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 教育文选

上 卷

卫道治 译
金世柏 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上 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上卷

卫道治 译

《丛书》责任编辑 肖云瑞

本书特约责任编辑 李月章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2 字数403,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33

平装本 ISBN7-107-10122-6/G·835 定价5.75元

精装本 ISBN7-107-10123-4/G·836 定价7.95元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译者说明

本书根据苏联教育科学院“教育”出版社1978—1980年出版的《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本)选译。吴式颖同志参与了本书的编选并担任审定工作。同时，她还为本书撰写了论文——《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作为本书的前言，并编写了克鲁普斯卡雅的生平事迹年表。金世柏同志参与了本书的审校。

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

吴式颖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雅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 1869—1939) 是苏联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她的教育活动和她的革命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 她对教育理论的探索也是和她的革命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

克鲁普斯卡雅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十分广泛。我们面前的这部教育文选, 选自苏联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 其中包括有关她成长道路的几篇著名的自传性文章、她在革命前撰写的主要教育论文和革命后发表的主要教育论文、报告、演说词等, 内容涉及教育史、欧美各国教育比较和国民教育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学前教育、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成人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这部著作就可以使我们知道, 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是何等博大精深, 她的胸怀是如何宽广。

一、革命家和教育家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于1869年2月14(26)日^①诞生在彼得堡

^① 括号外为俄历日期, 括号内为公历日期。

(今列宁格勒)。这时候，俄国虽已废除了农奴制，然而沙皇专制制度却依然存在，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中。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都很落后，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和苦难之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俄国的革命运动经过一段短期的沉寂之后重又活跃起来。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俄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是民粹派。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推翻沙皇的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却忽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他们在农村中的革命活动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民粹派的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出来的“民意党”主张通过恐怖暗杀手段来消灭沙皇专制制度，更加脱离广大群众。民粹派革命活动的失败促使革命者探求新的解放道路。

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经开始进行自发斗争。1875年和1878年，在敖得萨和彼得堡曾先后建立“南俄工人协会”与“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不久都遭到沙皇当局的破坏。1883年，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等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为俄文出版，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俄国。

克鲁普斯卡雅的父母虽出身于贵族，但“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生活异常艰难。克鲁普斯卡雅的母亲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离开学校之后就当了家庭教师。她的父亲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但不满足于现实。他“博览群书，不信鬼神，并且熟悉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形。”因此，在他们的家里经常有革命者来往，这使克鲁普斯卡雅从小受到革命情绪的影响。同时，克鲁普斯卡雅的父亲从1872年起就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解除了公职，他不得不为谋生而带着妻子和女儿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漂泊而贫困的生活使小姑娘获得了比一般少女更为广泛的

阅历。^①

当克鲁普斯卡雅11岁的时候，她因父亲的工作关系来到普斯科夫的一个女地主的领地。女地主的所作所为使她十分厌恶，这里的一位具有革命情绪的年轻女教师(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夫娜·雅沃斯卡雅)却很快地赢得了她的好感。这位乡村女教师的教学活动还激发了她对教育工作的强烈向往。

1880年4月，克鲁普斯卡雅父亲的案子得到了结，他被宣告无罪。翌年9月，父母送她到彼得堡私立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学习。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倾向“土地与自由社”，教师们经验丰富，思想进步，能给学生比较丰富的知识，并注意培养她们独立的工作能力。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她学习勤奋，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不幸的是，长时间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损害了她父亲的健康，不久他就因病逝世，克鲁普斯卡雅当时还只有14岁。为了帮助母亲，她只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要求她付出加倍的劳动。

1886年秋天，克鲁普斯卡雅以优异的成绩从奥波连斯卡雅中学毕业，又上了该校的师范班。一年以后，她获得了担任家庭教师的资格证书，留在该校的寄宿部当辅导教师，同时又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为一些学生补课。

从18岁开始，克鲁普斯卡雅已经在自觉地寻求自己的生活道路了。在她1887年3月写给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最近以来，我日益明显地感到，迄今为止我一直享受着别人用心血换来的劳动成果。我在享受这种成果并用一部分时间去获得知识的时候，心里曾想，以后我将用这些知识去为人们做些有益的事。”^②当时，克鲁普斯卡雅还曾向一位老民意党人请教：她应该怎样去帮助人民？这位民意党人建议她去教人们识字。她不满于这样的回答。为了解决使她焦虑的人

^①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②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生问题和增强自己的本领，克鲁普斯卡雅于1889年9月进入彼得堡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的历史语言系学习，兼听数学系的课程。就在这年秋天，她认识了一些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工学院学生，并且和米·伊·勃鲁斯涅夫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这里的活动使她的“眼界为之一开”。^①

1890年初，克鲁普斯卡雅离开了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详读《资本论》第一卷使她懂得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②她决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为了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她开始学习德文；为了同工人建立联系，她开始到斯摩棱斯克星期日男子夜校去从事无偿的教学活动。

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设在彼得堡的涅瓦关卡外，到这里来学习的是彼得堡一些工厂的工人。沙皇政府允许设立这种学校只是想给工人一点有限的文化知识，一些像克鲁普斯卡雅这样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师却用巧妙的方法向工人传播革命的道理，使它成了向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中心，结果使许多学生后来都参加了革命运动，而教师本身也从政治上得到了锻炼与提高。克鲁普斯卡雅后来写道：“从1891年到1896年，我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这几年的工作给我一生留下了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对我了解工人群众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几年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和逐渐巩固的时期”；又说：“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五年，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和工人本身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③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

③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俄文版第4卷，第16页；第2卷，第91页。

克鲁普斯卡雅是一位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人生目标既立，她决心坚持到底。正像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使我得到了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大幸福：我知道了应走的道路，对我的整个生命与之相系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前进的道路有时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我却从未怀疑过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我可能也有几步路走得不对，别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的。错误可以纠正，而朝向目标的运动却一往直前，如潮水汹涌澎湃。”^①

克鲁普斯卡雅的一生是竭尽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不屈不挠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一生。1895年秋，她参加了列宁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为该协会的核心成员，不久又参加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此，她遭到沙皇宪兵的一再逮捕和流放。同列宁相识（1894年2月）和结为终身伴侣（1898年7月）以后，她始终相随左右，成了他忠实的同志和得力助手。列宁对她的工作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帮助。还在他们共同的流放时期（1898年5月至1900年2月），克鲁普斯卡雅就为列宁抄写著作。他们两人还一起读书，翻译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关的英文和德文书籍。从这个时期起，克鲁普斯卡雅就帮列宁处理工作上的来往信件。她还陪同列宁走访流放中的革命同志，参加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各种讨论、争论，她也在家中热情地接待革命同志。1899年，克鲁普斯卡雅在列宁的建议、鼓励和具体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册子《女工》，这是俄国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侨居国外时期（1901年4月至1905年11月，1907年12月至1917年4月），克鲁普斯卡雅作为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工人报》编辑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与国内的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家保持着广泛而秘密的通讯联系，为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90页。

集聚与发展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她还和《真理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克鲁普斯卡雅多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会议，为捍卫列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克鲁普斯卡雅亲身参加了俄国1905年的民主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普斯卡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联共(布)第七次至十七次代表大会，并且参加了全俄和全苏的历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她参与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1924—1930年)、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9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37年)、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3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38年)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38—1939年)，她进行了大量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为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努力。

克鲁普斯卡雅始终把宣传列宁的伟大思想和革命实践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宁逝世以后，她每年都要发表一些纪念文章和演说，介绍列宁的革命活动，阐述他的观点。苏联学者认为，她撰写的《列宁回忆录》和其他文章是研究列宁的生平与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青年工人、妇女和整个年轻一代的教育始终是克鲁普斯卡雅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十分注意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上面提到的《女工》一书中，她就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家庭、学校和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1900年2月至1901年3月，她又撰写了《优秀教师的典型》、《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和《学校与社会》等三篇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将国民教育问题和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对教育理论的探讨和教育的实践活动在她第二次侨居国外时期的工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她担任过布尔什维克举办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杂志《教育》的编辑(1911年12月至1914年6月)，《女工》杂志

的主编(1914至1915年),参加了列宁在巴黎郊外龙寿姆村举办的布尔什维克党校的教学工作(1911年)。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在列宁的建议和支持下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俄国和欧美的教育理论,考察了西欧和北美的学校教育状况,完成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的撰写工作,为日后参予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创建工作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她还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33篇教育论文,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和资产阶级学校的阶级实质,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要求。克鲁普斯卡雅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俄共(布)党纲的教育条文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普斯卡雅一直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担负重要职务。从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创建之日起,她就是该部的部务委员,1917—1920年任社会教育司长,1920—1930年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或译政治教育总局)主席,1919—1932年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主席,1929—1939年任苏俄副教育人民委员,主管学前教育、成人学校、文化宫和博物馆等管理部的工作。克鲁普斯卡雅还领导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刊物《走向新学校之路》(1922—1932年任责任编辑)和1930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苏联青少年和儿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得到过她的有力指导。

在十月革命以后的22年中,克鲁普斯卡雅发表了大量论述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和教养内容、原则、方法的论文、报告和评论。据统计,克鲁普斯卡雅在世时,苏联报刊就发表过她在1901—1939年用俄语撰写的教育论文、演说词和评论将近1,600篇;在她逝世以后,从1940年至1965年,又陆续发表了她的300多篇遗著^①1957—1963年,苏俄教育科学院就编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一卷)。如上所述,苏联在七十年

^① 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遗产》,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6卷,399页。

代又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

苏联政府和人民充分肯定克鲁普斯卡雅对革命所作的卓越贡献和她对发展苏联教育科学与文化教育所起的巨大作用。1931年2月,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的参加者选举她为该院的名誉院士。1936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最高鉴定委员会决定授予她教育科学博士学位。在1929年和1933年,她先后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和列宁勋章。为奖励在年轻一代的教育和教学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苏联政府于1967年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章,第二年又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金,奖励论述教育与教学问题的优秀科学著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克鲁普斯卡雅在教育方面的建树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为奖励发展中国家在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组织与个人,教科文组织在1969年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金和荣誉证书。

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体系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候,美国和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西欧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勃然兴起,推动着各国的教育改革。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和“劳作教育”思想,由拉伊、梅伊曼和比内等人所推动的实验教育学等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思潮流传开来,和传统的教育理论(以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教育的管理体制与西欧大陆的教育管理体制(法国最为典型)相较,也有很大的差异。俄国在这时虽也跨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却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俄国教育和它的经济发展情况一样,都受着沙皇专制

制度的严重阻碍：国内居民中的文盲仍在75%以上，小学入学率只达20%，中、高等教育完全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整个教育体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教学崇尚书本、死记硬背，实行强迫纪律。俄国教育向何处去？它的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怎样才能得到彻底改变？它的国民教育应该如何发展？怎样认识和对待西欧与北美的新兴教育思潮和他们的教育经验？这一系列十分复杂的问题便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教育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当时，一般人总是离开政治经济的发展来讨论教育的发展，各种新教育理论的倡导者也都是避开教育的阶级性质抽象地谈论“人”或“公民”的培养。克鲁普斯卡雅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观点，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入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对面临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女工》是克鲁普斯卡雅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书是为发动妇女投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撰写的。她在第三章（本选集以《妇女与儿童教育》的篇名选入）专门论述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问题，并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想方案与革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

克鲁普斯卡雅尖锐地指出，俄国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完全是由俄国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决定的。她把俄国教育与西欧先进国家的教育作了比较，还用幼儿园的教育情况向俄国劳动妇女非常具体地说明，儿童的生活是可以按另一种方式来组织的，在西欧某些国家中存在这种先例。但是她同时指出了西欧教育的资产阶级实质及其局限性，进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教育将比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教育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但将为儿童组织良好的学前教育，还要对所有的儿童普遍进行社会教育，未来的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的、精力充沛的公民”^①。一切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俄国人民面临的首要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4页。

任务就是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进而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女工们不可能不珍惜社会教育的一切好处。母性的感情使她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使她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渴望工人阶级的事业取得胜利！”^①这既是她的结论，也是她对劳动妇女发出的号召。

克鲁普斯卡雅《女工》一书第三章的思想内容和论证方式在她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教育论文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这部书是在国外印刷出版后秘密运回俄国散发的，她毫无隐讳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在俄国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她写得比较隐晦，但基本思想仍然是非常明白的。例如，在《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和《学校与社会》中，她也是把当时俄国学校教学和教育中的问题（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强制的宗教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压制与摧残，等等）同俄国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联系在一起，并向教师们暗示：在沙皇专制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仅靠介绍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主张是无法改善学校教育状况的，一定要从社会条件中去寻找俄国教育落后的根源。在《论自由学校问题》一文中，她强调：学生和教师都应为一个共同的理想所鼓舞，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教师应该有自己的信念和热情，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实现共同理想，“做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②。为了做到这点，她建议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在教学中既当学生，又当教师，体现“教学相长”^③。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隐喻、类比和对照成了揭露沙皇反动政策和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对西方教育的比较研究。她在《论学校自治》、《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等一系列教育论文中大力肯定美国学校的一些进步之处，赞誉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4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同上，第37页。

义教育家霍勒斯·曼恩(Horace Mann, 1796~1859)在领导学校教育中的民主作风,高度评价了他在形成美国教育传统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法国、比利时等国家教育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克鲁普斯卡雅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因为这种管理体制和俄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具有某些类似之处。

克鲁普斯卡雅对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抱着强烈的兴趣,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使她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例如,她认为实验心理学借助于各种试验和仪器测量人的知觉的力量和速度、测量记忆能力和保持的时间,能提供有关儿童能力乃至儿童发展水平的客观材料;在实验教育学中虽有很多不科学的东西,但它使人们注意研究各种条件对精神能力发展的影响,确定其间的相互关系,“已显承出了光辉的远景”,^①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可取之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是俄国当时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内省心理学和思辨教育学的对立面,对它们的提倡有利于削弱内省心理学和思辨教育学对教师的影响。

克鲁普斯卡雅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也取分析态度。她在揭露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的同时,建议人们批判地利用它的某些教育原理。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学校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注意对儿童个性的研究,重视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在教学中注意依靠学生的兴趣、爱好,等等。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这些积极方面与俄国学校中的那种唯书、唯上、呆读死记、强迫纪律等严重脱离实际生活需要、扼杀学生个性的传统教育方式是截然对立的。克鲁普斯卡雅认为,美国许多学校的先进经验正是以杜威提出的这些原理为根据的,这些经验应该受到重视。1923年,克鲁普斯卡雅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了她的这种态度。她写道:“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倾向于把美国学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232页。

校和美国教育理想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国学校控制在沙皇政府手中，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这样的对比可以激发思考。”^①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克鲁普斯卡雅开始在合法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刊上发表教育论文，直接揭露和批判沙皇政府文教政策的反动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提出与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纲领。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1913年)是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重要论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她首先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学校作用的重视。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学校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感情产生影响。”^②其次，她说明了教育的发展决定于它们是掌握在那一个阶级的手里，是谁确定教学大纲、教学性质，谁挑选教师、考核教师，等等。她指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学校也就有很大的差异。在落后的加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是具有农奴制遗风的地主，那里的学校就充分表露出教权主义精神，而在极其自由、文明和工业发达的法国，神学课就被资产阶级道德课所取代，但是不论是在加尼西亚，抑或是在法国，国民学校都是统治阶级手里的一种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来按自己的需要教育人民群众的子弟。”^③关于工人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她提出了以下五点：

“第一，对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全体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学校应使儿童得到最广泛的全面发展：体育方面，其必要前提是让儿童的饮食富有营养，衣服穿得暖和；劳动方面，关键是让儿童参加生产劳动，从入幼儿园开始到高级学堂毕业为止，能受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智育方面，培养儿童能独立参加脑力劳动；社会方面，发展社会本能，养成集体工作的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3卷，第45页。

^②、^③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21、122页。

习惯和自治的习惯，等等。

第二，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即：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并保持充分的独立。

第三，民主地而非官僚主义地安排学校工作，广泛地吸收国民参加监督（他们选举教育委员会并监督其活动）。

第四，充分保证教师的信仰自由和结社的权利。

第五，国民有权接受用本族语进行教育，而无一定接受某种语言的义务。”^①这篇论文相当集中而概括地体现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前完成的一部最重要的教育著作，也是她的主要教育代表作。这部书是在1915年撰成的。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一年多，列宁早就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的结论，并为争取这一光辉前景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要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进行准备，要为教育战线进行准备。这一工作成了刻不容缓的工作……”。^②克鲁普斯卡雅正是为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献出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部苏联教育理论的经典作品。后来，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苏联初期的教育改革时曾这样写道：“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这部著作……是我们制定整个工作纲领的依据，无论是确立关于教育的新思想，还是这些思想的具体实施，乃至我们共和国成千上万所学校的具体教学工作和实际的教学进程，我们都是以她在本书中所阐明的思想为依据”^③。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部书对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22—123页。

② 同上，第150页。

③ 参见根·奥比契金等著，《克鲁普斯卡雅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苏联教育的影响。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据有重要地位。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第一部教育专著。克鲁普斯卡雅在书中对国外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的思想和当时的各种资产阶级教育思潮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并列专章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理论。书中的这些成就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克鲁普斯卡雅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着重地论述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她在初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克鲁普斯卡雅高度评价了卢梭、裴斯泰洛齐和欧文的教育思想，认为他们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和解决国民教育问题的，因而重视劳动的教育意义，“他们把生产劳动作为自己教育体系的基础。”^②她指出：在卢梭的教育名著《爱弥儿》中充满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崇高敬意；他把劳动视为每个人的社会义务，把劳动看作发展儿童智力并使他们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他主张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希望他的学生‘能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③。她认为，卢梭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民主的。

克鲁普斯卡雅强调了卢梭的教育思想对裴斯泰洛齐的影响。她写道：裴斯泰洛齐是瑞士思想家中受《爱弥儿》影响很深的一个人，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努力与劳动人民接近，研究他们的生活条件，试图通过教育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认为学校应该与生活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并从生活本身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55页。

^② 同上，第314页。

^③ 同上，第167页。

吸取教育方法；劳动可以形成人的智慧和性格，学校应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使他们受到全面的劳动训练。克鲁普斯卡雅断定，“裴斯泰洛齐大力提出的根本主张，即生产劳动应该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是完全正确的。”^①

克鲁普斯卡雅把欧文称为工人之友，指出欧文一生都在考虑和设法使工人摆脱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地。她比较了欧文和裴斯泰洛齐教育观点的异同：两人都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裴斯泰洛齐更强调人是劳动条件的产物，欧文则认为人一般地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包括劳动条件在内；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他所理解的教育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欧文认为只有改变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才能使人民摆脱非人的境地。克鲁普斯卡雅用裴斯泰洛齐和欧文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裴斯泰洛齐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瑞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里还处在萌芽状态，欧文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来说明产生这些思想差异的原因，同时也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介绍了欧文提出自己教育主张的社会历史背景。她还介绍了约翰·贝勒斯（1654—1725）的劳动教育思想 and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各种教育法案中的劳动教育主张。

克鲁普斯卡雅断言，工人阶级是贝勒斯、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②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的直接继承者。她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教育观点，强调马克思认为吸引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是进步现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和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80页。

② 拉瓦锡（Lavoisier，1743—1794），法国十八世纪化学家，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提出了一个旨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教育计划，要求对学生进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

法。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主要功绩是指出了这些思想和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指出了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将会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创造必要条件。

克鲁普斯卡雅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教育的命运不取决于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取决于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他们把国民学校视为使人民群众听命于政府当局的工具。”^①她谈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需要一批既能干活、又很听话的工人，于是，贝尔-兰喀斯特式的学校流行起来，“读书学校”成了学校的唯一模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思想一度消沉；而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竞争和现代战争又迫使资产阶级改组国民教育工作，把读书学校改变为劳动学校。克鲁普斯卡雅强调，资产阶级的劳动学校并不是工人阶级理想的劳动学校，即使是最先进的美国学校，也“并非完满无缺。不应忘记，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已达白热化的程度，阶级纷争极其尖锐，有时还采取了极其激烈的形式。凡此种种，肯定会对学校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无疑打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向青年一代灌输的观点往往与工人民主制度的观点很少一致的地方”。^②“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末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③，这便是克鲁普斯卡雅的结论。

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劳动教育思想和国民教育发展历史的这种总结与概括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她大力肯定劳动的教育意义，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这都是正确的。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314页。

② 同上，第317—318页。

③ 同上，第249页。

她的这些思想对苏联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把读书学校与劳动学校绝然对立的提法容易造成思想混乱，认定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的思想也是不科学的。

三、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的发展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是以一位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具有深厚理论修养的教育家走上苏联教育工作领导岗位的。她已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她参予领导的苏联初期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中受到了检验，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育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的指南；用分析的态度对待教育的历史遗产和各国的教育经验；明确宣布社会主义教育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强调学校与生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重视学生世界观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重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注意学生在教育和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强调人民群众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在她有关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和成人文化教育的论述中均有体现。

论学前儿童的教育 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关心学前教育。她常说，童年的生活与印象对人的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十月革命后，她十分重视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这是她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第一篇教育论文)一文中，她谈到应该从儿童幼年的时候起就注意加强与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使他们学会观察周围的世界，学会用各种方法(动作、语言、面部表情)表达自己获得的印象；要让儿童用粘土、铅笔、纸张和各种建筑材料从事工艺活动，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考虑到“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都不能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和儿童的创造力”，她建议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以便把所有的学前儿童

都纳入其中，使他们的个性都得到发展。^①在以《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为题发表的报告中，她又说：“3—8岁时的印象对儿童的心灵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这一年龄阶段的社会教育特别重要”，学前教育机构的建立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人和农民从照顾儿童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②从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年代起，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就设立了学前教育处，主管学前教育工作。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的指示性文件中，也强调了发展学前教育的必要性，这都是和克鲁普斯卡雅重视学前教育的思想分不开的。

克鲁普斯卡雅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等一系列论文和报告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她强调：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和组织起来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采而又愉快欢乐的社会生活。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这种人，没有这种人就不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③她认为，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和中学都应遵循“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的方针，它们是“彼此密切联系的一般发展上的若干环节”^④。

克鲁普斯卡雅发表过许多专门讨论幼儿教育问题的文章和讲演。她强调，对托幼机构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为保护儿童的健康而斗争”，要养成他们的卫生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使他们的身体得到锻炼，儿童的饮食起居要有规律，幼儿园的伙食应简单清淡，但要保证营养。^⑤总之，按照她的意见，学前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要“努力造就身体健康的一代人，要让下一代从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11页。

② 同上，第213页。

③ 同上，第10页。

④ 同上，第13页。

⑤ 同上，第5卷，第71页，第72页。

小身强体壮”^①。

克鲁普斯卡雅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德育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她强调自幼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要用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培养起良好的行为习惯。她反对对儿童进行枯燥的说教。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上(1926年)，克鲁普斯卡雅批评向儿童抽象谈论阶级斗争的现象。她指出，童年往往能理解许多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但是我认为，不能由于我们童年时代能接受一些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就得对孩子们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谈话。如果我们对五岁的孩子讲什么阶级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②又说：“我当然是竭力主张儿童应尽可能多从生活中获得一些印象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在幼儿园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使儿童以后能消化这些材料，那我们走的路子就会更加正确一些。”^③克鲁普斯卡雅这里指的是要正确地组织儿童的生活与活动，不要使学前儿童与社会生活隔绝开来。“幼儿园要多给儿童一些乐趣，以便儿童回忆起在幼儿园时就感到无限光明和温暖”；可以让儿童“参加游行，到工人俱乐部去玩，经常与女工、农妇和少年先锋队队员见面——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对幼儿发生作用”^④；要让儿童“养成友好地集体地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使孩子们不是把‘我’放在首位，而是把‘我们’放在首位”；应该让俄罗斯民族的儿童多了解少数民族儿童的有趣生活和游戏，安排各族儿童经常交往，“使他们从小建立起友谊”^⑤。

克鲁普斯卡雅十分重视对幼儿的智育。她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中论述开设足够数量的幼儿园的必要性时，就是从智育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6卷，第272页。

② 同上，第3卷，第35—36页。

③ 同上，36页。

④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89页，393页。

⑤ 同上，第5卷，第74页，第6卷，第272页。

问题谈起的。《论儿童的学前教育》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全苏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1931年),她在其中全面地讨论了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工作。正是在这篇演说里,她指出:“我们既要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同时也要把他们培养成智力发达的人。”^①她要求学前教育工作者千方百计地扩大儿童的视野,充实他们的生活经验,培养他们对技术的兴趣,引导他们观察和了解自然与社会环境,唤起他们的思想,发扬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克鲁普斯卡雅反对让儿童盲目模仿,她认为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弊端之一。她主张通过艺术、游戏与劳动等活动来发展儿童的智慧。

克鲁普斯卡雅赋予游戏以极大的教育意义。她指出,“对学龄前儿童来说,劳动就是做游戏”,“有许多游戏可以锻炼身体,发展劳动熟巧,提高眼力的精确程度,使人机智灵巧”。^②游戏还有助于培养儿童的注意力和观察能力,养成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习惯。克鲁普斯卡雅要求学前教育工作者认真地选择游戏,对儿童的游戏加以指导,“应该在研究周围生活的同时,寻找在生活和游戏之间架设桥梁的形式”^③。与游戏相联系,她谈到儿童的玩具问题,并为此撰写了专题论文。克鲁普斯卡雅写道:“我们谈论儿童玩具这一问题时,不能从成人喜欢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从儿童喜欢什么玩具和需要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来对待儿童玩具的问题。”^④幼年儿童不熟悉周围环境,“他们往往通过观察、摹仿和不断地重复同一动作、词语、游戏的方法来认识周围的环境。我们要注意儿童的主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就给他们一些能够发挥其主动性并把这种主动性组织引向一定轨道上的玩具”^⑤。幼童不会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5卷,第75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同上,第199页。

④、⑤ 同上,第6卷,第170页。

很好地分辨各种颜色、区别物体的大小，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分辨各种颜色和区别大小的玩具。应该给幼童提供一些能够使他们增长对距离、形式、音色和物质的各种性质的感觉的玩具。要“让儿童有一个普通的、打不破的、非畸形的洋娃娃，使他能给这个洋娃娃洗澡、洗脸、穿衣、脱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系带子、钉扣子。洋娃娃应该是最普通的、最便宜的，但是要非常好看，而且不容易弄坏，弄走样。”^①如此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对儿童玩具的制作和选择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它们既是从儿童的兴趣、需要出发的，也是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出发的。“不要在玩具的装璜上煞费苦心，重要的是朴素大方、价廉物美”^②，要给不同年龄的儿童制作和挑选不同的玩具。^③“使儿童在幼儿园里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要给他们买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或者是一些机械构造很复杂的玩具”，“评价一个玩具的价值，应该看这个玩具是否有助于研究周围的生活，是否有助于发扬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④，这就是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儿童玩具的主要意见。

克鲁普斯卡雅有关学前教育的论述，反映了她对广大儿童的热爱和对学前儿童年龄特征的深刻了解。热爱儿童、了解儿童，这也是她对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嘱咐。她经常说，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必须使儿童生活幸福，“愉快的童年可以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④。但是她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如果认为要使儿童幸福就得尽量给他们买一些贵重的玩具，吃最可口的点心，每天领他们看芭蕾舞，看戏和电影，穿丝着绸，讲一些荒诞无稽的故事，那就十分可笑了。”^⑤问题是要深入地了解儿童，要“钻到儿童肺腑里去”，了解他们的兴趣、需要，而不要把成人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6卷，第171页。

② 同上，第172页。

③、④、⑤ 同上，第211、208、195页。

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儿童；要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只有理解了儿童，才能给他们以真正的慈母般的关怀，使他们成为幸福的人。”^①她要求人们“尊重儿童的权利，首先是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受他们那一年龄阶段所需要的那种教育的权利”^②，批评有些学前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不照顾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点。为了做好学前儿童的教育工作，她号召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并指出：国家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发展多种形式的托幼机构，国家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要加强与家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联系，应该把对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联系起来，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对幼儿进行正确教育和传播学前教育思想的模范，“要把学前教育战线变成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战线。”^③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苏联的学前工作者也可以从福录培尔、蒙台梭利等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著作中吸取营养与经验。^④

改革普通学校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 改革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脱离实际生活需要、脱离生产劳动的旧式等级-阶级学校教育体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的学校教育体制，这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教育战线面临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十月革命之初，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全俄教师联合会公开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联合会的上层人物组织教师罢教和各种集会，出版刊物，反对并破坏教育改革；以波格丹诺夫^⑤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又从极“左”方面进

①、②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6卷,196页;第5卷,第194—201页;第6卷,第161—162页。

③ 同上,第6卷,第215页。

④ 同上,第2卷,第12页;第6卷,第197页。

⑤ 波格丹诺夫(1873—1928),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曾一度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公开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宣扬马赫主义,十月革命初期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提出反对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反对继承文化遗产和离开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实践而用实验室的办法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等一系列错误理论,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

行干扰。克鲁普斯卡雅在这时坚持了既反右、又反“左”的正确立场。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以及《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1918年)等其他文章和演说中,她深入地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教育的阶级实质和沙俄学校教育政策的反动性,捍卫学校的统一性和世俗性,论证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她指出:在改革教育时必须重视资产阶级教育家的合理意见,参考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的办学经验^①。在《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1920年)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2年)等一系列论文中,克鲁普斯卡雅深入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文化遗产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和他们的宗派主义倾向。她反对阶级出身决定论和阶级利己主义,并指出:“并非每一个无产者都是很有觉悟的人,并非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心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有些无产者满脑子小市民的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对无产阶级的理想、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格格不入,只是无产阶级出身这还不够,无产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要有阶级觉悟”,还提到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谋取特权,而是“为了消灭一切剥削现象,一切压迫现象”,无产阶级在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应对别的阶级施加影响^②。在《浅论教师》一文(1923年)中,克鲁普斯卡雅批评某些具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不信任教育专家的错误,反对乱扣帽子,提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主张团结一切忠诚于国民教育事业的专家学者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学校而共同奋斗。

与沙俄时代的旧式等级-阶级学校相对立,克鲁普斯卡雅认为新学校必须是民主的、统一的和非宗教的。十月革命初期,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学校的民主化和非宗教化。1918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1页、14—16页、21页。

② 同上,第2卷,122—126页。

年一、二月间，废除了旧的国民教育管理体制——学区制，撤销了学堂管理处和视察处等旧时的教育领导机构，全部学校由中央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地方上的教育厅、局、科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在学校里建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它主持工作。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把教育和教养事业从宗教机关转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法令，决定将原来隶属于教会的所有学校全部改为普通学校，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令，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取消了公民由于隶属于某种教派而受到的限制或享受的特权，禁止在任何学校讲授宗教教义、举行宗教仪式和典礼。发布了肃清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的命令，取消了从前妇女在教育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决定从1918年5月31日起实行男女同校。这些措施与克鲁普斯卡雅参予制定的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中的教育条款和1917年由她拟定的社会民主工党(布)党纲修改草案中的国民教育条款的民主精神完全相符^①。她在党纲修改草案中还提出了“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的要求，^②它成了十月革命后深入进行普通教育改革的所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标和指南。

从1918年春天开始，到1918年10月，克鲁普斯卡雅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一起领导了苏联第一个普通教育学校规程的制定工作。这个文件在1918年10月16日以《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名称公布。与此同时，还发表了《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在苏联教育界通称《统一劳动学校宣言》)，对《规程》的基本精神作了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修改草案(《修改党纲的材料》)是列宁在1917年四、五月间提出的，他在《修改党纲的材料》序言中指出，党纲修改草案中有关国民教育的条款及说明都是克鲁普斯卡雅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纲修改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4卷，中译本，第424—44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9页。

详细阐释。在这些文件中，确立了苏维埃普通学校的各项民主原则，强调了苏维埃学校与无产阶级政治的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在《宣言》中指出：“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靠庸俗的千篇一律的作法、人为的训练、宗教或美学的欺骗，而是靠现实利益的一致……教育培养方面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以乐观的、牢固的同志关系为基础的、团结的学校集体。这个集体要在少年儿童身上养成适当的习惯，培养广泛的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使学生真实地感到自己是这个伟大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使这种精神在儿童心灵中扎下根。自觉遵守纪律、互助精神、联合起来工作、建立在完全平等原则上的自己管理自己，凡是做得到的地方都要实行集体活动的原则，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以创造共同的成果——这就是我们学校教育的原则，借助这些原则再加上以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是资产阶级学校任何时候都培养不出来的，因为资产阶级学校只会培养利己主义者和驯服的绵羊。”^①《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宣言》中的这些思想和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以前与革命初年发表的有关普通教育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克鲁普斯卡雅在论述学校教育的文章和演说中坚持与发展了自己教育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她发表了《列宁和国民教育》(1926年)、《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1927年)、《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时间对文化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言论》(1931年)、《列宁在为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1932年)、《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1933年)、《行动的指南》(1935年)、《弗·依·列宁和国民教育问题》(1938年)等一系列文章与报告，介绍列宁的教育理论和他怎样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化教育现

^① 转引自《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84页。

象，还写了《马克思论年轻一代的教育》(1933年)和《马克思的学说是苏联教育工作者的行动指南》(1938年)等长篇论文，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

克鲁普斯卡雅始终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教育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思想。她竭力反对旧学校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抽象的学习方法，提倡学校与生活联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良好学风，要求通过教学和学生的课外、校外活动培养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集体主义精神，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与劳动教育。她写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虽然也开办了一些群众性的学校来授予一定的知识，但是资产阶级把这些知识授予新一代的目的，是想通过学校来模糊他们的意识。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学校所抱定的是另一种目的：学校把知识传授给青年，同时也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培养成能够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才。”^①又说：“在旧时的学校里，一般来说，理论总是与实践脱节的。一些与实践有关的好的见解只是顺便时才提一下。实践作业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某一理论原理。这样一来，就使学习脱离了生活，使学习变得很抽象。苏维埃学校从建立的初期开始就竭力使理论变成行动的指南。”^②她认为学校“不应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单位，而应该与所在地区、与全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应该对生活起作用”、“学校要正视生活，积极地干预生活”、“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帮助青年一代按崭新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上改造整个生活。”^③在《论中学》的讲话提纲中，克鲁普斯卡雅将七年制学校的办学方针归结为：“一、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学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5卷，第134页。

②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两卷集)，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506页。

③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82、106、321页。

生，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今后进行普通教育学习所不可或缺的；二、教学生学会把知识运用于生活；三、授予学生一般的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体工作的能力；四、给儿童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五、养成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①。这是她对普通学校教育任务的集中表述，也是全面发展思想的具体化。

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强调，必须使儿童和青少年受到比较全面的普通教育，要让他们获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知识。她认为知识对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素质、工作能力和形成年轻一代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绝对必要的。克鲁普斯卡雅在《一级学校的任务》(1922年)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小学的教学任务和内容。她指出，小学面临的一项任务是：“授予儿童一定的知识和熟巧，使他们有可能在今后进一步自学，有助于他们参加人类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②。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为小学提出了相当广泛的知识、技能、技巧的范围，其中包括读和写的 ability；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的技能和各种量的相互关系的知识(算术和初等几何)；初步了解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基本概念)；有关人体构造的初步知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关于当代各国人民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有关本国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状况的常识；粗浅的历史知识，等等。在她看来，青少年所需要的普通教育知识应当比通常人们所想的更加广泛和深入。她强调，没有普通教育的知识基础，就不可能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她指出：“必须通过顽强的学习来获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了了解周围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不致在乍看起来不能理解的局势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这个基础是必不可少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4卷，第64页。

^② 同上，第2卷，第104页。

的。”^①

如何把这样广泛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这就牵涉到编制教学大纲的问题。在《统一劳动学校规程》颁布之后，由克鲁普斯卡雅领导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一直为编制新的教学大纲而努力。1924年颁布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至四年级）和1925年出版的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五至七年级）教学大纲汇编是这种努力的第一批成果。在一级学校的教学大纲里，教材不是依据学科教学的原则来组织，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联结起来的。每个主题（或称单元）都从三个方面选取材料（一、自然界、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二、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利用；三、社会生活），进行综合教学。二级学校的大纲保留了分科制（分社会、自然、物理、化学、数学、本族语、文学、地理和外语等课程），但要求每门课程的教材安排体系服从共同的主题。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制定的这种教学大纲被称为综合教学大纲（或译单元教学大纲），它们在苏联一直使用到1931年。大纲的最初构思是由克鲁普斯卡雅提出的。她在《论学校建设》（1921年）中写道：“共产主义学校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在由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教学的基本中心应该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国内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进行研究。学校的劳动性质就体现在这里。”^②在《谈教学大纲问题》（1922年）一文中，她进一步阐述了编制新大纲的基本原理。克鲁普斯卡雅强调：“人们的劳动活动应该是整个教学大纲的一个重要轴心”，“要把学习人们的劳动活动当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的基础”^③。关于“学习劳动活动”的概念，她作了如下的解释：“对‘研究劳动’这一概念，我们是从极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的。为了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研究这一活动的客体——自然界和自然力；其次，必须研究人作用于自然（技术）的方式；最后，还要研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97页。

^②、^③ 同上，第81页，第112—113页。

究这一活动的主体——人。既要把人当作动物界的一员来研究，又要把他当作人类社会的一员来研究；既要研究他的肉体需要，又要研究他的社会需要。而为了了解后面这种社会需要，就必须懂得当代社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道当代社会发生、发展和前进的方向。”^①克鲁普斯卡雅在这篇文章中对一级和二级学校教学内容的安排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她指出，一级学校的宗旨是授予儿童从事劳动活动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并使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兴趣。必须培养儿童流利地、连贯地、详细地讲话的熟练技巧。要教会学生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绘画、雕塑、唱歌、游戏在一级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这是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获得经验的手段，是组织和表现自己感受的手段，因此应该使它们为教育的目的服务。”^②在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五至七年级)，学校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使他们能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劳动，自觉地对待各种自然和社会生活现象。”^③要研究劳动活动的基本领域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还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艺术史、本族语和外语。自然学科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要面向人们的劳动活动，要与这一活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要特别注意卫生课的教学。同时，自然学科的教学要为学生的世界观打下基础，要讲述地球的起源，阐明地球的历史、物种和人类的起源。要使学生充分掌握各门知识的研究方法。在二级学校的第二圆周阶段(八、九年级)，要实行分科教学，使“学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熟悉他们所选择的知识领域，更好地掌握该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圆周阶段应该使学生尽可能独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并养成对所选择的知识领域的专门兴趣”^④。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理解，对材料的综合安排，这只是组织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113页。

②、③ 同上，第117页。

④ 同上，第119页。

教学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她认为，重要的不是形式和方法，而是教材内容的选择。此外，她认为只有在最初几年的学习中才能完全采用综合教学法，而在以后的各个年级中仍然保留分科教学，但要反映综合教学思想，因为在按课程划分时仍应使各学科成为统一的整体，在各门课程之间要建立起内在联系。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并有利于形成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综合教学大纲虽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的集体创作，但大纲的编制与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克鲁普斯卡雅教学理论的具体体现，这里既包含着她关于教学法的许多光辉思想，也反映出她深受“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这一不科学的思想的困扰。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的编者指出：“执行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时期是从原则上改革和更新学校教学内容的重要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到三十年代初期，苏联学校已能保证学生具有相当广阔的社会政治视野和总的发展水平，而这是革命前的和资产阶级的学校所不可与之比拟的”；“但是，中小学校有一个根本的缺点未能克服，就是它为中等技术学校 and 高等学校输送的人才水平还不够高，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得还不够牢固”^①。苏联教育史方面的许多研究者也持类似观点。学者们在教育史著作中写道：“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是非常矛盾的。从一方面说，它们使学校接近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为培养学生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材料，扩大了儿童的社会政治视野，并使他们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大纲的综合编制未能保证学生获得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知识……。”^②苏联学者对综合教学大纲的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注释，见第416页。

② 康斯坦丁诺夫、麦丁斯基、沙巴耶娃著：《教育史》，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它们与克鲁普斯卡雅自己后来对这种教学大纲的认识也基本上一致。

综合教学大纲的确具有某些优点，它们使苏联的学校教育变得生动活泼了。但其缺点也异常严重，它们在实践中迅速地暴露出来。克鲁普斯卡雅在1927年的一次讲话中已经谈到，苏维埃学校还没有做到使儿童牢固地掌握知识，这是学校必须做到的“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教育”^①。1929年6月，她又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科学和文化蓬勃而迅速的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求人人识字，而且要使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教育素养和综合技术素养……社会主义为每一个人开辟了通向知识的道路。”^②针对当时苏联教育界中一些教育家迷恋实践、轻视学校作用和忽视理论教学的现象，克鲁普斯卡雅1930年在以《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为题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学校消亡论的错误，1931年又多次发表文章或报告批评对待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她写道：“如果说在旧时学校里，实践所起的是微不足道的作用，只是用来说明某些理论，那末现在却出现另一种危险，就是过于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理论。只从理论中找出那些对此时此地的实践有用的东西”。克鲁普斯卡雅号召大家警惕实用主义的危害，要求不降低教学大纲的理论水平。^③三十年代以后，她发表《党的最重要的决定》、《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为提高学校工作质量而斗争》等文章和报告，强调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指出：“不能把劳动置于知识之上……应该用渊博知识的光芒来照耀劳动，理解劳动，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肯定教学跟生产劳动结合必须在学生的一切社会生产劳动服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3卷，第219页。

② 同上，第4卷，第58页。

③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第506—516页。

从于学校的教学和教育目的的基础上进行。^①在《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等专门论述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的文章中，克鲁普斯卡雅谈到了综合教学大纲的缺点，指出它们模糊了各门知识之间的实际联系与中介，而把许多相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损害了系统的理论学习。不过，她仍然强调，采用分科教学制度并不意味着要在各门课程之间筑起一道高墙，而应以各门学科的共同目的为中介，“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股力量巨大的内在联系”^②。“教学法要想安排得很正确，就应该从该门课程的实质出发，以研究这方面的知识的发展史为基础，以学校的目的为转移，以科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成果和对儿童及其年龄特征的全面理解为基础，并且还以这些特征在适应该时代的环境中所表现的情况为基础”。这是克鲁普斯卡雅根据苏联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实践得出的新结论^③。

论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在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据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据统计，她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和演说在100篇以上。

如前所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特别是从十月革命以后到二十年代前期，克鲁普斯卡雅一直认为，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1927年后，她逐渐地摆脱了这一思想的困扰，对理论与实践、教育与劳动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科学的论断。

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强调劳动的教育意义。她认为只有使儿童从小习惯于劳动生活，学会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掌握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本领，才能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益成员。儿童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个性，通过劳动活动认识自己。“劳动的重大教育意义还在于儿童可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册，第359页。

②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5卷，第189—190页。

③ 同上，第191页。

力”^①，特别是集体的生产劳动，还可以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精神、内在纪律、组织能力及其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克鲁普斯卡雅特别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她写道：“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教育问题。他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杠杆；这种综合技术教育是全面教育的必要条件，”如果学校能够很好地组织儿童和青少年参加“有科学根据的各种集体劳动”，使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②。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劳动的教育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学生劳动的组织。她在《社会教育》一文(1923年)中对集体劳动作了这样的解说：“……既能在体力劳动方面，又能在脑力劳动方面集体地进行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习惯……集体地进行工作并不是说大家都在一个地方从事同样的一件工作，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合作形式。所谓集体的工作是指具有共同目的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可以、甚至要进行一定的、通常还是非常复杂的分工。”她要求学校教儿童学会给自己的工作提出一定的目的，“起初是简单的、起码的、眼前的目的，以后再提出比较复杂的、遥远的目的”。学校还应该教学生学会制定工作计划，“教他们准确地确定实现既定目的的最经济的、迅速的方法，仔细估量实现目的的手段(包括自己的力量在内)，然后又准确而迅速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并教他们在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以求共同目的的实现^③。克鲁普斯卡雅以后还多次谈到让儿童学会这种“集体工作的技巧”问题。这就要求学校和教师进行大量而细致的组织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使学生自己也获得组织经验而不是简单地让他们参加劳动。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劳动组织工作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苏维埃学校不是要培养劳动任务的简单或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46页。

② 同上，第44页。

③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第287—289页。

盲目的执行者，而是要培养生活的主人和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意见，学生的劳动活动决不能只局限在学校的范围以内。学校必须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同家务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以及生产劳动结合起来，通过校内外的各种劳动活动使学生深入了解各种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不过，她认为学生的各种劳动活动一定要由学校根据教育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来组织。幼年儿童的劳动常常带有游戏的性质。例如，制作小船或飞机模型，等等。“成人最好别去干涉这种游戏性的劳动”，可以给他们出些主意，但不要过多地干涉他们，妨碍其主动性的发挥^①。在组织学生的生产劳动时，一定要照顾到他们的年龄特点，不能“把七岁的孩子与成年人同等看待”。^②有人主张让儿童按集体农庄的任务和命令进行生产劳动。克鲁普斯卡雅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意见。她说：“儿童劳动按集体农庄命令进行，这意味着什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管理处并非一个能从教育学的角度处理这种问题的单位”，而且，只让儿童从事一些极其单调乏味的劳动，使他们得不到任何提高，这样来安排学生的劳动活动，与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③。克鲁普斯卡雅还批评了让五年级学生到工厂去参加生产劳动和在儿童中开展劳动竞赛等过火的做法。她指出：“我们往往损伤儿童的力量，让他们做些力不胜任的工作，我们一点也不考虑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我们常常把用于成人的竞赛方式用到儿童身上，采用与成人完全一样的形式，而不考虑是否有什么别的形式适用于儿童”；“参观，在工厂里干少部分工作——这是一回事，而经常从事现代技术所要求的繁重的工作，这又是一回事。如果你把儿童弄到传送带旁边去工作，而在这里工作又是一点也不能休息的，那你就损伤了儿童的力量。”^④她号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第429-430页。

②、③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4卷，第188页。

④ 同上，第329页。

召教育工作者研究儿童，了解儿童，从有利于儿童的一般发展出发来安排他们的劳动。“要使劳动是儿童既有兴趣又能胜任的，同时还应是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机械性的劳动”，要使它安排得既能教育人，又使他得到更高的发展^①。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实施和用现代技术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任务的提出，越来越显示出综合技术教育的优越性和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迫切性。1930年前后，克鲁普斯卡雅发表了许多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专题论文和报告，详细地说明它的意义、内容和进行这种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克鲁普斯卡雅强调，“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工业化的工具”，因为工业化是群众的事业，只有普及综合技术教育，“全国才能工业化”^②。她还说：“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激发了群众（其中包括儿童）对技术的兴趣，这就给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发挥这种兴趣并为它打下科学基础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我国各级机关，从幼儿园开始，都不应扼杀这种兴趣，而应通过对有关事实的概括，通过对这些事实的科学思考，通过出版有关读物，通过参观和观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等等来千方百计地培养这种兴趣。应该用现代技术的理想来吸引儿童”^③。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理解，综合技术教育不是让学生获得某种单一的技术或多种手工业，也不是让他们了解与别的生产部门脱节的某一生产部门。即使是研究某些现代的最高的技术形式，如果不和对科学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不了解并且明了各个相互联系着的生产部门，也不能算是综合技术教育。所以她说，综合技术教育乃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其基础是从技术的各种形式、发展和联系中来研究技术，并用理论来说明生产过程，这里“包括对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的工艺学’的具体的自然界的研究，对材料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4卷，第266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同上，第40页。

工艺学的研究，以及对生产工具及其构造的研究，对动力学的研究。这里还包括对经济地理的研究，开采和加工方式对社会劳动形式的影响以及社会劳动形式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①正因为如此，不能把综合技术教育看作一门特殊的学科。“它应该贯穿到各门课程里去，体现在物理、化学、自然课和社会学的选材上。这些课程互相之间应有联系，特别是这些课程要跟劳动教育联系起来。”^②克鲁普斯卡雅还指出，不应把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生产劳动的联系归结为从生产领域选些零散的事例来说明某些理论原理，而应该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及其相互联系中揭示对一切生产部门都起作用的现代技术的基本原理。要教会学生观察，并通过试验、实践，特别是劳动实践来检验自己观察的结果，从中得出一定的结论。要防止手工业倾向和对待理论的功利主义倾向。要让学生生动地了解科学是巨大的生产力，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在技术和工艺过程中的实际运用。当然，在综合技术教育过程中也要授予学生一般的劳动技巧，例如，能够给自己的劳动提出一定的目的，能作计划，会计算、制图，能合理地安排集体成员之间的工作，互相支持，节约材料，爱惜工具，等等，但他们还“需要另一种技能，就是把生产劳动同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技能。”^③由此可见，克鲁普斯卡雅所说的综合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是紧密结合的。

克鲁普斯卡雅还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她指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跟职业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里，重点是理解劳动过程，发展把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发展理解一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能力，而在职业学校里，重点是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巧。”^④她强调，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4卷，第40页。

② 同上，第41页。

③ 同上，第317页。

④ 同上，第42页。

从当时来说，培养工匠和半工匠的职业学校虽仍然必要，但这里的教育也不能与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相对立。如能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则不但能使学生迅速而牢固地掌握某种职业技能；还能使他们获得适应现代生产特点的能力。因此，她不仅要求把苏联的普通学校都办成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而且提倡举办以综合技术教育为基础的职业学校。她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经常谈论普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预示着在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互相接近。

克鲁普斯卡雅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例如，加强造型艺术和制图的教学，以巩固学生的形象思维和视觉记忆；在校内组织小型工厂和实验园地，并且与周围的工厂、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挂钩，使学生在校内外的生产劳动互相补充；组织学生到电站、拖拉机站、各种工厂去参观，以扩大他们的综合技术眼界；建立校外的儿童技术站、少年宫、俱乐部和图书馆，扩大学生的活动场所，等等。在有关著作中，她还向读者介绍了西欧和美国的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情况，主张批判地吸取他们的工作经验。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为了顺利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最重要的还是要宣传群众，要使工人、农民、教师、经济工作者都懂得综合技术教育的意义，知道为了推行综合技术教育需要做些什么，还必须吸引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来帮助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她强调，“只有依靠共同的力量，才能建立这种学校。”^①

论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 克鲁普斯卡雅十分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如前所述，她坚持必须改革旧俄的教育体制，建立统一劳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保证年轻一代思想品德的健康成长出发的。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4卷，第305页。

在克鲁普斯卡雅看来，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身强体壮，能够手脚并用，他还应该是科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新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者，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苏维埃国家的公民，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这就是她所理解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因此，她把培养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信念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指出学校必须“从思想上来影响儿童，并在他们身上逐渐奠定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使共产主义事业成为对他们亲切易懂的东西。”^① 克鲁普斯卡雅特别重视集体主义思想情感的培养，提出了“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的任务。她写道：“资产阶级力图把自己的儿童培养成个人主义者，使他们把‘我’置于一切之上，使他们跟群众对立起来。我们却努力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全面发展、身体强壮、认识明确的人，他们不应是个人主义者，而应是集体主义者，他们不和集体对立，而能成为集体中的一部分力量，并能把集体的意义提到新的高度来认识。”^②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集体主义精神是新的社会关系的生动体现，它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并不矛盾。“儿童的个性只有在集体当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集体不会消灭儿童的个性，但能够影响教育的性质和教育的内容。”^③ 克鲁普斯卡雅还指出，集体中的各种关系与活动既可以发挥儿童的聪明才智，又能扩大他们的眼界，加深他们的认识，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在集体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最容易培养儿童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感。所以她说，“学校应该是集体主义教育的基地。”^④

克鲁普斯卡雅对无神论的教育和自觉纪律教育也作了深刻的论述。

克鲁普斯卡雅在德育的原则和方法上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58页。

②、③同上。第307页。

④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三卷，第54页。

解，其中主要是强调理论与实践一致和在教师的指导下发挥儿童与青少年的自我教育作用。

克鲁普斯卡雅肯定知识在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念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她强调，知识还不等于信念。一定要使知识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机会，使儿童获得亲切的体验。在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时，克鲁普斯卡雅还反对机械的道德说教，提倡做细致的工作和学生独立思考。她指出：“要让孩子们学会考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深入思考每一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①。克鲁普斯卡雅具体地说明了机械说教的害处：青少年时期是自立的年龄阶段，经常以探究的眼光考察着自然和社会的复杂现象，他们对各种道德说教，对强加的观点极其反感，机械的说教只能带来消极后果；而对儿童进行工作时如果不将大道理变成某种生动的形象和亲切易懂的要求，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孩子们就会变成或者完全不能接受教育，或者光讲空话和大话而不干实事。克鲁普斯卡雅认为，能否克服这些缺点关系到贯彻学校教育的宗旨问题。

从强调理论与实践一致和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出发，克鲁普斯卡雅非常注意学生自治的组织。她认为学生自治是学校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通过自治，儿童们学习如何群策群力来探求校内共同生活和集体劳动的形式，自治是把这种生活和劳动引上一定轨道的一种手段”，自治将“使儿童学会从全班、全年级、全校的利益出发来解决本校的实际工作”，授予学生齐心协力、共同解决生活所提出的任务的熟巧，培养对集体的责任心和义务感；“从教育的角度看，重要的正是形成自治方式的过程。当然自治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培养自觉纪律的一种手段，是自愿服从集体意志的一种风尚”。^② 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学校一定要关心学生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4卷，第86页。

② 同上，第2卷，第110—111页。

自治的发展。她同时指出,不能把学生自治与学校管理混为一谈:“学校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既要求对人的了解,也要求对学校任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儿童当然毫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她明确表示,在管理学校这件事情上,不能由学生说了算,学生自治也不应该是成人政治生活的翻版^①。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联共(布)在青年男女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忠实助手,少先队和共青团是少年儿童和青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她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这些组织的活动原则、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都进行过有力的指导。她编辑出版的《列宁论青年》(1932年)、《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1937年)等专著对苏联青年的教育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从1932年到1939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在少先队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26封致少先队员的信,生动、具体而亲切地对少年儿童谈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许多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按照儿童的年龄特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典范。

论成人教育 克鲁普斯卡雅领导了苏联成人教育的开创性工作。她在这一方面也留下了大量遗产。

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曾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②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所作的完整表述。克鲁普斯卡雅领导苏联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一项重要理论依据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个原理。阅读她的著作使我们深深感到,如果说她在指导教育改革时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110—1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3页。

主要是着眼于改变旧俄时代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体制，那么，她在成人教育方面所遵循的方针则是以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工农大众，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劳动能力，使他们永远摆脱愚昧无知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到所处的不自由的困境。

十月革命初期，克鲁普斯卡雅直接领导社会教育司。她指出，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唤醒的工农大众需要知识，“而且要花最小的力量掌握它。他们需要吸取科学中的精华和科学中一切主要的、本质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并能立即在生活中运用和推广”，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国家经济的复兴，劳动人民也无法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管理。^① 克鲁普斯卡雅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到一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发动工农群众本身）来实现社会教育处的这一主要任务。

规模宏大的扫盲运动从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年代起就开展起来了。克鲁普斯卡雅参与了最初的扫盲文件的制定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她还和工人一起编出了《公民识字课本》。扫盲工作在红军中开展得卓有成效，克鲁普斯卡雅对这一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开始在农村建立阅览室，发展城市的图书馆，在城乡建立起人民文化馆、学校-俱乐部。到1920年，在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开办了7,134所成人学校，还设立了工人大学。克鲁普斯卡雅在《职业教育的任务》一文中写道：在苏维埃国家，工人既是工人，又是主人，“职业教育应该教工人既要学会干活，还要学会安排生产，监督生产以及懂得如何进行核算。工人目前需要的不是狭隘的职业教育，而是广泛的职业教育”；“我们已经办起了一些工人大学，既讲授狭窄的、纯技术性的专业，同时也授予工人使他能成为生产主人的广泛知识。这种知识在我们目前建设新生活的时候特别重要。”^②

^①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85—186页。

^②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34—35页。

在十月革命初期，扫盲及工农成人教育是与政治宣传紧密结合的。苏俄第一部宪法颁布之后，克鲁普斯卡雅就撰写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农民解释这部宪法的各项条文，使他们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苏维埃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好处。1918年12月，苏俄人民委员会根据她的建议制定了一项法令，动员一切有知识的人进行宣传，使居民广泛了解苏维埃制度的本质和工农政府的各项措施与政策。1919年5月，她在有关社会教育的报告中指出，“一切社会教育机构应当为扩大共产主义宣传这一目的服务，以便使群众看清自然界发生的一切现象，看清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①。

1920年末，克鲁普斯卡雅开始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召开）通过了在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下起草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决议，其中规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各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对非党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上，同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力量也应当尽量用于提高党员的觉悟水平（党校、政治常识学校）。”^② 决议还指出：“为了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群众性的共产主义宣传鼓动工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应当具有党的机关的灵活性，对群众要求的敏感性、机动性，并且将这些特性同系统性、准确性、行动迅速和工作的计划性结合起来”^③。代表大会以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通过成人教育的各种形式及报刊杂志大力宣传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生产宣传。克鲁普斯卡雅指出，“生产宣传的目的在于提高群众对待劳动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经济生活的积极改造者。”^④ 她强调，这一工作的成就是和扫盲、提高工农的一般文化水平与

① 转引自《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96—197页。

② 同上，第217—218页。

③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传》，第218页。

④ 同上，第220—221页。

政治觉悟紧密结合的。在这一时期，克鲁普斯卡雅还为创建和发展苏维埃党校，为建立短期的政治训练班做了许多工作。

随着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实施，克鲁普斯卡雅注意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联系起来。在这一时期中，许多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但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心的工人被提拔到生产的领导岗位上来。克鲁普斯卡雅热心于为这些工人建立训练班。她要求针对这些人原有的普通教育和专业知识水平的差异有区别地进行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补课，同时根据被提拔的干部未来工作部门的特点进行专业教育。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1930年被撤销以后，克鲁普斯卡雅还一度被委任为新成立的“将技术赋予群众”志愿协会的负责人（这时她已是副教育人民委员）。她与当时苏联科学技术部门的许多著名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热心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当斯达汉诺夫技术革新运动兴起时，克鲁普斯卡雅致信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及有关的科学家，请求他们为革新者写书，使这些先进的人们在科学文化水平、政治视野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高。她的这一倡议受到苏联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克鲁普斯卡雅深深懂得，成人的学习既要有国家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又需要学习者本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她对培养劳动人民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给予了特殊关怀。在二、三十年代，她发表了《组织自学》、《农民青年自学问题》、《自学在政治教育工作系统中的地位》、《学校与自学》、《自学须知》、《当前普及自学方面的任务》等一系列专门论述自学的文章。在《组织自学》（1922年）这个小册子中，克鲁普斯卡雅详细地谈论了自学的重要性，选择自学材料的原则和学习的方法。她指出，对于从事自学的人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从什么地方入手学习和按照什么程序来学习的问题。所选的书在文字上和内容上应该是适合自己水平的，与自己的工作、生活应有联系。要读些帮助自己

了解形势、了解资本主义复杂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书,关于自然现象的书,但“问题不在于从各个领域猎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从而成为一本活的百科辞典。问题在于要逐渐使知识深化,使新获得的知识与旧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从兴趣出发,使知识越来越巩固”,“要很好地把知识组织起来”,要学会读书,“要养成大量迅速默读的习惯,要使阅读达到完全自动化的境地”^①。克鲁普斯卡雅甚至对如何利用字典和参考书、如何做读书笔记都提了些具体意见。她特别强调,应该学会思考:每读一书,首先要弄清著作者想讲的是什么,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引用了那些论据,“特别重要的是弄清作者的思路,明白无误地掌握所读的东西”,要考虑全书的内容,论据对不对,可否采取别的办法来论述,那种推理比较正确,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结论^②。她叮嘱工农青年,要艰苦学习,学会节约时间和合理地安排时间,以利于学习。许多年后,克鲁普斯卡雅在《自学须知》(1934年)中将学习方法归纳为“不能急于求成”;“别留下疑难不懂之处”;“要经常复习”;“学习不能中断,要持之以恒”;“记笔记对记忆很有好处”;“笔记要记得明白无误、干干净净,免得日后费时间去辨识所记的东西”;“如有可能最好采用函授教科书”等^③。克鲁普斯卡雅关于自学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她对工农掌握文化知识的热情关怀,同时也反映了她对学习规律的深刻理解。

* * *

克鲁普斯卡雅于1939年2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享年70岁。她一生无私无畏,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奋斗不息。长时间的革命锻炼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促使她始终把教育事业和争取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社会主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142—143页。

^② 同上,第145页。

^③ 同上,第6卷,第29页。

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追求实现其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她注意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力图集中人类的全部知识和教育智慧来为提高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教育水平服务，为培养能够献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新一代服务。

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的。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反映着教育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对建立新体系的作用，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依赖关系，它对教育实践的反作用，等等）。俄国原来是一个文盲充斥、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苏联人民在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下以短短20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大量发展中等、高等教育和建成广泛的成人教育网的巨大成就，为以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当时苏联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教育理论家，克鲁普斯卡雅为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许多教育论文和演说还是她对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经验的总结。《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新选本的编辑出版将为研究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重要依据，并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建立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1986年10月于北京



Л. Кручекан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在一起(1915年5月)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ЖИЗНЬ и ЗНАНИЕ“.

Петроградъ, Поварской пер., д. № 2, кв. 9, 10 и 11.

Телефонъ 208-29 и 227-42.

Библиотека Обществовѣдѣнія Кн 37-ая.

Н. Крупская.

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ДЕМОКРАТІЯ.



ПЕТРОГРАДЪ.

Типографія Д. П. Рузскаго, Вознесенскій пр., 53.

1917.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的扉页(1917年)



克鲁普斯卡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
科学教育组的成员们之中(1926年)

目 录

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	吴式颖 1
---------------------	-------

自传性作品

我的生活道路·····	3
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摘要)·····	18
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	25

十月革命前作品

1899年—1917年

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摘录)·····	45
论自由学校问题·····	51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 ·····	57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	61
无产阶级的儿童·····	67
家庭与学校·····	69
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迎接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	78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	85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88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96
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182
列宁致阿·马·高尔基·····	197
克鲁普斯卡雅致阿·马·高尔基·····	198

十月革命后作品

1918年—1925年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	203
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213
论废除童工问题·····	218
职业教育的任务·····	222
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	226
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1918年9月20日在无产阶级文教 团体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229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237
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	240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243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	245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247
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	253
论学校建设(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提纲)·····	255
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258
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261
一级学校的任务·····	267
谈教学大纲问题·····	276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284
组织自学·····	289
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	313
浅论教师·····	317
改革教师培养工作·····	320
论道德缺陷儿童问题·····	324
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在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提纲)	327
培养列宁主义者(在俄国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 演说)	336
论儿童之家问题.....	341
学什么和怎么学(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全会 上的报告)	346
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54
学校和少先队运动.....	356
工厂艺徒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在全俄工人教育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361
苏维埃学校(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67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	380
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奋斗(在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 表大会上的演说)	386
少先队运动(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389
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在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	393
 注 释.....	 409



自 传 性 作 品



我的生活道路

依稀的往事

我生于1869年。我的父母虽然都出身贵族，但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结婚之后，经常靠借债度日。

我的母亲靠着官费在一个女子学校里学习。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离开学校之后，就当家庭教师。

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和祖母很早就已谢世。父亲就读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当时，很多军官不满现实。父亲博览群书，不信鬼神，并且熟悉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形。父亲在世时，经常有一些革命工作者来我们家（起先是虚无主义者，随后是民粹派，后来是民意党人）；父亲本人参加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不知其详，因我14岁时他就去世了，而且当时革命活动的形势又要求所有的革命工作者严格地保守机密，因此他们极少谈及自己的工作情况。每当他们谈到革命工作的时候，不是打发我去买点东西，就是支使我去干活。虽然如此，耳濡目染，我还是知道了不少革命道理。

父亲急公好义，每遇不平之事，总要仗义直言。当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军官的时候，他奉命去镇压波兰的起义，但他并不“奉

命唯谨，忠于职守”，他释放了许多波兰俘虏，帮助他们逃往国外，并且总是尽量使沙皇军队在镇压反对沙俄政府难以容忍的压迫的起义中不能得逞。这次战争结束后，父亲进了军事法律学院，毕业后，派到波兰去当县长。他认为，到波兰去的都应该是些正直的人。当他到达那个县城时，那里正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犹太人被拖到广场上来，不顾他们的民族习惯，在鼓声中强迫剪掉他们的鬓发；不准波兰人在自己墓地周围修栅栏，任凭猪群践踏坟墓。父亲下令禁止这些胡作非为。他建立了医院，使医院的工作井然有序，并且对贪污行为严加惩罚。这一来，就招致了宪兵和沙俄官吏对他的切齿痛恨，但他却赢得了居民（尤其是波兰人和贫穷的犹太人）的爱戴。

不久，父亲遭到各种匿名信的诬告，被上级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无端解除了他的职务，把他送交法庭审判（他们给他捏造了22条罪状，如说波兰话，跳波兰马祖卡舞，沙皇寿辰时没有在办公室张灯结彩，从来不到教堂礼拜），剥夺了他担任公职的权利。此案一拖十年，一直闹到枢密院才告了结。父亲虽被宣判无罪，但那时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我是这样学会仇恨专制制度的

我自幼就憎恨民族压迫行为，觉得犹太人、波兰人以及其他民族一点也不比俄罗斯民族差，所以长大之后，我对于俄国共产党的党纲衷心拥护。因为党纲上规定各族人民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生活，有权处理自己的一切事务；在我看来，承认民族自决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很早就明白了沙皇官吏的专制是怎么回事，强横暴虐又是怎么回事。我长大之后，就成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者。

父亲丢掉官职之后，碰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当过保险

公司代理人和工厂检查员，办理过诉讼案件，等等。我们经常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这就使我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观察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况。

妈妈常常谈起她在一个女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的情形，谈起她经常目睹的地主惨无人性虐待农民的情形。所以，有一次我们到妈妈当过家庭教师的那个女地主家里去作客度夏的时候（那时父亲正在找工作），我虽然只有5岁，却闹起别扭来了：早上既不愿向那个女地主问好，晚上也不愿跟她请安，并且从不感谢她的招待。当父亲来接我们离开鲁沙诺夫（那个女地主的领地名）的时候，妈妈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坐着四轮带棚马车离开鲁沙诺夫（那时已是冬天），途中农民以为我们是地主，差点把我们打死，马车夫被打得死去活来，农民还要把他丢到冰窟窿里去。

父亲并不责怪这些农民，他后来跟母亲讲到农民对地主的血海深仇，说地主确实可恨之至。

我在鲁沙诺夫跟一些农村儿童和妇女做了朋友，我站在农民这一边，他们对我很亲热。父亲的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正因为如此，长大了以后，我拥护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它分给农民的主张。

父亲在乌格利奇的“哥瓦尔德”工厂里当过检查员，我常常在一旁听他谈起工厂里的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谈起工人受剥削等情形，这使我自幼就仇恨工厂主（那时我才6岁）。

我跟工人的小孩一起玩，我们常常商量好躲在墙角落里用雪球打从旁边走过的经理。

我8岁的时候，我家住在基辅，那时与土耳其的战争开始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人们的爱国主义的狂热，常常听到有关土耳其人的残暴罪行的谈论，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亲眼见到了一些身受重伤的土耳其俘虏，并且曾经跟一个被俘的土耳其小孩在一起玩耍，当时我就认识到，战争是一件最有害的事情。

有一次，父亲领我去看维列夏金的画展。有一幅画上画着：

一位大公率领一群身穿白色制服的参谋人员，手里拿着望远镜，站在一块安全的地方观看自己的士兵怎样浴血奋战。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长大了以后，我是完全同情那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

“季莫菲卡”

11岁那年的春天，我给带到乡下住了一些时候。那时父亲正在女地主科夏卡夫斯卡娅家工作。这个女地主在普斯科夫省开设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文具工厂，厂里的事情本来杂乱无章，可是父亲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当时科夏卡夫斯卡娅家很需要父亲这样的人帮忙，所以待他很好。

那年春天，我病得很厉害，科夏卡夫斯卡娅一家人建议把我带到她们的领地上去住些时候。这领地名叫“山泉”，距别拉雅车站40俄里。家里的人都同意。我在陌生人面前总有点拘束，但骑马外出是一件异常愉快的事情。我们穿越森林，走过原野；山坡上开满了野花，空气中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芳香。

第一天晚上，他们把我安顿在老爷华丽的房间里，睡在一张很考究的床上。房里异常闷热。我走到窗前，推开窗子，紫丁香花的芳香扑鼻而来；夜莺清脆悦耳的歌声不时传来，我依窗凭栏，久久才去。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随后就到花园里去了。这个花园直通下面的河岸。我在花园里碰到一个年轻的姑娘，大约有十八岁，她穿着一件朴素的印花布衣裳，前额很低，头发乌黑而又卷曲。她跟我交谈起来。我估计她就是本地的教师亚历山大·季莫菲耶夫娜（大家都叫她“季莫菲卡”）。大约过了十分钟，我同“季莫菲卡”就混得很熟了，像一对要好的女友在一起似的，于是我也就对她随便谈起我的印象来了。这家女地主出资开办了一所学校，当时还在上课。在高年级学习的有5个人（伊留沙，谢良，

米吉卡，瓦良和巴维尔)，那时他们正准备参加考试。从此以后，我就常常跑到学校去，同这些小朋友一起进行演算习题的比赛，一起朗读；日子过得非常愉快。

“季莫菲卡”房里的小炉子上，堆着很多儿童读物，我常常帮助她修补和装订这些书籍。每逢星期天，很多小朋友和青年人都到她这里来，大家一起读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季莫菲卡”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从她的谈话里，我懂得了地主是最坏的东西，他们对农民坏极了；我知道了应该帮助农民。我不喜欢科夏卡夫斯卡娅这家人，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科夏卡夫斯卡娅妈妈总是穿着一件白衣裳，说话时装腔作势，常常责骂仆人。我看她很不顺眼。

女地主纳吉莫娃 和她豢养的狗

在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领地去了一趟之后，我就更加不喜欢地主了。那次，去的人有科夏卡夫斯卡娅一家、“季莫菲卡”和那五个高年级的学生（这五个学生要在那里参加考试）。他们把我也带去了。

我们去的那块领地，属于一个富裕的女地主纳吉莫娃。当地的人对她都曲意逢迎。神甫在这个女地主没有来以前就不做弥撒。因为每当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总是先吻吻神甫的手，然后就塞给他25个卢布。

考试是在学校里举行。主考的是本地的一个神甫，还有一个什么督学。孩子们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尤其是伊留沙。当他们开始听写的时候，伊留沙由于惊慌而把“酸汤”写成了“酸糖”。我忍不住跑去告诉他，让他改过来。“季莫菲卡”叫我规规矩矩坐着，不要东跑西窜；她自己也忐忑不安。孩子们总算都考及格了。

伊留沙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心里很久都不能平静。后来有人来叫我们到纳吉莫娃那儿去吃午饭。在那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房间里豢养的一大群小狗：小狮子狗、小哈巴狗，还有一些别的狗。这些小狗在椅子上跳来跳去，一会儿也不闲着。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来了两个光脚丫的小姑娘。纳吉莫娃首先把菜汤分到小狗食用的盘子里去，这两个小姑娘就把菜汤分送给每条小狗吃；然后，菜汤才分给客人吃。住宅里到处都显得富丽豪华。花园也都经过精心的修葺；水池周围盛开着鲜艳夺目的蔷薇。我却感到无聊已极，因此在我们准备动身回家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当时老想：“季莫菲卡”说应该消灭地主，这话的确是对的。以前，我在父亲那里也听到过这样的话。

“季莫菲卡”每次到邻近的村子里去的时候，总是带我同行。她经常给农民送一些小册子，同他们长谈，她说的话我并不全懂。后来，“季莫菲卡”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月。

同工厂的人们在一起

就在这时，父亲和母亲来了。我家就住在工厂附近，离科夏卡夫斯卡娅这家人的领地大约两俄里远；我跟那些在厂里干活的小孩子交上了朋友。原来伊留沙当时也在厂里工作。我常到工厂里去，有时竟在厂里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把包装纸堆成一堆一堆的。我还跟一个给工厂里运送木柴的老头做了朋友。他常常让我爬上大车站着赶车。我高兴极了。我们常常跟他到森林里去，帮他木柴堆在车上；然后跟着车子走回来，到了工厂，就把木柴卸到锅炉房里。父亲和母亲看见我这么起劲，双手都脱了一层皮，感到很好笑。

在工厂旁边的一个屋檐下，整天都有一些村妇坐在那里，她们一边哼着歌儿，一边清理厂里用来造纸的那些肮脏的破布。这

些破布是一些专收破烂的小贩从各村农民那里收来的，——有破衬衫、衬裤和各种破旧衣服，我也常常坐在这些村妇旁边，跟她们一起哼着歌儿，清理破布。

我家楼梯下面喂了一只兔子，这是一个村妇给我的。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小狗卡尔松，是一条毛色火红的看家狗。我每次吃完饭之后，就把菜汤、酸奶倒在盘子里，把骨头和面包屑也扔到盘子里去，然后就呼唤：“卡尔松，卡尔松！”听到我的喊声，它就飞快地跑了过来，贪婪地吃着给它的食物。

后来，我们要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季莫菲卡”（那时她已回来了），离开那些小朋友，离开运送木柴的老爷爷、玛丽雅婶婶和卡尔松。马车来了之后，我们就坐了进去，卡尔松却躺在车下不动，只好用力把它拖了出来。那年冬天，我听说卡尔松被狼吃了，心里非常难过。

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起“季莫菲卡”。父亲有一次说：有一天，警察突然闯进了“季莫菲卡”的屋子，在她那里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一些文件和一张沙皇的画像（上面写了一道算术题演草）。后来我打听到“季莫菲卡”在普斯科夫监狱里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被关了两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她姓雅沃尔斯卡娅。冬天，我坐在教室里，老是画着一些挂着“学校”牌子的小房子，同时想：我将来要怎样去当一个乡村教师。

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直对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的工作怀着强烈的兴趣。

1881年3月1号

那时，我怎能不同情革命者啊！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881年3月1号的夜晚。那天晚上民意党人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起先，一些亲戚到我们这里来

了，他们都吓得魂不附体，个个沉默不语。随后，突然闯进来一个军人（他是父亲在武备学校的老同学），他详细地叙述了沙皇被刺的经过和沙皇乘坐的马车被炸毁的情况，等等。他一边说：“瞧，我买了一块服丧黑纱”，一边就把买来的黑纱给我们看。我至今还记得，当我知道他想为他经常咒骂不休的沙皇服丧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奇。父亲的这个朋友是个吝啬鬼，我想：“既然他都肯破费买了一块黑纱，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就很明白了。”这一晚，我彻夜未眠，我在想：现在沙皇已死，情况将会好转，人民也可得到自由了。

但是事与愿违：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比以前更坏。民意党人纷纷被宪兵逮捕了，刺杀沙皇的“凶手”被处以死刑。在行刑以前，宪警押着凶手从我们学校门口走过。行刑以后，那天晚上，叔叔谈起当米哈依洛夫被吊起来又怎样从绞索上掉了下来的情况。

我们熟悉的一些革命者也不断遭到逮捕。各种社会活动逐渐消声匿迹……

学 习

最初我在家里学习，由妈妈教我。我很早就学会了读书。书籍成了我的快乐的源泉，我一本接一本贪婪地读着。书把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盼望早日上中学。我10岁的时候就入学了。但这所中学的情况很不理想。班上人很多，有50个左右。我非常腼腆，不大和别人接近，因此班上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谁也不注意我。教师就是教课，叫人到黑板前去提问功课，然后打分数，什么问题也不许问。我们的女学监爱吹毛求疵，大喊大叫。她对那些骑马上学的富家小姐照顾备至，而对衣衫破旧的女孩就咒骂不休。最主要的，还是同学之间没有友情，所以生活显得非常枯燥单调。

我学习十分努力，不落人后，但回答问题总是成绩不佳，因为教员所问的东西完全不是我所想的。

父亲看出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就让我转到私立奥波连斯卡娅中学去了。

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

谁也不对我们大喊大叫，同学们一点也不拘束，彼此相处都很和睦，我跟很多人做了朋友。当时的学习很有意思。直到现在，我回想起这所学校的时候，还感到很亲切：它教给了我许多知识，培养了我工作的能力，使我长大成人。

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

我和父亲(他的情况已如上述)的感情很好。我14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人。妈妈心地善良，精力充沛，但她总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我一直顽强地保持着我的独立精神。只是后来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格外亲密起来。妈妈对我爱护备至，我们在一起过了一辈子。她支持我参加革命活动，并且经常给我一些帮助。凡是到过我家的党内同志，对她都很了解、很敬爱。她总是关心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挨饿。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了。于是我就去教书。我和妈妈也给别人做一些誊写工作。此外，我们租了一幢大寓所，开始出租房子，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大学生和各种城市小知识分子(电话接线员、女裁缝、女护士等等)的生活情况。因为我是第一名女学生，所以我被聘为女子中学教师。这是一项苦差事。有钱的家长都瞧不起女教师，常常来干涉教学工作。我曾幻想在女子中学毕业后能到普通中学去做一个教师，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位置。

出路何在

那时，我孜孜不倦地读着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猛烈抨击富人的奢侈和闲逸，抨击当时的国家制度，指出一切都是为了让地主和富人过一种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的生活，指出工人如何由于过度劳累而未老先衰，早早死去；农民如何拚命工作以求一饱。列夫·托尔斯泰善于一针见血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我把所见所闻认真加以思考，觉得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革命者的斗争，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斗争的目的。但是用什么办法呢？采用恐怖手段，暗杀个别怙恶不悛的官吏和沙皇，这是无济于事的。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了这样一条出路：进行体力劳动和自我改造。于是我就开始自己料理全部家务，夏天就去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我在生活中力戒奢侈，处世待人更加谨慎耐心。但不久我就明白了，这种做法无济于事，不管我怎样拚命劳动，不公平的制度依旧会继续存在下去。诚然，我对农民的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学会了直率地跟工人和农民谈话，但这算什么出路呢？我当时想，如果我能进高等学校，那末我就能找到改变生活、消灭剥削的途径。

当时，妇女既不能上大学，也不能进任何其他高等学校。女皇认为，妇女不必学习，只要在家侍候丈夫和抚养孩子就行，因此，根据她的命令，当时女子医科学校和高级女子学校都停办了。我只好努力自学。

后来，彼得堡开设了一所高等女子学堂，我就到那个学校去了。过了两个月，我对这所学校非常失望。我发现我所需要的知识学校没有给我，在那里所学的都是些远离生活的纯学术性的东西。

我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时的情形和现在完全不同。没有一本像样的关于社会问题的书，从来不开会，工人们完全没有组织起来，工人政党也没有建立。当时我已经20岁了，我甚至没听说过马克思其人，对于工人运动、共产主义毫无所知。

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生的组去（那时学生运动已经开始），使我眼界为之一开。我离开了学校，开始参加组里的学习，读起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其它一些有关的书来。我这才明白，只有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才能改变生活现状；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有益的、有用的人，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

这年春天，我请别人给我弄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其他一些对我有用的书。马克思的著作当时很难弄到，甚至公共图书馆都不出借。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外，我还弄到了吉别尔写的《原始文化概论》，沃龙佐夫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耶菲缅科写的《北方之研究》。

这年初春，我和妈妈在乡下租了一间小房子，我把书也随身带去了。整个夏天我跟房东、当地农民一起干活，因为他们人手不够。我帮他们的小孩洗澡，照管菜园，割刈干草，收割庄稼。农村的生活使我陶醉。有时半夜醒来，回想着梦中耽心的事：“马该没有跑到麦田里去吧。”而在空闲的时候，我就贪婪地读着《资本论》。读头两章很困难，但从第三章起，读起来就顺利了。我就像饮着清泉甘露。从托尔斯泰的自我改造中是寻找不到出路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

暮色苍茫时分，我坐在台阶上，读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剥夺者。”我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在跳动。我看着眼前的

一切，怎么也听不懂那个坐在台阶上、双手抱着主人的孩子的小保姆在嘀咕什么：“我们说是菜汤，你们说是汤菜；我们叫它船，你们叫它舟；我们叫的桨，不知你们叫它啥。”她想与我交谈，不知我为什么默不作声。我当时是否想过，我能不能活到“剥夺剥夺者”的时候呢？那时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只有一点：目标明确，道路明确。后来，每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如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05年1月9日彼得堡流血星期日事件，1903年到1905年的各种事件，1912年的连拿事件，1917年的十月革命），我每次都想到：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想到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均为人民财产，这时我又想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离我们的目的还有多远？我能否看到这一天？这是无法预卜的！但这无关紧要。反正现在看来“理想可能实现，并且这一天日益临近”。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理想必然实现。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

在涅瓦关卡之外

我参加大学生小组的活动有三年，学到了很多，完全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但我不仅渴望知识，而且还想工作，做一个有益的人。当时大学生同工人的联系很少，因为他们如果到工人那里去，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沙皇政府妄图用一道石墙把大学生同工人隔离开来，所以，要想去和工人说话，就要化装成不像大学生的样子，悄悄地去。大学生同别人的联系很少。当时我决定到斯摩棱斯克村的星期日夜校去当教员。这学校在涅瓦关卡之外，现在，这个区叫做沃洛达尔区。

这所学校很大，有600人。来学习的有马克斯维尔、巴里、谢苗尼科夫工厂以及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等单位的工人。我几乎每天

都到学校里去。

我在这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工人生活和工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当时有这样两件事：一个是外地来的督学把一个补习班解散了，因为他们学了小数，而按照教学大纲只准教算术整数四则；另外，一个工人被遣送回老家，因为他在同经理谈话时用了“劳动强度”这个术语，等等。尽管如此，学校的工作还是可以开展的。只要不用“沙皇制度”、“罢工”、“革命”这些可怕的字眼，就可以畅所欲言。于是我们（次年又有几位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学校）在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尽量不提马克思的名字，令我惊奇的是，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说明问题，即使是最难懂的问题，也很容易向工人解释清楚，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秋天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起先，在上“地理”课和“俄语”课时堵住耳朵不听讲，却去读鲁达柯夫的旧约或新约圣经，可是到了来年春天，这个小伙子一放学之后就跑到小组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暗示着什么。一个工人在“地理”课上说：“小手工业不能与大生产竞争”，或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有何不同”，这时你就会知道：这个工人已经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他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这时我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好像他刚才说的是某种暗语似的。以后每次见面都特别亲近，说：“你大概是我们自己人。”即使那些没有参加小组活动，不会说什么“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的人，对我们教师也总是很关心、很友好。

有时一个学生会提醒说：您今天可别发书（虽然所发的多半是图书馆的书）——新来了一个人，谁也不了解他，据说他当过修道士。我们得去摸摸他的底……

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对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什么也别提，他常常跑暗探局。

一个学生要去参军，在临走前，他把普济洛夫工厂的一个朋友领来说：

“他走远了不行，每天晚上来也不行，但每星期天可以让他来上‘地理’课。”

我在这所学校教了五年书，直到我被捕入狱时为止。

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组织，虽然还很薄弱，但毕竟有了组织。这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以德国工人党为榜样，叫做社会主义民主组织。

1894年*列宁来到彼得堡，于是情况就大为好转，组织很快就巩固了。我和列宁在一个区工作，不久我们就相好起来。我们的组织已经从事广泛地散发传单的工作。我们开始印发秘密小册子，后来又想出版通俗的秘密杂志。当一切都已筹备就绪的时候，列宁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突然被捕了。这对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仍然聚集了一些力量来继续散发传单。1896年8月，我们竭力鼓动工人罢工，并使罢工能够有组织地进行。罢工之后，政府开始大肆逮捕，被捕的也有我。在流放时，我和列宁结婚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同他的生活紧密地联在一起了；我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工作。谈起这段往事，实际上也就是谈起列宁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国外流亡的日子里，我的工作主要是与俄国保持联系。1905年到1907年我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从1917年起，我从事国民教育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认为它极为重要。为了把十月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工人们需要掌握知识，农民们也需要掌握知识。农民要是没有知识就不可能自觉地跟着工人阶级走，就不可能很快建成农庄。我所从事的国民教育工作与党的宣传工作是紧密联系的。

* 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书中说列宁是1893年到彼得堡来的(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编者

结 束 语

我真是幸福，能够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日渐壮大，看到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断巩固，能够目睹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目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萌芽和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我常常惋惜我没有孩子。现在却不然了，因为现在我有许多孩子——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少年先锋队员。他们都已成为列宁主义者，或者渴望成为列宁主义者。

这篇自传是我应少年先锋队员之请而写的。

我把这篇自传献给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回忆录摘要)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距今已有31年。当时我才22岁，我渴望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还在童年时代，我就经常在家里听到大人对当时的制度所进行的各种抨击，尤其是对沙皇政府倒行逆施所进行的各种抨击。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有的民意党人经常到我们家来。我至今还记得3月1日的情景。那天，我期待着非同凡响的消息。由于心情激动，我几乎彻夜未眠。我还记得4月3日的情景，那天处决三月一日弑君犯。随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父亲故去，家境日衰。我再也无从听到激昂慷慨的言论，而当时的书籍又不能回答我所关心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一直悬在心头。我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好。我时而读航空史方面的书，时而读莫特列的《荷兰革命》，时而又读烈克柳^①写的书。遇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所读的各种书之间毫无联系，脱离生活。

我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她出身于一个激进的家庭。我们两人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生活，但是我们未能靠自己的努力走上生活的道路，而当时又没有人帮助我们。我这个女友家里，经常有一些熟人相聚，他们都是一些思想激进的人，其中也有一些阅历丰富的老民意党人。我对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和虔诚的敬意，听他们讲话，然而，这些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只是心灰意冷的沮丧。我们经常唱《伏尔加船夫曲》、

《小蚊之歌》、《走遍天涯》等歌曲。有一次，我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问一位老民意党人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才好，他开始向我灌输“从小事入手”的理论。

“不要追求做不到的事，不应指望把一切来一个彻底改造——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事不要去做，而要做一些身边的事情：好好学习，乐于助人。”

这话就是出自这位老民意党人之口（当时正是反动透顶的年代，一切都受到压制），出自一个与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而坐过多年牢的人之口，听了令人感到难受。他的谈话和所有这些老一辈人的谈话使人感到忧都不快。他们不失为一些好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受到了摧残。我当时尽管年龄不大，但这一点却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不能走三月一日弑君分子的道路。采取恐怖手段是不能奏效的，而且就连过去的那些恐怖分子也不再相信恐怖手段了。怎么办？有一天，我参加了在沃多瓦卓夫^②那里搞的一次小组活动。那天讨论的是意大利的土地关系问题和爱尔兰的命运问题。我当时一言未发，不过谁讲了什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但我以后再也未到这个小组去过，因为意大利的土地与“怎么办”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当时对我说来并无关系。有一次我还参加过一个文学组，米海洛夫斯基^③也参加了。但小组里讨论的是莎士比亚的《马克白》，因此我以后再也没有去了。我在中学毕业后，偶然得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的第13卷，列夫·托尔斯泰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制度。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写的《论劳动和奢侈》^④一文。我可能没有完全领会列夫·托尔斯泰想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如果走托尔斯泰指引的道路，不去占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从改造自己开始，行不行呢？也许，这样做比采取恐怖手段能更快地达到目的，能更快地造福人民？”

为此，我开始想办法搬到乡下去住。但这件事被拖延了。

生活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在此时，《中介》出版社^⑤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与一批激进分子经常举行座谈会。我参加了两三次，都是失望而归。对整个的托尔斯泰主义，我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他的勿抗恶的观点及其宗教世界观。

1889年秋，彼得格勒开办了高等女子学堂。我上了这所学校，希望能学到我需要的东西。我结识了一些从省里来的同学。他们没有我那么样的大量消极教训。他们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学习。我也抓紧时机学习。我潜心学习数学课，同时还去听语文系的课，但是这个系只开设普拉托诺夫的历史课和费维京斯基的心理学课。当然，所有这些功课，外加为了挣钱而去工作，占掉了我的时间。于是，在圣诞节到来之前，我就坚决离开了这个学校。

这时，我中学的那位女友结识了一个工艺师小组，一些青年常在他们宿舍里聚会。我一开始就被这一新的兴趣吸引住了。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40人)，决定分设若干小组。我参加了(这是1890年初的事)伦理学小组。说老实话，小组里很少讨论伦理学问题，多半是谈一般的世界观问题。由于参加小组的活动，我读了米尔托夫(拉甫罗夫)^⑥所写的《历史信札》一书。我十分激动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是第一本讲到长期以来使我极为关心的问题的书，它直接了当地把我想知道的东西讲得一清二楚。我早已辍学，现在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新的活动。我在这个小组第一次听到了“国际主义”这个词，知道有许多研究社会生活问题的科学，知道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听到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了解到原始时代的人的生活情况，并且知道了还有过原始社会。这年春天，我们为谢尔古诺夫^⑦举行了葬礼。也是这年春天，我去找了过去常到我女友家去的谢·尼·尤沙柯夫^⑧，向他借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几本对我有用的书。当时，马克思的著作很难弄到，连公立图书馆都借不到。除了《资本论》之外，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还有：

吉别尔的《原始文化概论》^⑧，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耶菲缅科的《北方之研究》。

这个初春，我和妈妈在乡下租了一间房子，我把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带了去读。整个夏天我都忙着跟房东和当地农民一起干活，因为他们劳动力不足。我帮他们的小孩洗澡，照管菜园，割刈干草，收割庄稼。这些农活深深吸引了我。有时半夜醒来，还想起梦中的事，耽心“马该没有跑到麦田里去吧。”

空闲的时候，我就贪婪地读着《资本论》。读头两章很困难，但从第三章起，读起来就顺利了。我好像饮着清泉甘露。从个人的恐怖活动中，从托尔斯泰的自我改造中，都不可能找到出路。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

暮色苍茫时分，我仍坐在台阶上，读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剥夺者。”我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在跳动。我着眼前的一切，怎么也听不懂那个坐在台阶上、双手抱着主人的孩子的小保姆在嘀咕什么：

“我们说是菜汤，你们说是汤菜……我们叫它船，你们叫它舟……我们叫的桨，不知你们叫它啥。”她想与我交谈，不知我为什么默不作声。我当时是否想过，我能不能活到“剥夺剥夺者”的时候呢？那时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关心的只有一点：目标明确，道路明确。后来，每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如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05年1月9日事件，1912年的连拿事件，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我每次都想到：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想到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均为人民财产，这时我又想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多远？我能否看到这一天？这是无法预卜的！但这无关紧要！反正现在看来“理想可能实现，并且这一天日益临近。”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理想必然会实现。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

马克思主义使我得到了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大幸福：我知道

了应走的道路，对我的整个生命与之相系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前进的道路有时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我却从未怀疑过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我可能也有几步路走得不对，别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的。但是错误可以纠正，而朝向目标的运动却一往直前，如潮水汹涌澎湃。

除了《资本论》之外，我把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全读完了。吉别尔（《原始文化概论》的作者）使我获益良多。我在古典中学毕业，念过师范班，上了一段时间的短训班，哪里也未听到过讲历史的动力，未听到过讲原始社会的生活。在我面前展现出崭新的天地。当然，我当时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到了1890—91年冬天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那年秋天，一些青年学生相遇之后，决定重新开展小组活动。当时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所谓《全俄同乡会》，约有300人参加。每个小组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央的组织。这个中央组织只研究大学生的组织形式，大学生图书馆等问题。工艺学院当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该校当时有两个十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高年级学生布鲁什涅夫^⑩和茨维斯基。他俩把工艺学院青年大学生的读书活动引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使他们注意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个大学当时盛行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这种组织关心的不是工人运动，而是经济发展的形态，因为它认为这种形态是具有某种独立意义的。经济形态是按一定的方向发展的，完全不以人的意志和态度为转移。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灭亡就会不可避免地来到，但是不必为此而去发动什么革命，工人不应干予这一客观的发展过程。

军事医学科学院内，民粹派的思想十分严重。

我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我重读了《资本论》，这一次的理解就深刻得多了。我们在小组研究和讨论所读的东西。我们手边都有一张写满问题的纸单子，这对我们的小组活动很有帮助。与此同时，我们还到公立图书馆去，把那里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有关

的书都借来阅读。

所读的主要是吉别尔对《资本论》的讲述和一些期刊上的文章。当时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少。除了《资本论》之外，马克思别的著作一本也未翻译出版，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恩格斯的著作一本也未翻译出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读到的是一种手抄本，中间和结尾部分都残缺不全。为了读懂《反杜林论》，我毫不吝惜时间，开始潜心学习德语。

我想尽快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起初，我要求工艺学院的同学让我领导一个工人小组，但是当时他们与工人的联系也很少，不可能分给我一个组。我曾想让民意党人让我领导一个小组，但他们要我加入“民意”党。这时我决定通过瓦尔古年在涅瓦关卡外开设的星期日夜校建立与工人的联系。这所学校位于斯摩棱斯克村，在工人区的正中心，它与女子学校和奥布霍夫学校一共能招收一千名左右的工人学生，他们程度不齐，有的还是文盲。

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五年，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和对工人本身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当时还有这样的事情，督学把补习班查封了，因为班上讲了分数，而按教学大纲却只能讲四则运算；有的工人由于与经理谈话用了“劳动强度”这个词而被遣送回乡，等等。尽管如此，学校的工作还是可以开展的，只要不用“沙皇制度”、“罢工”、“革命”这些可怕的字眼，就可以畅所欲言。于是我们（次年又有几位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学校）在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尽量不提马克思的名字。令我惊奇的是，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说明问题，即使是最难懂的问题，也很容易向工人解释清楚，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秋天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他上“地理课”和俄语课时堵住耳朵不听讲，却去读鲁达柯夫的旧约或新约圣经，可是到了来年春天，这个小伙子一放学之后就跑到小组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暗示着什么。一个工人在《地理》课上会说：“小手工业不能与大生产竞争”，或者会提出这样的问

题：“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有何不同？”这时你就会知道，这个工人已经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他也明白他用这句话表明他是“有觉悟的”。这时，我们就建立了某种关系，好像他刚才说的是某种暗语似的。以后每次见面都特别亲近，说：“你大概是我们自己人”。即使那些没有参加小组活动的人，不会说什么“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的人，对我们教师也总是很关心，很友好。

有时一个学生会提醒说：“您今天可别发书（虽然所发的多半是图书馆的书），今天来了一个陌生人，谁也不认识这个穿马夹的人。我们要弄清他的身份。”

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对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什么也别说，他常常跑暗探局。”这个工人是教堂的一个小头目，他很不喜欢那些不尊重长者的年青人，但他还是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教师。

有一个学生要去参军，临走前，他把普济洛夫工厂的一个朋友领来说：

“他走远了不行，每天晚上来也不行，但每星期天可以让他来上‘地理课’”。

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

在斯摩棱斯克 夜校工作的五年

从1891年到1896年，我在涅瓦关卡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这几年的工作给我一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对我了解工人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几年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和逐渐巩固的时期。我一经了解到工人阶级在解放全世界劳动者的事业中所应起的作用之后，就急不可待地想去接近工人群众，想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当时的秘密工人小组为数尚少，而想从事小组工作的人却比小组的数目多得多。我这个不爱说话，非常腼腆的姑娘，当时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参加小组的工作是毫无指望的。我执意请求，才让我去教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妻子识字。我同意了，但是由于对方断然拒绝，就连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我曾经试图通过民意党人参加小组的工作，但是他们要我参加民意党，而我不能也不愿隐瞒我的这种看法，就是我觉得社会民主主义者走的路要比民意党要正确些。显然，当时我只有想办法跟工人直接联系。有一天，我和我的一个女同学到什尼谢尔堡驿道上的斯摩棱斯克村去参观那里的星期日学校。我记得，我很满意所听的两堂课，两堂课都讲得很好：一堂课是讲的克雷洛夫的寓言《池沼和河流》，讲课人是卡尔梅柯娃；另一堂课是阿夫拉莫夫^①讲的《论劳动和奢侈》，他有一点托尔斯泰的风格。工人们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是重述教员的意见。我觉得这种教学方法应该加以改变。从1891年秋天开始，我

便成了斯摩棱斯克村星期日学校的教员。

当时我和我母亲的生活很困难——靠出租房子和誊写为生。我从早到晚忙于上课，但是所有这些课都不固定。我原来只在古典中学上夜课。但是它总是跟夜校的工作或会议时间冲突，只好把它放弃了。要想被录用为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的教员，必须去找陶瓷慈善会^②会长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华尔古林。当时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这种学校实际上有三个：两个在斯摩棱斯克村——一个男子学校，一个女子学校，另一个在亚历山大洛夫村）有将近一千个男女工人学习，而教员仅有50人。华尔古林很爱护学校，经常到学校来，事无巨细，他都十分关心。华尔古林对驿道上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了很多贡献。他不仅出钱，还把自己的精力也贡献出来。这是一个很有教养而练达有为的人。我对他并不太了解，但却十分仰慕他。我至今记得他主持星期日夜校教师联合大会的情形。他的公正和机智使我惊服。只是有一次，因为会议否决了刚刚通过的一项决议，他便生起气来，表示反对。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不是一个革命者。当斯摩棱斯克学校变为革命活动基地之后，他便离开了学校，把自己活动的重点转到国民剧院去了，但是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行动去妨碍学校的革命化。学校的情形他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清楚，——何况谁也不对他隐瞒什么，——他清楚，但是他并不声张。他只是要求大家恪守“法纪”，免得学校被查封。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有一次，一个督学到学校来，并且到补习班去听课。当时班上正在讲小数，学生们非常炫耀自己的知识。督学也赞不绝口。但是第二天却来了一纸公文：“补习班授课内容超越教学大纲范围，即行停办。”根据教学大纲规定只能复习算术整数四则，而讲授小数就被认为太革命了。

学校里谁也不认识我，起初大家对我不大相信。到了十月间才把一个人数不多的扫盲班交给我。这个班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工人，而且看来只有三个人身体没有什么毛病。有的人患有癆病，

一个人没有胳膊，一个人是独眼，等等。应该说，这个班我教得很不好；当时我还不会教识字，在成人教学上我还不得法，因而对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没有给予更多的帮助。但是我非常努力，很关心学生的学习成绩。我的能力也逐渐提高了，我和学生的关系也搞得很好。

大多数学生是巴里的马克斯维尔纺织厂的工人，有很多人是涅瓦河彼岸谢苗尼科夫的托仑顿制呢厂、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烟草厂、格洛莫夫仓库等单位的工人。

我现在还记得我教的这个扫盲班学生的情形。有一个学生个子不高，只有一只眼睛，麻脸，他从十岁起就在工厂干活。每逢星期天，他就喝得醉熏熏的，不来上课，而在外面闹事。同学们常说：“今天我们的独眼龙又给带到局子里去了。”每到晚上（上课时间是每星期日以及每周的两个晚上）他总按时来。但他一点主动精神也没有。如果你不告诉他怎样握笔，不告诉他应该按行写，他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你告诉他怎样做，他就能做得很好。他从小在机器旁边工作，自己也变成了一部机器。

另一个学生——华西里耶夫——在烟草厂工作。他全身都是浓烈的烟味。我一靠近他，头就发昏。他每逢星期天也喝酒。我记得这样一回事，华西里耶夫来了，脸色苍白如纸，勉强强坐了下来。值日的卡佳手里拿着铃，走过来问道：“喝醉酒的人到哪儿去了？”我们都没有作声。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我发现他能辨识人了。我就说：“你回家去吧，华西里耶夫，您不大舒服哩。”大家都笑起来了。华西里耶夫站起来说：“我不是不大舒服，——我是喝醉了，”说完就扶着墙走到门边。他在黑板旁停了下来：“用粉笔写几个字多好。”我说：“您明天晚上写吧。”当他学会写字之后，起初笔划上有点错误，——我明白这应该归罪于我。有一次，他拿来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条。我读了一下：“找到一个女孩，把她带到劳动组合去，她非常滑稽，本应该送到警察局里去的，但是有些可怜她。”当我把他写的纸条高声读出来的时候，他显得神气十足。

有一次他拿来一个卢布买书。我说：“太多了吧！”他说：“不多，都买了吧，要不我还是用来喝酒了。”

还有一个学生叫卡拉谢夫。他是马克斯维尔工厂的工人，患有痲病，身体很瘦，胸部下塌。他非常想学会识字。他是不久前才由农村来的。他一开始学写字，有一次就写着：“你教我学会识字，我就送你一件衣服。”有一次他对我说，祝我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

有一天晚上，他非常激动地走了来。他说：“今天我很不痛快，我的职务是看门是不是关好了。我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没有顾得上看门。不料工头来了，发现我在看书，就罚了我半卢布硬币。”

从托仑顿工厂来的都是一些年岁稍大的工人——身强力壮的斯摩梭斯克庄稼汉。托仑顿雇佣的斯摩梭斯克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专门雇用同村人，甚至于允许庆祝守护神节。他雇用同村人，是想使他的工人不与其他工人来往，为了不让大家到斯摩梭斯克的学校去，托仑顿亲自领导自己的星期日学校，并且还聘请一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到学校来。他们向工人讲述各种黑帮分子的胡言乱语、圣者传以及其他一些无用的东西。但是托仑顿的工人到托仑顿的学校去学习的很少，而大多数是到华尔古林的学校去。有一次，我到托仑顿工厂的工人宿舍里去。我们没有戴帽子，而是包着头巾，我和雅库波娃^②两人到一个熟悉的工人——我的学生克洛里科夫那里去作客。一幢很大的楼房，里面有无数间房间，用高高的隔板把房间隔开，非常嘈杂，特别是楼下的房间，楼上一层稍为安静一些，不过由于潮湿墙壁都发绿了。两家住一间小房，走廊上晒着衣服，空气非常混浊，连走廊上的灯都显得暗淡无光，集体宿舍十分拥挤。下班汽笛一响我们就来了。那时的工作日特别长（纺织厂里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我们也看了女工宿舍，几个女工非常疲倦地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有一个女工睡在箱子上。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大家特别谈起在那里工作的人常常

中毒的染房。当时还没有公共食堂，只有一个公用的女仆，每家每月给她两个卢布，让她把汤罐拿到炉子上去炖热。但是炉子放不下所有的饭盒，有时汤不能炖，只是勉强把水弄热就行了。

列宁把从克洛里科夫收集到的材料作为他告托仑顿工厂男女工人书(写于1895年11月)的素材。^④

在我班上学习的托仑顿的学生都是些成了家的人，他们很好。往往两个同乡坐在一块，一个人狡猾地瞧瞧同座人的练习本，一面用袖子遮住自己练习本上写的东西，看看同座的人是否搞错了，是不是在该写软音符号的地方写了硬音符号。有一个托仑顿的工人会读，他到学校来想学会写。有一天，他带来一本书《《圣母的苦难历程》》，这本书是神学院的大学生给他的。他向我推荐这本书说：“这本书很好，您拿去读读。”我接下来了。全书讲的是迷信和黑帮分子的滥调。这本书没有一点知识性，但是情节写得很动人。我后来同这个把书给我看的工人谈了很久。这次谈话以后，他每星期日上课时都把他的八岁的小儿子也带了来，说是“让他也听听。”

学的最好的一个班有马克斯维尔工厂来的四个工人，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劳动组合里。有一个头发斑白的上了年纪的工人，戴着白边眼镜，说话很有威信，常常代表该班讲话。他是一个能干的领导人，谨言慎行。他总是自己动手做作业，什么也不问。他很快学会了写。他写他自己的情况：一会儿是“大胆的三套车在急驶”，一会儿是“我向往喝茶”，一会儿又是“我们的森林都伐尽了，没有东西作燃料，——我们那里不是草原。”

这个劳动组合来的另一个学生叫米海依洛，高高的个子，是个年青的工人，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围巾。他很少说话，但是他很快就学会了读和写，对什么东西都理解得很快。第二年，他的一个同学来了，是他在劳动组合的同事，曾经当过兵，只有一只手。他说：“米海依洛死了！他在临死前为您祈祷过。”我问他：“怎么死的？”“工作累死的。”

后来，马克斯维尔工厂的这个工人班又来了一个名叫佐洛托夫的年轻小伙子，带着一脸稚气，穿着一件袖子很长的长袍。他是刚刚从农村来的，很快就学会了识字。同学们都说：“他当牧童时就学会了。”

我工作的第一个年头使我对工人运动有了生动的了解，它把我和工人阶级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 * *

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的教员主要是斯摩棱斯克村儿童学校的教师，她们是：奥里加·彼得洛芙娜·波莫尔斯卡雅、兹纳依达·阿列克谢耶芙娜·尼基金娜、米里曼诺娃、波扎洛娃，等等。校长是波莫尔斯卡雅。她在星期日夜校负主要责任，是这个学校的组织者。她为人正派，非常直率诚恳，在学校很有威信。虽然她也不满意专制制度，希望获得各种自由，但对于政治却不感兴趣。她一点也不了解秘密活动，而且任何秘密活动同她的个性相抵触。

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弗雅捷斯拉夫·雅柯夫列维奇·阿夫拉莫夫，他是沃尔柯沃村学校的国民教师，该校在沃尔柯沃公墓后边；每个星期天，甚至于每天晚上，他都坐着铁轨马车从沃尔柯沃公墓赶到涅瓦关卡来。他对政治也是不闻不问的，但对教育工作却很热心。

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教是没有报酬的，只是付给那些由城里来的人一些车马费。闷热的铁轨马车里总是挤满了工人，乘坐这种车使我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当时工人的日常生活。

有很多人是从城里来的：鲁巴京娜，格尔德，库兹涅佐娃，费拉托娃，女教师丹克沃尔特，基维里柯娃，阿尔采莫维奇，沙莫辛娜，库捷尔里，罗杰，捷秋林娜（现姓米雪梁柯娃），尼古拉·列阿尼达维奇·米雪梁柯夫，叶甫盖尼·亚历山大洛芙娜·卡拉瓦耶娃，等等^⑤。库捷尔里和米雪梁柯夫当时是民意党人，他们

在进行某种秘密活动，常常去卡波里叶参加晚会。

虽然我和学校里所有人的关系都搞得很好，但是第一年我最接近的人还是卡拉瓦耶娃以及受她影响的罗杰和捷秋林娜这一伙人。罗杰和捷秋林娜整天忙于上课，她们在一个职业学校任教，工资非常少。卡拉瓦耶娃家里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都是一些年轻人，有大学生、助理医生、在家里学习的孩子，此外还有一大堆事。卡拉瓦耶娃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但她是一个杰出的文化教育工作者。

我是在一些秘密集会上认识米雪梁柯夫的，在这种集会上，他经常以民意党人的身分发表演说。他给我看“劳动解放”社出版的东西和一些秘密的书籍，从下车后到学校的那一里多路上，我们一直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谁更正确一些。

总的说来，我在学校工作的那段时期，学校里普遍存在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民粹派的气氛；把很多教小孩子的办法搬到成人学校来了——听写和语法太多。

当我对学校的情况稍为熟悉一些，在那里初步扎下了根之后，我仔细了解了一下学校的情形，然后提出了某些革新的办法。

每逢星期四，学校里通常上阅读课，并用幻灯来说明。各班的学生都参加，大约有200人。通常是读某本小说，往往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

我提出了这么一个主张：不要读小说，改为讲讲外国（如瑞典、挪威、德国、英国、法国）的情况。我认为工人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要比对《上帝见到真理，但不很快道破》^⑥的兴趣大。波莫尔斯卡雅说：“好吧，您就试试吧。”于是我就开始作准备。我第一次讲的是瑞典。

有一个星期四，大教室里不用幻灯了，黑板上挂着一张瑞典地图，长凳子上肩靠肩地坐满了无数来听讲的工人，还有几个教员。

当时我还有些怯场，刚开始时讲得很不自然，但四五分钟之后，我抬头一看，发现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听得津津有味，——我受到了鼓舞，一口气把课讲完了。不过不是用了一个半钟头，而是一共只用了四十五分钟。工人们在临走时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波莫尔斯卡雅说：“您怎么能讲得这样沉着？”当时我激动得哭了起来，走到一个黑教室里去。

星期天，学生们都把以瑞典为内容的作文交给了各班教师。

从此以后，“地理”课变得时髦起来了。我们把巴兰诺夫^⑦编的文选发给学生，打开画着一个戴有丝带帽子的英国水兵的那一页（这是当督学来时的做法），而讲的是欧洲各国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英国国会以及机器的作用等等。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四，卡尔梅柯娃作了一个题目叫“谈国家预算”的报告，内容非常有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这个报告也是用的“地理”课的名义。

第二年，我请求教补习班。这个班历来都是叶卡捷玲娜·尼古拉耶芙娜·谢普金娜教。她是一个历史专家，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她的自由主义使我很气愤。我想用另一种办法来领导这个班，想通过这个班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个班给了我，班上的人很复杂。其中一部分人是青年人，他们认识不少字，很喜欢语法，他们不久前才离开学校，还有些孩子气。

另一部分是年岁较大的工人，字写得很差，但是却很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关生活”的事情。我采取了中间路线，结果造成一个错误：青年人都跑了，只有“长胡子的”一直坚持到底。他们中间有两个工人是从彼得堡调来的。这一年我备课很努力。听课的人往往提出一些很重大的问题。捷秋林娜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图书工作。她常常从城里给学生带些书来。

我也学捷秋林娜那样，在市图书馆给学生办理借书手续。一个借五本书的借书证要75戈比，每个学生分摊15戈比。借阅图书的大约有25人。我变成了一匹常常把书从城里背到驿道上来，又从驿道背回城里的骆驼。各人的口味很不相同，我只好自己确定，哪

个学生适合读什么。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人认为《战争与和平》不值一读：“这种书只有躺在沙发上看着玩。”认为《斯姆林村纪事》^⑧也不值一读。青年人很想读莫尔朵夫采夫^⑨写的《1812年》以及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我记得，有一个学生，看样子还像一个小孩子（身份证写明他已满18岁；学校不收18岁以下的人，如有怀疑时，还须提供出生证明材料），有一次他拿到了《水下八万里》这本书时，愉快地双手把书捧着，一直这样坐到下课，后来两星期没有见到他，他把全书通读了两遍。《斯巴达克》^⑩一书和艾尔克曼—沙特里安^⑪写的《一个农夫的遭遇》很受欢迎。为了后面这本书还引起一场纠纷。班上有一个学生叫谢尔盖耶夫，是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很有才干，能说会道。他是劳动组合的小组长，人很聪明，在油脂厂工作。他非常喜欢读书。不管我怎样仔细地用报纸把书包好，但是还回来时书上总是染上了油污指印。

谢尔盖耶夫是在工作时间读《一个农民的遭遇》的，这样只好一会儿才去搅拌一下油脂，恰好这时工程师来了（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拿起书一看，很生气，他对谢尔盖耶夫说：“您最好读读贝尔纳^⑫的作品，不要读这种令人生气的书。”书上已经有别人写的许多评语。比如在谈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的那个地方，写着这样的字：“对我们的那个家伙也应该这样制裁。”工程师把华尔古林找来，书拿去了，送到图书馆，并让图书馆负责人立一个字据，以后不再让这本书流通。

在驿道上离米海依尔—阿尔汉格尔教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国民阅览室”^⑬。那里能出借的书很少；例如，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就禁止借阅。

我在学校的最后几年，斯摩棱斯克阅览室的管理员是捷秋林娜。工人们不仅到她那里借书，而且还和她谈心，向她请教。在图书馆里，常常组织和某些工人的见面会。扎波罗茨同志^⑭（他后来与列宁同时被捕）在那里领导工人小组的活动。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也广泛地利用阅览室。这个阅览室成了一个特

殊的宣传点。

学生们写的作文都很有趣。大家所喜欢的题目是“我的生活”。每一篇作文都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况。有几个人还写诗。我记得，有一个工人在诗里描写了工头如何侮辱工人的情形：只要你顶一句嘴，你就会被撵出工厂。

后来就徘徊在
工厂的大门口，
成年累月在那里
等待着工作……

(结尾忘了。——克鲁普斯卡雅)

有一个叫特里风诺夫的工人，高高的个子，身体很健康，长着蜷曲的、淡黄色的头发，他非常喜欢读莱蒙托夫的作品，并且摹仿他的手法。“布良斯克人——诗人”——他在一首诗的开头这样写着。有一次他用诗来叙述屠格涅夫所写的“比留克”：

屠格涅夫坐在长凳上，
带着抚爱的神情瞧着小偷，
他最后对比留克说，
松开绑在庄稼汉身上的绳子。

……

等等。

当时还没有广泛发行工人刊物，也没有工人通讯员。只有教师和他们的朋友读读当时工人所写的这些关于他们工农生活的作文。列宁非常爱读这些文章。

学校的教师后来补充了一些新人。到学校来工作的有阿波利里纳利雅·亚历山大罗芙娜·雅库波娃、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

克利波维奇、亚历山大·里沃芙娜·坎斯卡雅、玛丽雅·维里雅莫芙娜·伯恩泰姆、特列留辛，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雅柯夫列夫等人^⑤。尼季亚·米海依洛夫娜早已是一个老革命家了，她从前曾和罗加切夫^⑥一起工作过，她非常镇静沉着，稳重老练，对学生的态度也与众不同。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学生都十分尊重，但同时对他们也管得过多一些。尼季亚却不这样。这可能是由于她生长在芬兰，可能是由于她本人的一些特点使她能完全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每个学生。巴布石金^⑦也在她班上学习。有一次刚上语法课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个句子：“我厂打算罢工。”下课之后，尼季亚·米海依洛夫娜把他叫到一旁责备他说：“您干什么？想出风头？如果您不是想出风头，而是考虑到工作的话，那您就不应该开这种玩笑。”巴布石金的脸都红了，但是从此以后，他对尼季雅·米海依洛夫娜更好了，更加信任了。她也没有少责备我们。我记得，她有一次责备我，因为我跟一个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的工程师（我和他在一个组织里工作）到驿道上的戏院看戏去了；还有一次责备我，因为我让奥里加·彼得洛夫娜·波莫尔斯卡雅当着人面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我，还是雅库波娃和库捷尔里，都非常怀念尼季雅·米海依洛夫娜。

她对我们工作的影响非常明显，教学工作很快具有了革命的性质。

在这一年里，伯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维特曼曾经到学校里讲过几次课。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教师，一个学识渊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受到全校的钦佩。他不是讲那些大家早就听厌了的关于水和空气的知识，而是对学生讲地球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于是学生之间就不断地谈起这些题目。补习班的学生经常拿一些问题来问我，这些问题是书上没有的，因此我往往答不上来。在一个半文盲班——好像是罗杰那班，有一个学生在听写的中间突然放下蘸水笔说：“真有意思，我是由许多细胞构成的。”

由于了解了许多自然科学历史事实，学生们逐渐革命化了。

有个星期天我顺便到驿道上的阅览室去。那里坐着一个邮递员，他每次到阅览室来总是借“新约”。他外出参观过，那天他坐在阅览室里什么书也没有借。他突然谈起他的印象：“想想看，毛虫还会利用树叶树干的颜色作保护色。既然科学家能发现这一点，那末他们也能发现别的，所以可以相信他们说的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借“新约”了。

根据当时的规定，学生们星期天一定要去听神学课。我班上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去。神父吵吵嚷嚷，大为不满。为了不使学习班被解散，我说服学生可以轮流去上神学课，于是每次就派两个人轮流去尽义务。同时为了反驳神父的观点，也需要了解它。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曾笑着说：“我简直听不下去。根本不值一驳，他讲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居然想反驳达尔文的学说。他说，把一只母鸡丢到水里去，难道它能立即长出蹼来。”在维特曼讲课之后，达尔文的学说就在我校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了。

学校的面貌开始为之一新。学校里也从学生中补充了一些新人。到学校来的不仅有想学习的人，而且还有有组织的工人。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就注意那些最有能力的学生，然后尽力使这些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在他们和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之间，似乎形成了一定的默契。有时他们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我们才明白，比如：“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和彼得堡的工人之间有何区别？”“小手工业是否能竞争得过大工业？”我们明白，这个人参加了组织的。随后，他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也非常尊敬地向我们行礼问好。不过一部分比较落后的学生最初对教师不太信任。例如，有一次上地理课，当讲到地球是球体的时候，一个学生（半文盲班的）在复习了所有的材料之后说：“就是这一点我不相信……这是先生们在欺骗我们工人，——他们以后会讲实话给我们听的。”要想改变这种对地理课不信任的局面，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1893年秋，我帮助波莫尔斯卡雅改考卷。在一本作业上（从遣

词用字的观点来看,写得很坏)写有这样一句话:“切尔皮哥列沃、涅业洛夫、哥列洛夫还和涅乌罗扎衣卡村的……农民。”波莫尔斯卡雅把作业发还给那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的工人(他发色淡黄,双目炯炯有神)时,惊奇地说:“啊,您读过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这个工人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应该知道,可是不是有许多人没有读过吗?”“很多人没有读,怪谁?怪资本家!”

“资本家和工人”这个题目是冯奇科夫特别喜欢的题目。他在他的作业里经常写到这个题目。

甚至在春季考试中(考卷要送到区上去的),用十行字来叙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他也巧妙地把工人和资本家加了进去,他把撒网的渔夫比喻为资本家,把金鱼比喻为工人。

1893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这年的流动画展上,展出了画家尼·盖的画“基督与强盗”。

皇族来参观画展,看了这幅画之后非常生气,立即命令把“这个血腥屠杀场面”从展览会上搬走。

这幅图画拿走了,它后来放在数学家斯特兰诺留布斯基^⑩教授(他的妻子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寓所里。起初只是一些熟朋友去看看,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这幅画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二天去看时,画家尼·盖本人的个性也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以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身分讲话时,往往枯燥无味。不过他多半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分讲话。他谈到他怎样作画,在作画时他有什么感受,想些什么;谈到他怎样通过实践改变了对艺术的看法;谈到他如何为自己所创作的画所陶醉;还谈到当他爱妻的弥留之际,他如何望着她的即将消逝的面容,尽力想抓住她临终前的神态,好把它画进自己的作品里。

对别人的作品他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谈起杜波夫斯基画

的“天空”，列宾画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等等。傍晚时分，各种各样的人围在一张画前，他就进行讲解。

来的人可说是形形色色。我记得这么一回事，有一个社交界的太太无论如何要尼·盖在接见日到她那里去。尼·盖同意了。“真巧。我们本想聚会一下，现在就要在您那儿会齐了。我的朋友们就要在那里一起见见面了。”这位太太非常吃惊：尼·盖称为“我的朋友”的那些人之中，很多人没有贵族派头。当然，朋友中谁也没有到这位太太那里去。

我想让学生们也去参观一下尼·盖的这幅画。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很激动地说：“这是干什么？这画对他们有什么帮助？神主要我们这样做吗？”“不，不能这样说。”挑选了大约九、十个水平较高的学生去，冯奇科夫也去了。这幅图画给工人们留下了印象。那次尼·盖也在场。

冯奇科夫开始谈起这幅图画，并且又用某些理由扯到了资本家和工人、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外表看来这很荒唐，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冯奇科夫想说的话，支持与同情他的同志都懂得。尼·盖的双眼噙着泪水，他非常激动地拥抱着冯奇科夫说，他想用这幅图画说明的正是这个意思。他送给同学一些图画照片集，并在每本上写着这样的话：“热爱你们的尼·盖敬赠”。后来，当学生们由于各种原因被捕之后，宪兵们从他们那里搜查到这些附有题词的照片集之后，都非常吃惊。

尼·盖后来说，他希望他的画能成为人民的财富，并且放在画廊里，让群众都能去参观。

我以后在日内瓦看到过这幅画。这幅画孤零零地摆在大厅里，一些戴着礼帽和手套的人莫名其妙地瞧着它。我当时很难受。我想起了展出这幅画的那次展览会，想起了我的学生。

每年春天，我们都领学生到埃尔米塔什去参观流动画展，他们的中肯的评论和现实主义的见解使人加深了对许多作品的理解。他们能够很快地抓住作品中任何不真实和不确切的地方，他

们对一些描写老爷们日常生活的画作不屑一顾，而在一些描绘森林、池沼、草原风光的画前留连忘返；对克里米亚风景画则一走而过。他们喜欢历史画，探究画里的内容。

我在上面已经谈过，1894—1895年学校的面貌有了改变。它在革命工人中已是声誉卓著。甚至别的区的工人也到这个学校来学习。例如，每星期天就有一个普吉洛夫工厂的工人来我班听“地理课”。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件事：秋天从乡下来了一个青年小伙子，走进教室之后，就向圣像划十字，上“地理”课时他读“新约”，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他每天晚上已经跟某一个参加了组织的人一起走了，腼腆地笑着，手里紧紧地拿着一本书，嘴里说：“我今晚上不来上课了，我和他到一个同学那里去”。他的眼色却告诉我：“到小组去。”

当时工人很注意有关他们的发展的每一句话。我班上有一个叫巴京的学生，虽然已经结了婚，却还像是小孩子。他非常能干。他是马克思维尔工厂的工人。他的工作很劳累——在潮湿的地板上由一台机器跑向另一台机器，把断了的线接起来。后来巴京的工作换了，他要看管的机器的台数增加了。巴京就去找经理。马克思维尔工厂的经理是个大坏蛋，他用暴力使工人屈服他，他办公室里放着一根鞭子，当他和那些刚从乡下来的工人谈话发起火来时，他就用鞭子打人。这次巴京来找经理说，既然他看管的机器台数增加了，劳动强度增加了，那么他的工资也应该增加。恰好不久前我们班上讲到过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讲到过工人受剥削以及劳动强度的问题。

不仅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懂得，当工人掌握了“劳动强度”这种术语时是什么意思，就连马克思维尔工厂的经理也是懂得这一点的。巴京立即就被解雇了，把他送到警察段上去，然后又由段上按驿站把他遣送回乡。

十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他当了面包师，成了工人运动自觉的参加者；我和他畅叙别情，谈得十分高兴。

有些事情往往不能不令人激动。在马克斯维尔工厂里，有一个叫托奇洛夫的工人。他拼命寻找“上帝”，曾经当过圣经基督教派^⑩信徒。秋天他通常是到学校来，从一个班转到另一个班，由于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就停学了。后来，他到了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克利波维奇那个班，就跟班学习了。春天，他写了一个条子给她：“我这一辈子都在寻求上帝，复活节那天我才从鲁达柯夫（另一个同学）那里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我听了之后，顿时就感到非常轻松愉快，因为最糟糕不过的就是当‘神的奴隶’，——而当人的奴隶还可以想法子反抗。”

当时还没有工人组织，也没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托奇洛夫决定独自进行斗争。夏天，他用刀刺伤了一个工头，因为这个工头对工人粗暴野蛮极了。后来，他在监狱里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庭审讯时，我同尼季亚也出庭了。马克斯维尔找了很多证人——有两个工头，一个经理，一个没有觉悟的老工人来控诉托奇洛夫。但是他们的发言与托奇洛夫慷慨激昂的演说相比，是多么可怜啊！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的秋天，我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试验。我们从技术协会^⑪的章程里得知，在经常开办的训练班里可以讲某些课程。在斯摩棱斯克的各年级里，除了星期日夜校之外，还有技术训练班。我们想在训练班里开设一些讲座。我们贴了一张布告，然后一连几星期在一个大教室里进行了这种试验性的讲座。每一个教员都说出他要讲的课程，然后就上试验课。接着工人们开始登记——自己想学什么课程。大多数人都报名学欧洲地理（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⑫对这门课曾大加赞扬）和几何（由科罗布卡^⑬讲授），但是这两门课都没有得到批准。后来欧洲地理改为俄国地理，由我讲授。学生是经过选择的，因此我可以和他们讲很多问题。后来听讲的人都参加了革命运动，都先后被逮捕。我们每天晚上总是把大门锁上，只把一个漆黑的过道开着，这样既可把可能突然来到的督学“拒之门外”，也可以防止不速之客的

光临。

内部的保卫工作由学生们自己担任。常常有学生预先来告诉我们：“今天可别讲什么特殊的玩意，新来了一个人，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据说他当过修道士。”学生不仅预先告诉我，一个上了年纪的信教的工人还对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克利波维奇说：“注意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他常常跑暗探局。”

总之，驿道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都一清二楚：哪个政党在工人群众中领导着斗争，工人对这个政党持什么态度，对党有什么反应，他们喜欢党的什么，不喜欢什么。当散发传单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用打听，也可以通过学校非常详细地了解到，这些传单怎样散发出去以及产生了什么影响。

库捷尔里当过市立儿童学校的教师。她在学校里组织了几个工人小组。有一次她叫我和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去参加小组的会议。我们最能干的工人中大约有15个人去了。库捷尔里具有非凡的宣传才能。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历史课讲得有声有色。我很少见到这样有天才的学习领导人。但当时库捷尔里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和尼季亚在讲课的内容上总是有些争论。下次讲课的内容本来是有关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題，不过这次课没有上成。学校里进行了一次搜查，库捷尔里、沙莫辛娜被解职了。

通过学校我们还搜集到一些有关工厂制度的材料。《工人事业》报^②第一期的材料就是这样搜集起来的，它本来打算由斗争协会出版，然而在准备付印时却被宪兵查抄了。

学生们在最后一年谈了很多心里话。通常是这样进行的：我提出若干问题，学生们互相展开激烈的争论。例如，我班上就有一个马克斯维尔工厂的工人，叫雅库雪夫，他喜欢写一些“发展阶段论”等的长篇文章，同时他又是教堂的领唱人。同学们都责备他，可是他对他们说，他之所以不能抛弃这一工作，是因为神父骗人太厉害，得把他们弄到清水里洗濯一番，而他本人对宗教仪

式向来是不参加的。同学们还谈到自己在工厂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我的几个学生(巴布石金, 格里巴京, 波得罗夫兄弟——阿尔谢里和菲力普)参加了列宁的小组。当时我经常和列宁研究宣传方法、宣传内容以及鼓动工作方面的问题。列宁的学生都猜测我们是认识的。

当列宁、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基、斯达尔科夫^②等人在1895年12月被捕之后, 巴布石金到学校来找我, 他们想为这次逮捕写一份传单, 他请我给他们起草。当这份传单在“斗争协会”大会上朗读时,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份“政治性的”传单——当时传单上一般地只写经济要求, ——因此大家都很担心, 只是由于这张传单是工人写的, 才决定去印行。

1896年春纺织工人准备罢工, 应该指出, 学校在准备这次罢工的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们最后碰到了一个奸细——一个叫“拉里翁内奇”的人。一个学生(鲁达柯夫)在下乡之前把我和另一个同学的妻子也领走了, ——他们有一个单独的房子, 很方便, “拉里翁内奇”也常常去。1896年的罢工, 我们失败了。许多学生失败了, 我们这些教师——“斗争协会”的会员——也失败了^③。

教员当中后来入党的有以下这些人: 克利波维奇, 库捷尔里, 米雪梁柯夫, 捷秋林娜(米雪梁柯娃), 涅夫佐罗娃(克尔日然诺夫斯卡雅), 雅库波娃, 卡坦斯卡雅, 卡尔梅柯娃, 维特曼, 伯恩施泰姆(她有一个时期曾参加“斗争协会”)等人也帮助过党。学生中, 巴布石金于1906年在公墓附近被枪杀了, 格里巴京在反动年代在狱中被折磨死了, 阿尔谢里·波得罗夫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南方战线牺牲了。

岁月流逝, 很多事情我都忘了。在这所学校的几年工作, 使我学会了做政治教育工作, 懂得了工作方法。



十月革命前作品

1899年—1917年



妇女与儿童教育

(《女工》一书摘录)

对女工说来，家庭生活就是不断地照看孩子，只不过是让他们吃饱喝足而已，教育孩子的事，往往谈不上。

农妇首先就遇到照看孩子的问题。要么下地干活，要么在家看孩子。但是农活不等人，只好出去干活，而把孩子交给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或者是年龄稍大些的孩子去照看。凡是在农村住过的人，都知道这种照看是怎么回事：给乳婴灌下变酸了的奶（母亲只能偶而抽空来哺乳）；塞进一些青菜和嚼碎了的黑面包；把孩子放在摇篮里摇晃，直到他昏昏入睡为止；让孩子穿着外套关在闷热的屋子里，而晚上又让他几乎光着身子睡。经常可以听到人说，一个七岁左右的小保姆不是把小孩摔坏了，就是把他“惹火”了，再不就是和他一起干出一些只有六岁的小孩子才想得出的事情……不过，即使母亲亲自照看孩子，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她一点也不了解人体组织，一点也不懂得儿童的发育情况，而这些又是使儿童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知识。农妇照看孩子多半是按习惯和偏见办事。即使她知道应该怎样做，而且也很想做好，但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得符合要求。儿童需要清洁的环境、暖和的室温、新鲜的空气，可是一间房子里住着上百个人，没有取暖设备，屋里放着兽皮，养着牛犊，等等，使你感到无可奈何。孩子病了，母亲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往往找不到地方看病。最糟糕的就是孩子得了天花、猩红热等传染病：生病的孩子本应与健康的孩子

隔离，可是农村往往是全家人住一间房，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于是孩子们就相互感染、相继死去而无法抢救。农村儿童有半数不到五岁就夭折了，这已是司空见惯、毫不足奇的事。只有身体特别好的才能活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农村儿童的学校教育。农村往往没有任何学校，只偶然能有机会学习一下识字。而且即使农村里有学校，父母也常常不能把子女送去学习。家里需要孩子们做事：要他们照顾弟弟妹妹，放羊喂鸡，干各种家务活。有时是没有衣服可以穿去上学，尤其是学校办在邻村的时候。那些能去上学的孩子，也只能在学校里学点读、写、算，而且还学得不好。我们俄国的学校很糟，除了教识字之外，不准教师教任何别的东西。人民愚昧无知对政府当局最为有利，因此学校不准给儿童讲别国人民怎样获得自由，他们奉行的什么法律和制度；不准讲为什么有的国家实行这种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实行别的制度，为什么有些人穷而另一些人富。总之，学校不准传授真理，而教师只该教学生对上帝和沙皇顶礼膜拜。上司严格监视教师，不让他们传授真理，而且所挑选的教师也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结果，孩子们毕业时与刚入学时一样无知。母亲本人往往也不会教自己的子女，因为她自己一无所知。^①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所写的《黑暗的势力》这一剧本中，曾经通过一个退伍士兵的口说起俄国农妇的愚昧无知的情况：“你们娘们懂什么？就像瞎眼的狗把鼻子插进粪堆一样。咱爷们好歹当过兵，见过世面，可你们懂什么？除了娘们的丑事，啥也不知道。”^② 妇女顶多只能教儿子恪守斋戒，礼拜上帝，遵从长者和富绅，学会逆来顺受……然而她的子女未必能因此而有幸福、自由可言，未必能懂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话的真谛，未必能伸张正义、捍卫真理。

我们对农妇（她本应懂得教育子女之道）所说的这番话，也完全适用于在从事手工业的有子女的妇女。她们与农妇一样，知识贫乏，忙于干活，无力教育子女。手工业部门的儿童，六七岁左

右就开始干活。这种活儿虽然不复杂，但他们得和成年人一样干，劳动的时间也和成年人一样长。这种工作损害了儿童的健康，使他们的智力大为减退。由于没有体育运动，又缺少新鲜空气，儿童们在闷热不通风的屋子里很容易生病。从早到晚干着单调的工作，他们的智力得不到发展，知识水平难于提高，逐渐变得萎靡迟钝、毫无生气。上学念书根本谈不上。一个手工业者要想勉强维持生活，就得全家老小齐动手，拼死拼活地干活才行，哪里还谈得上送孩子上学！

女工的身体本来就弱，她们的身体状况更难适应工厂恶劣的劳动条件。体弱多病的妇女生出来的子女也是瘦弱不堪的。据调查：“在火柴厂(厂内工人多为妇女和儿童)干活的女工，一经出嫁，就成了生育体弱多病的子女的母体。她的子女与她本人一样身患百病，因此常常夭折。”我国的工厂法对限制和减轻孕妇劳动迄今无明文规定。仅在工厂罚金保管和支付细则中提到，“可以”从罚金中拨付临产女工一些补助费，并在分娩前两周停止上班。由此可见，它并未名正言顺地规定一定要给予任何补助费，而只是说可予支付；也就是说，是否支付全凭工厂主的高兴。实际上，几乎无一处支付过此种补助费。女工得不到这种补助，又有失业之虑，因此只好一直工作到临产的前夕。产后身体还未复原，又急于上班。正因为如此，所以女工流产、早产并且患有各种妇女病已是屡见不鲜之事。女工很难照看子女。她下班回来已是疲惫不堪，可是还得洗衣扫地，缝缝补补，还得给孩子做饭洗澡。有时孩子生病，她一连几夜不能成眠，照顾病孩。这时，要是有个邻居提醒她给小孩喂点罂粟汁，让孩子平静入睡，她就满心高兴，感激不尽。她哪里懂得这种饮料有伤孩子身体(罂粟汁含有鸦片，而鸦片毒性很大)，会使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十足的白痴。女工白天上班时，就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的老太婆照看。孩子稍大一些，干脆就没有人照管，几乎全是在街上长大的。他们营养不良，挨冻受饿，衣衫褴褛，肮脏龌龊，从小就看到酗酒闹事、聚众斗殴等

恶行。儿童的学前阶段就是这样度过的。城里虽然有学校，但市内和市郊的学校往往人数甚众、很难入学，而工厂内往往又不开办学校。工厂法规定工厂主“有权”为工人子弟办学，但并非工厂主的义务。这样一来，远非所有工人的子弟都能入学。当儿童到了可以进厂干活的年龄（根据我国工厂法规定，儿童年满12岁即可入厂做工），他们就开始自谋生路，很快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女工虽然目睹自己的孩子很可怜，也很心疼他们，但她难得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结果孩子长大后往往和她很疏远。

只要我们注意到女工照顾子女多么困难（特别是私生子，而且完全由女方抚养时），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她们有时不得不把子女送到育婴堂去，或者交给某个专门收养孩子的妇女。报纸上经常报道某个大工业城市发现了一个“天使工厂”。有的妇女所操的职业，就是收养乳婴（收取一定费用），然后用饥饿、鸦片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尽快把他们送进天堂，使他们成为“天使”。这种勾当一经暴露，“天使”的制造者就被判以徒刑，可是不久在别的地方又出现了新的“天使工厂”，其产生的原因仍然是由于女工无力抚养子女。

女仆的子女也是同样的遭遇。女仆不能成家。人们雇用女仆时都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有男人来找她。人们不愿意雇用已出嫁的女仆，因为她的丈夫会经常来找。带着孩子的女仆从来无人雇用。这样就可以使女仆一心一意地干活。在这方面，女仆的地位比女工的还要低下。女工干完一定时间的活儿，其他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而女仆受雇于人，任何时候也无自主权。她的全部时间都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往往不许女仆花时间去看望她自己的孩子，因此不管她是否愿意，她都得把孩子交给别人抚养。这样一来，她的大部分工资就用到养活孩子上去了，否则她就只有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

由此可见，女工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很好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她全然不能起到一个教育者的作用；她不知道什么对儿

童有害，什么对儿童有益，不知道应该教孩子们什么以及怎样去教。德国社会主义者蔡特金* 在她所写的一本论述德国女工运动的著名小册子中曾经说过：“要是不学习，你就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要想培养人，难道可以不经过特别的训练？但是即使女工能起一个教育者的作用，那么在她目前的生活条件下，她几乎也是无能为力的。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她唯一能管的，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不打赤脚。但是她往往连让孩子吃饱都做不到，因此只好听之任之。现制度下的情况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工作应该怎样安排呢？我们已经说过，社会主义者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愤怒的资产者惊呼：“这些可怕的社会主义者想要毁灭家庭，把子女从父母手里夺走！”这当然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从来没有人这么主张过，也从来没有人打算把子女从父母手里夺走。所谓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首先是指不要父母操心儿童的生活问题；社会不仅保证给儿童以生活资料，并且还要让他们得到完满而全面的发展。学前儿童的教育时期是一个最困难的时期。目前，西欧各国已开办了所谓的“幼儿园”。母亲上班时把孩子送到那里，下班后再来接走。她们可以安心工作，因为孩子们不会出事，幼儿园有很多阿姨亲切地照顾孩子们。幼儿园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乍看起来，可能觉得幼儿园没有秩序，但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儿童的活动都是严格按计划安排的。儿童按班划分，各有自己的活动。在幼儿园里，儿童刨土、浇水、除草，在厨房洗菜、洗餐具，学习刨削、缝纫、画图、唱歌、读书和游戏。每种游戏、每项活动都可以使儿童学到点东西，而主要的还是使他们养成守纪律、爱劳动的习惯，不与同学争吵，对同学谦让有礼，不调皮任性。阿姨们都能很好地照顾这些三四岁的孩子，按时给他们吃饭、让他们睡觉。地板

* 克·蔡特金是德国女工运动的一位最杰出的、最有天才的领导人。——作者注

上铺着宽大的褥垫，儿童们并排躺着，盖着公用的被子。这种在幼儿园度过时光的情况与那种无目的地到处流浪的情况（儿童在家常常如此）完全不同。对于那些在家里闲逛的孩子，常常没有时间去管他们。“别闹！走开！”这是孩子们在家里经常听到的苛责声。同时应该指出：目前西欧办理完善的幼儿园为数还不多。我们之所以谈到幼儿园，只不过是说明教育儿童可以自幼开始，说明儿童在公共幼儿园里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且比在家里快乐得多。既然目前都能有一些办理完善的幼儿园，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幼儿园将办得更好。由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子女都在这种幼儿园受教育，所以大家都会关心把幼儿园办得更好。儿童由幼儿园升入学校。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校将不同于目前的学校。在未来的学校里，学生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们在校期间将要养成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而更主要的是，这种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于人、精力充沛的公民。

资产者不关心子女的教育。他能给自己的孩子几间宽敞明亮的房子，能给孩子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条件，能为孩子雇用奶妈、保姆、家庭教师、外国保姆，但他却坚决反对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女工们不可能不珍惜社会教育的一切好处。母性的感情使她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使她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渴望工人阶级的事业取得胜利！

论自由学校问题

当前对自由学校的问题讨论极其热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参与者甚众^①。但文章和谈话涉及此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者多，谈到如何组织这种学校者少，而任何一所自由学校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它的组织工作。新型学校的教师所具备的组织才能应当大大超过其教学才能。他要善于组织儿童的共同活动，使这一活动能做到统一协调，具有一致的思想；否则，自由学校就会变成儿童们不是在此学习独立工作，而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指望大家为他效劳，让他尽情享乐这样一个场所。

当然，自由学校的组织工作与其说是理论研究的对象，毋宁说是实际试验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在报刊上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我只想谈谈儿童自己在自由学校组织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现代学校把学生仅仅当作一种原始材料，当作一堆粘土用以塑造这种或那种人物：手工业者，政府官员，优秀公民，社会活动家。诚然，这时也常常谈到学生的个性问题，谈到必须考虑个性问题。但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必须了解你用以塑造人物的那种粘土的性质。而对儿童自己鲜明的个性，以及他精神领域深处的那一复杂的内在生活，却完全未加注意；不够认真研究儿童的个性，不够尊重儿童的个性。

儿童以探求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生活，他们在观察，在思考。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儿童有接触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的脑子里引起了成千上万的问题，唤醒了儿童的心灵里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只不过他们不能用成人能理解的方式来陈述、来表露而已。“孩子不哭不喊，母亲就不管不问。”成人往往认为儿童比实际情况要稚气得多(如果可以这么表述的话)。儿童置身于幼儿园和学校的热忱气氛中，人为地脱离了他想投入的生活。

我知道，支持自由学校的人在理论上是重视儿童的这种人的个性的，但是正如法国谚语所说：“le mort saisit le vif”(死人牵着活人的鼻子走)，在教育学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无疑会对支持自由学校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把青年一代(从10—12岁开始)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不能因为儿童不会对他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认为不应对他谈起这些现象。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说明他没有考虑这些现象。当然，如果儿童毫无意义地重述他们从大人那儿听来的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和事实的评论(儿童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还不能独立地进行这种评论)，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健康的现象。但我认为，应该给10—12岁的儿童讲述以下这种思想：“现在人们的生活很苦；谁想做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就应该勤于思考，努力学习，会做工作。”自由学校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这样的人：他们不仅自己生活幸福，而且处处显得朝气蓬勃、知识丰富、热爱劳动。但是，如果儿童本人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如果他们不努力获取知识并且善于运用这种知识，如果他们不去帮助自己的同学和其他一切他们能够帮助的儿童做到这一点，只是依靠自由学校的教师，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任务的。

我认为，这种思想应该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于新型学校的全部生活之中，把新型学校团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里，学生和教师都为一个共同的理想所鼓舞，都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当然，凡此种种，皆取决于教师的热忱。如果他对自己的工作怀有

信念，热爱自己的工作，那么他的这种坚定信心和执着情感定会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受到影响和感染。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教学生学会去实现这一理想。在这方面，采取广泛的措施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工作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学生应该既是学生，同时又是教师。

凡对儿童进行过观察的人都知道，儿童具有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的知识与别人分享。一个小孩刚刚背会一段课文，就急于去教自己的弟弟和妹妹，教自己不识字的同伴、佣人。促使儿童这样做的动力，是他的一种天赋的积极性：希望把所获得的知识用于实际工作。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儿童的一种社会本能：希望成为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还可能有一种检验自己的模糊要求在起作用。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儿童都很想扮演教师的角色。应该说，儿童也具备扮演这一角色的素质。他对刚刚掌握的知识津津乐道，他还深切地感到，由于获得了这一知识，他的视野如何扩大了；他还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的这一乐趣来感染他的同学，——儿童是喜欢模仿的。

此外，从心理学方面看，儿童对别的儿童总是比对成人更亲近：他往往很详细地告诉自己的同伴一件事情，而对教师却绝口不提此事。

自由学校的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儿童想教别人的这种愿望，调动他的这种积极性并将它引上正轨。

这个思想本身并不新颖。英国学校广泛采用了这种办法，学校的教师经常依靠高年级学生的帮助来进行教学工作，而在教育工作中利用此种帮助的时候更多。拉科姆^②写的《根据儿童心理进行的教育》这本饶有兴味的著作里，坚持了这种思想。他说：“要让儿童互相提问，互相检查对功课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这样一来，每个学生依次都可起到教师的作用。”（第181页）他接着写道：“如果我对一个学生提问后，发现他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历史时期掌握、

理解得很好，我就让他对别的同学就这个问题进行辅导：‘这个问题你理解很深，可以帮助别的同学。如果他们中间谁有什么疑问或遗忘的地方，不必来找我，可以问你。你完全可以代替我做这件事。’只要教师能让学生代替自己，自己可以不去起一个教师的作用的时候，他都要这样去做。这种做法大有好处，不妨一试。”（第183页）

我认为，吸引儿童本身参加教学工作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现代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糟糕透了的教育机构，因为它不仅不去发展儿童的社会本能，反而千方百计地扼杀这种本能。

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在研究教育问题的人中，未必会有人怀疑。现代学校盛行的评分奖惩制度将使卑劣的利己主义得以发展，儿童团结一致、互相关怀的情感受到摧残，那种最起码的正义感将被扼杀。

在儿童既学习、又教别人的学校里，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必须绝对服从在他们看来极为无理的要求的奴隶，也不是教师必须殷勤照顾的来宾，而是一个小团体的有益成员。这个团体需要他们，他们也离不了这个团体。

儿童感到自己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成员，他做的是大家需要的事情，必须充分评价儿童的这种意识情感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它可以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对事对己的认真态度；也可以避免产生内部的争吵、精神的空虚和不满的情绪。

儿童迫切要求成为一个有益的人。这种要求在家庭里多少还可以得到满足，而在现代学校里，这种要求就无声无息，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在自由学校里，教师应教育儿童成为有益的人，教育他们自己的力量为别人谋利益。他应该告诉儿童，怎样去帮助那些水平比自己差的，应予以某种帮助的同学或小朋友，以及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

我认为，应该尽量满足儿童想成为有益的人的这一要求。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举例说，可以让一所中学与某一所条件很差的农村学校建立联系，让孩子们在教学用具方面为农村学校服务。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只消给孩子们一些指导就行了。例如，可以告诉他们如何利用旧的画报（如《涅瓦》画刊）编地理、历史小册子以及童话故事的插图集，等等。了解一下儿童所表现的主动精神和毅力，看看这项活动如何密切师生关系并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这样一来，既可以满足儿童的创作要求，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的要求，而且正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成为有益的人。

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可以让学校与某个幼儿园建立联系，教育学生为幼儿园的小朋友缝衣服、做玩具，有时还可以让他们去照顾这些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复杂，都需要进行组织、加以引导，使这一切都做得很有生气。舍此还有别的办法吗？

回头再谈互教互学问题。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教学相长”，这是众所周知的教育学真理。从事教学工作的人都知道，教学是进行自我检验的最佳手段。你刚一张口向别人讲述某个似乎已经明白了的问题，却突然发现知识上的缺陷。所以，儿童临时充当教师，就会明白自己知识不足之处，感到必须加以补充。经常进行自我检验、自我评价，这在教育上是至关重要的。

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同时还能培养他们的自制力、忍耐力，培养对他人的关怀以及对同学所取得的成就所感到的喜悦之情。

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必然会使学生很早就来讨论教育学的某些问题和某门学科的教学法问题。目前，只有中学高年级才讲教育学，而由于教育学与儿童息息相关，所以孩子们早就对教育学感兴趣。孩子们经常互相讨论教学方法，以及自己教师采用的各种教育方式。而且他们在进行这种讨论时，表现出相当的观

察能力。教师们为何不积极参加儿童们的这种讨论并将其引上正轨呢？这样做可以大大密切教师与儿童的关系，加深他们的相互了解，使儿童关心自由学校的组织工作和自由教育。他们可以为这一工作做出更多新的贡献！

常常有人说：“新型学校所需要的教师与目前的教师完全不同。他应该十分关心教育问题，具备超群出众的组织才干、渊博深厚的知识基础、敏锐犀利的洞察能力以及主动精神和细致作风。这些教师从哪儿来？”如果自由学校能吸引本校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如果它一开始就能吸引儿童参加本校的组织工作，并用自己的教育思想来激励教师，向他们展示实际运用这种思想所取得的成果，那么，自由学校就会造就出一批必要的新型教师。

而那些参与了别的活动的学生（这种学生自然总是占大多数），将永远对教育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千方百计地促使自由学校思想的实现。

与此同时，吸引儿童自己参加教学工作还可以解决一个对许多人说来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发展学生的个性，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要从个性出发来对学生进行教学工作，而在现行教学制度下，一个教师就只能教有限的学生。这样一来，自由学校（其教学工作完全由教师负担）就会成为一个收费昂贵的机构，入学的人数就会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学校成了某种劳动场所，每个学生在这儿起的作用时而是学生，时而又是教师，那么它所需要的教师人数就会少些，因而收费就低廉得多，广大居民就能把自己的子女送来学习。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

在《圣彼得堡国民教育委员会1908年工作总结》中，一位专员在评论手工教学时说：“谈到手工，我极感欣慰的是，几乎在所有男女合校的学校里，从事手工的不仅有女孩，而且有男孩。这些男孩非常喜爱这种活动。在有些学校里，他们的成绩（例如缝纫和编织的成绩）甚至还超过了女孩子。”

这段话摘自上述总结，载于去年^①12月号《教育通报》^② 新闻记事栏内。该栏编辑对教男孩学习缝纫是否有益甚表怀疑。

我想对此问题略抒浅见。

首先我想一般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至今认为只应由妇女来干的活（如缝纫、做饭、洗衣、照看小孩，等等）是否应教男孩去做？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生活是与操持家务有关的许多琐事联系在一起的（大概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将来，生产改革和社会生活条件改善之后，这种情况也就会有很大改变，但目前的家庭生活还是与做饭、烧菜、收拾房间、缝补衣裳、养育子女等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工作全都落在妇女身上。

在收入较多的家庭里，这种劳动就落到女仆——厨娘、使女、保姆身上去了。富裕的妇女之所以可以不必从事劳动，是因为她把这种劳动转嫁到另外一些没有条件摆脱这种劳动的妇女身上了。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整个家务总是完全落在妇女身上。在工人家庭里，丈夫有时也帮助妻子料理家务，这是由于家庭贫困

所迫使的。工人下班之后，或者节日休假，或者失业在家，有时也到小铺去买点日用品，或者在家打扫房间，带领小孩。当然，并非每个工人都这样做，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这样做，何况还有很多事情他根本不会做（如缝纫、洗衣）。而做妻子的，尽管有时也整天在外工作，然而回家之后，还要洗衣服、擦地板，甚至夜深人静还在缝缝补补，而丈夫早已呼呼大睡了。如果说在工人中间丈夫有时还帮助妻子料理一下家务的话，那末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即使收入非常微薄，男人对家务事总是不闻不问的，而让妻子去干她所擅长的“女人家的事”。一个“知识分子”要是去擦地板、补衣服的话，那就会引起周围所有人的嘲笑。

在资产阶级的报刊（尤其是西方的报刊）上，经常谈到这个题目，就是家务是妇女能够最有效地发挥自己力量的方面。一个人只能最适合他的个性的劳动方面才能做出一些真正伟大的事情，而琐碎的家务就最适合于妇女的个性。妇女所应该大力追求的，就是成为一个模范的主妇，而不能妄图走出家庭生活的圈子来与男子在脑力劳动上较量高低。瞧不起扫地补袜这种工作是完全不应该的，这种工作应该备受尊重，而不应该轻视。

这些话虚伪透顶，这一点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看出，男人们尽管滔滔不绝地说什么家务劳动应受到极大的尊重，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也不做这一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是瞧不起这种工作的，认为这是那些庸庸碌碌、不求进取的人干的活。

所有这些关于妇女是“天生注定”要管理家务的言论，同过去奴隶主所说的奴隶“天生注定”就是做牛当马的说法，同样是不值一驳的胡言乱语。

实际上，家务工作中根本没有什么是比较适合于妇女个性而不适合于男子个性的。妇女不能从事某些需要较大的体力才能胜任的工作，但是男子又为什么不能同妇女一起从事家务呢？问题不在于家务是妇女天生注定要从事的工作，而是因为丈夫为了挣得工资而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工作。这样一来，管理家务完全靠

着妇女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然而，由于妇女也越来越需要把自己的时间用去挣得工资，因此家务就成了她的额外负担，而男子这时要是不去帮助她，那就有失公平了。同样的，如果男子所从事的职业使他能有许多空闲时间，而他却以为同妻子一起做点家务工作有伤他的体面，这也是不对的。

自由学校一向反对一切损害人们生活的偏见。那种认为家务只是一些不求进取的人才做的看法，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使得男女不平等。这种偏见不只损害了妇女的生活，也给家庭带来了不和与误解。

我们要使男女儿童同样学会做一切必要的家务工作，而不要认为这种工作有伤体面。

凡是对儿童作过观察的人都知道，男孩在儿童时代与女孩一样喜欢帮助母亲做饭、洗餐具、做各种家务，他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但是，在家里往往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男孩和女孩采取不同的态度。家里的人往往把洗杯子、摆饭桌等工作让女孩做，而对男孩说：“你干吗老在厨房里挤来挤去，这难道是男子汉干的活？”送给女孩的礼物是布娃娃、食具；送给男孩的礼物是火车头、小兵。到了学龄时期，男孩已经养成了轻视“小丫头”和女孩的活计的心理了。当然，这种现象表现得还不很严重，只要学校采取另外的办法，这种对“女人家的事”的轻视态度很快就会转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应该像教女孩一样去教男孩学习缝纫、编织、补衣——教他们学会做一切生活中所必须学会的事情，使他们不要成为一个依赖别人的无用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一教育工作做得很好，那末就完全有理由认为，男孩一定会很愿从事这些工作，就像我们在彼得堡学校中所看到的先例一样。

……其次，我们应该让儿童自己轮流做学校里的早饭，洗食具，收拾房间，保持环境卫生等等（男孩和女孩做的工作都一样），使之具有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愿望，很好地完成委托给他的工作的愿望以及对工作的兴趣，这一切都会使儿童很快改正对“女人

家的事”的轻视态度。

当然，指望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而能取得巨大的成果，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树立学校里的集体精神而值得注意的小事情之一。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

法国教育杂志《Revue Pédagogique》(《教育评论》)1910年9月号刊载了Roger(罗歇)所写《布鲁塞尔博览会上的初等教育》一文。罗歇在谈到比利时这一部分时说,根据比利时国民教育部大臣的意见,1910年的博览会应该根据既定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尽可能做到用图例来说明问题,同时对学生宣传根据某一原因必须向他们灌输的思想。这一思想应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在各个年级(从幼儿园开始到成人学习班)的课堂上得到发扬。

布鲁塞尔博览会表明了比利时大臣的这一意见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为了发展殖民生活,教育部里向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培养学生对旅游的兴趣、探险的爱好,发扬他们的独立进取精神。教师们随即采取措施,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教案。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展出了教师们的大量教案,充分显示了比利时教育界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当然,博览会上没有展示也不可能展示这种教学的效果。这样就不可能作出估计:由于修改教案,学生的独立进取精神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发扬。而只有这种效果才能证明这位比利时大臣的主张正确无误。

罗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对法国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的做法习以为常,因而对比利时教育界这种明快的工作作风大为赞赏,对比利时教师这种严格执行命令的精神大为推崇。

培养活生生的人，所根据的是某一死板模式，对儿童的心灵和智慧进行大量的机械加工。上面下达一项任务：在某一时间、为了某种需要（这次是为了殖民地生活的需要）、生产多少商品。于是大批教育工作者就立即采取行动……

教师本人、教师的观点，教师的教育经验和信念置于何地？教师同仁置于何地？居民置于何地？居民怎样参予学校工作，促进学校工作的开展？父母的意见置于何地？所有这些问题都一字不提。

从罗歇的文章判定，比利时国民教育工作的景况是极为凄凉的。

我们不禁要把它与美国的国民教育工作的景况作一比较。美国的居民对欧洲官僚主义的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们认为官僚主义会窒息任何有朝气的工作，会扼杀任何个人的首倡精神。

最令欧洲人惊奇的是，美国没有任何一个部来管国民教育工作。美国只有一个“国民教育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它不进行管理，不下达命令，只是召开一些与教育工作有关的会议，出版一些教育统计材料。这些材料载于年度报告和定期出版物上，日报从中摘引一些材料进行讨论。这些材料的内容既涉及美国各州，也与其他国家有关。年度报告书上通常都附有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明意见。这位官员是教育学专家，他向居民发出某种号召，并向美国各州的公民提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贯彻执行行之有效的国民教育制度及如何协助全国教育工作的开展。

当然，每个州都有一个专门的官员主管国民教育。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作用仅限于以该州代表的身份参加考试委员会，并负责审定教育统计材料。即使是在他起领导者作用的地方，他起的与其说是政府官员的作用，勿宁说是业务专家的作用。

每个州分为若干学区。每个学区设政府督学一名，其主要职责是担任学区的主考人。他负责对全区各个学校进行监督。一般

认为，这种监督的力量极其薄弱。

所以说，美国政府对教育工作不实行集中的管理。

那么，美国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以及校内规章制度的拟定由谁负责呢？所有这些都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督学负责。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选举机构。从前选举教育委员会（通过平等的普选）只有该地的男性公民才参加；现在妇女和达到一定年龄的女孩子也可参加选举。教育委员会应关心校舍的修建和设备的添置，关心学校教学工具的供应。教育委员会选出督学，批准督学提出的教师名单或直接任命教师。

教育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均公开举行，一切措施均公诸于众。督学和教师的活动既是报刊，也是家长热烈讨论的对象。家长可以时常去听课，参加各种考试*和庆祝会，跟教师和校长谈话。

一位致力于美国教育研究的德国教育家说：“一般说来，教师与家长的这种交往很有益处。家长不仅关心自己子女的成绩，他们的兴趣还要广泛：家长开始关心各种教育问题，去完成某些教育任务。这样一来，美国村社学校的影响远远超过德国学校的影响。它使国民受到影响，对成人产生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民族基础的教育机构。”（威廉·缪勒尔：《美国国民教育的本质》，第12—13页）

最近以来，美国家长大会的规模日益扩大。1904年，波士顿首先出现了这样的组织。1907年，全部学区已有五个举行了家长大会，每次会议平均有三四百人参加。家长组织举办的教育专题学术报告会，同时展开讨论，每次都有八九百位家长参加。1907年在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成立了六十个家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代表既积极参加学校的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也积极参加各种教育创举活动。

* 在美国，每个准备到某校任教的教师都要接受地方考试委员会的考试，即使他已有几十年教龄也不例外。持有任何证书和文凭亦不能免试。这种考试可能使教师很恼火，但可以促使他注意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作者注

凡是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地方，工作进展就特别顺利，如罗契斯特市就是这样，那里的组织全是由公民们一手创办起来的。罗契斯特市市民的各个阶层都普遍参加了家长组织，其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在美国，任何创举几乎都发自居民，而所成立的协会则为这些创举的付诸实践铺平道路。这样产生的协会对国民教育事业很有帮助。近年来开展活动比较多的有两个协会：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以及公共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如上所述，美国教育的组织管理工作不由政府负责，而由国民自理。政府让国民自愿管理此项工作。另一方面，各州和各市的教育委员会是彼此独立的。由于这个缘故，以及由于各州、市、镇的条件不同，美国教育工作的发展所经历的途程十分不同。全国教育协会使各个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在精神上保持一致。该协会的成员是国内各方面的群众。当然，美国还有一些保护教师职业利益的协会。全国教育协会不以此为目标。在该协会内，各级教师(大学的学者教授与偏远农村的女教师)团结友爱，并肩工作。著名教育家的演说使听众深受鼓舞，并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教育事业是伟大的事业，每个人不论能力大小，都应它为它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大陆的学校形形色色，其宗旨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教师的共同活动给教学带来了统一的精神。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上，如有需要，就对各种教育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一切大报均刊载有关这些代表大会的详尽材料，并对会上讨论的问题表明一定的立场。通过这种途径，以及依靠地方的分会，这些代表大会的成果就传到了教育委员会，他们往往按大会的指示来指导自己的活动。

全国教育协会完全由各级男女教师组成。至于公共教育协会，其参加者本身虽不执教，却是极其热心国民教育工作的人。有谁

比家长(尤其是母亲)更关心青年一代的喜怒哀乐!正因为如此,所以刚开始时协会主要的参加者是妇女,她们纷纷集会,想让学校与家庭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公共教育协会的会员研究儿童的本性和学校立法,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他们是教师的积极合作者。与此同时,他们非常关心教师的活动,而且,只要他们觉得是对的,他们也敢于对这种活动进行严厉指责。

现在,我们把上述有关美国教育工作的情况作一总结。美国政府把全部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交给国民。国民依靠选举产生的教育委员会管理国民教育的经费和教学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在国民教育全国委员会广泛发行的刊物、日报、报告书和教师代表大会上,找到如何搞好这一工作的指示。这些东西广大的居民阶层也都能得到,这可以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对待教育委员会的活动。教育委员会的活动完全公开,大家能对这一活动进行监督,而家长组织和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所参加的协会组织又为进行这种监督提供了可能。

我们不想详谈这一制度所产生的辉煌成果。美国以自己的学校、教学法、图书馆等引为骄傲。我们只想指出,像比利时那种管理教育的方式,对自由学校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自由学校只有在美国这种制度下才能广泛地发展,因为这种制度与各种琐碎的规章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还有一点意见。目前,德国教师中最先进的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参见肯尼希·舒尔茨^①不久前出版的著作),认为必须出版全帝国的学校法,根据这一法令,全德国的教学都按一个教学大纲、一个教学计划进行。把所有的学校纳入一个模式,其理由是:工人的孩子经常转学,因为他们的父亲常常到处找工作。这个理由似乎很充足,不过只是乍看起来是如此。主张搞一个全帝国的学校立法的人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的标准是现代改革了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大纲和教师就是一切,而学生的个

性则谈不上。当然，如果现在某个学校某个年级只讲算术，而另一个学校相应的年级还讲几何学，还有，如果不知道几个几何概念和术语就经常责备儿童，使他不能和全班同学一起学习，那么，这会使儿童感到苦恼。但是在改革了的学校里，放在首位的是学生和他的一般发展水平，教师和同学会帮助新生很快适应环境并迎头赶上别的同学。因为我们所说的是小学，在那里只是学习初步的知识而不是某种专业知识；在那里，学生最重要的是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和劳动的熟巧。因此，为了使工人的孩子在转学时学习不受影响，不应该是使各个学校统一化起来，而是要改革教育工作，向美国的组织管理办法看齐，因为这种类型的组织管理办法能使自由学校巩固发展。

无产阶级的儿童

孩子们，尽情地游乐吧！
自由地成长吧！你们有
如花似锦的童年……

住在大城市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孩子的童年并不太幸福。童年的印象非常贫乏，因而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

莫斯科教育小组想了解一下进入莫斯科各市立学校学习的儿童的智力发展情况。起初调查了354个刚入学的八岁以下的儿童，而且这354个儿童中，没有一个人的父母是从事自由职业（律师、医生、教师、作家等等）的。通过这次调查，使我们了解了无产阶级儿童的生活情况。

工人的子弟从四、五岁起就帮助家里做事。八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担负起成年人的工作。“八岁的儿童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弟妹，而且他们还要洗衣服、擦地板、劈木柴，甚至还要帮着干些手工活”。负担特别重的是女孩，全部家务几乎都由她们操持。

在所调查的儿童中，有85%的女孩和54%的男孩都要干家务活。家里的人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因为他们都忙于工作。有半数儿童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童话，任何故事。所调查的儿童中有76%的人从来没有到城郊去玩过，不仅没有到城郊去玩过，而且一般地也没有到附近几条街道以外的地方去过，没有看见过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运河。85%的儿童没有在冬天到过农村，而几乎半数——40%——的儿童没有在夏天到过农村。

有很多儿童从来没有看见过奶牛、绵羊、鸭子，没有到过森林和田野，从来没有采过浆果和蘑菇……有的儿童连母鸡也没有见过……

那么这些儿童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如果你问他们母鸡有几只脚，他们会回答说有三四只。他们不知道是乌鸦多些还是麻雀多些。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做的什么工作，不知道住在哪条街上，也不知道自己住的房子有几层楼……

问他们能不能讲讲自己生活中的某件事情，70%的儿童不会讲。有些儿童干脆回答说，没有什么可讲的，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讲的事情，或者说：“记不起了，我没有看见过什么事情。”

莫斯科贫民的生活情况就是如此。彼得堡的情形也与此不相上下。你们去听听市内一些女教师所讲的情形。她们每个人都会讲起自己学生的生活中的一些令人非常惊讶的现象。

怎么办？首先必须更慎重地对待儿童，对待他们精神上的需要。此外，还要努力改善物质状况，不要让儿童担负力所不能及的劳动。最后，还要在城市里设立许多办得较为完善的幼儿园，使儿童能从三四岁起在那里做游戏，通过游戏来学习，熟悉自然情况，了解广阔的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可是这个工作必须做，因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应该把他们很好地武装起来，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斗争。

家庭与学校

艾伦·凯在他的名著《儿童世纪》一书中写道：“我经常幻想的，就是今后不再开办幼儿园，不再为小孩开办学校，而代之以家庭教育。”

“现在有一种日益严重的趋向，就是把儿童送进托儿所，然后送进幼儿园，接着送进学校，去接受理想的教育计划；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不幸。每当谈及妇女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可能性时，人们都说，这种计划可以使母亲免去照顾孩子之劳累，而儿童也可以摆脱母亲不周到的照顾，从而使妇女有可能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当母亲的人走出家门参加了工作，她们又不能很好地尽自己照顾子女之责，因而托儿所和幼儿园对许多儿童说来是一种极大的帮助，这无疑是正确的。很可能，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儿童没有年龄相当的人一起玩，母亲不愿或不能教育儿童（之所以不能，往往是过于好动、意志过弱或非常抑郁的结果），那么，某种类似幼儿园的机构永远是不可缺少的。”

“在许多场合，梅里·沃里斯通克拉弗特一百年前所表述的下列思想至今还是正确的。他说：‘如果儿童在肉体上没有被十分愚昧无知的母亲弄死，那他们也会在精神上被不善于教育的母亲扼杀。前六年过后，儿童下一步的整个发展过程即已确定，母亲就把他交到女仆手上，然后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学校应该纠正孩子们的坏习气。对这些坏的习气，母亲们如果警觉一些的话，本来是可以预防其产生的。而学校用以纠正这些坏习气的手段，

往往又是各种恶习得以产生的源泉。’尽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许多当母亲的人总是不善于教育孩子，但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大多数妇女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教育者，何况随着妇女教养的提高必将提出这一任务。未来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一代新的母亲，她们将使儿童摆脱幼儿园的体系。”

“从儿童两三岁起，就像看管一群小动物似的把他们看管起来，要他们在房间里走，按同一的计划活动，完成同样的小任务，既无意义，又无益处，声称这就是在教育人，实际上是训练小卒！只要谁童年时在大海之滨、密林深处或宽阔的儿童园地玩过，或者在堆满杂物的阁楼玩过，或者看见过别的孩子在哪儿玩过，他就知道，这种自由自在的游戏对发展精神力量、进取精神和想象能力所具有的意义，要比成人不断安排的游戏和作业所具有的意义高出百倍。这种游戏和作业教儿童不要单独游戏，而要跟大家一起玩，——养成一种精神上贫乏的习惯；同时，孩子们忙于去生产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小玩艺，还冠以‘劳动’这一响亮的称号。教育的任务在于教孩子们不屑于去干这种没完没了的琐事（因为它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使生活变得如此矫揉造作），教孩子们让生活简单化并发掘它的巨大的益处。而幼儿园体系却是培养那种知识浅薄之徒的最好手段，这种人的‘群体’意识倒是很浓厚的。”

“如果目前甚或将来还不能取消幼儿园，那就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像小猫小狗一样自由游玩的地方，让他们自己找事情做；给他们提供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做他们想做的东西；给他们找一些可以做游戏的小伙伴一起玩。在那儿安排一个聪明机灵的妇女，她的任务只是注意不让孩子对自己或别人干出有危险的事来。她不时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讲个故事，教他们做一个愉快的游戏，其余则一概不管，不过在此同时要不断地观察和发现儿童性格上的特点和他们的爱好，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自由自在的游戏时才能显现出来。母亲本人也应该这样观察孩子们的游戏，

观察他们对游戏伙伴的态度和他们的爱好；要尽量做到多观察、少干涉。这样长期全面地坚持观察，最终将使母亲比较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孩子。一个生物未必总是能充分了解另一个生物，即使这个生物给了它生命，每天都给它以新的生活，使它感到母性精神的巨大幸福。儿童的出生是身体成熟的标志，同样，儿童的教育是他心理成熟的表现；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心理学上的见识，大多数家长一生也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一些最伟大的原则，以及克尽义务的急迫意向，我们往往把它与完全盲目地对待儿童的个性、对待他产生某一行为的真正原因、以及对待儿童各种品质的综合等等混淆在一起了。”

“我们试举出一些最荒诞的谬论。例如，小孩子时常长时间地很有兴味地研究镜子里映照出的自己的模样，人们往往把这称之为卖弄风情。儿童由于害怕或心慌不能回答某些刺耳的或不懂的问话，没有听明白它的意思，人们往往把这称之为顽固执拗。儿童对自己所做的许多小事不能说明其原因（大人往往也记不清楚），于是就说孩子撒谎，而当他还没有形成私有这个概念之前，拿了一件他喜欢的东西，于是就说他偷窃。如果孩子说他自己不好，并且愿意当一个不好的孩子时，就认为他粗鲁无礼、不知上进，而这恰好表明孩子的性格和自觉，本可以因势利导产生良好效果的。如果孩子由于专心思虑而忘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就说他记性太坏。甚至于儿童真的表现出固执和怠惰，又把这些缺点看作是某种自主的东西，然而这些缺点往往是受某些需要注意纠正的更严重的缺点的影响而产生的，或者这些缺点是受某些好的品质的影响而产生的，如果采用不适当的方法去纠正缺点，可能扼杀那些好的品质。”

“即使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很明智，但是如果孩子很小就送到幼儿园和学校去了，家长也很难了解他。由于不了解儿童的个性，往往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而导致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今日许多家庭的痛苦。父母只有尊重儿童的

个性，并且全面地注意观察这种个性才可以避免产生通常的错误——缘木求鱼。在没有创造材料的地方不可能进行创造，但是应该善于发扬儿童天生的一些特点。对心理学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产生乐观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下定决心去遵循必然性。这种研究也可以使家长和儿童都同样感到痛苦的许多努力告一结束，因为花在这方面的精力完全是白费的。”

“但是，研究儿童的心理状态；从他出生开始，对他的游戏、劳动、休息，每天进行比较研究，这就要有专门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一个人照顾几个孩子。要是照顾一大群孩子，那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孩子在群体中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给观察带来了困难。”

“幼儿园好比一个工厂，把儿童当作原材料来塑造人，就像教孩子们按模型塑造各种东西，而不是给他们粘土让他们按自己的口味做包子一样。儿童在工厂的第一道工序——幼儿园被雕琢一番，然后，为了磨得更加平整光滑，又把他送入下一道工序——学校，于是许许多多庸庸碌碌的人就产生出来了。”

“……在大城市还存在的时候，就应该让贫穷的城市儿童能像农村的孩子一样，用他们周围的材料来做玩具，在完成家庭交给的任务后，能干一点名副其实的‘劳动’，而不是幼儿园里让干的那种看来有用而实际毫无联系的游戏似的‘劳动’。聪明的母亲或教师只汲取幼儿园制度中一点长处，就是教儿童学会对自然界和环境进行观察，使之善于把这一活动与某种有益的宗旨联系起来，把愉快的感情与某种知识联系起来。”

“福禄培尔^①有一句名言：‘让我们为儿童活着！’这句名言应代之以更有内容的一句话：‘让儿童活着！’”

“而这就是说，让他们忘却印入脑中的知识，忘却各种方法，忘却那些年的群体生活，当时潜移默化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有如种子在地里发芽一般。相反，幼儿园制度却像种子在盘子里发芽一样，只不过一时显得非常好看！”

“……无论在哪里，学校以及它的和谐的小团体精神，都使得对社会的良知变得迟钝起来。”

“因此之故，现代社会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把历代的罪恶加以重演，而且常常有一些在个人生活上十分忠诚老实的人参与其事。创立罪恶流派的比较大的罪犯，永远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儿童成天学着如何成为听学校话的人，成为对自己的同学非常忠实的人，以及日后如何对大学、对团体、对工作忠诚老实的人。学这些在先，而学如何忠于自己的良知、正义感、自己精神的的活动则在后。他学会了不正视自己同学的以及本团体、本国的罪恶，粉饰罪恶，否认这种罪恶。”

“这样一来，世界上就出现了德雷福斯^②案件、德兰士瓦战争^③。如果就个人而言，而不着眼于一群人，那就应遵循国家伟人施泰恩^④的教育纲领：‘要发扬那些可以左右人的内在价值和力量的激励人的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让儿童从小就能有权进行自由的选择，学会衡量自己选择的后果，认清自己意志的权利和义务，了解个人经验的条件和任务。而所有这些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幼儿园的压抑，只有在家庭里才能形成。最好的教育效果是把个人与他的良知直接联系起来。这并不排斥这个人逐渐能感到并要求成为整体中有益的一员（起先是家庭中的一员，后来是同学中的一员，然后是祖国的一员，最后是世界的一员）的那种幸福。”

“不同之处在于，一种情况下人是建造各种活生生的形式的活生生的细胞，另一种情况下却是建筑物里的一砖一瓦。不仅在个性的发展上，而且在感情的培植上，幼儿园和学校都落后于家庭。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感情可能比较深沉，温情可能得到发展，并表现在家庭生活引起的行动上，而幼儿园以及后来的学校却使儿童摆脱了自然的、个人的义务，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些全体学生都可以完成的要求。儿童在那里建立的都是一些表面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使感情变得非常浅薄，这是过早开始学校生活的最大危害

险。单纯的家庭生活又会产生另一种危险——感情过于浓厚。在感情正在形成，感情的培植对今后的整个生活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年代，必须要有家庭教育，晚后，过了十二岁，就需要真诚的同志情谊。如果不以培植感情为基础，那末，通过最完善的方法获得的智力发展以及各种社会意向都是枉然的。要使头脑清楚，必须胸怀一颗炽热的心。只有那种能为他所爱的少数人而牺牲的人，才能为其他人而很好地活着”（艾伦·凯：《儿童世纪》）。

上面所引的艾伦·凯所著《儿童世纪》一书中，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细致的观察、对儿童的热爱，但是基本观点却是错误的。

艾伦·凯认为，未来的家庭教育将延续到十二岁左右。这是因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能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

艾伦·凯批评幼儿园制度和学校扼杀儿童的朝气，他的大多数意见都是正确的。目前的幼儿园和学校办得很不好。必须使之办得更加完善。应该让那些热爱并理解儿童的人去领导在校的儿童。这种人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具有必要的知识和教育鉴别力。应使学校成为自由的学校，在那里，儿童不再受到处罚，他们的个性却能得到发展。应使学校给儿童提供劳动的机会，创造的机会，使他们能与别人愉快地交往。应使学校与实际生活、与家庭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艾伦·凯虽然批评了现代的幼儿园和学校，却并不想用办理完善的学校去取代现在这种不好的学校，她想用家庭去取代。不过又不是现在这样的家庭。艾伦·凯深知，从教育学的观点看，现在这种家庭是什么家庭。关于这个问题，她在书中谈得很多。她想用未来的理想的家庭教育代替学校教育，在那种家庭里，当母亲的将以十二年的时间用来教育孩子，她将具备必要的素养和坚毅精神，等等。艾伦·凯在这里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如果要把家庭和学校加以比较，那就应该把现实的学校与现实的家庭加以比较，或者把未来应有的学校与未来的家庭加以比较。这种方法论的错误见于整个论述的过程，完全歪曲了整个前景。

艾伦·凯十分惧怕“群体性”。群体性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模仿性，一是社会本能。模仿性与智力不健全有关。儿童总是要模仿某一个人：哥哥、比较强壮或聪明的同学、母亲、父亲等等。他往往模仿一些我们认为完全不值得模仿的东西，但儿童却很感兴趣，为之入迷。模仿之于儿童，其必要性一如独立的创造。这里也能体现儿童的个性。对成人说来，模仿往往看起来是一种愚蠢的依样画葫芦的举动，可是对儿童说来，这却是他据以检验自己力量的工作。当然，这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意识的发展，模仿的愿望就日趋淡漠。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互相模仿，那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置身于同学之间是模仿的原因，因而教育孩子就应该在12岁之前让他远离同学。这也可能影响到他，使他的社会本能退化。这种社会本能是对他人的一种同情的感情和理解的能力。学生们在一起共同体验的印象可以使他们彼此亲近起来。他们共同体验的印象越多样、越深刻，这种精神上的接近就越密切。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社会本能随后就会从狭隘的同学圈子扩大及到广阔的世人范围。深切地感到自己在精神上与周围的人团结一致，这是一种无比的幸福，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社会本能对儿童的个性毫无害处。家庭对儿童的这种社会本能往往不仅不予以促进，反而加以扼杀。皮耶尔·洛齐^①在他描述自己童年的一本小说中，有几处写得很有艺术的感染力，他在那里讲了他孩提时代所经历的斗争。一次，他从远处看到滨海城市的一群欢闹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热气腾腾，他情不自禁地走上街头，卷入了这股人流，投身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但他是父母的爱子，不愿让母亲伤心，于是他抑止了那种本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本能。他没有成为这种作家。他对大海、对热带国家、对滨海城市和布里塔尼半岛的描述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他还长于表达海员的内心感受，但他对社会问题却不大了解，他笔下的人物无非是贤妻良母，丈夫儿子，或好或坏，只此而已……洛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上学很晚，他在学校里感到格格不入。但是家庭

未能发展他内心蕴积的力量，而是扼杀了这股力量。

小团体主义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社会本能的一种歪曲，是用狭隘的外部圈子对社会本能的一种局限。学校当然也有小团体主义，但它不是学校固有的东西，而是学校不良组织的产物。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学校与家庭对立起来，因为我们不应忘记，家庭也是某种有其特殊利益的小团体。家庭的利益往往与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于是儿童必须作出选择，这时就很难说他对母亲和家人的热爱不会使他做出昧良心的事。儿童的处境往往很不好，他的精神负担很重。如果艾伦·凯认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能促使儿童直接与良知联系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艾伦·凯认为，家庭可以使儿童不受同学的欺侮，可以不受同学伦理的约束。实际上，家庭给儿童的压力往往大得多。家庭不能把儿童安排在其他伦理观点对他不产生影响的条件下生活。因为儿童要参与生活，关心家庭的利益。不仅父母要观察儿童，而且儿童在父母休息、劳动、娱乐时也要观察父母，观察他们对别人的态度，于是很快就了解到父母喜好什么，讨厌什么，父母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儿童对父母爱得越深，他们就越发以父母的伦理观点指导自己的言行，经常使自己的个性迎合亲人的口味。这种情况常见于感情深厚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儿童由于每时每刻都受到严格的监督而弄得疲惫不堪。在学校里，他觉得自己更自由一些，更像一个人。

艾伦·凯认为，家庭教育中的主要之点在于了解儿童的个性，并根据他的个性来对待他；这也是错误的。了解当然很重要，但在教育上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家庭生活方式。如果家庭成员互相关心体贴，都有广泛的社会兴趣；如果劳动把家庭组成一个和谐的集体，那么，家庭就会对儿童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如果家庭过的是游手好闲的日子，只是追求享乐；如果家庭没有高尚的理想，而是利己主义思想占上风，那么，对儿童的个性进行任何全面的观察了解都无济于事……。对家长来说，家庭教育首先

是自我教育。对劳动的热爱也是如此。远非所有的家庭都能教儿童学会劳动。富裕的家庭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目前即使是贫困的家庭也不能经常做到这一点。家庭成员的劳动要想对儿童产生教育意义，那他就要当着儿童的面劳动，而且儿童自己也要参加劳动，可是现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由于生产条件的要求都不是在家里干活，不仅父亲是这样，母亲也是这样。此外，家务劳动的范围日益缩小。过去，举凡纺纱织布缝衣均在家里，制皂做烛，饲养家禽，自给自足。现在，城市的家务劳动日益局限于收拾房间，做饭，缝衣。当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劳动都应该教儿童学会，但不止于此。劳动学校将给家庭以帮助，它使整个学校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由的劳动学校密切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之间的关系，官样的学校关系被亲密无间的关系所取代。这种学校将为儿童个性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场所，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使儿童得以摆脱那种特别强烈的爱抚的控制，摆脱毫无生气的学校的因循守旧之风的影响……然而，这种学校暂时还只是我理想中的学校而已。

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

(迎接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

在识字协会^①成立的基础上，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②即将召开，据称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甚众——达两三千人。

代表大会分为三个分组：

第一分组：小学的组织、类型、任务和大纲(含成人学校分组，这个分组对解决各大城市和各省工人教育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分组：教学法和学校的教学和教育机构。

第三分组：人民教师的培养。

大纲的77条中，四分之三是纯教育性质的问题，不过也有许多一般性质的问题，例如：学校组织的一般原则；国民学校的任务；义务教育问题等等。

虽然这些一般问题湮没在一些极为次要的教育问题之中，但是，这些问题却是关键所在。因为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教育活动的全部方向。国民学校的任务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考试、纪律、大纲等等)都会迎刃而解。

来自全俄各地的教师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将不约而同地用各种语言来讨论这一主要问题。

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在另一个国家，在另外一种历史时刻，也许可能谈到一些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甚至极为次要的问题，而不涉及一些基本问题，但这需要另外一些条件，即所谓“稳定

的平衡”这样的条件。

当然，这些问题往往有很多时候得不到讨论，甚至不能充分提出来——也就是说，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令人满意地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我国目前对教育问题的兴趣明显地趋于浓厚（这种情况在社会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是随处可见的），因而一些问题提得特别广泛和彻底。以十八世纪末叶为例，瑞士当时正处于一个动荡时期，这个时期以1798年宣布成立海尔维第共和国而告终。瑞士的这个时期是与教育上的一系列光辉名字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者马尔丁·布兰泰根据崭新的、在当时说来极其大胆的原则开办了一所学校，同时实行学生自治以便在学校培养合乎共和精神的美德。如果考虑到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即使在欧洲实行学生自治也还是一种崭新事物，那么，我们就可以充分肯定这一试验所具有的大胆性了。目前只是在美国，而且在那里也不是普遍实行了学生自治；至于欧洲诸国，只有瑞士与德国做了某些谨慎的试验。如果说马尔丁·布兰泰^③这个名字还不为广大公众所熟知，那么，每个人都知道裴斯泰洛齐和让·雅克·卢梭这两个名字。裴斯泰洛齐与许多民主主义者私交甚笃，他在青年时期就幻想自己祖国的解放。

卢梭这个名字是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联的。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民主主义者，在教育领域开展了巨大的批判工作。从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对卢梭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批判进行得多么深刻。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代把自己的事业与全民的事业视为一体，因而对卢梭十分崇拜，而现代的法国资产阶级早已丧失了自己的理想，因此对“天真的”民主主义者卢梭采取了鄙视的态度。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南方奴隶制的国内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十年，是北美广泛进行民主建设的年代。年青的美国民主制度培育了一个十分理解国民教育领域的民主任务的人。这个人就是霍勒斯·曼恩^④。他当过律师，以后是麻萨诸塞州

的议员，后来成了参议员，并担任参议院主席。他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热情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国民教育领域的全部活动，实质上就是把民主原则运用于国民教育领域。

霍勒斯·曼恩毕生全力以赴的，就是把学校由奴役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美国没有一个专门领导、管理、监督国民教育工作的部，这使欧洲人感到惊奇。美国有一些政府官员参加考试委员会，但他们与其说是起领导者的作用，毋宁说是起专家的作用。

然而美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并未因此而衰败，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地方的国民教育事业所处的地位有美国这样高；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学校有美国的效果这么好；培养学生今后的独立发展能力有美国这么强；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学校像美国这样能适应国民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在美国早已广泛普及的教育思想，欧洲的教育家接受的还不到百分之一。

对教育的热爱，对读书和知识的渴求，看来没有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强烈。

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国民学校是直接掌握在民主界之手。

国民学校由民主界来掌握，这也是霍勒斯·曼恩奋力以求的。美国教育工作随后的发展，完全是按他指定的道路前进的。1837年，霍勒斯·曼恩以麻萨诸塞州参议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一条关于成立“教育局”的法令。教育局履行教育部的职务，但过去和现在一直不掌握行政权力，只是搞些调查工作，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向居民广泛宣传教育思想。

目前，国家教育局印发了四万份报告，做了大量的统计工作。美国教育界很重视它的意见。

那么美国由谁来负责拟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制定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呢？所有这些工作都由督学负责。督学由教育委员会选任。

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以前，只有当地的男性

居民才能参加选举(以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为原则),现在妇女和姑娘们也可参加选举了。教育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区的全部学校。委员会的一切会议都公开举行,一切措施都通过表决决定。督学和教师的活动既是报刊、也是家长热烈讨论的课题。

总的说来,美国对教育问题非常关心。除了大量的教育刊物外,一些政治性的报刊也用大量篇幅讨论教育问题。家长经常访问学校,与教师和校长交谈,共同完成某些教育任务。一般地说,美国的学校与家庭之间没有欧洲的学校与家庭之间的那种隔阂。霍勒斯·曼恩让居民自己管理初等教育,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居民关心教育问题。于是他在本州(即麻萨诸塞州)14个学区内普遍举办公共讲座和讨论会,他亲自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做报告,力图使大家关心他的创举。法国一位目录学家谈到霍勒斯·曼恩时说:“教育部只是发布通令,曼恩却能做报告和讲课。”听报告的人有时寥寥无几。曼恩曾经自我解嘲地说:“如果什么地方聚集着一群人在闲扯,不必用法律的名义驱散他们,只消说一声马上就要举办教育讲座就够了,所有的人一下子都会溜掉。”

他逐渐使居民对教育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尽管各州和各市的教育委员会是彼此完全独立的,但是他们的活动却非常统一。这种统一应归功于许多不同的教育协会。近来,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和公共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活动开展得很积极。

全国教育协会完全由各级男女教师组成:遐迹闻名的大学教授与偏远农村的女教师携手工作。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上讨论各种教育问题,有时还通过决议。各个大报都刊载有关这种年会的详细报告并进行评述。这些年会的成果通过报刊、通过各地的分会送到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往往利用会议的指示来指导自己的活动。

公共教育协会的成员虽然自己不讲课,但他们都是关心国民

教育工作的人。公共教育协会的会员经常研究儿童的天性和各种教育方法。他们是教师的得力助手。与此同时，他们密切注视教师的工作，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就进行严格的批评。

美国就是这样在国民教育工作中实行民主原则的。国民教育的组织掌握在居民手中，国民教育工作受到广泛的社会监督^⑤。

在欧洲，学校至今还掌握在官僚机构手中。近来，工人们和教育问题越来越关心。在法国，工人们试图自己办一种学校，其精神实质完全不同于政府办的学校。例如，“La Ruche”（“蜂房”）就是这样的学校。谢巴斯基扬·弗尔^⑥的“L’avenir social”（“社会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新型学校^⑦。这些学校不能左右整个国民教育的形势，它们只是法国国民教育大海中的一滴。但是，尽管它们微不足道，资产阶级却视为眼中之钉。“L’avenir social”（“社会的未来”）这所学校既有男孩，又有女孩，当局通知寄宿学校女学监，不允许男女合校，责令女学监把寄宿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念书。

组织起来了的德国工人不仅想自己开办工人学校，而且还想通过自己在地方自治会的代表来影响全国的教育工作。

工人目前还谈不到对教育政策进行根本的改变，谈不到按完全不同的民主方针来办学。只有在欧洲打破了目前这种极其平衡的局面，才有可能向民主界充分提出民主建设的问题。

资产阶级教育界的代表人物更少考虑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工作的问題。但是他们却经常侈谈各种改革。这些言论表明，他们的教育工作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旧时学校已病入膏肓，任何改革也不能收起死回生之效。仅以学校纪律为例。学校纪律是官僚主义学校的生命线。为了维护学校纪律，不惜压抑儿童的朝气，扼杀他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志向。儿童在学校里必须学会顺从听话，如有违抗之处，就要挨打受罚。

然而，像弗·费尔斯特尔这样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也承认，目前法国学校的纪律十分松弛，大城市尤为严重。儿童（大多数情

况下是工人的孩子，往往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孩子)在家庭里听到大人的谈话与以前完全不同。教师在儿童心目中已不复是绝对的权威。用纪律来制服这样的儿童已非易事。教师处理班级的问题比以前难得多。于是现代的一些教师转而求助于学校自治。马马丁·布兰泰把学校自治当作培养学生养成共和品德的一种手段。在美国，学校公社的目的是从幼年起就让美国未来的公民学会自治，善于与别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在德国，甚至在瑞士，都把学校自治视为减轻教师对学生的监督的一种手段，视为把学生从道德上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但是，美国为学生所做的一切，为了把民主原则运用于学校内部所做的一切，在欧洲却摇身一变而为进行警察监视的一种十分完备的方法。不同的社会风尚和不同的社会生活制度对一切都打下自己不同的烙印。

试图实行学校自治(通过试验的方式)在法国塞拉省遭到了惨败。在儿童心理研究自由协会(Société libre pour l'étude psychologique de l'enfant)两位会员比列和贝洛的协助下，于1910年2月建议教师每人推荐12名学生，并对他们委以专门的职务：有的负责检查个人清洁卫生，有的负责班上的清洁卫生，有的负责检查按时完成教师的作业、交练习本等等。但是儿童却完全没有陷入学校自治的圈套。被选出来的学生认为自己是被任命的教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谁也不听他的，他们自己也为扮演监视人这一角色而感到苦恼。

著名的法国教育家库吉列写道：“试验失败了。自治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对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在充满民主精神的美国学校起巨大作用的东西，在学生个性毫不受重视的官僚主义的法国学校却变成了粗俗无耻的把戏。

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的议题中，有不少目前在欧洲还很“时髦”的东西：班级公社，儿童俱乐部，电影院，远足旅行，劳动原则，自由教育，美育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仍然很有意义，不

过在目前的形势下，它却像一把沙土，迷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人分辨不出主次。

仅以第7条(第2分组会议)为例。这一条的前半部分谈了教师必须表现出首倡精神和独立精神。后半部分则谈到“保证教学自由的条件”。

当然，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前半部分，去空谈首倡精神和独立精神如何之好。但是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后半部分，不离开空间和时间，而是在俄国的现实情况下来看教师的首倡精神和独立精神。

其他许多问题也是如此。

代表大会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

柯诺瓦洛夫写了一本关于现代农村的著作。这本书充分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其中有一章描述了一位乡村女教师的生活^①。这位教师靠她的微薄收入养活自己和小妹妹。一个兄弟被流放到远方。她住在一个农民房舍的一隅，坐在室内仅有的一张桌子跟前写东西、改作业，等等。每天晚上她连灯都不能点，因为灯光会妨碍白天劳累已极的主人入睡。

主人对这位女教师很照顾，不过房子是太窄小了，冬天还得把奶牛牵到屋里来。马克思的一帧照片挂在床头，人畜共居于这间斗室之内。

瞧，这就是一个俄国的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与农村生活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他不可能不关心农村的疾苦，不可能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不可能不认真考虑社会生活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俄罗斯农村并非“风平浪静，诸事如意”，而是深受整个制度压迫束缚之苦。

乡村教师困居在穷乡僻壤，与文化生活隔绝，因而他们对即将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寄予深切的期望。

工人报刊的有关人员、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都将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与会教师的本能的民主思想得到巩固和深化，变得更加自觉。为此，他们应该尽可能充分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对学校问题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学校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感情

产生影响。当然，学校掌握在谁手里，就由谁按自己的需要来施加这种影响。因此，起决定作用的是看学校掌握在谁手里，谁确定教学大纲、教学性质，谁挑选教师、考核教师等等。

常常有人持这样一种见解，认为关键是要开办学堂，拨给学校一笔经费等等，至于国民学校里讲授的内容，是些很肤浅的东西，却不为大家所关心，因之在大纲的制定上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分歧。读、写、算……让孩子们学会这些东西就行，不管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管是民粹派分子，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同样的主张。人们往往这样看，但这是大错特错了。

即使是只学一些最肤浅的东西的学校，也有个学校贯穿着什么样的精神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对青年一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学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落后的加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是具有农奴制遗风的地主，那里的学校就充分显露出教权主义精神；而在极其自由、文明和工业发达的法国，神学课已被资产阶级道德课所取代。然而，不论是在加尼西亚，还是在法国，国民学校都是统治阶级手里的一种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按自己的需要来教育人民群众的子弟。

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各个阶级之间正在为影响青年一代而进行着斗争。

工人阶级向学校提出了自己一贯的民主要求：

1) 对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全体男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学校应使儿童得到最广泛的全面发展：体育方面（其必要前提是让儿童的饮食富有营养，衣服穿得暖和）；劳动方面（关键是让儿童参加生产劳动，从入幼儿园开始到高级学堂毕业为止能受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智育方面（培养儿童能独立参加脑力劳动）；社会方面（发展社会本能，养成集体工作的习惯和自治的习惯等等）。

2) 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即：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并保持

充分的独立。

3) 民主地而非官僚主义地安排学校工作，广泛地吸收国民参加监督(他们选举教育委员会并监督其活动)。

4) 充分保证教师的信仰自由和结社的权利。

5) 国民有权接受用本族语进行的教育，而没有一定要接受某种语言的义务。

以上就是无产阶级一贯深切关心并始终坚持的主要民主要求，因为儿童乃是他们的未来。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民渴望受到教育，有如久旱盼雨。”从那时以来，我国历经了饥荒与战争，发生了一月九日的流血事变和1905年的革命等等一系列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群众的整个生活制度。人民对知识的渴望无比高涨。工人的这种要求尤为迫切。工厂的工作条件以及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向他们提出了许多燃眉之急的问题，他们十分希望找到答案。夜校、俱乐部、各种教育团体都有很多工人参加。与工人意见相左的知识界一致指出了“工人们知识的渴求近乎神经质，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工人的觉悟越高，他们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越明确，那么他们对知识评价就越高，他们也就越渴望掌握知识。他们深切地感到：知识就是力量。

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说来，他们的孩子不仅随时可以受到初等教育，而且也可以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教育和国民学校的问题与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大企业主，也是一些不得不生活在一群愚昧无知的人中间的人。他们经常讨论和争论：是否值得掏钱给人民办教育；多大的规模；用什么办法。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个问题却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而且也涉及他们的家庭和亲人。

根据1914年国家支出总预算，国民教育部的预算仅为161,629,822卢布这一区区之数，而其中完全用于国民学校的经费仅为总数之半，即8400万卢布。这仅占整个经费的四十六分之一，

而根据中央统计局^①的材料，这却是识字人口仅占21.1%的这么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8400万卢布，可是一次战争下来一年就得八个亿。

一些维护现状的人（如波列日阿耶夫及其所著《六年来》一书）却欢呼国民教育经费预算逐年有所增长。1907年为4590万卢布，1911年为9750万卢布，1912年为11400万卢布，1913年为13670万卢布，最后，1914年的预算为16150万卢布。但是不应忘记的是，1906年国家的预算仅为20亿，而1913年则为30.020亿。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拨给国民教育部这8400万卢布如何支配？这笔钱果真能用来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改善学校条件和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吗？

过去政府曾通过波别多诺斯采夫^②的嘴露骨地声称：“……大办国民教育无疑是有害之举。”政府当局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解不比工人差，因而它全然不会去关心把这一力量让人民群众掌握在手。但是几年来俄国革命的情况表明，对人民群众采取过去那套策略是行不通的。工人和农民决心通过斗争获得知识，而不等待别人的恩赐。因为不上官办的正式学校也可以获得知识，立陶宛和波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拿科文斯克省来说，省内立陶宛人占68%。政府为了大搞俄罗斯化，禁止该省用本族语教学，因此该省的入学率是最低的，仅高于文盲最多的省之一的唐波夫省。尽管如此，科文斯克省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识字人数最多的是彼得堡省，识字的人占62%，其次就是科文斯克省，识字的人占54%。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原因相同，也是因为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使居民不能入学）：入学率低，但识字率高。

从这个例子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人民想获得知识，他们不上正规的学校也仍然可以获得。

由此可见，奉行那种不让人民获得起码知识的陈规再也行不通了。

政府决定采用更为现实的、更符合基督精神的政策，即允许

少量地增加国民学校，但同时也竭力使学校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

童年的印象往往在人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基督教徒对此非常注意，他们特别注意对青年人的教育。主持国民学校工作的人可以通过挑选具有一定方向的教师、通过修订大纲和根据这一大纲编写的教科书来影响学生世界观的形成。

国民教育部向第三届杜马提出了《初等学校法令》草案^③，其中指出了学校应具有的性质；把宗教道德教育摆在首位；强调学生应树立“尊敬父母和长者的观点，热爱祖国，遵守法纪，树立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观点”。歌咏课应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的和宗教的感情，体育课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

总之，根据国民教育部的法令草案，学校应该成为一种工具，用以宣传那种把人的思想搞乱的思想，而不是让人们认清周围的现实。

《新时代》^④抓住了国民教育部的这种思想，并且更加突出了这种思想。在第三届杜马讨论有关初等学校的政府法令草案期间，孟什柯夫^⑤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支持普及教育体系，就是：必须绝对保证这种体系是俄罗斯民族的而不是别的体系。能起这种保证作用的不仅有学校的大纲，而且还要对一些极其令人怀疑的机构进行改革，这些机构的任务是监视教工，检查教育著作和刊物。显然，支持人民自由党团的人对政府的目的不大理解。”^⑥

第三届杜马的议员米留柯夫^⑦1910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杜马的发言中说：“在自由运动提出的各种任务中，看来没有一项任务像普及教育问题那样，人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如果您把俄国所有政党的党纲（从社会革命党人到各右派政党^⑧的党纲）加以比较，您就会发现，他们对普及教育问题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并且都很重视。”

上面摘引的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对的，即各个政党都很重视

普及教育问题。

至于米留柯夫提到的各个政党对普及教育问题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云云，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举例而言，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主张学校应是非宗教的，学校完全与教会脱离。大家肯定记得，人民自由党团(如卡拉乌洛夫^⑨)在第三届杜马上却坚决主张学校必须进行宗教道德教育，并且希望教会学校所辖范围的劳动者，东正教信徒到部立学校去，那里既教基督教的教义，也教与之有关的基督教道德。

米留柯夫本人声称，他与“否定宗教在学校里的文化作用的思想相隔甚远”。

可见，一方面要求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而另一方面却是“承认宗教在学校里的文化作用”。可见，两种提法“几乎”完全不同。但上面所引用的米留柯夫讲话中的主要之点在于，他完全忽视了在谈及普及教育问题时，不同的阶级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

贵族地主想依靠学校让农民尊重神圣的所有制，在内心惧怕上帝。

工厂主希望工人的文化水平有一定提高，因为有文化的工人劳动生产率高，但工厂主最关心的是教育工人尊重私人财产，尊重上司。

农民希望得到真正的知识，以便了解周围的现实，并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

工人们希望得到最广泛、最真实的知识，以便通过正确的道路去争取美好的未来。

目的不同，因而不能混为一谈。大家都希望进行普及教育。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要求是一致的。

人民自由党团的支持者爱说什么反对把学校卷入政治。这是一句粉饰现状的空话。政治永远存在于学校之中。我国的政治在于学校具有教会性质，学校追求俄罗斯化的目的，挑选具有一定观点的教师；政治还存在于学校的大纲、教科书中，而教师是据

此来进行教学的。任何政府都要把政治带到学校，使学校成为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机构。

教育工作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而不是由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地方自治机构实施领导，进行监督，在这种地方，情况都和上面讲的一样。问题只是力量，只是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多大力量去实施自己对学校的影响。

要想利用学校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来管理国民学校。目前我国有两种类型的学校。一种是教会办的学校，一种是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尽管这两种学校的自治程度还不高，但它们却不完全受国民教育部的影响，学校工作并未完全控制在官僚机构手里，教学工作也不太僵化，学校也还未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而这些却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指教育而言，是指减少对学校的监督而言。不把学校纳入一定的模式，官僚主义的教育机构就不可能履行正确的职能。

在最为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国民学校不由中央集中管理。与国民学校打交道的中央机关全然不承担监督任务，它所关心的不是日常琐事，而只是编印国民教育的统计资料，撰写工作情况报告，介绍优秀的教学方法。管理工作全由地方自治机构负责。

国民教育部热衷于中央集权，因而在第三届杜马上提出了一个法令草案，要把教会办的学校和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改为部立的学校。

但俄国毕竟是俄国。支持教会办学的人不理解政府草案的用意，不理解法令草案把所有的学校都降低到教会办的学校的可怜水平的目的何在。大家知道，如果不同时拨给教会学校一百五十万卢布的话，国家委员会^⑩拒绝给学校一千万卢布的拨款。

由中央集中管理学校工作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国民教育部还是竭力加强对学校的监督。

1) 国民教育部尽量不让地方自治机构管理学校。当然，只有建立在普遍平等的、不记名投票选举的原则上的这种地方自治

机构才可能管理完全符合当地居民需要的学校。它们能让学生穿得暖、吃得热，而这在目前往往由于饥馑和疲劳而无人过问。目前，只有部分教师能做到给学生供应热早餐。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教师为此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如果他外出或调离，早餐也就供应不上。在其他方面民主组建的自治机构还可以把国民学校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是更不用说的，因为它来说，学校工作乃是自己切身的事业。

我国地主的地方自治会当然与真正的地方自治机构相距千里。不过在国民教育工作上，地方自治会仍然比暗探密布、宪警充斥的俄国官僚机构略胜一筹。地方自治会关心孩子们有书可读等等事情，因而在各个学校开设了图书馆；尽管图书不多，而且往往还是经过挑选的。

现在国民教育部发布通令，要把图书财产转交给教育当局。

在许多省，这一财产有几万卢布。把图书馆交到教育当局，其目的是把许多书籍从图书馆清除出去，因为这些图书在知识渊博的人看来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或艺术著作，但国民教育部却害怕人民见到它。

文明国家几乎消灭了文盲。那里的人民都乐于入学学习。各方大力支持开办图书馆。可是我国的所谓国民“教育”部却煞费苦心采取卑劣的警察手段来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阻碍人民去学习！我国的国民教育部在摧毁学校图书馆！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国家还有这种反对图书馆的特别规定，还有这种可卑的书刊检查机构。可是我国除了对报刊进行检查之外，除了采取野蛮手段反对图书馆之外，还制定了一些极严厉的规章来反对国民图书馆！这是令人发指的愚民政策，是地主阶级企图使全国野蛮化的令人发指的政策。有些富人（如巴甫连科夫^①）花了一些钱开办国民图书馆。现在，野蛮的地主政府却摧毁了这些图书馆。是时候了，那些想帮助俄国教育事业的人应该懂得，钱不应白白地花在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并且遭到摧毁的图书馆上，而要用在争取政治自由的

斗争上，因为连这种自由都没有，俄国就会被野蛮的气氛窒息而死。

2) 还有一个有关教师的尖锐问题。国民教育部想通过教师短训班培养一批世界观符合他们要求的教师。教师短训班的情况并不比别的中等学校的好。维特曼文科中学的逮捕事件^②就充分说明我国的中等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学生在那儿的任何首倡精神都遭到扼杀，任何对知识渴求的愿望都遭到摧残。新颁布的有关私立学校的通告，其目的是让这些学校像公立中学一样服从那种死气沉沉的监督。这个通告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我国中等学校目前的精神面貌。

教师短训班毕业的年青教师不大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生活穷困，有时工资还不够租一个单独的房间，因此只好与农民一起住在小木房里，连供学习用的一隅之地也没有，冬天还要把奶牛牵到房里来。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教师开始关心起当地居民的疾苦了。他们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问题。他们在教学工作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优秀的教师还渴望学习，但这谈何容易。繁重的劳动使他无暇学习。他们没有钱买书，即使有钱，往往也很难买到。他们渴望上暑期短训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能参加这种短训班，他们就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短训班有时并无多大效果。如果工作搞得不好，短训班又会面临各种困难，甚至会停办。前年夏天彼得堡的短训班就是如此，参加短训班的在头一年就达一千人。

然而教师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生活比犯人的生活还要坏。他们一言一行都受到神甫、警察、地方黑帮分子的监视。教师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搞不好就丢了饭碗，或者调往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去工作。总之，往往由于督学想安插另外的人，他们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调离教师。

教师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自己。他们完全处于警察和督学的控制之中。在别的一些国家，拥有成千上万会员的教师工会对教师

说来还不失为一种保护。这些工会保护教师的权益，努力改善教师的劳动条件，讨论各种教育问题，出版自己的杂志，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我国禁止教师加入组织。只要教师能被当局完全控制，工作受损失也无所谓。

对国民教育部奉行的这种政策，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认为，国民教育工作要想步入正途，必须做到：

- 1) 学校脱离教会，成为非宗教学校；
- 2) 不能由中央集中管理国民学校的工作，而应由地方自治机构管理。这种地方自治机构应该建立在普遍平等的、直接不记名选举原则的基础之上；
- 3) 学校要摆脱警察的监视，学校要完全自由（只有在政治自由的国家才能做到此点）；
- 4) 教师有权组织工会，出版自己的报纸，召开大会，等等。

我们认为，如果做不到以上四点，国民教育部在所谓“国民教育”上花的钱，根本不能促进国民教育的发展。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初版序言

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观点产生于大工业开始大规模利用和剥削儿童劳动的时期。最先指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作家约翰·贝勒斯^①。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这种主张不仅在英国有人拥护，而且在欧洲大陆也有人支持。卢梭就积极赞成这一主张，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在法国、瑞士和德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国民公会力图通过立法方式来实现这一主张；在瑞士，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裴斯泰洛齐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财产来说明应该怎样在国民教育工作中实际进行生产劳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工人民主主义者在十九世纪50年代以及晚后一些时期又提出了这一主张，发展并科学地论述了这一主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指出，由于技术本身的发展，就需要具有高度水平和全面劳动技能并且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人。

但是，十八世纪末叶一些活动家所宣扬的关于脑力发展与体力发展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以及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种种试验，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十九世纪的前七十五年，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需要工人从事没有什么技巧的简单劳动，而这种劳动既不要求工人具有首创精神和机敏性，也不要求工人灵活敏捷和掌握知识，所以一些民主主义者关于使国民能受到全面教育(以广泛的脑力发展与准备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相结合为基础)要求的呼声就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诚然，国民学校的数量有所增加，但这些学校是读书学校，只教学生读、写、算，不教学生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而且这种学校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俯首贴耳、驯服恭顺的工人。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从而有力地把握现代工艺学的新趋向——机器劳动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机器劳动需要全面发展的、有技术能力的工人，这种工人能很快地适应经常变化和改进的机器与生产过程。当然，这种新趋向首先是在两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即美国和德国表现出来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视培养有全面劳动技能的工人，为此而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和夜校等等。随着对具有劳动技能的工人的需要的增长，他们打算把技术教育变为普及教育，开始使技术教育同初等教育联系起来；为此对国民学校进行了改革。在美国，以及最近又在德国，一般的读书学校正被所谓的劳动学校(Arbeitsschule)所代替。但是，劳动学校不能建立在贯彻读书学校的那些原则的基础上。劳动学校要求教科书能培养独立精神，要求发展学生的个性。那种学生的个性受压抑，劳动纪律流于表面的情况，是很难适应劳动学校所提出的任务的。新的方法要求完全不同的教学人员。惯于墨守陈规而且处处唯命是从的教师已经不能适合这种学校的要求了。劳动学校要求教学人员以生气勃勃的姿态去对待工作，要求教学人员有个性。旧的考查形式已经无能为力了。需要学生互相之间的考查，群众的考查。新的学校不仅需要群众的考查，而且要与群众保持最广泛的合作。劳动学校是以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为前提的，而如果它不吸引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人组织来参予其事，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把一般的读书学校改革为劳动学校，但是如果不改组国民教

育工作的全部组织，这种改革也就不可能实现。

写于1917年

三 版 序 言

本书著于1915年。初版于1917年由《生活与知识》出版社印行。本书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即已付印。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写得比较含蓄，而且用语也略为隐晦——旨在逃避检查。为了逃避检查，本书的书名我没有用《国民教育和工人阶级》，而用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本书已印行两版（每版两万册），现在再来更换书名，也就无此必要了。

我试图在本书里阐明劳动学校这一问题提出的经过情形，并且说明这一思想的内容是随着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说明企图实现劳动学校的究竟是哪一个社会阶级。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教育组织没有掌握在工人民主义者（工人阶级）手里的时候，劳动学校就会成为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工具。只有工人民主义者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本书脱稿已经五年了。这是变化多么大的五年呵！在这五年里，旧世界已经失去了它的基础；在这五年里，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重新作出评价。

在俄国，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把旧时学校改造成为劳动学校。劳动学校已列入了共产党党纲。

但是，俄国经济上的落后状况及其低下的文化水平在国民教育上比在别的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实现劳动学校的任务只好由旧时学校的教师来做，这些教师是由过去的国民蒙蔽部^②从最落后的人中专门挑选出来的，他们大部分被弃置在僻远的乡村，本身也是半愚昧无知的，他们对于不自觉地见到的以及使他们惊惧惶恐的那一伟大变革感到格格不入。现在还必须对教师进行巨大

的工作，这样他们今后才能成为劳动学校的真正领导者。在一般的读书学校任教的人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东西，上课“从这里读到这里”，然后就万事大吉。可是劳动学校却不同，这些学校的教师本人应该知道很多东西，会做很多事情。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就是目前俄国教师的任务。

正确实现劳动学校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劳动学校在乡村(那里至今还是小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和城市都被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所包围。只有使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得到改造，才能大规模地建立劳动学校。当前学校与群众的联系还只是在工人区和各个工厂里，在那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给学校打上了一定的烙印。

现在，办理得很完善的劳动学校却寥寥无几。

但这是否说我们就应该回到一般的读书学校的路上去呢？当然不能。一般的读书学校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生经受过革命的洗礼；类似伊洛瓦依斯基^⑤编的旧教科书在现代学校里已经不适用；教师(至少是一些先进的教师)这三年来学到了很多東西。

随着经济破坏现象的消除、饥荒程度的逐渐减轻以及教师的改造和进步，劳动学校也将有所改进而成为合乎要求的学校。

不久以前，大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战争上；随着战争的结束，大家就会日益关心文化问题，组织劳动学校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正在不断吸取新的力量而使自已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写于1920年12月

四 版 序 言

十五年前(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本书作者当

时侨居国外。本书的写作提纲曾与列宁一起讨论过。全书脱稿后，列宁又通读了一遍，他并且写信给高尔基谈过这本书的问题^④。

凡是研究过列宁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一直是非常重视国民教育工作的。早在1897年，列宁就在评论谢·尼·尤沙柯夫^⑤所著《教育问题》一书而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捍卫了马克思对国民教育工作的观点^⑥。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三个年头了，现在，四年制普及义务教育行将实现，七年制义务教育的问题又认真地提出来，因此列宁的这篇文章至今还有特殊的意义。列宁在这篇文章里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等级学校，什么是阶级学校。他还谈到了统一的学校；谈到资产阶级各国的普及免费学校仍然是只为有钱人服务的阶级学校；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谈到大家都要参加生产劳动；谈到为了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必须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状况。1913年，当国家杜马讨论1913年国民教育部的经费预算报告时，列宁为巴达也夫^⑦草拟了一篇讲演稿^⑧。列宁的这篇讲演稿流露出一种愤懑的情绪，写的慷慨激昂，使人看了之后一点也不会怀疑他对国民教育工作的见解的正确性，并且使人看出他是多么重视这一工作。讲演稿是以下面这段话为结尾的：“工人阶级在1905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能够再一次证明，而且将以更大的说服力和更大的威力，更加严肃认真地证明自己有能力和争取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而不是卡索的也不是贵族的）国民教育而进行革命的斗争！”^⑨。

当时要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进行准备，要为教育战线进行准备。这一工作成了刻不容缓之举，本当认真抓好，但战争突然爆发了。

本书脱稿于1915年，当时出版商不肯出版，以致拖到1917年才问世。关于统一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从教育人民委员部一成立就提出来了。

在我党党纲中曾经谈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出版了大量有关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和职业教育问题的书籍。但是由于《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是从历史的观点写成的，所以它目前还有一定意义。

不久前，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把我过去写的一封信关于《教育辞典》的信交给我。这封信是1916年写给打算出版《教育辞典》的出版商的。列宁把这封信转寄给家里的人，请他们去找出版商。但是没有找到出版的人，这封信就和书一样遭到了相同的命运。我现将此信收入本书附录中^⑩。

我们在国民教育上所做的工作还非常不够。旧的影响还很强烈，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农村的集体化已经给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创造了崭新的条件。如果本书的再版对实现综合技术教育能有些微帮助的话，作者就感到欣慰了。

写于1930年4月18日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对生产劳动 在国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

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由于生产方式根本改变的影响，整个民族的生活开始沿着崭新的轨道前进，习用已久的旧尺度完全不适用于新的经济关系、家庭的关系和法的关系；这些关系完全不属于旧的社会形态。这些旧尺度与新的生活条件不适应的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于是就开始对旧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最先进的哲人看到了建立新形式的社会关系必然性。

在这个时期，民族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被广泛地、原则地提出来了，而且提得很直接和实际。

大家知道，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临近革命爆发的

一段时期，对于欧洲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大工业与旧的行会制度、习惯和法规相矛盾；货币经济根本改变了封建关系而使农民的生活变得比牛马还不如；由封建领主控制的法律在新的形势下成了可怕的专横手段；从前无人闻问、过着牛马一样生活的人民群众开始走上舞台，——他们的贫困和无知是大家都清楚的。人们开始常常讲起“人民”来了。第一次提出了必须使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教育的问题。在此以前，学校仅仅是为上等和中等阶层的子女设立的；为下等阶层的子女设立的学校只是极个别的，而且这种学校还怀有特殊的目的。关于国民教育的这一新问题当时引起了热烈、广泛的讨论，并且与国民福利和国家法令上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正因为这一问题提出的范围是如此广泛、而且涉及当时现实生活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一问题当时是怎样提出来的。这有助于我们从新的方面、根据新的说明来发现国民教育上的许多迫切问题。

例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许多人以为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只是不久前在美国和德国提出的。可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就曾热烈地、全面地讨论过，而且当时许多活动家还力图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并且进行了试验。

裴斯泰洛齐就曾在新庄设立了一所学校，试图在这所学校里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另一个瑞士人费林别尔格^①也在自己的领地霍夫维尔设立了类似的学校。随后，欧文^②也在纽兰纳克设立了这样的学校。孔多塞^③、洛姆^④，加任费拉特茨^⑤企图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这些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大多数试验都失败了，这就使一些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人抓住把柄大肆叫嚣，说这种主张是乌托邦。但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又异常迫切地把这些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这说明这种主张里有很多值得重视的东西。

进一步研究这种主张，把它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情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观察，探究清楚它在当时的情形下所进行的种种试验没有成功，而且不能成功的原因何在？了解一下为了实现这种主张中值得重视的、本质的东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样做是极有益的。

让·雅克·卢梭

我们首先讲一讲卢梭，从他的名著《爱弥儿》谈起。这本书出版于1761年，它对整个教育思想的动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卢梭对当时教育方法的猛烈批判深深震动了思想界。他指出当时的教育内容空虚贫乏，存在着狭隘的等级制和违反自然。社会思潮也趋向于他这方面。不久前那些毫不引人注目，看来完全正常的东西，现在遭到了反对，人们想改变现存的制度。

当然，由于一般社会条件的不同，各国对卢梭的理解也各异。对于贯穿在《爱弥儿》一书中的思想，每个思想家都是根据自己所持的世界观去理解的。

在当时经济和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德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教育流派——“泛爱派”，为首的是巴兹朵夫、卡门别、托里茨曼、古特斯姆特。泛爱派^⑥特别重视卢梭关于必须回到大自然去的主张。他们不把自己的学校设在城市，而设在野外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非常重视健康、锻炼、旅行以及户外游戏。根据扎里茨曼的意见（见《Etwas über Erziehung》《教育概论》），在儿童必须学会对答的第一次问答中，应该提出许多有关健康的问题，如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预防牙疼，怎样保持视力，等等。在泛爱学校中，学生衣着很朴素，食物也很简单。巴兹朵夫于1774年在德萨设立了第一所泛爱学校，这所学校实现卢梭的主张，就是不应该教育儿童去适应某种一定的制度。实行所谓“随意日”，把日常生活完全颠倒过来，例如，学生整夜不睡觉，入夜前不吃任何东西，等等。

德国作家让·波尔·里赫杰尔^①（他是教育著作《列瓦那》一书的作者）称巴兹朵夫是“卢梭思想的精神上的解说者和传导者”。他之所以这样说，实在是由于他对卢梭的理解太肤浅，有时甚至很可笑。一般说来，这些泛爱派们与贯穿在《爱弥儿》一书中的深厚的民主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不了解该书中所谈到的对劳动、对劳动人民的尊敬。

例如，扎里茨曼为人民写了一本小说——《康纳德·基菲尔》，他在该书中企图用小说的形式说明如何把卢梭的思想灌输到农民生活里去。但是他取之于卢梭的只是一些在当时的德国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可以实现的东西，而把问题的社会方面、把构成《爱弥儿》一书中的“精神”的一切东西都抛弃了。正是这些东西使该书能对当时的人产生如此重大影响。

泛爱派们对《爱弥儿》的理解只是表面字句，完全忽视了它的精神实质。

例如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使自己的学生出身于富有的家庭。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一般地应该怎样去教育一个人*，为此他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能为儿子创造这种条件的只有富人，而不可能是穷人。

可是巴兹朵夫把这种选择曲解为只应当注意教育富人的子弟，这与卢梭著作总的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巴兹朵夫说：“我的建议和教育著作只是为富裕阶层服务的，从王子开始到商人和艺术家的子弟为止，都包括在内。这一庞大的、可贵的阶层的世俗教育无可争辩地应该具有符合这一阶层的需要的实际性质。这种知识是最起码的知识，但应努力从上层阶层所有的全部知识中去挑选。”

*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说：“至于我，我要给他一个他怎样也不会失掉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他引以为荣的地位，我要把他教养成人；不管你怎样说，他得到这种地位的机会将会比你能够给予他一切地位的机会少得多。”（卢梭：《爱弥儿》，李平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下引文均出自此译本。——译者）

卢梭说的是教育“人”，而巴兹朵夫却谈的是培养特权阶层的子弟。

在巴兹朵夫的学校里，特权阶层的子弟可以把别的学生当作仆役来使唤，给他们擦皮鞋，收拾床铺。从这里就可看出巴兹朵夫对卢梭的理解是多么肤浅。特权阶层的学生受处分就让他们当仆役学生，并且要做粗活。这种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卑贱的工作，只有下等阶层的人才适合去做。虽然泛爱学校也进行体力劳动，但只是把它当作娱乐，当作锻炼体力的手段，而把真正的生产劳动看作卑贱的事儿。

然而卢梭对问题的看法却不同：

“处在社会之外与世隔离的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债务，所以他爱怎样生活就可以怎样生活；但在社会之中，他必然要借他人之力而生活，他应该用劳动来向他们偿付他生活的费用；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所以，劳动是社会的人不可或免的责任。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是贫或是富，是强或是弱，只要不干活，就是一个流氓。”（《爱弥儿》中译本，第262页）

“在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在所有一切有身分的人当中，最不受命运和他人的影响的，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所依靠的是他的手艺；他是自由的，他所享受的自由恰好同农民遭受的奴役形成对照，因为后者束缚于他的土地，而土地的产物完全凭他人的支配。敌人、贵族、有势力的邻居或一场官司，都可以夺去他的土地；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利用他的土地去折磨他；然而，不论在什么地方，谁要是想折磨手工业者的话，他马上就捆起行李走掉了。可是农业是人类所从事的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它是最诚实，最有益于人，因而也就是人类所能从事的最高尚的职业。我没有向爱弥儿说：“你去学一学农活吧！”因为他懂得农活。所有的庄稼活儿他都是很熟悉的，他起初就是从庄稼活儿学起，而且还不断地干这种活儿。因此，我要对他说：‘你现在耕种你祖上留下来的土地。

但如果你失去了继承权，或者根本就没有继承权的时候，又怎样办呢？所以，你还得学一门手艺。”（同上书，第262—263页）

多么天真的话啊！现在只有伪善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除了自己的双手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手工业者的自由值几个钱。但是，150年前，工业刚刚兴起，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那时说出这种话，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话里充满了对劳动的崇高敬意，充满了对建立在特权基础上、划分为等级的社会的强烈的反抗情绪。泛爱派对此却置若罔闻，凡此种种都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

然而，卢梭教育思想中的社会方面却在瑞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瑞士和法国一样，正处在革命的前夕），不过范围略有不同。裴斯泰洛齐就是瑞士思想家中受《爱弥儿》影响很深的一个。他在《天鹅之歌》一书中写到《爱弥儿》对他的影响时说：“当他著的《爱弥儿》一出版之后，我的非常不实际的、充满幻想的思想在这本同样非常不实际的、充满幻想的书的影响下，也洋溢着热情。我曾经把我在家里从母亲那儿受到的教育以及后来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与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加以比较。我开始觉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各个阶层都完全是一种摧残毒化。我觉得，只有从卢梭的崇高的思想中才可能找到一种共同的解毒剂。卢梭从思想上为自由制度打下了基础并且使它变得充满生气，这种自由制度更加加强了 my 充满幻想的愿望：为了人民的利益去广泛地、有效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Pestalozzi, “Schwanengesang”, bei Seyffarth xlv, 200）（裴斯泰洛齐著：《天鹅之歌》）

我们知道，卢梭认为劳动是每个人的社会义务。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教育必须教学生学会劳动。爱弥儿擅长农业劳动，他学习了许多门手艺。

卢梭也把手工劳动看作发展儿童智力的手段。

“读者诸君，不要只是呆在这里看我们的学生练他的身体和练他的手艺，也请你们考虑一下我们把他幼稚的好奇心是引向哪个

方向发展的，考虑一下他所获得的常识，他所培养的发明精神和深远的目光，考虑一下我们将训练他具备什么样的头脑。他无论看见什么或做什么，都要把它彻底地弄个明白，懂得其中的道理；他要从一种工具到另一种工具，追溯到当初使用的第一个工具；他绝不凭想象行事；他对一样东西如果事先没有一点知识，他就不去学它；如果他看见人家做弹簧，他就想知道钢铁是怎样从矿石中炼出来的；如果他看见别人把木板钉成箱子，他就想知道树木是怎样砍伐的；当他自己工作的时候，他拿到他所用的每一样工具时都要这样说：‘如果我没有这样的工具，我怎样才能做一个同它相似的东西来用，或者怎样想办法不用这种工具？’”（《爱弥儿》中译本，第251—252页）

卢梭认为，儿童从事劳动的目的，不在于这种劳动的结果，而在于它对儿童的教育意义。不要进行机械性的劳动，而要进行可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劳动，具有思想意义的劳动。

卢梭虽然认为他的学生应该学习某种手艺，但是他最重视的并非职业教育，而是综合技术教育，不是准备从事某门专业，而是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

“我们在这里也许太强调选择一门职业的重要性了。既然问题只是在于一门手艺，则这种选择对爱弥儿来说就是毫不费事的；通过我们迄今给他的种种锻炼，他学徒的期限已经是过了一半多了。你要他干哪种活儿呢？他什么都会：他已经会使铲子和铁锹，会使车床、锤子、刨子和锉刀，各种手艺的工具他都是很熟习的。问题只是在于怎样把这些工具当中的某一种工具用得更熟练，以便努一把力赶上善于使用那种工具的工人；在这一点上，他有一个比谁都优越的条件，那就是他的身子灵便、手脚灵活，能毫无困难地做各种各样的姿势，即使长久地做什么动作，他也不觉得费劲的。此外，他的一切器官都是很健全的，而且还受过良好的锻炼；他已经懂得各种技术的机械原理。为了要成为一个干活的高手，他所欠缺的只是经验，而经验是只要有时间就能获得的。”

(《爱弥儿》中译本，第269页)。

卢梭还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是使学生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

“你要极其小心的是，不能使你的学生接触到社会关系的一切概念，因为这不是他的智力所能理解的；但是，当知识的锁链使你不能不向他讲到人类的互相依赖时，你就不要从道德方面向他讲解，而必须首先使他的注意力放在使人和人都互相有用的工业和机械技术上。当你带着他从这个工场走到那个工场的时候，就不能让他看见什么工作都袖手旁观，不能让他走出工场以后对里面的情形一点也不明白，你至少要使他对他所看到的東西有一个了解。为此，你就要亲自动手去工作，处处给他做一个模范；为了使他成为师傅，你就要到处都做徒弟；你要知道，他从一小时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比听你讲一整天学到的东西还多。”(同上书，第247页)

这时，“教师的艺术是：绝不要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琐碎的事情上，而要不断地使他接触他将来必须知道的重⼤关系，以便使他能够正确地判断人类社会中的善恶。”(同上书，第254页)

由此可见，在卢梭看来，综合技术教育要使学生能够判断人类社会的真正价值。劳动关系应该成为判断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种劳动关系，学生不应该只是消极地观察这种关系，而应积极地参予其事。只有亲自参加劳动，根据经验了解了它的全部复杂性、艰巨性等等，学生今后才能判断某一生产部门的社会意义。在这里，卢梭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不要把每种手工业、每种生产只当作一种手艺去研究，而且还要当作一种社会关系去研究。

“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全都用在工场里。我们不仅仅要学习做工人，我们还要学习做人；后者的学徒生活比前者苦得多和长得多。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像你跟舞蹈老师学习那

样每天跟刨木板的师傅学习一个小时吗？不，我们不是学徒，而是弟子；我们所抱的志愿不在于学木匠的手艺，而在于把我们提拔到木匠的身分。因此，我主张每个星期至少到师傅家里去学一个或两个整天，在他起床的时候我们也起床，我们要在他的眼前工作，要在他的家里吃饭，要照他的吩咐去做；在荣幸地同他一家人吃过晚饭之后，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回到自己家里的硬床上去睡觉。我们要一下就学会几种职业，而且要在学做手工活的同时又不忽略其他的学习，就必须采取这样的办法。”（《爱弥儿》中译本，第272页）

“积累这种虽然狭隘却是正确的知识的另一优点，就是从这些知识的相互联系中把知识教给学生，使他能评价每一种知识，防止估计过高的倾向（大多数人对那些自学的天才往往产生这种倾向），防止对其余人估计不足的倾向。凡是能够洞悉整个制度的人，就能了解每个部分的位置；凡是能够洞悉一个部分，并且对它了解得很深入的人，可能成为一个博学的人；能够进行判断的人是第一流的人，你们要记得，我们的目的与其说是授予学生知识，毋宁说是授予他们判断力。”

由此可见，卢梭之所以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并且把它摆在职业教育之上，是因为：（1）它可以使学生受到从事任何职业的训练；（2）它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使他既能胸怀全局并且又能正确判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3）它为评价在劳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标准；（4）它使真正了解现存的社会制度有了可能。卢梭希望他的学生“能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爱弥儿》中译本第274页）

这就是卢梭在150年前对于体力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

他没有把这种思想具体化，没有打算实现这些思想，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是泛泛的问题，卢梭的思想才具有如此普遍的意义；他只给各

国的活动家指出一条道路、一个方向，而使他们有充分的可能把这些思想在他们国家的特殊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加以实现。

这些思想在150年后的今天还很有意义，尽管社会情况完全不同了，社会大大向前发展了。在目前非常盛行的农村寄宿学校(Landerziehungsheime)里，学生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那里和泛爱学校一样，体力生产劳动的作用被缩小为只具有卫生学上的和狭隘教育学目的。卢梭的气魄完全不同。他把体力劳动看作一种社会义务，看作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的一种手段，看作获得广泛的智力视野和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这种见解是非常民主的，因此工人阶级怀着感激的心情继承了卢梭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为现代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背弃了。资产阶级的祖先还没有把他们的阶级利益跟人民的事业分开来而颂扬过卢梭；现在的资产阶级冷淡地、轻蔑地对待卢梭，虽然他们按照传统称他为“伟大的”，但经常要加上“空想家”的字眼，而且他们所说的空想不仅指卢梭著作中确实是空想的部分，并且指他的民主主义和他尊敬“人”和尊重“劳动”的感情。

裴斯泰洛齐

十八世纪末叶，瑞士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渗透到农业的瑞士来了，并且开始动摇旧的宗法制的基石。农民处在一种分化的状态。裴斯泰洛齐在他所写的《林哈德和葛笃德》^⑧这本小说里，把农民经济划分为三类：1. 富裕的经济，有许多牲口和牧场，劳动沿袭过去的旧章法进行，非常紧张；力戒奢侈，厉行节约；宗法式的严守纪律的家庭，严肃的风尚；没有债务；只从事农业；2. 中等的经济，负有债务——力图通过各种手段保住土地，追求各种收入，在工厂里作工；动荡不安；家庭的性质发生变化，不够巩固团结；3. 最后，完全破产的经济；靠在工厂里当零工维持生活；让五、六岁的小孩子整天纺线，赚一

点零钱，穷愁潦倒，把钱全用于酗酒。

瑞士破产了的群众的贫困、散漫、软弱无力表现得非常明显，非常令人不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些最敏感的、具有同情心的青年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要帮助人民的愿望。但是他们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这些受苦受难的群众是特权阶级全然不了解的陌生人。于是青年们就努力去接近人民，熟悉人民的生活情况。

1765年，波得米尔教授^⑨写信给祖里茨尔谈起瑞士的青年时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优秀的大学生都沉醉在与他（布烈斯）一起耕种农田的这一幻想里。为了学会这件事，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试验——帮助农民收割，考验自己能否经得起日晒雨淋和疲劳的折磨。”

裴斯泰洛齐住在乡下祖父家里，并且参加各种农活。裴斯泰洛齐的朋友布龙奇里^⑩谈到裴斯泰洛齐的时候曾说：“这个人整天同农民在一起收割庄稼。他左手的五个指头几乎全割破了；可怜的人！”

这些都是俄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民粹主义思想的体现。

裴斯泰洛齐力图与人民接近，他过着“清苦的生活”，整天在田里劳动。他在《林哈德和葛笃德》这本小说里，谈到他这几年来在人民中所过的生活时曾说：“由于我自己生活也很贫困，我就学习更加深入地了解人民的贫困和贫困的来源。我对贫困理解得很深刻，而任何生活幸福的人都是不可能理解得这样深刻的。我经受了人民所经受了痛苦，并且体察了真实的民情，这是谁也没有体察过的。不顾人们对我的嘲笑，不顾他们厉声的斥责：‘倒霉的人，你比最潦倒的短工还不会帮助自己，你以为你能帮助人民吗？’——我不顾人们说的这些话，从内心涌出的巨流仍然推动我奔向唯一的目的：铲除使人民和我自己遭受苦难的根源。”

裴斯泰洛齐感叹地说：“啊，可爱的人民！我看到你所处的低下的地位，非常低下的地位，我一定要帮助你提高你的地位！”

裴斯泰洛齐肩负的任务是不轻的，他意识到了这点，但这并没有阻碍他。

“问题不在于我帮助人民是难是易，而在于我作为一个人来说，能否允许目前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裴斯泰洛齐通过自己杰出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一个可爱的主角说出了这句话。

裴斯泰洛齐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探讨如何铲除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问题。裴斯泰洛齐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己对人民生活的观察中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本书不拟对裴斯泰洛齐这些著作加以分析，也不想对他的总的世界观有所阐述。我只想指出，他的全部著作充满对人民的热爱，并且体现出非凡的观察能力以及深刻而又独到的见解。其中有很多天真的想法。历史表明，裴斯泰洛齐的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谁要是至今还不明了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何在并且不知道如何铲除这一根源的话，他趁早别想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去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在120—130年以前，资本主义刚刚形成，封建势力还很强大，还看不到发展的道路，因此当时还未形成这样一股力量，其历史使命是彻底铲除使人民遭受苦难的主要根源*。

裴斯泰洛齐是他那一时代的儿子，当时人们对阶级斗争问题还无认识，大家还在期待着救世主：受过教育的君王，关怀民众疾苦的封建领主，贤明聪颖的立法者，乐善好施的工厂主。裴斯泰洛齐所生活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天真地认为，通过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些善行美德就可以发家致富。

在那个时代，像罗伯特·欧文这种具有大智大慧、同时生活在生产极其发达的英国的人，还一直致书当时的富豪权贵，希望他们资助他实现自己的计划。

所以，不能指望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得到许多重大问题的答案。

* 隐喻工人阶级，以避免沙皇检查官检查。——译注

不过，对于想了解民主思想史的人来说，裴斯泰洛齐的作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裴斯泰洛齐说(见1782年8月8日《周报》第32期)：“我觉得，首先应使人民很好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地位。”^④

为此，裴斯泰洛齐于1781年为人民撰写了三卷本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他在这本小说里描写了农村贫困的生活，描写了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愚昧无知的农村居民。一个好心的地主想通过法律和管理以及对青年的合理教育来使居民成为幸福的人。这本小说篇幅冗长，艺术成就不高，充满长篇的议论和伤感的情节，但却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民主思想和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地主、牧师和教师并非实有其人，而是具有美德的模特儿。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他们的嘴来告诉人民，使他们遭受苦难的根源何在，并且怎样铲除这一根源。作者的目的是想让读者相信地主和牧师是具有美德的人，而是要说明人民怎样并且用什么来帮助自己。

裴斯泰洛齐认为，能使人民成为不依靠财富和善心的人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裴斯泰洛齐所主张的教育是与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联系着的，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这种教育就是培养全面的劳动能力，它与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从中可以获得发展体力和智力的手段；这种教育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费用、贵重的设备、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在这方面人民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人民中间优秀的人可以帮助落后的人提高。

裴斯泰洛齐在他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些观点。人民本身对学校有什么要求？学校应该满足什么要求？这就是裴斯泰洛齐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教师格吕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人物)去了解村民对学校的看法和要求。他

* 此书有多种版本，也有分为四卷本的。中译本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译注

访问了一个殷富的农民、泥水匠的妻子和一个贫农出身的工厂主。

那个富裕的农民不很重视学校，他甚至反对设立学校。

他认为，“对于农民的子弟说来，真正的学校就是农民的耕地、牧场、牛栏和田野。书本知识会使他们想入非非，而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塞到脑子里去”。农民的子弟看起来很健壮，外表与工人很少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非常不开化，以至无法和他们交谈。格吕菲得出结论说，对于这些儿童说来，只有设立这样一种学校才有益处，这种学校所授予他们的东西，并不是代替从事农业所给予他们的东西，而要超过这种东西。

工厂主，或者确切些说，企业主迈耶尔常给一些棉花让农民在家里纺线，他认为“不会读书写字在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危险”；他的眼界更广，他说：“大量流通的货币可以改变人民的生活条件和他们工资的性质。通过增加货币和把产品提价一倍减少了私人的财产。大多数人已经不是靠农业维持生活；十个人中未必有一个人能从地里得到一切必需品。大多数人为了生活都得找外快。要想使这种外快确有保证，那么就得起比一个农夫更高明、更灵活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人要知道得更多些，能力更强些，这样他才能使自己吃得好些、穿得好些、生活得好些，好像世界上的人减少了一半，土地和粮食便宜了一半一样。”为了使生活条件的变化不致使居民走投无路，迈耶尔希望建立这样一种学校，这种学校“要让儿童整天远远地离开他们那些脱离常轨的糊涂的父母，教儿童坚强、守纪律（这种现象在一个好家庭里是常见的），教他们一切应该知道和应该学会的东西，以便在家里和工厂工作，并且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为自己创造很好的家庭生活条件。”（《林哈德和葛笃德》，第154页）

地主和教师花了一整夜时间去讨论这个“意义深刻的计划，但是要想让这些不开化的人把他们的子女交出去一整天，并且在学校里对这些儿童进行适合于他们今后生活的家庭教育，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泥水匠林哈德的妻子葛笃德使他们找到

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他们观察了她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情形。她的孩子为了赚钱维持生活而不得不纺线。葛笃德教他们认真地干活，教他们学习各种活计，但是她也注意在他们双手工作的时候，让他们的脑子也工作。她教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读、算，对他们讲基督的生平，等等。“他们做的是日工，但他们心里不觉得是做日工。”格吕菲在乡村里设立了一所学校。“他发现，那些土地很多、但债务也很多的少数农民的孩子以及那些没有土地、没有什么更多的财产的农民的孩子，一般说来在很多方面所要求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于是他就把他们分成三个不同的班，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施教。”（《林哈德和葛笃德》，第199页）

“……后面这一班学生（他们的父母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财产）主要由他教。他对学校里的工作的安排，完全是从穷人孩子的利益出发，这些孩子既未得到财产上的好处，也没有合理的家庭教育，所以他的教育完全是摹仿贤淑的葛笃德的家庭教育。少尉（格吕菲）和她的看法一样，认为学校的全部制度应该以儿童一开始就能自己赚钱谋生为出发点。否则就不可能为穷人大规模地创办农村学校以及一般的任何学校。这是一切事情的基础，它还会给今后实现最终的目的指出道路。这样一来，纺车、织布机等等就成了格吕菲的第一批教科书，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主拨给他的一栋旧屋子（在学校旁边）里的三个大房间里；他首先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儿童。他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里，由玛格丽指导他们（这是葛笃德介绍她这样做的）去做他们自己选择好了的工作，或者他们的父母选择好了的工作，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他们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每天每时都可以接触别的工作，了解它的特性，弄清楚它的好处和坏处、难处和益处，这样就可以使许多穷苦的儿童不会终生被束缚在自己的纺车或织布机上，过着一种非常单调死板的生活。儿童完成了自己每天的工作以后，还可以从事他所喜欢的工作……此外，为了让儿童熟悉小农业生产（格吕菲认为把它与家庭工业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他

在校园内拨出一块地给他们耕种。每一个学生都有三垄地，他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凡是蔬菜种得最多最好的人，都可以得到奖金……在学校里，举凡富贵家庭所有的东西儿童都有，他们还学会了怎样莳弄这些东西。他们养猪、养家禽、养兔（都在校园角上），还养羊（村里的牧童把它与村里的羊赶在一起，在牧场上放牧）。他们学过怎样种麻（从播种到变为大麻和麻布为止），怎样用麻布做衣服。他们也会处理羊毛，从剪羊毛开始到把羊毛织成呢绒为止。

“这一切格吕菲都得到了玛格丽的帮助，因为格吕菲最初对这些东西都不懂。玛格丽很会做家务，如果班上某个人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她立刻就能察觉出来。当哪个儿童没有线了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使他停工的时候，她立即去帮助他，直到他重新开始工作为止。在校园里也是同样的情形。她对每样作物都照顾得非常周到，就像在班上照顾每个儿童一样；儿童们不管怎样努力，自己垄上的东西总没有她的长得好。她是受过贫困熬煎的人，所以谁也不会像她那样能教儿童学会充分利用各种东西。她教他们把嫩绿的树叶阴干，做成柔软而舒适的褥子，因为穷人不可能搞到羽毛。她教他们把沟里和枯朽树洞的泥土挖出来做肥料，把草地、沼泽地、小河里的植物弄来做饲料。她教他们把泥土烧焦，告诉他们火可以使石灰石变成石灰。她就这样使贫穷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拮据环境下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办法来把生活安排得更舒适一点，而这是一些愚蠢的有钱的农民花掉他们全部的钱财也做不到的。

“……格吕菲力图使穷人的孩子受到全面的教育而成为一个不依靠有钱的农民的独立自主的、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的人。”（《林哈德和葛笃德》，第202页）

在坡那镇（葛笃德的住所以及格吕菲的学校的所在地）住着一个从邻镇来的妇女，那个镇里的居民文化水平比较高些；她在自己菜园里种了各种鲜嫩的蔬菜，种了各种果树和鲜花，已经有二十年了。从前，村里的小孩不是偷她菜园里的东西，就是逼着要，

同时还嘲弄她。格吕菲的学生向她请教，问她是怎么耕作的，她愉快地教他们怎么去做，并且送给他们一些种子。

坡那镇还有一个钟表匠。学生们请他允许他们去看看他怎样工作，这个钟表匠发现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他干活，不久他们自己也会干了；这时他就开始教他们学习自己这行手艺。

“凡是迟早对儿童有用的东西，格吕菲都把它纳入自己的学校教育里去。教室里往往每到晚上就堆满了各种工具和刨花，好像一个工场。当儿童做完了挣工资的工作之后，没有到菜园去或者由于天气不好而不能去的话，他们可以在教室里做他们爱做的任何工作，只要不游手好闲就行。格吕菲常常和他们一起刨、锯、旋。他常常用蜡给学生做些人像和动物、头和手，有时又用木头做房子、磨房、锯木厂、船只以及一切他们想做的东西。”（《林哈德和葛笃德》，第241页）

格吕菲常常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坐在胡桃树下。“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河谷和小溪，几乎可以一直看到那银色的湖面。在树下，孩子们围着他，他给他们讲村子里从前发生的事情，说是一百年前村里房子还很少，村里的居民比现在还穷，还不懂事，现在整个生活情况已经在各方面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随后，当孩子们在家里谈起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不明白，孩子们对过去的情况怎么会了解得这样清楚。”（《林哈德和葛笃德》，第241页）

摘引暂时到这里为止。

裴斯泰洛齐认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格吕菲一开始就了解了村民对学校的看法），学校应该满足居民的要求。必须研究这种要求，必须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创立合乎人民要求、受人民爱戴的学校。

我们试回忆一下列夫·托尔斯泰在他所写的教育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他也和裴斯泰洛齐一样，问农民对学校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他发现当时设立的读书学校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使他们感到格格不入。他对这种和人民格格不入

的学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人民渴望知识，一如大旱之盼雨露，可是我们给他们吃的不是面包，而是石头。”我们常常矫枉过正，把小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现代学校力图尽量去满足工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不去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只是部分地吻合，而裴斯泰洛齐的理想——建立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学校——仍然只是一种民主思想。

居民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要求是各种各样的，要认真加以研究。学校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应该克服老一套的工作作风，而能适应所处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我们知道，格吕菲曾经把自己的学校分为三个班，每个班的教学都适合该班学生的那一阶层的生活条件。

现代学校由于对整个学校工作的管理过于集中，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离裴斯泰洛齐的进行个别教学的愿望远了。美国在最近一段时期的做法可能是最接近裴斯泰洛齐的这一要求的；而欧洲为了管理方便起见，主要是尽量保持清一色的作法。但如果裴斯泰洛齐的这一主张完全被人抛弃了，这当然不能说这一主张是不对的。企图改革现代学校的人仍然时常想起他的主张。

上面那些从《林哈德和葛笃德》摘引出来的关于格吕菲的学校的材料说明，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意见，学校应该与生活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去生活，应该关心这种生活，从各方面去说明它，这样它才能成为改造这种生活的有力武器，成为裴斯泰洛齐所理想的学校。而且学校还应该从生活本身吸取教育方法。《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有一章的题词是“生活的教育”。裴斯泰洛齐想通过坡那镇的学校例子来说明，应该怎样使学校与生活联系起来，怎样通过生活来教育学生今后去生活。劳动是人民生活的中心，因此裴斯泰洛齐把生产劳动当作学校教育的中心。裴斯泰洛齐在《瑞士之叶》附录二中说：“一个人必须从他经常从事的劳动中找寻自己世界观的基础……他应该尽力独立地、

主要从自己的劳动活动中得到知识……因而授予每个儿童的知识应该围绕着他的劳动活动。”劳动可以形成一个人的智慧和性格。裴斯泰洛齐指出，凡是土地须要花大力翻耕的地方，那里的农民也就很粗野，喜欢喝酒；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那里的农民性格就比较柔和；大的牧畜者比小私有者粗野；雇农与农场主的性格不同。单调的、机械的工厂工作会使人变得迟钝，使他失去意志力。于是裴斯泰洛齐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劳动条件对儿童也会产生影响。在十八世纪末，农业和家庭工业中都广泛地采用了童工。儿童怎样受剥削，他们的工作条件怎样恶劣，这种工作对他们产生了多么沉重的影响，——这一点裴斯泰洛齐非常了解。1782年，在《瑞士之叶》的第九篇文章《论农民》一文中，裴斯泰洛齐说：“凡是农民耕种要使人畜都受折磨的地方，就是只关心自己工厂的利润这一件事的企业主的乐土。他在这里找到一些人，这些人常常把自己五、六岁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要他们纺线，赚得几文钱。凡是农业收入少的地方，凡是农民牧地少的地方，凡是负债或因为某种原因而破产的地方，还有农村里每个人都乐于推却自己多余的负担的地方，我们都可看到这种现象。”^②

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意见，学校是防止儿童被这种单调的劳动弄愚蠢的一种工具。学校应该仔细考虑儿童的劳动，使它成为发展儿童全面劳动能力的手段，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我们看到，格吕菲在自己的学校里尽力想做到这一点。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在裴斯泰洛齐的学校里授予儿童的综合技术的知识范围是很有限的，它带有明显的小生产（这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烙印。当时也只能如此。但是裴斯泰洛齐的必须了解整个生产、了解人的全部劳动活动（同时这种了解不是书本上的了解，而是实际的、真正的了解）的思想表现得已经非常明显了。

1790年，他写了一份报告书^③给贵族卡尔·庆陈道尔夫伯爵（当时奥地利的国务活动家，地位很高，曾与卢梭、伏尔泰、爱尔

维修有书信往来),其中发挥了这样的思想:必须建立一些学校,使贫苦人民的子弟能通过学习多种工业形式而受到全面的劳动训练,学会各种形式的劳动。他指出了三种主要的劳动:农业、家务和加工工业。在学校里学习这三种劳动应该实际地进行,与儿童的生产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

裴斯泰洛齐想写一本《劳动入门》,其中将指出如何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初步劳动活动,如:抛、搬、推、摇、转,等等。儿童如果做完了这些练习,就能发展自己的体力,并能养成动作的机敏性,运用自己各种官能的灵活性,而这是从事任何工作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工业发展的时代,由于这种发展破坏了旧的国民经济的形式,使社会上每个人的生存变得不安定起来,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因此他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必须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进行各种形式的劳动,而不是准备从事某种一定的职业。一个人今天从事农业,明天他失去了土地,就得上工厂。工厂倒闭后,他只好改做别的工作。十八世纪末叶,除了农业之外就不知道任何别的劳动的居民,特别感到工资来源太不固定。农业的凋蔽把人变成了无依无靠的流浪汉,因为他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只好去过一种忍饥挨饿的可怜生活。卢梭和裴斯泰洛齐都主张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因为受了这种教育之后就不怕劳动条件发生变化。

裴斯泰洛齐希望不仅把生产劳动,而且把儿童的工资与教育联系起来,这无疑是错误的。儿童的工资是与剥削儿童劳动、与消耗儿童精力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读到对格吕菲的学校的描写时,就已觉察到那里并非一切都是无可指摘的。一方面,儿童“从早上到深夜”地纺线;另一方面,还要学园艺、其它的生产以及修理钟表,等等。在纸上,即在小说中,还能勉强搪塞过去。如果不正视儿童的“工资”是建立在剥削儿童劳力的基础上的,那末只要一接触现实,就会把一切幻想变成泡影。当裴斯泰洛齐想实际

地建立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学校时，事实也正是如此。1769年，他在自己的领地新庄，用自己个人的财产为穷人开办了一所学校。他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没有一点生活资料，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会工作也不想工作，粗野，凶狠，往往是一些半病态的小野兽。裴斯泰洛齐对他们爱抚备至，并且开始按自己的方法去教育他们。

儿童在开设的农场里进行生产劳动。在农场里，裴斯泰洛齐开办了一个干酪制造所和一个纺纱厂。冬天，儿童就纺纱织布。几个很有经验的工人来教他们。教学工作是根据裴斯泰洛齐的精神进行的，他竭力想实现自己把生产劳动与读、写、算的教学以及一般地与总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主张。当然，根本谈不到儿童劳动受剥削的事。从教育的观点看来，效果是很好的：儿童工作起来很努力，学会了独立思考，获得了许多知识等等，但是学校本身维持不下去了：主持者是一个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的裴斯泰洛齐，他不会做生意（虽然他常常亲自去出售儿童的劳动产品）。不过问题还不在于裴斯泰洛齐不会当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儿童的工资一般说来只够维持一部分生活费用。依靠工资，他们只能过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即使这样，还得是儿童的全部劳动力和全部时间都完全归企业主支配才行，至少在限制童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颁布以前是如此。裴斯泰洛齐在世时，占主要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生产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劳动被剥削的程度达到了极点。要想在这种情况下使儿童的劳动能够完全维持生活，甚至于还有一些剩余，那纯粹是空想。事实上，裴斯泰洛齐的学生的绝大部分费用都是靠他本人的财产来支付的，而他本人的钱并不多。1755年，裴斯泰洛齐不得不“请求友人资助这所旨在使贫苦的农民子弟得到教育和工作的学校”。结果募集到了1,400法郎。这点钱当然不能维持很久。于是裴斯泰洛齐只好把一切可以典当、出卖的东西都典当出卖了。但是，到了1780年他不得不把孤儿院解散，因为他既无法养活自己的学生，也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

裴斯泰洛齐的试验失败了。一些看问题很肤浅的人就得出结论说，儿童的生产劳动一般地不能与教育相结合，而欣然认为读书学校比劳动学校好。

裴斯泰洛齐本人对他自己失败的原因估计得更正确些。1782年，他在第32期“周报”附刊的首页上曾谈起这个问题^④。他认为自己主要的错误是，他力图把儿童的生产劳动跟商业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他主持的是工业企业，而使自己教育企业的成败取决于工业企业的成败。不应当使劳动的目的变成生产物品出卖，而应当生产一些物品来满足本身的需要。

裴斯泰洛齐认为不能把教育企业的成败系于市场的条件，他这话完全正确。但是他认为儿童的生产劳动只应该局限于生产一些物品来满足本身的需要，这就不对了。如果照这样去做，那么这种学校就会成为一个脱离国内总的经济生活的闭塞的小经济单位。这样它就会脱离现实生活，而这是裴斯泰洛齐所竭力反对的。此外，所谈的还不只是一个学校，而是成千上万的学校。这些闭塞的学校小生产团体将要散布于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而与它发生尖锐的矛盾。要想使这种独立的生产单位在一般说来发展比较迅猛的资本主义组织（它建立在互相竞争的基础上，对一切都要求进行资本主义交换）的核心中存在下去，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就像希望儿童给企业主做工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同时还能使这一工作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一样。

裴斯泰洛齐大力提倡的根本主张，即生产劳动应该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也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目前经济发展本身的进程也提出了这一要求。裴斯泰洛齐的错误只是，他把这种生产劳动理解成了他当时所进行的那种劳动：要么就是给企业主干活，要么就是以不合时宜的方式为本身的需要而干活。

裴斯泰洛齐梦想设立这样的学校，这种学校要能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为他们所欢迎，并且在颇大程度上要掌握在他们自己

的手里。

但是怎样能说服愚昧贫穷的人民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呢？当时在瑞士还谈不上义务教育的问题。裴斯泰洛齐生活在人民中间，他知道，贫穷破产的农民认为与其把他六岁的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还不如让这孩子从早到晚在家纺线为他挣点钱。当时在瑞士也谈不上通过颁布“工厂法”来限制父母对孩子的剥削。裴斯泰洛齐认为，让儿童在学校里为企业主工作可以成为一种手段来使群众感到学校的好处，并使他们愿意把子女送来，因为这样家长仍然可以得到孩子的工资，甚至于得到的还要多些，因为学校可以提高儿童的劳动能力。

裴斯泰洛齐想得到外援的希望很小。他认为只有自己负担开支的学校才能做到这一点。儿童的工资要能够支付学校的开支。教师应该从人民中聘请，他应和儿童们一起工作。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该简单化。教师也需要指导。必须编一本书，这本书能谈到家务工作、农业和工业的一切原理在穷人生活中的运用。我们发现，裴斯泰洛齐对儿童工资的盘算落空了。

当时已经出现了另一种国民学校，即读书学校，这种学校的设立与其说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工业和特权阶层的利益。大工业把成千上万的人吸引到城市和工业中心来了。管理这批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外，他们的愚昧无知和粗暴脾气也使人吃惊。从前认为农民的愚昧无知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而现在自由资产阶级却提出必须给人民一些起码的知识，向他们灌输一些宗教道理。这是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所要求的。于是在当时最大的工业国——英国——就出现了一种兰喀斯特学校^②。这种学校是为群众设立的。在一个大的厅堂里坐着600—1,000个儿童，他们由一个教师采用互教的方法学习着。这种学校是工厂，或者确切些说，是手工工场的精确模型。教学工作非常机械，而且分为许多相隔很长的阶段。一切都以分工为基础。认识三个字母的儿童可以教一个字母也不认识的儿童；认识五个字母

的儿童可以教认识三个字母的儿童，等等。所有这些都根据一个教师的哨音和手势去做。这种学校收费非常低廉，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也非常之少。这种学校对儿童劳动毫不挑剔，不过在培尔-兰喀斯特制度中，儿童劳动不是教育的手段，而是减少学校开支的手段。1814年签订和约之后，兰喀斯特学校在当时另一个工业国家——法国——也出现了。在法国，这种学校遭到了主教协会的激烈反对^②。主教协会把这种学校看作对“圣兄弟教团的威胁和教团基础的动摇”。于是在这方面就展开了斗争：反动分子反对培尔-兰喀斯特学校，自由主义者拥护这种学校。问题从国民学校应该是怎样的学校变成了国民教育工作是应该由国家掌握还是由僧侣掌握。

裴斯泰洛齐非常反对兰喀斯特学校，称它为“藏污纳垢之地”。他希望为人民设立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学校，这种学校能使儿童得到全面的发展，能为他将来的生活和劳动作一些准备。他不可能不看到，那种只是教学生死背祈祷文以及教学生认识一些起码的字的学校完全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因此他反对培尔-兰喀斯特制度。

兰喀斯特学校在规模上缩小了一些，互教制瓦解了，它那种初级大手工工场性质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学校的精神仍然存在：它们只是授予人民一点点起码的知识。背诵祈祷文和圣经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读书学校在欧洲逐渐确立了。

费林别尔格

费林别尔格是裴斯泰洛齐的同时代人，是瑞士的另一个活动家。他企图通过实践证明，儿童的生产劳动可以与教育结合，并且可以支付儿童的生活费用。如果我们不谈谈费林别尔格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对裴斯泰洛齐的必须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中心这一观点的阐述就是不全面的。

一般说来，费林别尔格和裴斯泰洛齐的观点是完全不一致的。裴斯泰洛齐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费林别尔格是一个贵族，对各种解放运动毫不同情。他是一个大地主，田连阡陌，非常富有。

他与裴斯泰洛齐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两人都把教育看作使祖国复兴的工具，看作把祖国“从严重的经济凋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工具。

瑞士优秀的教育史家奥·龚茨凯尔^②对费林别尔格的计划曾作如是评述：“费林别尔格希望：(1)通过建立一系列各种不同的、有机地分开但又彼此密切联系的各阶级居民的学校，来做出(起先在霍夫维尔)一个进行真正的民族教育的范例；(2)借助于建立(通过恰当地摹仿霍夫维尔范例的方法)这种遍于地球各地的“学校国家”，使它们相互间的作用以及与起点的联系有助于逐渐对世界各文明国家的紊乱的社会情况进行根本改造。由于这种逐渐产生的、包罗万象的教育影响，人类社会就可以从自己堕落的深渊里走出来；对劳动的热爱，高尚的习俗和美德将再一次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社会肢体里的每一根动脉里，将流着真诚积极的基督教的血液，一句话，人类将日益接近神造的原形。这样一来，不仅目前就会恢复那种安宁昌盛、人人满足的景象以及对上帝的信仰，而且，由于消除了各种不满的根源，将来也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危险尝试。

完善的霍夫维尔学校的制度是包括需要受教育的各种不同年龄(从幼年起)的儿童。由于给学生提供了相当的活动场所，这种教育就有可能去萌发还未觉醒的精神生活方面的幼芽。在儿童学校之上，还要为年龄比较大的人建立另外一些学校，根据社会的主要阶层而分为三部分，有如三个柱石：

“(1)为下层社会的孩子即穷人的孩子设立的学校，应该是把农业和技术结合起来的工业学校，或者叫做贫民学校；

(2)为中层社会的孩子设立的学校，应该是适合他们的要求的实科学校；

(3) 对富豪权贵人家的孩子，应该进行特殊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要注意智力发展，而且要注意宗教道德的培养，能在精神上提高他们，并把它与广泛的政治教育联系起来。

把这些纯教育机关联系起来的共同环节，就是合理安排的农业；不仅贫民学校的学生为了自己的教育应当在农业上找到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上层社会的孩子也要如此，因为他们熟悉了农业之后，将来就能够以人道的、适合他们高贵身分的方法来对穷人施恩予惠。

所以，除这些学校外，还必须关心建立模范的和实验的农场，并且还要建立必要的农具制造改进工场，对于那些受过普通教育之后愿意专门研究农业的学生，还可以专门设立一种农业学校。所有这些农业教育机关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设立教师讲习班，主要是为了国民学校的教师，这些教师要能理解在霍夫维尔所想达到的目的，能掌握那里采用的活动方法，并能学会摹仿霍夫维尔的良好模样。”（龚茨凯尔：《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第27页）

从这一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费林别尔格的理想是在广阔的领地上建立有等级隔阂的国家。

龚茨凯尔也指出了贫民学校的等级性质。

他说：“费林别尔格的理想是使全人类都受到教育。不过这种教育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是各不相同的，它应该适合他们的要求。虽然费林别尔格在个别情况下也非常慷慨地帮助下层社会出身的能干的人脱离他所出身的那一阶层，而让他受到上层社会的教育，——虽然如此，他认为每个人受的教育应该适合他出身的那一阶层的要求才好。

这样一来，为穷人工子弟设立的保育院就成了所有教育机关中必要的一环，甚至是最必要的一环，但它无论何时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机关。根据费林别尔格的主张，这种保育院绝不应成为进入其他学校的阶梯。

裴斯泰洛齐的理想也是使全人类都受到教育。这种共同的教

育首先是通过很自然的方式，即基本教育来实现的。但是由于这种基本教育是以人的自然特性为根据的，所以它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致的，不因等级不同有所改变，而是适应每个人的。但是重要的是穷人的教育，因为：第一，他们为数最多；第二，他们没有受过不好的教育，因而是进行普及基本教育试验的最好对象。为穷人（他们深受裴斯泰洛齐的敬重）建立独立的保育院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尽管也是由于裴斯泰洛齐本人对贫弱者的同情。裴斯泰洛齐进行这种实际试验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并不是专门对穷人的孩子进行教育，而是把它与整个人类（不分阶级）的教育融合在一起，这是在这些为穷人设立的保育院对普通教育任务产生了良好影响并能实现这些任务之后的事情”。（龚茨凯尔：《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第40页）

等级教育与裴斯泰洛齐思想中的整个民主体系是完全对立的。

下面这段有关他生活中的插曲很有意思。

裴斯泰洛齐已是垂暮之年了。过去有一段时期，当裴斯泰洛齐的处境非常困难并且强烈地感到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孤立无援的时候，费林别尔格提议让他在自己的领地霍夫维尔来领导贫民学校。费林别尔格自己把全部实际工作都担当下来，并且给他一些极有利的条件而让裴斯泰洛齐放手办学。裴斯泰洛齐的朋友告诉他，只好走这条路了。裴斯泰洛齐动摇了，他原本要同意的，但最后却不辞而别。他给费林别尔格写了一封信，说不能与他共事，因为彼此的宗旨不一样。从裴斯泰洛齐生活中的这段插曲可以看出，他一忽儿表现得性格软弱，一忽儿又担心与费林别尔格相处不好，受他约束。其实，裴斯泰洛齐不愿与费林别尔格共事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民主主义者裴斯泰洛齐的宗旨与贵族费林别尔格的宗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想尽力使大家都自由、平等、友爱；另一个则是想巩固等级划分，通过各种教育来强化。

费林别尔格是一个意志顽强、精力充沛的人，能不屈不挠地

为达到既定目的而奋斗。同时他也是一个讲求实际、小心谨慎的人，很懂人情世故，并且善于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他也是一位大富翁。

如果说到霍夫维尔的“学校国家”，那他几乎是完全实现了自己既定的计划。这个领地的辽阔的田地是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采用了机器和改良的生产方法。处处精打细算，制度极其严密。农活由雇农担任（在霍夫维尔所在的别恩州，当时破产的农民为数极多，农业无产者的人数很多，他们的生活极其困难），收益巨大。费林别尔格把领导霍夫维尔的农事看作自己的文明天职，看作用具体事例进行宣传的一种手段。他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内情。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组织了几次农业展览会和庆祝会；他得到过政府委员会的委任状，这说明他领地上的农事搞得很出色。

费林别尔格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学校系统。

霍夫维尔获得了世界声誉。欧洲各地有许多人来参观费林别尔格的“学校国家”。特别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他的贫民“工业学校”。

在这个学校执教23年（从1810年至1833年）的威尔里^②，曾在自传中详细地叙述这所学校的发展史。

由于缺乏合适的教员，费林别尔格的“贫民工业学校”长期未能成立。根据他的意见，这个学校的教师应该出身于贫寒之家，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能像雇农一样，从早到晚和儿童们在田里或工场里干活。这种人应该是没有奢望的人，能安于穷困，不曾结婚，并且信奉神灵，未曾沾染过自由解放的思想。同时他还要能够理解费林别尔格给自己的工业学校提出的种种任务，并能忠心耿耿地去完成这些任务。此外，他还应该是一个热爱科学的人，品德高尚，堪为师表。

年轻的威尔里完全具备这些条件，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知识、一颗热情慈爱的心以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培养霍夫维尔工业学校的穷人孩子的教育工作上了。没有他，这个学校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自己的学校里只主要注意了生产劳动的教育影响，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二位；而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却是把农业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儿童的劳动安排得很紧。费林别尔格认为，儿童只有紧张地劳动，并且在学校里一直工作到21岁，这样才能补偿他们自己的全部生活费用。除了星期日之外，儿童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八点要同自己的教师在田里干活，甚至霍夫维尔过节时，孩子们和威尔里也要干活。最常干的活就是除草。大家知道，这种活非常单调，不能使人有所提高，因而使人感到沉重，并且渐渐变得迟钝起来。教师同时还要当监工。一时照顾不到，或者儿童干活时稍一松懈，费林别尔格就指责威尔里，有时非常粗暴。只有晚上或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才能学习，一天不过两三小时。虽然工作如此繁重，但是威尔里和儿童们的伙食却很差，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一点肉。吃饭地点在厨房。穿的衣服是用自织的麻布做的。其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威尔里曾经几次想离开霍夫维尔（他的工资长期以来都很微薄）。但是精通人情世故的费林别尔格知道怎样控制威尔里。他对威尔里谈起崇高的天职，再给他一点甜头吃吃，于是威尔里就打消了辞意。在干活的时候，威尔里教儿童们算术，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一起唱歌，告诉他们动植物的生长情况，教他们几何学。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就写字，或者学习一些在干活时绝对不许学习的东西。由于威尔里具有非凡的教育才干，加上自己能埋头苦干，因而在教学上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费林别尔格当着来宾发表演说，借以博取声誉，同时也指出威尔里对工作忠心耿耿所起的作用，并发了若干奖金。

总之，“贫民工业学校”达到了费林别尔格预定的目的，它用儿童的劳动补偿了一切开支。它培养了一批既健康、又有知识的农业工人。当然，这种农业工人只是当时的大资本主义农业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而不是裴斯泰洛齐想在自己的学校里培养的那种全面发展的人材。不过这种区别当时很难看到。

随后又出现了一些与霍夫维尔的“贫民工业学校”类似的学

校：在马依基尔、布留弗兹荷夫(在苏黎世州)，在卡拉什(在日内瓦附近)，在格拉罗斯州(林特移民区)，在阿平车尔(在特隆郡之舒尔坦)，在巴泽尔等地，都建立了这种学校。

这些学校大多数与霍夫维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威尔里经常给这些学校的教师一些帮助，提出种种建议。其中有些学校(特别是那里的教师是威尔里的学生的学校)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但总的说来“贫民工业学校”未能普遍推广。这种学校未能推广的原因和裴斯泰洛齐的学校未能推广的原因一样：它需要一种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特殊的农业组织。

* * *

最后，我们想谈谈霍夫维尔“贫民工业学校”的一段有趣的插曲。

教育人的不只是学校，还有生活。霍夫维尔的有钱人家的子弟是绝不到贫民学校来的。贫民学校的学生要除草，他们穿麻布衣服，赤着脚，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可是为中层和上层社会设立的学校里的有钱人的子弟，却跑跑跳跳，做游戏，学习……

有一天，工业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发生了一次暴动。这次暴动不是为了反对头脑简单的教师威尔里，因为他也和他们一样干着雇农的活，而是反对地主费林别尔格，因为在他们看来，费林别尔格剥削了他们。威尔里认为这次暴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高年级学生受了与他们一起在工场和地里干活的雇农的不良影响。非常明显，雇农们本身的反抗行为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地主和雇农双方利益上的对立。学生们早就有了这种看法，霍夫维尔“学校国家”的整个气氛也使这种看法更加坚定。学生们不可能不感觉到，费林别尔格是把他们当“贱民”看待的。

这次暴动之后，两个学生被撵出了霍夫维尔，而其余的人则根据自己的倡议组织了一个学校共和国，它负责管理农业工作：安排各人的劳动，进行相互之间同志式的监督，主持同志审判会，等

等。“工业学校”共和国与大多数学校共和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人为产生的，而是由生活所要求产生的：学生们认识到必须取消那种侮辱人格的“农事”监督，希望他们的行动得到公平地评价。

过去曾有人打算组织学校共和国（例如马尔丁·布兰泰^②在1761年就在自己的中学里组织过学校共和国），不过其性质纯粹是教育方面的。例如马尔丁·布兰泰就打算通过模仿罗马共和国的机构而把学生培养成英勇的公民。同时，这也是历史的一种“生动的教育”。

在读书学校里，学校共和国总是具有人为的性质。儿童和青年对各种人为的作法总是感到格格不入，虽然他们很喜欢搞“共和国把戏”，但是很难让他们认识到学校共和国的严肃性质。

在劳动学校里，学校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同，它是由劳动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工作需要劳动组织和内在纪律。每个人都必须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衡量力量的最好标准是工作本身，做工作不允许粗枝大叶的作风。很多事情要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办得到。

霍夫维尔学校共和国的目的，正是在学校公社内部正确地组织劳动，并且维护由于劳动的要求而产生的纪律。

费林别尔格对各种“共和国”都不喜欢，但是他知道为了使“工业学校”得到蓬勃的发展，就需要有这种组织，因此他不仅不反对这一新措施，而且还加以支持。

而威尔里对学生倡导的这一新制度赞不绝口，因为他们使他不再担任那个他非常苦恼的监工职务了。

罗伯特·欧文

大工业在英国的出现，要比在瑞士早得多，到十八世纪末，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那里的儿童往往从五、六岁起主要就不在家里干活，而在工厂工作。妇女的劳动得到了极广泛的利用，而且逐渐代替了男子的劳动。残酷的剥削还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家庭迅速解体了。人民处于一种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地。自然，当时也有人在考虑如何帮人民摆脱这种困境。罗伯特·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结如下：“人是环境的产物；贫穷和犯罪是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后果，并非人的本性。如果能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就可以消除贫穷和犯罪现象。所以应该促进这种关系的建立。这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利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无一例外地受着目前这种制度的折磨。所有的人都有权过安宁的生活。所以，对于社会说来，重要的是使全体儿童尽可能受到完善的教育，使目前的阶级划分以及阶级统治让位于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能使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样能参加社会工作，并且能过一种人过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土地就应该成为公有的财产。租金和资本主义剥削应该由建立在同志友爱原则上的生产所代替。社会分为若干“家庭区”（“Home Colonies”），由许多包括500—2,500人的协会组成。它建立在公社的原则上，负责农业和工业生产，防止城乡之间那种极端有害的矛盾；它有自己的自治机构，由代表组成中央管理处，负责调整各区的生产和需求，并与建立在同样原则上的其它单位保持联系。这就是一般情况”（《罗伯特·欧文》第19页）。

把欧文的观点与裴斯泰洛齐的观点加以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两人都发现，现存的境况与人的本性是不符合的。他们两人都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不过裴斯泰洛齐主要注意的是，人是劳动条件的产物，而欧文对问题的提法却比较广泛些：人一般地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包括劳动条件在内。因此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主要是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即用他所理解的教育）。罗伯特·欧文认为，要想帮助人民，只有改变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成为社会这所大厦的基础）在内。

由于瑞士的资本主义关系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裴斯泰洛齐未能对资本主义剥削做出任何结论。诚然，他了解这种剥削的事实，但是他认为剥削是某些人丧尽天良的结果。至于这种剥削是

与一定的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这点他也不怀疑。他认为人分为善人和恶人，分为各种等级的人。人应该善良，不应滥用本阶层的特权。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所代替的思想，他是一点也没有的。所以他使自己的全部教育理论适应于当时的实际条件。儿童们整天弯着腰为企业主纺线，他还使自己的学校去适应这种儿童劳动的条件，认为它是不可改变的。而罗伯特·欧文由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所以就能把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加以概括。他谈到资本家阶级，谈到这个阶级的统治。他力图改变当时的条件。他看清了残酷剥削儿童劳动的事实，主张用“工厂法”来限制这种剥削。他想根本改变这种社会关系，拟订了一个建立更美好的社会的计划。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的试验是为了说明应该怎样进行教育工作。罗伯特·欧文在纽兰纳克的试验是为了说明应该怎样合理地安排人们的生活。裴斯泰洛齐在自己的作品中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发放工资的新情况对家庭产生了解体作用。但是他只看到了这种解体现象的萌芽。当时，在瑞士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是家庭形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它改变了家庭生活的性质，但并没有彻底破坏这种性质，如像妇女和儿童在工厂里劳动所引起的那样。所以，裴斯泰洛齐只是把家庭解体看作一种偶然现象，表面现象，而不像欧文那样把它看作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所以裴斯泰洛齐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对家庭的作用估计很高。有些人（如阿布拉莫夫，见他写的裴斯泰洛齐传，巴甫连柯夫版^⑧）甚至认为，裴斯泰洛齐想用家庭教育来代替社会教育，用母亲的教育来代替国民学校。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因为国民学校还非常之少。其次，我们在裴斯泰洛齐的作品里看到了完全相反的现象。在《林哈德与葛笃德》一书中对教育观点进行一般总结的地方曾说：“但是明显的事实不久就使他相信，在人民的农业知识和耕种方法都很落后的情况下，儿童如果留在家里，那么今后每一代都会仍然像现在这样既无能力，又无学识，所以就

必须通过设立类似的学校来为他们的教育打下一个基础。他发现了监督、管理以及改进工作的愿望所具有的优点(这些优点在这种学校里表现出来),并且相信,只有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和手工艺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的时候,家庭教育的条件才能赶得上社会教育的优点”。(《林哈德和葛笃德》,第300页)

裴斯泰洛齐始终对当时和未来的家庭寄予很大希望,而罗伯特·欧文由于看到了英国旧的家庭制度正在迅速崩溃,对家庭也就不存任何幻想了。他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而且是从年纪最小的时候开始。

1816年,欧文在纽兰纳克为幼儿创办了第一批托儿所^⑧。由于创办了托儿所,母亲们虽然在工厂整天忙于工作,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听天由命了,而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适合他们智力和体力发展的良好环境里。设立托儿所完全是时代要求的结果,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看出:起初在英国和苏格兰,后来在法国和荷兰很快都设立了托儿所(这得归功于欧文),尽管宗教界提出了种种理由来反对这一纯洁无辜的机关。不管信仰如何,凡是愿意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来的,欧文都收纳。这就引起了天主教的强烈不满,教皇葛里高里十六咒骂托儿所是违反神意、破坏家庭原则的机关。

欧文不像裴斯泰洛齐那样,幻想儿童的收入可以完全支付他们的全部生活费用。工厂主德里的试验告诉他这种主张完全是幻想。

德里是一个大纺织企业家,是纽兰纳克一个工厂的厂长,他后来成了欧文的女婿。他和当时其他的工厂主一样,也利用儿童的劳动。他从苏格兰的工人之家要了500名儿童,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只要6—7岁左右的孩子。

德里非常关心在他工厂干活的孩子。他专门给他们修建了一所房子,供他们吃和穿,还让他们念书。德里毫不吝惜自己的金钱。房间宽敞清洁,通风良好,食物丰富而有营养,衣服干净而

简朴。宿舍里还有一个医生。担任教学工作的都是一些名师。但是德里认为，开支应该补偿。所以，儿童必须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到晚上七点钟都在机器旁边干活才行；工作完毕后才学习。儿童感到工作非常累，很吃力，因此很多人都跑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儿童在智力和体力上都未得到发展，没有什么提高。到18—15岁时，他们的学习结束了，他们必须独立生活，可是他们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不了解生活，一无所长。不能一边在机器旁边做工，一边给他们讲历史、教算术，而最主要的，还是儿童的力量不能长期的去从事一种单调的劳动。

当欧文接手管理德里的工厂时，他不用10岁以下的儿童做工。5—10岁的儿童在一所特设的学校里学习，在这种学校里，教学工作要进行得使儿童感到满意、舒适。效果非常之好。

罗伯特·欧文看到工厂工作对儿童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就想通过立法来禁止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到工厂工作。

这当然不是说罗伯特·欧文不同意儿童从事生产劳动。恰恰相反，他完全同意著名的教友派信徒约翰·贝勒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约翰·贝勒斯生活在十七世纪末叶(1654—1725)。在研究国民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贝勒斯(马克思称他为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⑧出于一种人道的愿望，想帮助那些流浪街头的失业贫民。他曾经详细地谈到了怎样帮助失业者的问题。他的《关于建立工业学校以研究目前工农业各部门的建议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这种工业学校“应该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能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贝勒斯之所以谈到富人的利益，是由于他认为“富人只有利用别人的劳动才能生活；地主要靠佃户的劳动生活，商人和实业家要靠工人的劳动生活”。只有有收入的企业才能站得住脚。“对于一个生财有道的企业说来，赚一千英镑比花一百英镑做慈善事业要容易”。

贝勒斯的工业学校只收30人，它是工业和知识的发源地，它要把农业活动和工业劳动联系在一起来进行，为合理地利用妇女

和儿童劳动创造条件。

“起初要注意选择一些熟悉业务的和有经验的工人——他们能成为良好的榜样；其余的成员都是学生”。

“24岁以内的男子、21岁以内的女子是‘学生’，满24岁或21岁后，他们离开学校去结婚。”

工业学校可以招收富人的子女，享受社会教育的福利，但是他们要缴费。

在工业学校里，教学与体力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学略胜于不学”。“人需要从事体力劳动，就像他需要吃饭一样。人的生命好像是一盏灯，思想就是灯光，体力劳动有如灯油，没有灯油，灯光(思想)就会熄灭”。

在这种学校进行的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相比，有以下六个优点：

1. 在这种学校里，年龄不同、能力不同的人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学会使用各种生产工具。

2. 各种语言(和知识)将通过与各民族(工人)代表的交往而学会，工人们将像教自己的子女那样来教育青年学习他的本族语。

3. 当成人和孩子看见别的人也遵守规定和法律时，他自己也就比较容易去遵守了。

4. 儿童的成长不与生活和人们脱离，而与人们密切来往。

5. 儿童经常受到成人的照料。

6. 这种学校里有图书馆、研究植物的实验园地以及制药的化验室。

划船等等将成为一种体育训练。总之，学校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的缩影，把各种有益的生产包括进去。

“男女儿童从四岁或五岁开始，除了学习阅读之外，还要学习编织、纺线等等，年龄比较大的儿童要学习旋工手艺等等，到了青年时期，他们将成为一些优秀的工人，这样，即使从事轻便

的工作，他们也会用(真理的)生动的论据来发展自己的智力，然而愚蠢的儿童活动却只能使儿童的智力变得愚蠢。”

“手工劳动是有好处的，它使人变得有智慧，可以锻炼意志，保持人的良知”。

“儿童们在工业学校里将要学习各种有益的东西。儿童看见别人如何工作和爱惜时间，他自己也就不会贪玩而去研究某种生产，他们不会感到劳动比游戏难；他看见别人工作，自己也就去摹仿，而这种摹仿能像游戏一样给他带来满足。他们也比成年人容易养成劳动习惯。许多美满的家庭，因为没有劳动习惯而遭受毁灭……”。

由此可见，由于英国工业的发展，贝勒斯在十七世纪末叶就理解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劳动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把工业学校当作为贫民设立的特殊的机构，而把它看作一个示范学校，富人的子弟也可以到这种学校里来分享它的优越性。同样值得注意的，就是贝勒斯的这种学校并非专为儿童设立的学校，在那里，儿童与成人一起学习和工作。实质上，这种学校是一种合理安排的生活，是为儿童表现其积极性提供必要条件的经常劳动。

罗伯特·欧文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谈起下面这件事。1817年，佛兰西斯·普兰斯^③清理自己的图书馆，把一些过时了的用不着的书挑了出来，他无意间找出了贝勒斯写的《关于建立工业学校的建议书》。他把它递给当时在场的欧文说：“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瞧，这本书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提出了您的社会理论”。欧文请普兰斯把书给他，还说他打算把它印几千册来发行，并指出最初奠定这种思想的功劳属于该书作者。欧文又补充说，虽然“我产生这种思想是我观察事实、分析事实并加以研究(因为它可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结果”。

罗伯特·欧文认为，阅读和书写不过是获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人民所需要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要么就是让穷人受到合

理的和有益的教育，要么就别奚落他们愚昧无知、贫穷不幸，只让他们了解他们深深的不幸。所以——从同情备受苦难的人类出发——，要么就让穷人处于完全愚昧无知的境地（如果您还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让他们尽量过一种禽兽般的生活，要么就干脆把他们教育成有智慧的人，成为国家有用的、有生产能力的一员”。（罗伯特·欧文：《人格教育》）^⑨

国民公会

卢梭、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欧文等人都力图根据切身的经验来说明广泛实施为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综合技术教育是必要的，也是可以行得通的。

国民公会想通过法律来实行这种教育。

1791年8月5日，制宪会议^⑩在宣布保障人权之后，紧接着又宣布实行全体公民的普及公共教育，让每个人免费受到必需的教育。要根据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平均设置学校。

但是，制宪会议没有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做任何工作。诚然，塔列兰^⑪（他过去是主教，后来成了五执政内阁、拿破仑执政、第二帝制时期的有名的大臣）曾在制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详尽周密的国民教育草案。但是他的这一计划谁都感到不满意，因为根据他的主张，教育工作仍然掌握在僧侣手里，不管在教学大纲方面，或在工作的安排上，塔列兰都未作任何根本的改变。他的草案转交给了立法会议^⑫。但是立法会议根本没有讨论塔列兰的草案，它组织了“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孔多塞提出了一个新的国民教育计划。这个计划在立法会议上未能通过，而转交给了下届的立法会议，即国民公会^⑬。

我们顺便提一提立法会议的一个著名的命令。1792年8月26日，立法会议决定授予裴斯泰洛齐以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称号。命令中说：“凡将自己的作品和英勇精神献给人类自由解放事业

的人，法国均视其为自己的同胞”。

必须通过相当的教育去培养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在国民公会通过的无数有关国民教育的草案中，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着。国民公众对国民教育工作非常热情，为它展开了多次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发表了许多正确、深刻的思想，大胆地、广泛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国民公会的议员的主张是很好的，但是历次的讨论说明，他们一般说来不太能够解决国民教育中的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关人民群众教育的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既无任何经验，又无任何实践。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判断什么是可以做到的，什么是不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发现，国民公会的议员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接二连三地通过了一些前后矛盾的草案。举例来说：

1793年6月13日，国民公会热烈地通过了由罗伯斯比尔^⑧在国民公会上代读的雷佩尔提^⑨的草案。

雷佩尔提主张，不要只在口头上说进行国民教育，而要在实际上使共和国的公民受到这种教育。他问到：“至于说到一无所有的阶级，对他们将采取什么办法呢？你们提议要让穷苦儿童受教育，但是首先要给他们面包。他们的爱好劳动的父亲为了他们而失去了自己的一片面包，其余的部分必须由他们自己去挣来。他们的时间都被劳动占去了，因为他们不劳动就活不下去。难道你们主张，他们在田里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又打起精神，到可能离家几公里的学校去休息吗？你们想通过法令强制他们的父亲送孩子进小学，这只不过是妄想，因为他每天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从八岁、九岁、十岁就要做些事情维持生活）帮忙就不行。每周去几小时，他还可能当作牺牲而答应下来，多了就不行。由此可见，设立你们主张的那种学校，说老实话，只是对那些不愁吃穿、不知贫困的少数公民有利。他们的子女才能享受教育的果实，而穷人只可能得到一点果皮。”（摘自若列士《法国革命史》^⑩）因此，这种学校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不平等的现象。所以雷佩尔提主

张，“要颁布一条法令，所有5岁至12岁的男孩和5岁至11岁的女孩都没有任何区别和无一例外地一起受教育，由共和国供给经费，并使所有的人能根据平等的法律得到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食品、同样的教育、同样的待遇”（同前书）。儿童将要学习读、写、算，学习“自然道德”和家政。学校要进行手工劳动，儿童要学习种地，必须进行体力劳动。如果校内没有耕地，就让儿童去修路。儿童的教育和生活费用都一律免交。这种费用主要向富人征收，部分开支由儿童劳动挣钱支付。每一个学校应设立家长委员会，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

另一个雅各宾党人圣—优斯特^②也持有这种见解，他在“共和机构”一书中发挥了这种思想。

雷佩尔提法案的远景是使全体人民的新一代得到公共的劳动教育、有营养的食品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一远景颇使国民公会向往，因此他的法案就被热烈地通过了。

可是过了不久，这个国民公会又通过了布基埃^③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自由竞争的原则作基础的。草案认为不可创办拥有从属于国家的教师的国立学校。凡是持有政府所发的共和国信任证明书的人都可以任教。不需要任何材料来证明他是否胜任教师工作。优秀的教师自然能吸引绝大多数的学生。国家将个别地为每个学生付钱。布基埃草案的拥护人江衣曾说：“人们想把新一代幽禁于其中的四万个城堡（这里谈的已经不是雷佩尔提的草案，而是指的建立初级学校），是维护专制的最后一点希望并使之死灰复燃的最好工具”。

国民公会通过了布基埃的草案，当然，不久又用新的草案来代替了它。

国民公会想取缔旧的教育制度，让人民都能受到教育的决心是很坚定的，但是怎样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它是不清楚的。

我们不打算把国民公会讨论和通过的草案拿来一一加以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国民公会所接受的各个草案都把准备从事劳动当作国民教育的一个任务。

雷佩尔提在阐述自己的计划时说：“除了力量和健康之外，社会机关应该保证使每人取得的还有另一技能，这就是劳动的习惯。我在这里没有说准备从事某种工业，而是说的一般的劳动能力，担当艰巨工作的勇气，完成这一工作的毅力，达到目的的顽强精神和贯彻始终的决心，这些品质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所固有的”。（比松：《教育辞典》^④第387页）

雷佩尔提在谈到共和国设立的教育之家的经费时指出，“儿童的劳动产品可以减少教育之家的开支”。（同上）

在以“热月法规”（共和国二年）著名的洛姆草案中，却主张儿童要学会使用圆规、水准仪、度量衡器具、杠杆、滑车，会测定时间。要常常领他们去参观农活和工场里的工作，在那里，他们要量力参加一些劳动（同前书，第395页）。

国民公会于1794年11月17日通过的拉卡纳尔^⑤的草案最接近布基埃的草案，第9节内容是：“要时常把他们（儿童）领到制造日用品的工场去，以便了解其生产过程而使他们多少认识到一些工业的优越性，并唤起他们对有益劳动的兴趣”。

第10节指出：“部分教学时间将用去从事各种有益的、一般的手工劳动”。（同上）

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国民公会1793年9月15日通过的一个草案。

这个草案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

国民公会的议员、化学家加任费拉特茨就是这个草案的鼓吹者。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公共教育的一般看法》的书。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坚持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工业教育。

加任费拉特茨说：“共和国可能组织的最好的典礼，就是组织手工业和职业知识的讲授，这种讲授可以推动民族工业，加强工厂的活动，振兴我国的商业，并且永远消灭专制、倾轧和散播在

我们之间的不和的种子”。(同前书,第384—385页)

加任费拉特茨到处宣传这一思想。

1793年7月5日,他和另外几个议员一起,向国民公会递了一份请愿书,吁请立法的议员们必须“研究能够促进民族工业的社会教育形式”。7月10日,加任费拉特茨根据这一请愿书在“手工艺委员会常会”(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发表演说,告诉它必须在这方面采取若干措施。结果决定出版关于人民必需的教育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撰写工作委托给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⑥担任。他所撰写的报告是一项极有意义的作品。现在摘引数段如下,

“手艺(工业)在儿童本身的器官(即自然的工具)之外,又给他提供了一些新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他才能取得某些新的成效;使用锤、刀、斧、锯。他利用这些工具,就可以了解制材艺术的初步原理,人们教他学习加工金属品,学会使用铁匠和钳工的各种工具。以农业为基础的各项原则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思想。显然,把实践几何学的知识授予儿童也并不比这难。在初等教育的计划中必须列入实验物理学。植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也是适宜于儿童学习的科学”。至于说到阅读和书写,拉瓦锡认为:“它们也是工业(手艺)的工具,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哪个阶层的)都必须会使用这种工具。它是把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人联系起来的工具,它是预防偏见的产生和滥用职权现象的产生的工具,它是自由的首要保证。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儿童会书写之前是很难传授给他们的,如四则运算,它是初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前书,第987页)。至于地区学校(高等小学, *écoles de district*),拉瓦锡认为:“图画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语言,它应该成为立志从事工业活动的人首先要学习的一门课程,全体工人(手工业者)一律要参加这种学习”。“今后工业将分为两大部分:机械生产和化学生产。机械生产需要投入强壮的体力并且必须利用机械工具;在这些教学部门中,教师将教

给儿童初等图形几何学的知识，并且从中导出透视、雕刻、建筑艺术的规则；另一方面，为了把机器拆开以便把它分为许多简单的机械工具，教师应该讲授理论力学（它可以计算各种力）和实践力学——‘这门科学还没有，或者至少是在过去没有从教学上简要地讲解过。’化学生产和机械生产不同，它不需要强壮的体力，也不使用机械工具；与化学生产有关的课程开始时应当研究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自然机体，然后‘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些化学上的手段也能像机器一样加以分类和划分为若干部分，所有这些手段分为：燃烧、焦化、溶解、结晶、分解和发酵。他应该从适用于大多数生产过程的一般原理讲起，最后才讲需要进行专门分析的生产过程’。最后，还有许多综合性的生产，其中既采用机械工具，同时也采用化学过程。教师们可以互相商量一下应该怎样讲授。此外，在这种地区学校里还要讲‘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商业学’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员同时要讲解一般的语法原则并且教自己的学生学会‘用文字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地区学校也招收女生’”。（同前书，第988页）

这就是这位伟大的化学家所描绘的可以作为自由的保证的“合乎理性的”教育。

他所拟定的普及教育计划是从那些不得不终身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居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这是这一计划与塔列兰计划截然不同之处。塔列兰的计划是1789年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其中谈到要教舞蹈和希腊语，但是一点也没有涉及准备从事工业活动和劳动的问题^④。

拉瓦锡所拟定的国民教育计划，实际上是说的怎样从童年起就广泛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如何使综合技术与工业、与各门社会科学联系起来的问题。由于加任费拉特茨和拉瓦锡的观点密切涉及群众的利益，他们两人的草案在国民教育上是一致的，它受到了工人阶级的拥护。

巴黎地区的人民决定为此事向国民公会呈递请愿书。巴黎公

社参加了这次请愿。照章成立的各部也决定支持请愿活动。“人民协会”(sociétés populaires)也持同样态度。集会地点定在雅各宾党人的俱乐部，9月15日上午10时在那里隆重地宣读了请愿书，其中说：“我们不希望教育成为长期享有特权的富人阶级的独占财富，我们希望教育成为全体同胞的财产。我们号召所有无财无产的人，我们要帮助他们从他们的地下室里走到人世之间来，从他们暗无天日的阁楼走下来，享受教育的成果”。(同前书，第391页)

“旧的学校是培养祭司的小学，我们要求关闭这种学校而设立新的中学(在这种学校里，共和国的青年可以获得各种手工业和生产部门所必需的知识)，设立新的专科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他们可以研究各种精密科学和语言的基本原理)，设立新的高等学校(在这里，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天才)”。(同前书，第391页)

请愿书在隆重宣读之后被通过了，以便给国民公会施加压力。

国民公会虽然有很多急事要处理，但是当天仍然接读了请愿书，并且根据请愿书的精神颁布了一项命令。

命令第一条的内容是：在国民公会所设立的小学之外，共和国还将设立三级连贯的学校：第一级学校，传授手工业者和各种工人所必需的知识；第二级学校，传授打算从事另一些社会职业所必需的进一步知识；第三级学校，研究并非每人都能学习的那些课程。

第二条：上述学校课程的设置和讲授应遵照本命令中的指示进行。

第三条：至于说到执行办法，则授权巴黎地区和市政当局与“国民公会国民教育委员会”达成协议，使上述学校在今年11月1日开学。而现存的高等学校及神学系、医药系、艺术系和法学系在全国内一律停办。

命令中的第一项指示的标题是：“培养手工业者和各种工人的第二级学校的教育工作”。教学科目中必须包括描写几何学，以便把它实际应用到石头和木材的加工、绘画中的投影、透视、配景、简单的和主要的机器的几何绘图上去；还必须包括物理学和化学（通过实验学习）；了解简单的机器。每一个学校必须有两个教员：一个教制图，另一个教物理。

第二项和第三项指示几乎全是抄录孔多塞主持下的第一届社会教育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

国民公会的一个名叫库培的议员第二天要求重新审查已通过的命令，理由是通过这项命令时很多议员都不在场。

这项已经通过的命令遭到了同国民公会通过的大多数有关国民教育的命令同样的命运：这一命令未能实现。

但是加任费拉特茨的演说，拉瓦锡的小册子，9月15日的请愿书以及同日由国民公会通过的命令，都说明当时的民主人士中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必须对工人进行广泛的教育，这种教育一方面要与劳动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要与精确科学的材料紧密联系起来。

在共和国三年（公元1794年）的宪法（由国民公会制定的）中也反映了把体力劳动看作每个公民的义务的观点。这个宪法的第16条的内容是：“凡是不会读书写字，不了解某种体力职业的年轻人，不能算作公民。农业劳动是属于体力职业之列的。这项规定从共和国建国十二周年起生效”。

下面就是比松编的《教育辞典》中“手工劳动”词条的作者就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

“无论如何，即使法国革命大胆地确立了这一原则（每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它也无法贯彻执行。不能只是从政治的变化（它使政权由理论家的手里落到阴谋家和统帅们的手里）中去寻求这种原因；这个原因很深远。要想使全体人都参加体力劳动，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才有可能：在这种社会里，一方面，非常完善

的劳动工具可以使教育变为了解若干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要服从科学要求，并要建立在协作的原则上。由此可见，革命所确定的每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规定是完全不适合目前法国这种社会制度的。根据这种见解而拟定的教育大纲，一般说来，只能在同时产生的经济发展过程终止之后才能行得通”。(Travail manuel”, dict. Buisson, 第1206页)(比松编《教育辞典》：“手工劳动”，第1206页)

工人阶级对生产劳动 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

贝勒斯、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的直接继承者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从这些见解中吸取了一切健康的、重要的东西，并且把它加以发展和补充。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功绩还在于他指出了这些见解与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指出了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的全面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将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劳动分工做好准备工作。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极其全面的研究。同马克思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恩格斯。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里，都描绘了儿童劳动在家庭工业和工厂中受剥削的可怕情况。这些描绘使人完全打消了这一劳动对儿童有良好效果的幻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1840年就已经成立了。该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用纳·威·西尼耳^④的话来说，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

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这份报告〈1842年〉二十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但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④

委员会要求通过立法来调整儿童在工厂的劳动。委员会在报告里写道：法律“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⑤

马克思说：“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⑥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⑦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

出，上层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⑤。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定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⑥

不过马克思和欧文一样，对家庭在教育中的良好作用并未寄予任何希望。

“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进行无限度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维持，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权力……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父母权力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⑦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

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⑤

于是，马克思通过对儿童劳动的资本主义吓人的剥削以及旧家庭形态被破坏现象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把吸引儿童(以及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看作一种进步的现象，这种现象将促进高级家庭形态的建立，并且成为人的个性发展的源泉。

正如机器是进步的要素一样(尽管机器的使用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同样的，儿童劳动也是一个进步的事实(尽管资本主义式的利用儿童劳动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吸引儿童参加生产劳动这件事，而是对这一劳动进行的资本主义剥削。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即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就非常明确地谈到了。马克思在“禁止童工”^⑥这一条内说：“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⑦。

早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杰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了这一思想。根据宣言的这两位作者的意见，无产阶级在夺得了政权之后，就应该立即采取许多旨在改善社会福利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

“对一切儿童实行社会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⑧。

宣言中谈到：“也许你们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⑥

又说：“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⑥

马克思把必须根据上述方针（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改变现代教育与必须消灭社会上现存的劳动分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生产者的活动是形形色色的。

在手工业和手工工场成了主要生产形态的时期，个别的生产部门还没有独立分化出来。生产者的活动形式比较单纯，都已专门化了。每一种手工业根据多年的经验形成了一套适合本行特点的技术形态，改进很缓慢，世代相传，没有什么大变化。生产分化为个别的、独立的部门，就引起并且巩固了社会上的劳动分工。一直到十八世纪，手工业还被称为秘诀。这一名称说明，一个未得真传的人想探究手工业的秘密是多么困难；同时也说明个别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许多深的隔阂。大工业打破了这种隔阂。大规模的生产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尽量在作坊内进行分工，把每一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组成部分。要完成个别生产部分的工作，

已经不需要专门的职业训练。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就使科学的工艺学的创造成为可能。科学的工艺学对生产的全部过程都运用科学的材料，从而使这些过程统一起来，并且经常改变其形式。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②

由此可见，大工业本身的性质要求全面发展的工人，这种工人要具有全面的劳动能力，受过综合技术训练，能操作任何一种机器，懂得各种劳动过程。

同时，旧的劳动分工在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工人往往只是去完成某一细小的工作。这对他们的影响极其重大。大工业中常有的生产过程的不断变化，使工人每分钟都受着失业的威胁。旧的机器被新的机器替换之后，只会从事某一细小工作的工人就不合用了，于是他们就流浪街头，补充到失业大军的队伍里去了。对于工人来说，如果他没有全面的工作能力、没有受过综合技术训练，不能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那末他就要受到饥饿和贫困的威胁，而对社会来说，这又是无止境的，无意义的浪费人力……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

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这一思想，在他为第一国际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866年在日内瓦举行）所写的决议中也有了发展。当时第一国际是年轻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中心和智慧中心，对工人运动中一般问题的兴趣非常浓厚。“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劳动”⑥这一条在那次日内瓦会议的讨论中占了很大的位置。这个看来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它与新一代的教育问题有联系，因而它既成了猛烈抨击当时教育制度的根据，又成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缘由。会上通过了马克思草拟的决议⑦。这一决议的内容如下⑧：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

* 马克思在这一段的注解上说：

“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十七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结束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注

.....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读书学校及其巩固的原因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轰动一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很快就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仅仅到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人们才重新谈起这一问题。

那时，学校成了读书学校的同义词。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备受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他们变成了一部机器，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

有关读书学校的问题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这种学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所以这里也就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其缺点了。

本书作者曾于1908年访问了日内瓦的一所模范国民学校。这

所学校的校舍富丽堂皇，拥有宽敞的教室和礼堂，四壁挂有《红帽子》一书中的图画，校内各处都很清洁，还有浴室和体育馆。这是一所八年制学校，此外还有为幼童设的两个预备班；教科书都是用精美的纸张印刷的，附有插图；男女教师都是本门业务的能手。他们擅长绘画，讲话声音宏亮清楚。每一课书全班学生都合乎要求地准备得很好，并且学得很透。作者在四天的时间内听了各种各样的课，拜访了各个教师。这所模范学校给我留下了一种沉重压抑的印象。尽管学校的外表很好，它仍然是一所典型的读书学校。教学的机械性使人吃惊，使人受到压抑。教师通过一些巧妙的问题和无休止的复习，使全班学生把所读过的东西逐字逐句复习一遍，然而这种全班的集体呆读死记不过是最普通的训练而已。最使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学生的个性受到非常厉害的压抑，以致不能把班上能力较强、水平较高的学生和能力较差、天资较笨的学生区别开来。不同之点只是回答得是否及时。没有一个问题是要学生动脑筋思考的，没有一点生动的思想。此外还有纪律，压抑人的纪律。某些教师把整个一堂课都变成了一种同学生进行的无休止的战斗：侮辱，斥责，赶出教室。当然，并非瑞士所有的学校，甚至并非日内瓦所有的学校都和作者所见到的这所模范学校一样。但是这所学校的设备如此之好，并且专门供外人参观，好让参观者由此了解到日内瓦教育工作的斐然成就，其作法尚且如此，那末这一事实也就说明上述情况并非可悲的例外，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当然，瑞士在这方面还并不是欧洲家庭的一个丑儿。不是的，日内瓦的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读书学校而已。

教学是机械的，但整个学校机构还要机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工作是高度集中的。上级组织制定教学大纲，分配教学时数，确定教学方法。比如说，法国人对于全国各国民学校一定的班级小学生在某一天的某一小时都在听写同一个内容一事，感到非常骄傲。这种机械做法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让那些想象力丰

富的人去想象吧。教师的个性受这一制度的压抑程度并不次于学生，于是整个学校机构就好似一个庞大的工厂或作坊。

这个好似工厂的学校机构的工作情况，在罗歇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布鲁塞尔博览会上的初等教育》，载1910年9月号的《教育评论》^⑧）中谈得很生动。罗歇在谈到比利时这一部分时说，根据比利时国民教育部大臣的意见，1910年的博览会应该用图例说明，并遵照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来把根据某一原因必须授予学生的思想加以宣传。这一思想应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在各个年级（从幼儿园开始到成人学习班）的课堂上得到发挥。

布鲁塞尔博览会具体表明了比利时教育大臣的这一意见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为了发展殖民生活，教育部向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培养儿童对旅游的兴趣、探险的爱好，发扬他们的独立进取精神。教师们随即采取措施，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教案。他们在每一次讲课时都加进去一些事例，以便实现教育部提出的口号，使这一口号变为学生的实际行动。同时还采取相应的办法改变了听写的内容。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展出了教师的大量教案，它们充分显示了比利时教师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当然，会上没有展示也不可能展示这种教学的效果。这样就无从判断：由于修改教案，学生的独立进取精神究竟有多大的发扬。而只有这种效果才能证明这种工厂生产式的机械教学所取得的成效。

罗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对法国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的做法习以为常，因而对比利时教育界这种明快的工作作风大为赞赏，对比利时教师的工作态度倍感钦佩。

但是，读书学校也产生了非常可悲的后果。关于这个问题，瑞士民族会议的议员谢克里在他所著的《未来的学校》一书中谈得极其精辟透彻。

谢克里是文捷尔吐尔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师，他亲眼见到过数百个在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他根据亲身的观察，确认在学校里念过八、九年书、在所谓高级国民学校（Sekundarschule）毕业的学

生，竟然令人惊奇的一点也不会简明扼要地表达最简单的思想，毫无观察能力，也不会独立思考。这一缺点在学习自然科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学生们不能根据最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不理解实验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找出并且确定有关现象的规律。

谢克里对于现代学校的缺点在实际生活中有何反映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农民、工人和商人等等。根据这些调查，他说：“年轻人离开学校到工厂或作坊去之后，连最简单的工具都不会使用，只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从头学习每一种最简单的操作方法。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儿童如果能注意观察成人的行动，摹仿他们的动作，就能很容易地学会任何一种操作方法。

“在办公地点说的话和在工厂与作坊说的话是一样的。年轻人往往连一封最简单的信也不会写。诚然，他们能够机械地根据某一公式计算，但要他们动脑筋思考就做不到。在农村里，曾在城里学习过的青年成了农民抱怨的对象：他们甚至不会使用任何一种劳动工具，更不用说干什么活儿了”。

“这还是在裴斯泰洛齐的国家里呢！”——作者不禁大为感慨。

弗里布尔格中等技术学校的校长列昂·惹奴在他所著的《职业教育 (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一书中也指出了他访问学校后所得到的同样印象：

“小学的标准教学大纲偏离了教育目的。这个大纲过于理论化和抽象，于是青年显然就失去了对手工劳动和体力活动的爱好”。(第408页)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同样情况。

教育工作没有根据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加任费拉特茨以及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道路前进，而是沿着机械地教学生读、写和其他一些基本知识的贝尔-兰喀斯特制度的道路走下去，其

原因何在呢？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所处的时期是工业发展时期，科学的工艺学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不过，最初机器只是把人的劳动简化到去完成一些不复杂的操作，使每个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它，那时机器还没有把人的劳动淘汰掉，只不过把工人由独立的工作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的技术对具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已缩小（手工业者的劳动就是这种劳动），而对普通的、没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却增加了。当时需要的不是能干的、理解整个劳动过程并且具有独立主动精神的工人，需要的是绝对顺从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粗工，对于这种工人，既不要求他有特殊的体力，也不要求他机智灵敏，不要求他有手艺，只要求他能遵守时间，克己自制、有耐心和能吃苦耐劳。

读书学校所培养的正是这种工人，既严守时间，又绝对顺从。处于欧洲十九世纪所经历的那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这种学校，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并无矛盾，尽管与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但是当时的工人的组织还很不健全，力量还非常薄弱，所以不能给自己创立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学校，而且他们的斗争当时在这方面还不尖锐。

作为时代标志的学徒制的瓦解

读书学校没有发展儿童的一般劳动能力，而学生在校外就更难获得作为从事一个有技能的工人的复杂劳动所必需的知识 and 技能。

从前，一般的劳动技巧是由家庭传授的。家庭生活与广泛多样的劳动活动保持着联系。儿童从小就观察家里的人所做的工作，而且自己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这一工作。现在，家庭生活

的性质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工作不是在家里进行的，父亲到什么作坊或工厂去工作，一去就是一整天，有时母亲也外出工作。

从前，大部分儿童是在自己父亲作坊里学习父亲的手艺，并且由父亲言传身教。如果一个少年想学习另外一种手艺，那末他就要到师傅那里去学习，好像成了师傅家里的一员。行会只注意师傅教徒弟是否正确无误，并且一般地去调整师徒之间的关系。

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厂里招收进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也不会做的少年。这些少年在工厂或作坊里用很短的时间学习要他去从事的某种不复杂的劳动：用机器装订，把断了的线接上，等等。学习这种简单的操作法不能叫做职业教育，而且一般地也不能叫做劳动活动的训练，因为这种机械的工作不能培养一般的工作能力，而且也不能使少年儿童受到任何专门训练。这样一来，儿童可以不必事先受教育就能赚钱谋生，因此大多数做父母的人都热衷此道，尽管这对家庭的收入增加得并不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做三四年学徒来学习某种职业的，只是一小部分家境较好的工人。

而且拜师学艺的性质本身也有了改变。手工业的情况改变了，不太稳定了。手工业者因为和大工业竞争而陷于窘境，于是就不得不延长工作日，整天忙碌，疲于奔命，而且还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有时所以还能招架得住大工业的竞争，那也仅仅是依靠剥削学徒的劳动，强使学徒从事某种纯粹机械性的工作（这种工作与工厂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把他们当杂工使唤，从事家庭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学徒们学不到什么东西。

在很多生产部门，手工业的性质也改变了。手工业者所制造的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東西，而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只是从事收集，或把用机器做好的各个部件进行最后的加工。工作变得死板得多了，其性质已经接近作坊的工作了。

这样一来，职业教育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更加专门化了。但是即使没有这些缺点，拜师学艺最多也不过是准备将来在小作

坊工作而已。何况手工业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大多数学徒以后都要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在工厂里去工作，而在手工业者作坊里做的工作对于到大工厂去工作所做的准备是很有限的。

从前，学得一门手艺就可以保证学徒将来不愁没有饭吃。现在，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地位同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境况一样不稳定。新机器的发明和新的工作方法的使用等等，可以使整个一行职业成为不必要的，而花了很多年时间去受某门职业训练的工人，就不得不去寻找另一种他完全不熟悉的职业了。

科恩基^⑥在他所写的《学徒》一文中说：“学徒的危机成了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调查(这里指的是1902年法国‘最高劳动会议常委会’和‘劳动管理处’同时进行的调查)表明了学徒制的瓦解以及作为这种瓦解的证明的学徒职业训练水平的降低是实际情况。在某些工业部门已经没有学徒了：工人一般的都是从临时工的队伍里征集来的。另一方面，即使在那些还有学徒的工业部门里，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学徒了，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全面充分的职业训练的学徒了”。

“……促使学徒制瓦解的许多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儿童及其父母想迅速获得工资的愿望，使师傅不能再教学徒的那种大工业的发展，机械化，工作的专门化(它把工作分成许多个别的任务，分成许多动作，这些动作非常简单，只须用几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学会操作机器，从事能使他获得工资的一部分手艺)——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必然会引起学徒制的进步性的丧失和瓦解。学徒制在许许多多行业的消失目前已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学徒制的瓦解是工人技术训练水平降低的表现，由于这个原因，整个工人的前途都将恶化”。

拉法格^⑦在《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中说：

“目前，学徒制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家庭性质，并且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有益的方面。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学徒还在‘学习’。如

果学徒不是工具的必然后备和机器的附属品，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当作杂工使用”。

技术的进步。技术方面的新趋势

读书学校和学徒制的瓦解都在一个方面发生了影响——降低了工人的一般劳动能力和一般技术训练水平。

这种情况要继续下去，直到工业上需要大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受过技术劳动训练的工人时为止。但是近来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成效。而技术的进步又反映在对劳动力的需要的性质上。在采用了最完善的机器、使用最完善的生产过程的那些工业部门，对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量就少些，而对受过综合技术训练的、具有独立主动精神的工人的需要量就大些。关于工业发展中的这一新的趋势，奥托·卡敏尔^⑥在他所写的一本很有意思的著作中曾详细地谈到过（见他所著的《试论技术成就对生产之影响》）：在十九世纪头五十年，机器在技术上还不够完善，往往要人从事很多手工劳动。十九世纪后五十年，机器就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不仅力图使机器的主要动作成为独立的（不需要手工劳动），而且还要使附加的、辅助性的动作成为独立的，因为至今还有许多辅助性的手工劳动。”（第413页）

在提高工资和罢工的压力之下，“近十年来（卡敏尔的著作出版于1910年），机器制造工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全力制造那种只需要为数不多的、但是有知识的、工资高的劳动力去操纵的机器”。（第413—415页）

卡敏尔指出了许多已经实现了这一过程的生产部门（主要是重工业方面的），同时引证了每一个生产部门具体的材料，来说明采用了某一机器之后对有知识的工人的需要量增加了多少，对辅助工人的需要量减少了多少。

许多工业部门还未被这一趋势所波及，过程虽然刚刚开始，

但是，毫无疑问，它已经开始了。

“技术发展的结果总是使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被淘汰。这种发展过程提出了机器技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不是把人力当作肉体机器来使用，而是当作有思想的生物。实现这一思想的主要手段是电力配备”。（同前书，第424页）

“熟悉最新的机器技术发展情况，就得承认最近所取得的成就的最本质的特点，是在电力配备的情况下，尽量把机器加以改进，使它不仅能够完成自己最基本的任务——加速运动或运转工具，而且本身还能完成力所能及的和辅助的运动。因而，发展情形并不表现在通常所认为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机器工作这件事情上。其实恰好相反，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一天天地从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他们的位置为少数更有能力的工人所占据，这些工人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并且受过专门的教育，而这又是了解完善的机器并且正确操纵这些机器所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最初在某一部门多余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由于生产的扩大还可能在另一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话，那末将来接受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岗位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是经常不断的，而且这种需要量还将增加。所以，将来培养有技能的工人就比预防衰老病死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就像一个病人一样没有多大用处。国家如果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去关心新一代接受专门训练，将来就会陷于这样一种狼狈的处境，这种狼狈处境就像是派遣装有土炮的木船去跟拥有速射武器的铁甲主力舰作战一样”。（同前书，第425页）

增加有知识的、受过技术教育的工人的这种要求，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是在那些近来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国家里，如北美和德国这些最近的例子，表现得非常明显。

最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培养具有广泛技术能力的工人干部。

军国主义化的要求也推动着政府这样去做。

巴·尼·米留柯夫在他所著的《武装的世界和军备限制》^⑦一书中就是这样描绘现代战争的：“战争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企业”。（第16页）“军事技术需要有很多贵重的设备，这些设备经常由于新的发明的出现而改变”。（第17页）

“战争本身是从属于这一总的改变过程的。目前，军队的领导人、武器发明人和军火制造商主宰着与普通的知识职业稍有不同的生活。战争的胜利不是取决于武士的品德，而是取决于计算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取决于多年来事先进行的辛勤努力。这样一来，战争就失去了从前那种吸引人的浪漫性而成了一种最现实的职业”。（第159页）

世界大战非常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真理。这次大战表明，技术、完善的武器、工业组织、为数众多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人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一般说来，工业上特别是军事上对受过全面训练的、具有知识的工人的需求，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技术教育的组织特别重视，并因此对改组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把读书学校变为劳动学校）非常重视。

职业教育及其发展。

职业教育性质的改变

学徒制的瓦解对于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全部卷入大工业而带有半手工业、半手工艺性质的工业部门）产生了不利的影晌。

例如法国1902年进行的调查，就用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学徒制的瓦解对一系列的生产部门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晌。学徒制过去在法国起着重大的作用，因为法国之所以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产品的精美和艺术加工。

这种现象在其它各国也有。为了扶持民族工业，政府和私人开始设置许多工业学校和手工业学校，授予学生职业教育（从前学生是在手工业者作坊受到这种教育的）。这些学校的目的往往直接就是扶持小生产。

例如奥地利在十九世纪40年代曾经组织了“民族工业者联盟”。这个联盟在1847年曾把学校里学生的作品拿来举行了第一次展览会。这次展览会的章程说：“每一个想使自己的前途有所依托的年轻人，都应该利用自己的学徒时期去踏踏实实地学习手工业，这样才能在小生产进行的斗争中站稳脚跟，并在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之间、民族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这一斗争今后将日益残酷”。（惹奴著：《职业教育(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1901，第12页）

手工业型的职业学校遭到了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反对，有时还遭到受过专门训练的临时工人的反对。他们把职业学校的学生看作未来的竞争者。有时，手工业者甚至想关闭职业学校，比如说，里昂的布德尔钟表职业学校就曾碰到过这种事情：凡是关闭学校不可能的地方，就不让职业学校出卖学生的劳动产品。在法国，这一传统已牢固地固定下来；甚至于职业学校学生所做的新产品，不管质量怎样好，或者是全被毁坏，或者是成年累月地堆放在地下室里，听其坏损。在瑞士，职业学校出售学生的产品，但是售价很高，以免和独立的手工业者竞争。职工联合会对职业学校也抱否定态度，并且千方百计地反对设立这种学校。他们一般都力图限制学习手艺的门路，以便减少受过教育的工人对劳动力的供给，并且严格控制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我们发现，美国的工会联合会对当时美国设立的商业学校(Trade Schools)也抱着同样的否定态度。

但是，适应生产要求而建立起来的职业学校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它们不再是单纯地向手工艺匠学习的场所了。由于绘图、造型、机械以及其它理论课程进行得很好，从而使教学提到了很

高的水平。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是在小作坊里向手艺人学不到的。美国的实业学校(Industrial Schools)、法国的市立职业学校和民族职业学校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的许多专业学校都属于这种类型。

拉法格在《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一书中曾经谈到这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在手艺人领导下的作坊的学徒制被职业学校所代替，这种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加；校内设有奖学金、助学金，并且为了学习的目的组织优秀的学生到各工业城市去旅行。这样一来，有一段时间受同业工会监督、随后又由私人管辖的学徒制，现在就失去了它的私人性质而力求变为社会机关，在一些得到社会当局直接公认的教师和教授领导下进行活动”。

这种职业学校所培养的不是独立的手艺人，而是从事大生产的“受过教育的”工人、技师、监工、助理工程师等等。

但是这种职业学校还远远不够理想。这种学校多半脱离生产，这使它们打上了一定的烙印。在这种学校里，因循守旧之风往往很浓。例如法国很多职业学校至今使用的机器还只是法国出产的，而法国有关的工业部门早已使用德国和美国出产的比较完善的机器了。

大多数职业学校都设有作坊，但是这些作坊的设备往往不好。美国的实业学校虽然例外，但它们也未能利用一切新的技术成果。有些国家(如奥地利、瑞士、英国)的技术博物馆在这方面常常给些帮助，但是做得不够。

工人都很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型的职业学校里去。当然，能够这样做的只是一些收入较多的工人，因为他们可以在几年当中不需要子女赚钱养活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型职业学校里去的还有小资产阶级。

目前，由于工业上非常需要在职业学校毕业的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工厂主对这种工人就非常重视。他们不仅付给这种工人优厚的工资，不仅使他们享受特权，而且还通过参与分得利润以

及其他一些方法来使这种工人的利益同工业企业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这种工人大多数都养成一种资产阶级心理。他们的利益往往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相矛盾。他们是一群工人贵族，在很多方面颇与参加职工联合会的英国工人贵族相似。这一群受过技术训练、具有技术能力的工人在德国、瑞士、奥地利约占全体工厂工人的四分之一，在法国为数稍少。现代的工人贵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旧的工联主义。旧的工联主义多少是一个闭塞的组织，它一方面既与资本家有矛盾；另一方面又与其他的工人群众有矛盾，可是现代的工人贵族既不与前者有矛盾，又不与后者有矛盾。在组织上，它属于一般的工人组织；在思想上，它从不把工人阶级的利益跟资本家的利益分开。工人贵族的代表人物由于自己的知识稍为丰富一些，由于多受到一些教育，由于一般的具有比较优越的条件，因此他们往往是工人组织的领导人物和负责人，于是他们就把自己所特有的妥协精神和机会主义的精神带到这些组织里来了。战争极其生动地揭露了这一现象：例如，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袖就完全同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了。分而治之是资产阶级的拿手好戏。

从工人阶级的利益来看，产生一群特殊的工人贵族当然是不好的现象，工人阶级希望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而不是工人阶级中部分人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

最近十年来，资本家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上发展得很迅速的国家（如德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当局也都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技术水平。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特征的是到处都设置了一些技术夜校。

在法国、英国、美国，进入这种学校学习是自愿的，并不强迫，在英国甚至还要缴学费。夜校符合许多工人想从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队伍进入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队伍的愿望。

在法国，夜校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尽管在这种学校里绘图是主要的课程。在进行技术教学的地方，所追求的是狭隘的职业

目的。夜校取得了成绩，但是到年终时学生人数却少了一半多。这就说明白天进行了紧张的劳动之后，再到夜校去学习是多么困难。

英国的情况更为有趣。那里有所谓国民中等技术学校。现在伦敦的每一个区都设有这种中等技术学校。这些学校总数大约十个。这简直是一些宫殿。在一条洛金街上，中等技术学校一周开设五百多种课程，学生将近一万五千人。

“每一所中等技术学校都包括工业学校、音乐学校、朗读班、商业学校、职业学校(至少有十五种不同的职业)、家政学校、缝纫剪裁学校等等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同时，这种学校也是一个俱乐部，经常组织盛大的联欢会，演出戏剧，举办音乐会，每周至少一次；中等技术学校里都有宽大的礼堂、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富丽堂皇的阅览室、体育馆、游泳池、游艺室、吸烟室以及价廉物美的食堂等等”（惹奴著：《职业教育》(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第150页)。每个人都可以学任何一种课程，只要付出一小笔费用。

美国的补习学校(Continuation Schools)具有更多的技术性质。这种学校的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很好，校内附设有很好的教学工厂，拥有最新式的机器，等等。

在奥地利和德国，进补习学校是义务的。

在德国，补习学校(Fortbildungsschule)最初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学校里的教学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学校的目的主要是给开始迅猛地在青年中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作“解毒剂”。然而由于迫切需要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于是大家就把注意力日益转向绘画、制图、几何学、计算、商业簿记学、撰写应用文方面去了。当时法国人嘲笑德国补习学校的教学大纲说：“学术味太浓了！厨师不懂代数和三角也能做出甜饼子来。”但是德国的补习学校不是培养某一种狭隘的职业人材，而是给学生打下一般的理论基础，这种基础是每一个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所不可缺少的。它力图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因而在这点上毫无疑问

是具有进步性质的。

实际情况很快就表明，补习学校教学工作的缺点就是过于抽象，因此没有达到它原来的目的。于是就开始在补习学校内设置一些小型工厂，把理论讲授和实际操作结合了起来，效果非常好，德国的补习学校就在这个方面迅速地进行着改造。但是不久就暴露出一个问题：由于学生疲倦已极，因而影响了学习成绩。学生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活，晚上就不能继续在教学工厂工作下去。于是德国就颁布了一条法令，根据这条法令，每个企业主每周要让学徒停止厂内的工作而到日间补习学校去学习一次。

日间补习学校把德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程度提到了更高的水平，因为这种学校里的理论讲授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讲授本身所具有的不是狭隘职业的性质，而是多少接近综合技术的性质。

德国所不足而美国所有的，是外部感情的一般发展以及对劳动的一般训练（在美国，这些东西都由小学授予儿童）。在美国，学生到技术学校去学习时已经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和绘画能力，熟悉各项工作的底细并能圆满地完成工作任务。而德国至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读书学校，这种学校既不训练儿童去劳动，反而使儿童脱离劳动。德国现代的补习学校就暴露了德国国民学校的这一缺点，因而不得不对它进行改造。

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就经常训练儿童劳动。这种一般的劳动训练是在所谓高级手艺学校^②(High Manual Training Schools)完成的。这是一种设备完善的小型工厂，青年人在这里可以实际地学习整个生产过程。所学习的不是某种职业，而是许多生产部门，选择一些最重要的、最典型的部门来学。在高级手艺学校里，学生所受到的是真正的、全面的理论和实际的综合技术教育。这种综合技术教育不仅给予学生一般的劳动训练，而且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

德国的补习学校着重于现代工业发展使技术教育成为全民财

富的趋势。

美国的高级手工艺学校所着重的是这一发展的另一趋势：扩大职业教育的范围，把职业教育从培养狭隘的职业变为准备进行一般的工业劳动，使学生获得一般的基础，这种基础可以使由于现代技术的进步而引起的职业变更成为可能。

最后，在最近还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学校，这种学校所着重的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另一具有特色的趋势，即把技术教育同生产产品的劳动紧密联系起来。

美国大的工厂主非常需要受过教育的、经过良好训练的工人（这种工人可以委托以负责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曾在补习学校里受过训练），由于这种要求往往不能满足，于是他们就想亲自掌握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工人的工作。1905年以后的五年内，美国出现了许多工厂学校，其中大多数是日间学校。学生学习时可以不上班，照样领取平日的工资。此外，如果学生能顺利地把一门课程学完，还发给他50—150美元的奖金。学习通常是每周两天，不过学校是全周都上课的，所换的只是学生。学校招收从14岁到18岁的学生，这取决于进入工厂学校是否要求在普通学校或高级中学毕业……工厂学校所讲授的课程有：适合生产要求的数学、物理、电学、力学、商业学、制图、绘画，等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没有普通学科。印刷工人和化学生产部门的教学计划稍有不同。

在工厂里，学生在不同的技师监督下工作，并且由使用一种机器转向另一种机器。

1910年，仅仅在铁路公司就有51所这种工厂学校。

除了为学生设立的工厂学校（这种学校只有那些有许多少年人参加工作的大企业才能开设）之外，在美国，一种所谓的“合作教育制度”^③（cooperative school system）开始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制度就是一个或几个企业与本地的技术学校订立合同。它们把自己的学生送到学校去（保留他们的工资），让他们用一半时间

或部分时间在校内学习(往往是这样安排的：学生一个星期学习，一个星期工作)，而学校负责给学生讲授一些为他们的技术教育所必需的课程。

英国的大企业对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工人的工作也很关心。

“1903年，英国的造船中心苏格兰的工程师和造船家辛迪加和该市技术学校的行政当局拟订了互相合作的基础，这一合作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后果。参与这一运动的经济力量的意义，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这一运动包罗了25个造船商，其中仅仅多克斯菲德一人就控制了许多庞大的造船厂，以致于他一家一年所承担制造的船只就等于德国所有造船商要制造的船只。苏格兰所实行的主要原则，就是学生应该在作坊里向老板学习自己的职业，去听技术学校非常适用的科学课程和绘画课程。小学毕业的头两年，他们白天都在作坊里，晚上有时在学校学习，通过竞争考试之后，最有能力的学生就得到了奖金，这样，他们在整个学期就可以不花一个钱而埋头钻研高技术知识。这种学习可以使他们获得一张专门的文凭，而这一纸文凭就可以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财产”。（“Revue Pédagogique”《教育评论》1914年7月号，第52页）

“德国的大工业在培养学徒上采取了特殊的方法，目的是培养知识和能力上都能适应现代技术要求的工人。德国设立了许多专门的教学工厂，通过经常更换学习内容的方式来向最有天才的人讲授职业的各种秘密。首创者就是普鲁士帝国的铁路行政当局”。

“在为期一年的学徒期，年轻人在技师的经常监督和指导下学习如何使用材料和工具。然后依次派他们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去工作，参加工厂里正在进行的生产，并利用一切他们会使用的机器来从事生产，从而，他们就在最顺利的条件下接受了实际教育”。（惹奴：《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 职业教育》，第165页）

职业补习学校和工厂学校的设立，是由于现代大工业需要受

过训练的、具有技能的工人。工人阶级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普及综合技术教育上所受到的好处，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扩大自己对青年的影响，以及它在工人阶级中分化出一批最有才干的工人成为特殊的工人贵族、特权阶层这两种手段来求得补偿。但是随着对有技能的工人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就越来越多，于是技术教育就从一种特权变为大家都能享受得到的东西了。技术教育提高了工人阶级的一般知识水平，而成为把现行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了。

读书学校之转变为劳动学校。 这种转变的必然性

欧洲各地的国民学校采取的都是读书学校的形式。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学校修业年限越长，儿童就变得越加迟钝（如我们所见到的瑞士的情况）。凯兴斯泰纳在他所著的《Begriff der Arbeitsschule》《劳动学校》（第25页）一书中说：“儿童从3岁到14岁占优势的是本能和对手工劳动的爱好”。这段时期儿童大部分是在学校度过的。读书学校不仅不能发展这一自然的欲求，反而扼杀它。

当工业日益需要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有首倡精神的、有知识的工人的时候，当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工人的技术教育的内容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碰到读书学校的悲惨结果。这种情况在同北美进行比较之后就显得更突出了，因为北美的国民学校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发展儿童的劳动能力。

美国最先走上这条道路，这是不难理解的。美国在技术进步方面长期以来就在世界各国之先，美国比任何国家更早地、更尖锐地感到缺乏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另一方面，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美国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排斥任何官僚主义的习气和

因循守旧的作风。它给儿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来显露他们每个人的首倡精神。它受居民的监督，因而就使美国的学校变得非常灵活，容易适应生活的各种要求。美国的学校同国家的社会生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劳动在美国学校中占有广泛的地位，也是很自然的。

在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儿童劳动，教儿童学会使用各种材料和工具；通过劳动来教儿童学会观察，独立思考和行动。儿童们会画图画、做装饰、塑造、雕刻、剪贴。国民学校继续幼儿园未做完的工作，只不过所做的活儿更复杂些，要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忍耐性、坚持性、独立精神。生产劳动像一根红线贯串在高级手工艺学校的全部课程中，——这种综合技术学校只不过是完成在幼儿园就已开始了的手工劳动的教学工作的地方。各方面的劳动活动可以很早就使儿童的爱好、兴趣和天才显露出来。因此，在美国学校毕业的男女青年选择职业就比欧洲的各国男女青年要容易得多，因为在欧洲选择职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选择职业对于加入劳动大军的青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从事符合自己兴趣和能力的劳动，比从事违反自己本性的劳动要使人愉快得多。选择适合的职业对于劳动生产率也很有意义，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的企业主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自己的工厂里特别注意“to put the right man on the right place”（“使人各得其所”）。劳动学校比起读书学校来，可使儿童的能力更好地显示出来。此外，在美国学校里还有特别的“就业顾问”。这种顾问对学校里的儿童进行观察，了解儿童的爱好，确定毕业的儿童最适宜于从事哪种职业，从而进行适当的指导。这是欧洲所没有的。当然，不应该过高地估计了选择职业对广大居民的意义。目前，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都不适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只是尽可能找到一个工作就行了。现在正在进行着一种一般的劳动训练，这种劳动训练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使人不必要一辈子为一种狭小的职业所束缚，而能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我们发现美国学校里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结合的，这种结合可以鼓舞体力劳动和丰富脑力活动，为消灭社会分为贵族(从事脑力劳动)和平民(其命运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现象作准备。对于这种结合要给予更高的评价。

美国在工业劳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种成绩在较大的程度上使它能够出色地去培养工人。美国所取得的这种成绩也促使欧洲对国民学校改革问题，以及把国民学校由读书学校变成劳动学校问题的议论。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最激烈的是德国，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德国最近45年来在工业方面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都发展得快些。关于劳动学校的问题在德国成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恩斯特·维柏尔于1912年在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做报告，在谈到劳动学校这一问题时说：“世界市场迫使德国人与‘价廉物美’这一过时的方针决裂。新时代不允许按陈旧的工艺流程生产产品。它要求所生产的产品是任何外国工人望尘莫及的。新的时代要求产品式样新、质量好。由此就得出一个教育学上的结论：既然要学生将来生产某种体现其个性的东西，那么他的个性(尤其是他的意志和志向)就不应经常受到压抑，要表现出个性来。

“改革不仅应使精神力量平衡，而且也应关心个人活动的积极形式与消极形式的平衡。人们发现，学生过分习惯于模仿，只是一个善于接受事物的人；他们的脑子塞满了教材，以致根本不能消化，这就扼杀了创造性的乐趣。因此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学生不仅应获得知识，还要显示才能；不仅能够接受事物，还要善于行动；不仅会模仿，还要会创造。特别要强调教育必须有利于实际活动，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主动性这条久已存在的原则，虽然口头上经常提及，却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一直未能实行。现在，这个原则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甚至成了新运动的一项主要要求。独立的观察能力的培养应在教师简要的讲解和学生的复述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知识应该变为技能，认识应该产生行动。”

“真正的主动性发自内部，真正的个人创造不能由外部强令产生；真正的主动性源于人的本性的基本特点，源于自由的意志。”

“认识到这一事实就可以弄清自由和强制之间的关系。改革所最应关注的，就是要促进儿童个人创造力的发展。儿童因一时感情冲动而从事的活动，由于出自一种自然的意向，并且是一种直接的动机所促使，因而不应该过多干预，恰恰相反，应该积极支持。过去曾经提过这样一个口号：捍卫儿童的自然权力！儿童以教师之所好为自己之所好，这不应成为一个准则，而应以儿童发自内心的喜好为准则。在开展每项教育活动时，在确定某一目标时，以及在选择某种方式时，教师只应该是儿童的保护人，而不应该是他们的统治者。每走一步时，教师都要反躬自问：如果按儿童自己的意愿，他们是否会走这一步。”

“儿童是判定整个教育活动的中心，因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儿童的个性。现代儿童心理学认为，儿童精神生活的基本特点与成人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心理学发现，不同的年龄层次，其类型也截然不同。儿童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可以手触目睹的具体的有形事物；儿童把握现实的能力超过他的抽象化的能力；充满具体体验的现实生活比充满科学联想的非物质世界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为了通过适当的方式达到培养儿童个人创造力并适应儿童的本性这一既定目的，就不能忽视儿童这种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能忽视他们对具体事物的喜好和自由自在的意愿。”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协调形式，即学校与生活的协调。环境、故土乃是一切教学创举的出发点。‘走出去！’这一号召曾在文艺工作者中间起过重大的作用，现在这一号召对学校也有了新的意义。它使自然界也进入了学校生活之中：学校设立了花圃、饲养室、水族馆。某些课程（读、写、算）比过去更多地以实际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同

时，人们尽力把学校生活与儿童的游戏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转变不致太剧烈，因为孩子们过去自由自在惯了，入学后突然强迫他们做这做那，成天提心吊胆，毫无乐趣可言。”

“最后，认识到儿童的天性比较喜欢实际的、具体的世界之后，就会全面地去发展人体的各种器官；就会要求各种感觉器官参与感受，把所感受的东西加以运用和加工。我们就会不只是培养听力和发展言语器官，而且还有两眼和双手。需要训练的也不只是听力和视力，而且还有肌肉感觉。图画课改革了，我国学校开设了手工劳动，教学生学习使用工具和材料，成立了校办工厂。人们期待这种革新能使智育和体育结合起来。人们同时把这看作是教学法的结合，看作观察、加工和表现能力的结合，看作从精神上、身体上对整个教育工作进行的组织；最后，看成是抽象素养和具体素养的结合。”（《1912年在柏林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的报告》Bericht über die deutsche Lehrerversammlung zu Berlin, 1912, 第38—41页）

在上面所摘引的这段话里，报告人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工业生活的新要求怎样动摇了旧的读书学校的整个基石。学校的全部生活方式必须重新改造。把手工劳动包括到教学大纲中去是与改革整个旧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手工劳动是发展儿童个性的一种手段，是显示儿童的创造愿望的场所，是一种教育方法，是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德国近年来教育改革运动的优秀代表人物就是这样来理解手工劳动的。

上面指出的恩·维柏尔的几项原则，在美国国民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在美国，教育学的一个新学科——目的在于科学地研究儿童本性的实验心理学——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

实验心理学对儿童的精神能力进行科学的研究。借助于各种试验和仪器来测量各种知觉的力量和速度，测量记忆的能力和保持的时间等等，这样就能够得到有关儿童能力、甚至儿童发展水平的客观材料。实验教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属于精密学科之列的，

一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但它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其教学方法还未准确形成，而且由于各种教育学上的偏见，这门学科里有很多东西只是在表面上才具有科学的性质。然而即使在目前，它也已显示出了光辉的远景。它使我们能够研究各种条件对精神能力发展的影响，确定其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已经研究了疲倦对注意力、记忆力和意志的影响；兴趣对集中注意力和加强记忆力的影响，对努力程度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②制定了一些原则，美国的学校就是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

杜威得出了下列结论：

儿童的个性是有机体的一定力量和本能总和的产物，这种力量和本能是力图按照某些冲动而行动的儿童之所以发生这些冲动的原由。这种力量和本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纳入正轨，但不能加以压抑。儿童对某一事物或活动发生兴趣，这说明这一事物或活动有使儿童感兴趣的地方，说明有某种东西能满足他的正在发育的有机体的一定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儿童就会感到满意；当儿童从事他所喜欢和感兴趣的工作时，他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的积极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有机体不需要外界的强制就能加强起来，由于从事感兴趣的工作，儿童的精神力量就能得到发展。教师在研究了儿童的个性和兴趣之后，就可以经常去培养这种兴趣，把它加以发展、深化和改造。如果能照顾到儿童的个性，就能取得巨大的成果。反之，要是压抑儿童的个性，强迫他去做他心里不喜欢去做的事情，就会分散注意力，使儿童疲倦，减低有机体的积极性，削弱意志力。

诚然，夸美纽斯早在十七世纪就曾说过，教学工作应该个别进行，但是，第一，长期以来对个性的理解都不肯定，后来到了资本主义世纪，大部分居民成了机器的简单附属品，工人同商品一样，于是对人的发展和人的个性就很少注意了。如果对成人的个性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那就很难指望去注意儿童个性的发展。

此外，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需要有很多原则，而要比充分地实现这些原则，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正因为如此，这些原则在美国学校很快就实行了，而在德国学校实行起来就要困难得多。在美国学校里，富贵人家的子弟和普通工人的子弟在一起学习。在德国，学校具有较大的等级的、阶级的性质，——德国有所谓“国民”学校，进这种学校学习的都是劳动阶级的子弟；另外还有中等学校（它不是国民学校的继续，它的低年级与国民学校是平行的），这种学校是为有钱人的子弟开设的，它的宗旨与国民学校不同，——培养“治人”的人。所以当国民学校一般还继续建立在强迫纪律和呆读死记的原则上的时候，中等学校已经采用了美国学校的原则。当然，也并非全都如此。德国和法国大多数学校继续追求着从前的目的——通过教科书培养如巴乌里辛^⑤所说的“唯命是从的官吏的美德”，但是在欧洲各地已经为有钱人的子弟设立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是为那些需要有独立精神和首倡精神的地方培养学生的。英国的“新”学校，阿波特斯霍姆学校^⑥是欧洲大陆上很多这类学校的典范，在它们的大纲中曾直言不讳地说，学校的学生以后可以在英国殖民地上获得显要的地位。在什图加特市郊的一位“新”学校的校长卡普弗曾经很详细地说明了这种“新”学校（在德国叫做Landerziehungsheime农村寄宿学校）究竟是为谁设立的。

卡普弗说：“‘新’学校一般说来是培养能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的。根本没有适合工业领导人物（Captains of industry）子弟的并且能给予他们必要训练的中等学校。我们的劳动学校对于未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次我们要指出这一事实，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在最近创立了许多新的职业，这种职业完全适合于受过教育的人的子弟”。（卡普弗著：《学校》（Die Erziehungsschule），Kapff，第69页）

“对于那些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建设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世界上是有广阔的天地的，同时还不包括医生、教授、人类

灵魂工作者的学术职业，更不用说技术性的职业。当然，年轻的德国商人和银行要员遍布于世界各地，汉萨同盟年轻的盟员可以通过自己的亲戚获得优厚的地位，他们很关心用必要的人员补充到落后的空白地区去。但是能使自己获得一定地位的生产职业的种类还不够吗？例如，在目前空前繁荣的阿根廷有很多广阔的土地，这些土地以前都当牧场用，现在却成了耕地，那里完全有条件产生像北美大草原上的农场主阶层，我们的家长知不知道这种情况呢？而且就在欧洲也还有很多地方可供移民之用。于是有经验的人说，如果一些有进取心的、拥有资本的农场主在那里开办一些美国式的果树农场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依斯特利亚半岛变为小加利福尼亚”。

“……在上层分子的子弟的面前（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也一样）摆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到别的国家去做德国工商业和德国科学的开路先锋。至今为止没有培养这种人材的相应的中等学校。设立农村寄宿学校的目的就是为填补这个空白”。（同前书，第71页）

所以说，新学校的目的就是满足国家对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有首倡精神的高等公务员的需要，满足资产阶级对工业企业能干的领导者的需要。迅速发展着的帝国主义需要这种选拔出来的人物。

新学校的目的决定了它的全部精神。目前新学校已经非常多。1899年雷迪博士在英国艾博茨霍姆创办了第一所这种学校，后来在英国的别达尔又设立了一所。根据狄摩林^①的倡议，1899年在法国的“石头”城也设立了一所与艾博茨霍姆的学校相同的“新”学校。这种学校在法国已超过六所。艾博茨霍姆学校过去的教员利茨博士在德国也设立了同一类型的学校，时间比法国早一年。现在他已经设立了三所这样的学校。在瑞士和奥地利也设立了几个同样类型的学校。

“新”学校是一种寄宿学校。每年收学费1,500—2,000法郎。

这些学校一般都远离城市，设在郊外风景如画的领地里。设备完善舒适，有浴池、电灯、学生单身宿舍、阅览室等等。描写这种“新”学校的书籍印满了照片，这些照片显示出这些学校的设备富丽堂皇、舒适方便。

它非常注意体育。豪华的通风设备，晨间的淋浴和擦澡、体操、运动、游戏，富有营养的食物，合身的衣裳，长时间安静的睡眠——这一切都是为了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体操中包括在户外小型工厂进行体力劳动。种花、种菜、割干草、修亭子和鸽舍、做船篷——所有这些都对体力发展都非常有益。儿童在这种“新”学校里健康地成长着。

它对脑力发展也特别重视。没有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学生的独立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教学中特别注意学生的兴趣，满足学生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要求。外表纪律和强制现象根本不存在。学校的整个制度照顾到所有的儿童，可以促进儿童的个性全面发展。安排得很合理的共同工作使学生学会了和别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学校的自治使学生养成了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

与一般中学相比，这种“新”学校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这并非工人阶级理想的学校。这种学校就其目的和它整个的性质来说像是个慈善机关。“新”学校生活的性质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农村寄宿中学的温室的气氛可能是一种沉闷的中学的气氛或者是资产阶级家庭的毫无意义的往往是腐化的气氛，但是这种寄宿学校即使组织得很好也仍然是寄宿学校，也就是说它使学生与现实生活隔离，缩小了学生的社会印象和感受的范围。

体力劳动在农村寄宿学校的作用被缩小到只具有纯粹教育学和卫生学的目的：增强健康，发展机敏性和求知欲。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卢梭对体力劳动所具有的作用的见解。他认为体力劳动是必须完成的社会义务。它可以培养一般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使学生通过可能的体力劳动获得生存的资料。它是了解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和了解人们相互关系的工具。它是判断社会制

度是否公平合理的工具。

“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是要培养成从事“高级知识职业的人”的，他们将不靠体力劳动生活，这一点教师和学生都了解，因此他们对待劳动就像对待游戏和运动一样。它也很不重视通过向学生介绍各生产部门的情况，来使学生了解整个社会生产。农村寄宿学校的宗旨不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由于脱离生活，学生就不能真正地研究各种社会关系。卢梭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木匠的手艺，而且要和木匠、农民生活在一起。在“新”学校里却不学这些。“新”学校并不把判断现存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教给学生，而且说老实话，这些Captain of industry（工业领导人）也乐于没有这种标准。

裴斯泰洛齐、欧文、贝勒斯、拉瓦锡等人希望儿童从幼年时期就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使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在温室中长大的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也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种菜、种花、修鸽舍等等。但是这里完全谈不上他们是通过劳动来补偿自己的费用，他们所花费的2,000法郎是由他们的父母支付的。他们很了解这一点。他们种了一些菜卖给寄宿学校的厨子，这不能培养他们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团结感情，而认真地参加生产劳动却是可以培养这种感情的。

总而言之，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农村寄宿学校在很多方面是组织得合理的，但是就这种学校的目的和精神来看，它只是满足资产阶级中某些人的特殊要求的学校。工人阶级利用他们的教育经验，但是要按照另外的方法来创办自己的学校。

必须使儿童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这种新思想欧洲的小学很难接受，读书学校的制度是要培养学生一定的思想方法和一定的感情，它扼杀学生的个性，要学生非常顺从，麻痹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一些知名之士所称颂的正是读书学校的这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最新发展的技术又迫切需要具有自己“面貌”的工人，这种工人不仅能够根据指示去进行工作，而且能在劳动中表

现自己的首倡精神，把“我”放到劳动里去。

这种矛盾在德国特别尖锐。长期以来，那里的人们都在寻求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企图保留旧的学校制度，而只是把个别手工业的教学当成一门特殊课程列入学习里面去。在法国也进行过这种尝试，但是效果极坏（见萨瓦著：《瑞士的学徒制》(L'apprentissage en Suisse)，第58页)。在德国，曾经在小学进行过职业教育，但受到了德国教师的坚决反对。1857年在美茵河上的法兰克福，1882年在卡塞尔，1889年在阿乌格斯堡，最后，1900年在科隆，德国的教师都坚决反对国民学校在教学计划中列入手工劳动课。儿童将来要花很多时间进行体力劳动，不能从普通教育中分出一些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因为普通教育的时间也很不够。这就是当时的主要的借口，虽然这里还牵涉到不愿意把学校的权利和影响让给师傅、技师这些行业的专家的问题，并且还由于把体力劳动看做一种“低下”的事，进行体力劳动就会有失学校的尊严。由于所谈的是进行纯粹职业教育的问题，因此，教师的意见是正确的。狭隘职业教育仍然具有读书的性质，这样提出问题就确实是为了培养纯粹的技术技巧而缩小普通教育的范围。现已遐迩闻名的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凯兴斯泰纳在1889年谈到手工的教育意义时，受到了普遍的嘲笑。但是23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提高工人的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水平，使他们在发展上接近美国工人的水平，这已经成了德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于是就在德国学校内部引起了震动，对教学方法重新进行了审查等等，这种情况在上面所引的恩斯特·维柏尔的文章中已经谈到了。为了对学校进行一般的改革，就必须把手工劳动当作一种教学方法，当作深入进行普通教育的一种方法。个别教师开始在学校里进行手工劳动，这种劳动由于安排得很妥贴，因而就为发挥儿童的创造精神提供了广阔的园地。怎样进行手工劳动才能使它具有普通教育的意义，对这个问题德国教师花了不少工夫来研究。他们的经验加上美国学校有关的经验，为劳动学校的设立

奠定了合法的地位。

凯兴斯泰纳被任命为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是时代的旗帜。诚然，凯兴斯泰纳没有引起巴伐利亚政府的戒心，他完全没有任何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对资产阶级国家非常崇拜，异常坚决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使自己的教育活动吻合这种利益。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精通最新的教学方法，曾经到法国、瑞士、奥地利去考察职业教育情况。但是他希望建立新学校。他想建立一种用新方法达到旧目的的学校。紧闭的活门稍为打开了一点，学生的个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他把学生的主动性看作一种手段，用以更好地掌握学生注意力，取得学生信任，从而使他们更能接受自己的影响。新教学法在凯兴斯泰纳手里只不过是根据对儿童个性的了解而构成的更完善的工具而已。这种工具可以影响他们的感情和世界观，给他们灌输有关的道德和思想，必须把儿童的主动性纳入一定的轨道，唤起儿童对技术、对手工劳动的兴趣，把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上面。同时，这还会使他们不去注意伤脑筋的政治问题，而又给大工业提供必需的有知识的、有首创精神的工人。

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末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附：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

素材摘要

手工劳动，十八世纪末叶伟大的 教育思想家对手工劳动的理解

我们对读书学校一向习惯于使之只追求一个目的，即向学生灌输一定数量的知识，而当我们想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来建设学校时，当我们想使教学工作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时，我们还以为这是一种新的发现，是当今教育思想的一大成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十八世纪末叶就已非常完整地提出了儿童全面发展的问題，与此问题相联系，又提出了体力劳动及其在教育工作中的作用问题。而且不只是进行理论探讨，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欧文都力图在自己的学校里实际地实行自己的主张。裴斯泰洛齐在新庄，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欧文在纽兰纳克都力图在实践中把劳动作为教育的基础。

这种思想和试验所经历的命运异常奇特。同时代的人称颂他们，参观者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到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和欧文所办的学校来参观，打算以后能在自己的故土兴办这类学校。然而直到不久以前，这些思想却被抛向九霄云外，而要想根据十九世纪所写的教育著作对它们加以评价，则将一无所获。一些知名的教育家力图从另一角度来评价这些国民教育活动家的功绩，说他们的实验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力图证明提出这些主张的人

的思想是不切合实际的。只有读了卢梭、裴斯泰洛齐和欧文等人的原著之后，你才会发现他们对体力劳动的问题提得多么深刻。

十八世纪末叶是英国、法国、瑞士生活中的批判时代。新的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动摇了旧的封建制度基础。生活已沿着新的轨道前进，多年习以为常的尺度已完全不适应经济、家庭和法权关系的新形势。这种形势要求社会关系的新形式。

大工业与旧的行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法令规章有了矛盾；封建领主所实行的司法权在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下成了一种可怕的暴行；过去谁也不曾提起过什么人民群众——他们自生自灭，有如田野之草芥；而现在他们却开始引人瞩目，他们的贫困无知使大家为之关注。“人民”一词常见于日常谈话之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必须使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问题，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教育的问题。从前，学校只是为上层和中层人士的子弟开设的，为下层人物的子弟开设学校只是极个别的情况，而且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

国民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它得到了广泛而热情的讨论并且牵涉到人民福利和国家法令的一般问题。

民主主义者卢梭、民粹主义者裴斯泰洛齐和工人之友欧文，从民主主义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国民教育问题。因此，他们把生产劳动作为自己教育体系的基础。

但是，国民教育的命运不取决于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取决于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他们把国民学校视为使人民群众听命于政府当局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需要一批既能干活、又很听话的工人，他们会读、写、算，同时充满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他们不要求工人具备任何一点首倡探求精神和独立精神，甚至不要求他们具备体力和灵巧性。那时是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人只不过是机器的一个附件，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完成机械的、单一的动作。

国民教育工作正是根据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安排的：大量的机械教学，完全忽视儿童的个性，毫不注意培养儿童的劳动能力。贝尔和兰喀斯特式的学校就是后来的“国民”学校的雏型。为了节省教育经费，一个教师要教500人，700人，甚至1000人。学生们聚集在一个大礼堂里，根据铃声，按编队进行互教互学的教学活动。极其严格的分工，极其死板的训练，有如地地道道的工场。贝尔和兰喀斯特式的学校在当时最大的工业国——英国和法国盛行一时。

这部学校机器靠盲目服从的纪律来维持，因而千方百计地树立这种纪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影响范围扩大了，教学大纲的内容也有了补充。工人和农民成了选民，人数很多，不容忽视。因而要更好地控制学生的精神世界，扩大影响范围。教学大纲的内容扩充了，但教学方法却依然如故。读书学校由此应运而生。官方教育家的心目中只有上级指出的道路而无其他。一切都四平八稳。义务教育的普及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能。

但是近来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工业所需要的人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前，占主体的是没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求于他们的只是准确地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而现在，至少是在如美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却要求工人有首倡精神、独立精神，能适应一切新的发明。他不仅要能够看懂工厂的内部规章制度，会写自己的名字，他还应具备一般的劳动技能和综合技术的素养。现在的工业已不能由没受过教育的工人来掌握了，只有受过教育而又有首倡精神、独立精神的工人才能驾驭它。

美国和德国国民学校的发展方向是由读书学校变成劳动学校，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工业发展所使然。慕尼黑国民学校的校长并非一个民主主义者，不过他在改革国民学校的工作中是很有建树的。

但是，这方面的教育改革却孕育着一种重大的后果。一般劳

动能力的发展离不开总的发展。而总的全面发展要求采用崭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要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个性和增强他的积极性。这种教学方法是与外表的强制格格不入的,它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

资产阶级现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工业迫切需要全面发展的、有首倡精神的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却不指望工人能独立思考和行动。于是就出现了资产阶级难以消除的矛盾。

生产要求的那种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解放,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只有民主制度掌握了国民教育工作之后,才能把国民学校由奴役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因此,当代的民主制度必须充分认识学校所应追求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学习国民学校的历史,包括学习十八世纪末叶教育家的思想和经验,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解决上述的问题。

让·雅克·卢梭

卢梭没有直接写一些有关国民学校的文章。1761年出版的他的名著《爱弥儿》,只是一般地谈了人的教育问题。他所塑造的爱弥儿这一教育对象属于富有者阶层。卢梭写道:“穷人不需要教育;他所受的教育受他的等级地位所制约,这种教育是强制的;他不可能受别的教育。相反,富人由于其等级地位而受的那种教育,无论对他自己抑对社会都无多大补益。此外,教育穷人去过富裕生活,不如教育富人安于贫困更为明智,因为我们计算这两个阶层的人数时,发现潦倒落魄者多于发财致富者。因此,我们选择了富人。我们坚信,培养一个人就够了,因为穷人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穷人可以从必须参加的劳动中受到教育,可以从生活中受到教育。卢梭当然不想说穷人的子弟无权受教育,他从富裕阶层选择自己的教育对象,把这个对象放在这样一个条件下,

即：如何最有效地教育一个人。实际上，爱弥儿所摆的位置已超越了任何阶层或阶级，超越了家庭，超越了社会环境。

卢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他的思想。他达到了这一目的。他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裴斯泰洛齐在《天鹄之歌》中写下了他读《爱弥儿》的印象：“当他的《爱弥儿》一书问世时，我的极不切实际的思想、流于幻想的思想在这本同样不切实际的、流于幻想的著作的影响下，变得狂热起来。我把自己在家里、在母亲那里受到的教育，以及后来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与卢梭给爱弥儿的教育以及对爱弥儿的要求加以比较。家庭教育以及各处、各阶层的社会教育无疑对我是一种损害。我觉得，只有在卢梭所阐述的思想中才能找到摆脱现行教育的困境。卢梭理想化了的自由制度更加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使我去寻求有益于人民的、广阔而有效的活动场所。”

* * *

劳动学校对民主制度有利；当学校符合民主制度的利益时，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后来，当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时，这个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到了最近，由于竞争和技术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资产阶级才把劳动学校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 * *

……美国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注意学生的个性，尊重他们的个性。在美国，学校是为学生而开办的，而不是为了学校才去招学生。学生的兴趣、爱好得到照顾。美国学校里有一段特别的时间，学生可以学习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学生可以不要教师的帮助而独立活动。学生们不仅有权独立工作，而且有权独立思考。学校和老师就是这样教他们的。

学校还培养他们参加社会生活。最好的培养就是实践。“学校共和国”就是这种实践。学校自治的主要意义，以及在美国为

数众多的儿童俱乐部、各种活动小组和团体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可以培养适应社会组织的能力，使学生善于服从整体的意志，服从内在的纪律，而没有这种内在纪律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任何外部的学校纪律都不可能代替这种内在纪律）。外部的纪律产生于对强力和权威的服从，而内在的纪律却源于认识到必要性之后的自觉服从。比较早地参加儿童所能接受的社会生活，可以培养他们了解人的能力，使他们学会不是根据言谈而是根据行动去判断一个人，学会影响人。

美国学校盛行的各种社会游戏，也有助于达到“学校共和国”所要达到的目的。

美国学校为儿童的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激发了他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方面的积极性，为他们的社会本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它就完全把儿童抓住了，对儿童的影响要比读书学校大得多，因为儿童到读书学校去是奉命行事，读书学校不是发展而是扼杀他的个性。

美国学校并非完满无缺。不应忘记，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已达白热化的程度，阶级纷争极其尖锐，有时还采取了极其激烈的形式。凡此种种，肯定会对学校有很大影响。美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无疑打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向青年一代灌输的观点往往与工人民主制度的观点很少一致之处，但是美国国民学校的形式却是现有各种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它以最恰当的方式发展儿童的自然力量，以最恰当的方式培养他们参加劳动、走向生活。它最灵活、最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要求。

* * *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事业与全体人民的事业视为一体。资产阶级优秀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不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是为整个人类的利益而斗争。法国革命倡导

“人权”。许多革命活动家开始用广泛的民主观点看问题，孔多塞就是其中的一个。诚然，他的观点当时未被理解，他备受迫害，终于献出了生命。这是不难理解的。已经掌权的资产阶级想充分运用这一权力，它预感到，学校将成为它手上的强大统治工具，而孔多塞为了……科学的独立性却力图使学校摆脱国家的控制。不难理解，他的主张对资产阶级说来就是一种大逆不道之举。但是，资产阶级之所以反对他，并非由于他反动，恰恰相反，他受到民主制度的关注。下面我们详细探讨一下孔多塞的思想。

立法会议成立了一个国民教育特别委员会，它责成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小组制定有关组织国民教育工作的法令草案。1791年4月，由孔多塞起草的这个法令草案业已脱手，孔多塞写了一个说明。立法会议没有来得及讨论这个法令草案，这个草案后来是国民公会(1792年9月20日召开)讨论的，但未获通过。国民公会通过了另一个不太民主的国民教育法令草案。国民公会否定了孔多塞的法令草案，其主要原因在于，孔多塞不仅要求学校脱离教会，而且要求脱离国家。

孔多塞说：“由于任何教育的基本条件在于传授真理，因而社会权力用以达到此目的的学校就应该尽可能不受任何政权的控制，但由于这种独立性又不可能是绝对的，因此从上述原因中就得出如下结论，学校只应听命于人民代表会议，这是因为在一切国家权力中(由于一切变革主要来自政权机关)，这个权力机关最少腐败气息，最不唯私人利益行事，最易接受有教养的人的舆论影响，因而它最少敌视进步、教育，最少反对由这种进步引起的各种改进。”

孔多塞计划成立一个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教师、科学与艺术人士的组织。这个组织分为几个层次。第四层是中学。在那里充分讲授各门科学。那里培养科学者，也应该培养科学家。“最后，最高一级的教育单位就是‘全国科学和艺术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监督各个教育机构，管理这些机构，改进科学和艺术工作，它

应该收集、奖励、运用和推广各种有益的发明……”

每级选出一个管理机构，负责监督下一级的机构。遇有重大问题，概由教授或教师大会解决。

区级研究院提出国民教师名单。学校所在区的各家庭的家长大会从教师候选人中推举出教师。除了现有的教育团体和机构之外，还可以组织其他的教育团体和学校。

“教育独立于任何政权之外，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惊恐，因为任何滥用职权的行为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弹劾，司法机关的权力可以直接施于整个教育制度。而自由的教育机构和自由的学术团体可以提出意见对上述滥用职权的行为进行干预。教育的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人权……’的一部分。每个政权都有权对人说：‘哪些是您应知道的，哪些是您不能超越的界限。’任何政权都可以根据某种权利确定哪是真理，哪是谬误。一个政权不许你讲授违背现行制度的意见，这样就可以直接扼杀思想的自由。”

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认为，要求教育机构脱离政权是一种反对刚刚成立的共和国的罪行，是蓄意成立国中之国。孔多塞的支持者杜鲁^①捍卫这一观点，他的论据是，孔多塞似乎是想用自己的方案来捍卫社会教育免受君主政体危险的干涉。孔多塞这位君王之敌是要从教师中选出一些人来组成一个自治的公会，他是想在社会权力机关的天平上投下一个法码来与王权相抗衡。杜鲁这样说的目的是捍卫孔多塞的主张，却抹煞了他的基本思想。当然，孔多塞是君王之敌，他是国民公会会员，“山岳派”^②的支持者，但他却十分明确地说过，他的本意是使科学和教育不从属于任何政权，不仅是君主政权，也包括民主政权。他希望学校不为旁的目的服务，不要成为某人手中的工具；学校要为真理服务，而不为政治利益服务。他主张学校完全脱离宗教，实行免费教育，而且一切教育机构都如此。与此同时，他反对义务教育。学校和科学不应该束缚任何人。

孔多塞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不懂得资本主义社

会阶级利益的斗争，他完全没有看到实行各级免费教育，在赤贫阶级的青年不干活就无法生活的情况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干活就是把自己全部的劳动力出卖给雇主），这种各级免费教育只能变成富人从国家得到一笔费用即用人民的钱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孔多塞反对义务教育，他没有看到，义务教育是对儿童权利的保障，是对青年一代享受社会教育权利的保障，是使他们不受家长和雇主剥削，不受家长滥用其权力的保障。

但是，当时要看到这一点是有困难的。

孔多塞的命运令人痛心地看着，一旦言论自由危及统治者的威望时，它就要用暴力来镇压这种自由。孔多塞由于写了《根据新宪法草案致法国公民》一书而被政府下令逮捕。孔多塞只好隐居起来。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为《人类精神的历史发展略图》，他在这本著作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即：社会艺术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际上实现平等。1794年Germinal[®] 7日，他在市郊一家小酒馆被捕。他毫不怀疑，等待他的是断头台，两天之后他服毒身亡。世界失去了孔多塞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失去了一位忠诚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主义者。

孔多塞并不孤立。热伯特·洛姆这位以前曾多次在国民公会教育委员会发表演说的人，也要求让教师能自由传授真理并保证教师不受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他们从事此项工作。他在第一次演说时讲了一个问题：“进行社会教育能否不受行政机关干预？”他的回答是：

“暴政使人民备受苦难，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并按统治者的所好来管理学校。这种苦难使自由之友渴望千方百计地保证社会教育的有效性和纯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最有效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使教学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的约束，不受任何政权的约束。

政权部门任何时候都不应按自己的需要来左右舆论。要注意

加强政权的威力，让它掌握舆论这一强大的武器。

教学的独立性是一种自然权利：它是完善人的全部能力的一种权利，从而也是完善一切社会机关的一种权利。它是社会理性的一种权利。”

孔多塞、洛姆的呼声，在当时只是一种旷野的呼唤，无人应对。

* * *

孔多塞奋力提出的教学必须摆脱行政约束的思想未获国民公会理解。1793年7月13日，在罗伯斯比尔的影响下，通过了雷佩尔提的草案。雷佩尔提认为，儿童是国家即共和国的特别财富，家长对儿童的权利逊于国家对儿童的权利。雷佩尔提在他的草案中写道：“规定全体儿童不分男女（女孩从5岁到11岁，男孩从5岁到12岁）都合校学习，由国家负担费用，享受六年或七年同等教育。

要求全体儿童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要把儿童培养成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一切组成共和国的东西，都应具有共和国的模型。”儿童将要学习读、写、算，学习“自然道德”，家政。学校里要进行手工劳动，儿童要学习种地。必须进行体力劳动。如果校内没有耕地，就让儿童们去修路。儿童受教育和穿衣吃饭都不收钱，经费由富裕的家长支付和由劳动得来，不足之数由国家垫付。每一个学校应设立家长委员会，负责监督学校的教学工作。

另一个雅各宾党人圣—优斯特也持有雷佩尔提的这种观点，他在《共和机构》一书中发挥了这种思想。

当代大多数教育家都认为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的观点有如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然而，如果摈弃一些可笑的细节（诸如穿同样衣服，修路铺道等等），那么他们的基本思想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青年进行共同的劳动教育，保证青年一代有健康的伙食和健康的生活条

件。限制家长剥削自己孩子的劳动的权利，以及限制家长在对他有利益时就不让孩子上学的权利。

这怎么可以说是空中楼阁呢？恰恰相反，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的某些思想萌芽已经得到实现：工厂法和义务教育限制了家长的“权利”，免费义务教育使儿童的社会教育开始进行；摆在目前日程上的劳动学校对青年的劳动教育表示出关心；学校里设置了浴池，供给学生衣服和伙食（遗憾的是，供应伙食的事情还很少见），这些都为搞好儿童的健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雷佩尔提思想中的荒诞不经之处不在此，而在他对国家的信赖。他全然不理解孔多塞所预感的东西，不理解孔多塞想在什么方面保护广大群众，即：已经诞生的共和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奋力追求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条文上的平等，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可能实行实际的平等……而由于雷佩尔提把已经诞生的共和国理想化了，他就放心大胆地把青年的教育交到了国家的手上，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人对此也毫无顾虑，因而通过了雷佩尔提的法令草案。

但是这法草案未能实行。雷佩尔提的计划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机构（这个机构是完全违背国内经济生活的总趋向的），它过于“民主化”，过于“共产化”……无力实现这一计划。三个月之后，国民公会撤消了它所通过的这一法令草案……

1794年11月17日（共和国3年2月④29日）通过了一个新的国民教育法案（拉卡纳尔），这个法案既未体现孔多塞不愿使国民学校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精神，也未体现雷佩尔提的精神及其关于平等的民主思想。

决定每千个居民设置一所学校，实行男女分校，教儿童学习读和写，学习《人权宣言》和宪法；教他们学习法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言、四则运算；学习主要的自然现象和自然产品，学习共和国道德的起码准则；还要让孩子们学习英雄事迹和胜利歌曲。

不去学习伟大的改革，而是让孩子们掌握共和国道德的原则和会唱胜利歌曲……资产阶级通过国立国民学校留下的只是按自己的需要形成人民群众的智慧这一权利。大家知道，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



谈到孔多塞，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民主主义者——美国的社会活动家霍勒斯·曼恩^⑤。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反对奴隶制度，用于敷设一条宽广的轨道，使美国的国民教育从此以后循此向前发展。目前，美国的学校已使欧洲人叹为观止。它赖以建立的原则是曼恩最初开始实行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教育的充分自由。

1837年4月20日，霍勒斯·曼恩以麻萨诸塞州参议院议长的身份，签署了成立教育局的法令。教育局的任务是使国民教育工作具有统一的精神，大力促进教育的发展，等等。但这种促进工作纯粹是思想上的，曼恩对教育局的任务有明确的认识，他不让教育局掌握任何权力。教育局不能“下达命令”、“签发文件”，它只能讨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曼恩认为，要想使学校成为解放的工具而不是奴役的工具，学校就应该由人民来掌管，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满足人民的需要，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曼恩受命担任过教育局的秘书，他以自己的活动作出了应该如何工作的榜样。

孔多塞当时也持这种观点，他主张男女应受到同等的普通教育。他要求把这种教育当作一种权利，而从正义与平等的观点来看，这种权利是一切公民不分性别都应享有的。

雷佩尔提也要求对男女儿童进行普及的平等的教育，直至十一岁。

但是，远非所有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都是完全一致的。

甚至圣一优斯特这位雅各宾党人也主张，一切男孩从五岁起，为了国家和他们本身的利益，均由共和国管理，女孩的教育则由母亲负责。

但是，在这方面特别典型的是卢梭，他对爱弥儿的教育，对爱弥儿未婚妻索菲亚的教育描写都很精辟，但他的观点也极保守。他认为“妇女的教育应适合男子的要求。要使男子称心如意，对男子有利，为男子所爱。在他们年青时教育他们，在他们长大后关心他们，要帮他们出主意，给他们以安慰，使他们的生活愉快甜蜜——这就是任何时代的妇女的责任。”索菲亚从童年时起就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宗教让她学会顺从丈夫，她在母亲的照拂下外出参加舞会和节日活动，学习如何使人着迷，以便日后取悦于丈夫。索菲亚喜爱手工活儿。“她最喜爱的手工活儿就是编织花边，因为干这种活儿使人仪态无比大方，十指优美灵巧。”

卢梭是一个不妥协的反抗者，他对现行的制度和偏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在妇女问题上，他是一个典型的凡夫俗子：在他眼里，妇女是一个附属品，而不是一个公民，至多不过是丈夫观赏的一个花瓶。

这是典型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观点。直到现在，法国也少见男女合校之事。当共产国际的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波耳·罗宾^⑥在大赦之后返回法国时，巴黎市把卡普尤领地划给他管，让他在那儿办一所孤儿院，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罗宾坚决支持男女合校，因此在他的孤儿院这样做了。报纸《自由谈》(Libreparole)对罗宾大肆攻击，说他以办学为名在卡普尤开了一个“猪舍”。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巴黎市杜马屈从舆论之压力，关闭了卡普尤的孤儿院。这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到了二十世纪，历史又复重演，不过规模略小而已。社会主义者玛杰莲娜·维恩为无家可归的男儿童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名叫《社会的未来》。

她在《五年教育经验》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方针是使儿童受到最合理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以管理人的生活的自然法则为依据

的：普通的教育是与这些法则相违背的。我们教育的宗旨是为了儿童本身。我们力图培养他们健康的思维方式，发展他们的意识，锻炼他们的意志力，——总之，我们希望他们既身强力壮，又无比善良。

我们还努力教他们学会工作，不过不是让他们按惯例行事，而是发展他们个人的首倡精神。我们要培养孩子们与人共事的意愿，发扬他们的团结精神，学会协调一致地行动，我们希望他们爱好自由劳动而厌恶束缚压迫。我们不怕他们接触谬误观点，而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有独立见解的人。”该校尽管经费短缺，但是办理却很完善，孩子们和女教师结成了一个友好的大家庭。

但是当地的督学却对学校进行控告。根据1894年1月16日的法令，凡是实行男女合校的社会学校，不许设置宿舍。玛杰莲娜·维恩被处以350法郎的罚金，学校被查封，孩子们均送往公社学校学习(法国的公社学校不实行男女合校)，不过宿舍可以保留，因为如果男女孩子们不在一起学习，那么宿舍就可以理解为家庭公寓。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保障风尚之纯洁，但是，禁止男女合校而留下一座宿舍，这说明问题不在于风尚之纯洁，不在于有谁怀疑《社会的未来》有越轨的行为。问题在于男女合校不符合法国资产阶级认为妇女是附属品，妇女不过是“花瓶”的观点。而维恩的学校恰巧在这方向资产阶级进行了挑战，因而只得关闭了事。

在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男女合校在那儿已深入人心。曼恩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霍勒斯·曼恩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财产和一切能献出的东西，他反对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奴役。年青的美国则从国家方面竭力使这种思想得到贯彻、发扬并结出硕果。

曼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孔多塞的主张。他使国民教育独立于政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教育为人民利益而自由发展。

1869年8月14日，在共产国际全体大会的一次辩论会上，马

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谈到必须使国民教育摆脱国家的直接干预时，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见《Beehive》^⑦报）。

马克思观点中最新之点就在于把现代教育看作是阶级的教育，看作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组织的教育。

这一思想乃是工人民主主义的思想，不仅卢梭和裴斯泰洛齐感到格格不入，而且指望当时世界的强者来实现其计划的欧文也感到格格不入。在他们眼中，世人分为普通人和知名人，弱者和强者，穷人和富人，只此而已。他们不满意现代教育，却看不清它的阶级实质。

但是，马克思不只是认清了现代教育的实质，他还看出这种阶级实质是通过国家体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张学校与国家分离。

杨·阿姆司·夸美纽斯(1592—1670)

他的很多观点，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他属于“捷克兄弟会”（胡斯^⑧的追随者），经历了三十年的战争^⑨，足迹遍及各国。莫拉夫兄弟期待天国来到人间（一千年太平说）。夸美纽斯希望实现普遍的和平和幸福，没有禁欲主义。为此目的，他想建立统一的科学和统一的学校。把拉丁语作为世界语。反对宗教和民族歧视，反对等级学校，男女一律平等，对天才和笨伯一样施教。“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设立统一的普遍的学校。宣传最广泛的民主主义思想。赞成社会的学校，孩子在学校要学习社会；赞成自由的学校（“人人都应自由行事，反对任何暴力”——这是《大教学论》扉页的标题）。他拥护经验主义：“感觉中没有的东西，智慧里也不会有”，等等。

列宁致阿·马·高尔基

最敬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

现将我妻子所著《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挂号寄奉。

作者研究教育学已有20余年。本书既有她亲身考察所得的结果，也有关于欧美新学校的材料。您从本书各节的标题可以看出，前半部还从历史上扼要地讲了一些民主主义者的观点。这点至为重要，因为其他作者一般都是不正确地叙述或用不正确的观点叙述过去伟大民主主义者的见解。我不知道您自己能不能抽出时间并且是不是有兴趣阅读这本书。第2节和第12节可以作为范例。现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学校中的变化是根据最近几年的材料叙述的，同时还对俄国的民主主义作了很有意思的说明。

如蒙您对此书的出版能直接或间接予以协助，将不胜感激。现在俄国对此种书籍的需要确实大为增加。

致衷心的敬意和祝愿。

弗·乌里扬诺夫

W1.Uljanow. Seidenweg. 4-a Bern

写于1916年2月8日前

自伯尔尼寄彼得堡

1925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第3
卷按手稿刊印

克鲁普斯卡雅致阿·马·高尔基

最敬爱的阿列克赛·马克西姆维奇：

我想向您谈谈所奉寄的这本小册子^①。由于我常向工人群众讲述这本小册子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我总是感到他们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至今还有人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甚至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说了些什么他们似乎也知之甚少……当然，这种情况是过去那段时期造成的，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上。视野所及，都是立宪民主党和民粹分子。工人和教师们只是听他们讲起才知道这些问题，而在欧洲，由于技术飞速发达的影响，国民教育的问题已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现在正值战争时期，德国就在狂热地改造学校，使学校更能满足飞速发展的生活的要求，把学校由单纯念书的学校变为劳动学校。我国无疑很快就会把这一问题纳入日程，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我们做到这一点。与这个问题最有关系的民主力量，绝不能对此事不闻不问，毫无自觉之意。别的部门都还有传统可循，而在这一部门却很遗憾地尚无传统可言。

在奉寄的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只是讲了劳动学校这一基本问题。第二部分旨在分析民主在建立这种学校中的作用。现将这第二部分的提要寄上。第二部分或许比第一部分更有趣味一些，但第一部分乃是第二部分的必要前提。从分量、时间等方面考虑，这些部分均能独立成章。

好，就此停笔，谨致衷心的问候。

娜·克鲁斯卡雅

〔写于1915年12月14日至1916年2月
8日之间〕

自伯尔尼寄彼得格勒





十月革命后作品

1918年—1925年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

在资产阶级国家(无论是君主国抑或是共和国都一样),学校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

在这种国家里,学校的宗旨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是为了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两者的利益往往很不一致。

但是学校的宗旨决定着整个学校工作的组织、学校生活的全部制度以及学校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内容。

如果我们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那么学校的宗旨将根据学校为哪一阶层的居民服务而有所不同。

如果学校是为统治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它的宗旨就是把他们培养成会享乐和统治的人。这类学校的典型就是所谓“农村古典中学”,亦即“新式学校”。现在欧洲各国几乎都设立了这种学校,财阀和上层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受教育。农村古典中学收费昂贵。这种中学一般都设在富人的领地里,设备十分舒适,采用了最新的科学成就。儿童在这种古典中学里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他们十分自由,实行自治,受到教师的信任。一批博学多才的教师向他们揭示大自然和艺术的美妙之处,把他们引入神圣的科学之宫。这种学校特别重视身体的健康和动作的敏捷。同时尽量发展儿童的意志力,培养他们达到既定目标的顽强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管理自己与别人的能力。此外,教师还尽力为学生打下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牢固基础,并从历史学、伦理学和哲学上对这种世界观加以论述。由于农村古典中学

的儿童脱离实际生活，不了解生活中的痛苦、矛盾和斗争，因此这样做起来很容易。工人的家庭由于失业而离散，因此工人的孩子绝对不可能成为在农村寄宿学校受教育的儿童的同学。向这些儿童灌输的对私有财产的观点，不会因为他们的奶娘所讲的故事而有所动摇。他们的奶娘知道他们的要求，会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说是农村里的一件喜事就是听说附近某处一辆装茶叶的车翻了，于是所有的人都拼命去抢茶叶。童年时代的印象使他不会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如果学校是为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它的宗旨就是培养官僚政治的干部、“知识分子化”的干部，他们将会为了分得一杯羹而去帮助统治阶级统治人民。这就是大多数培养各级官吏，即培养资产阶级的有本事的奴仆的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宗旨。在这种学校里，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勤勉奋发的精神，但却压抑了学生独立思考、观察和作出结论的能力。学生所学的知识大都是一些抽象的书本知识。这种学校不教学生从事体力劳动，只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这种人唯主子之命是从，他吃统治阶级的饭，听统治阶级的话。书本上学来的科学知识脱离了生活，它使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学生不能与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是与群众格格不入。这些学校特别注意培养它们的学生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崇拜。

至于说到国民学校，资产阶级力图把无产阶级孩子的教育工作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企图对青年一代施加自己特殊的影响。因此，资产阶级也实行义务教育。

国民学校直到最近一直是读书学校。它授予学生一些起码的知识，因为对识字的群众容易统治，而对看不懂内部规章制度或政府法令的人，对既不会写自己的姓名、又不会最简单的算术的人却难于驾驭。国家在工业方面越发达，对工人和农民所要求的知识范围就越广。学校授予学生这些知识，但是这都是糖衣炮弹，因为学校传授这些知识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资产阶级的思想

意识。学校向学生灌输的是：这个资产阶级制度是上帝亲自建立的，它是最公平合理、值得称颂的制度；一些大权在握的头面人物都是优秀分子，必须绝对服从他们。在学校里，无时无刻不在教学生顺从听话、尊敬长者。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培养学生崇拜金钱权势，崇拜资产阶级教育。本族语、地理、历史课都是培养儿童最凶恶的沙文主义的工具。学校力图扼杀学生的友好团结感情。奖惩和记分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在学生之间开展比赛和“竞争”。总之，国民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资产阶级道德观点，麻痹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培养成易于统治的恭顺的奴仆。

当然，随着国家工业发展和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同，阶级学校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先进的国家里，学校比较完善，方法比较细致，教学大纲的范围比较广泛，学校的目的比较隐蔽，但是本质仍然不变。举例说，工人的子弟可以受到中等教育。我们俄国不久前还不允许“厨子的孩子”上中学。在德国，上中学虽然没有直接的阻碍，却存在间接的困难：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大纲不衔接，使小学毕业的学生在有几门课程上可以升入中学四年级，而在另几门课程上却只能升入补习学校，因此小学毕业生要想升入中学，就得多花两三年时间。在英国，由小学升入中学完全没有阻碍。相反，英国还设立了许多奖学金来资助小学里天资聪颖、顺从听话的学生升入中学和高等学校。英国的资产阶级认为：中学的目的就是培养资产阶级国家有知识的仆从。工人阶级都是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不可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脱离体力劳动的学校去学习，因此升入中学的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儿童，他们由此就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而走到国家职员这一特权阶级里去了。才华出众的人离开了工人阶级，这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人，力量削弱，无人闻问，而国家仆从的力量却加强了。他们就是这样解决升入中学的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各有千秋，而问题的实质却到处都是一样：广大居民不能升入中学，因而知识仍然是阶级的特权。

我们俄国的资产阶级经常谈起普及教育和教育改革的问题，而且不止于谈论，还为实现这种改革做了一些工作^①。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非常了解：资产阶级的学校办理得越完善，那么这种学校就越能成为更好地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如果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宗旨不改变，中学和高等学校纯知识的、脱离生活的性质不消除，在这种学校里不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那末学校的阶级性质就不可能改变。

工农政府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应该彻底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应该使全体居民能进入各级学校学习，而且不仅在口头上说，还要实际去做。只要学校的宗旨不改变，教育就将一直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权。居民所关心的是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的目标一致：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组织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采而又愉快欢乐的生活。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这种人，没有这种人就不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

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培养这种人呢？

首先，这种学校应尽一切可能搞好青年一代的身体健康。学校要使学生的伙食富有营养，保证学生睡眠充足，衣著舒适而且暖和，养成卫生习惯，能呼吸新鲜空气，积极开展体育运动。统治阶级使他们自己的子弟能享受这一切，而我们必须使全体儿童（不管他们父母的经济地位如何）也能享受这一切。夏天，学校应该迁到农村去。学校应该从儿童的幼年就开始就增强和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器官。理解的力量和多样化取决于上述器官的敏锐、完善和发展程度。一些教育学家（尤其是福禄培尔）很早以前就曾指出，必须从儿童幼年起就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听觉、视觉、肌肉感觉等训练，使这种感觉训练系统化，要给儿童以机会，让他们

去训练自己的这种外部感觉。儿童很早就想进行观察。应该教儿童学会做到这一点。玛丽亚·蒙台梭利^②的游戏体系正是通过玩具的选择(而不是口头上讲讲)来使幼童学会观察和训练自己的外部感觉的。儿童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尽量用各种方法(如动作、语言、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印象。要使儿童能够扩大表现自己所形成的形象的范围。应该给他们一些材料:做塑像的粘土,铅笔,纸张,各种建筑材料等等;要教儿童学会如何使用这些材料。用物质材料来表现所形成的形象是检查和丰富这些形象的最好手段。不管儿童的创造是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都应大力予以鼓励。艺术和语言是使人们互相亲近的有力工具,是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工具。

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都不能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和儿童的创造力。所以必须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以便把所有的孩子都吸收进来。这种幼儿园要能使每个儿童的个性都得到发展,而不应成为幼儿的兵营,让幼儿随着哨音下操,按教师的指示做动作(一个法国女工在回答儿童在母育学校里学些什么东西这一问题时说:“只是盲目的摹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子弟进的幼儿园常常成了这种兵营,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却不容许这种兵营存在。

当儿童学习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他们也关心别人的思想和感情的表达。在这一发展时期(大约是7—12岁,虽然个别人可能出入较大),儿童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别的人。在这一发展时期,儿童的摹仿力特别强,这种摹仿力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形式——再现别人的思想和感情。在这段时期,儿童的社会本能开始迅速发展,同时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了儿童注意的中心。学校应该巩固儿童觉醒了的社会本能并使之深化,让他们了解劳动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体会创造性的生产劳动的乐趣,感到自己是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是社会的有益成员。摹仿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获得各种劳动技巧,应该让

儿童获得这种技巧，教他们学会干活。特别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干的活具有集体的性质，因为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共同工作和生活的能力。通过干活，使儿童能够恰当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既不估计过高，也不估计不足。共同的劳动，与同年龄的小朋友共同游戏，通过各种形式参加劳动和成人的生活，这些都可以为形成儿童的共同伦理提供丰富的材料。

在儿童的这一发展时期，学校继续幼儿园未做完的工作，它要让儿童养成一种愿望，即直接参加为别人所需要的生产劳动。它应该授予学生共同的劳动技巧，使他们能够广泛地观察各种社会关系，使他们学会与别人一起生活，互相帮助，同甘共苦。7岁到12岁这一时期相当于儿童上小学时期。小学能让儿童学到什么呢？读、写、算的能力，掌握许多陌生的、机械地记住的思想。它不能使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它既不能给孩子们劳动材料，也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指示和时间。现代学校是读书学校，而不是劳动学校。现代学校压抑儿童的社会本能，而不能发展这种本能，毫不注意儿童的游戏，不注意他们的集体活动，不注意让他们参加劳动和成人的生活。学校使儿童脱离生活、脱离成人，缩小了他们的视野，使儿童脱离组织。它对儿童的一言一行都加以干涉。一般普及的小学当然应该具有实际的性质，应该广泛采取劳动原则并增强儿童的社会本能。

二级学校的学生正处在一个把已经获得的印象加以深化、改造、系统化的年龄时期。这是学习的时期。男女青年开始研究自己，研究社会，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在这段时期，批判性的思想表现得很突出。这是一个人的成熟时期。在这段时期让儿童获得大量的印象和事实是极为重要的。这些事实可以激发他的一定的理想，使他产生全面阐述这些事实的要求。这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特别重要的是授予学生方法，使他们掌握把已获得的知识连贯起来的要领。在这段时期，学生有某些意志薄弱的表现，学生的个性已完全形成，他的外部生活正按既定轨道进行。

在这段时期，特别重要的是让男女青年养成牢固的劳动习惯和集体生活习惯。在这段时期，创造性地表现自我有所削弱，因此应该去掌握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机器本身。

这几年的学校生活是在中学度过的，而目前中学完全不注意学生的个性，不注意必须由他们独立进行检验已获得的经验。从事生产劳动和发展社会本能在现代中学里所起的作用简直微不足道；中学里和小学里一样，占主导地位的是学习；中学也同样压抑学生的个性，呆读死记，脱离社会生活。

高等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专业人材，就其实质而言它不可能是普及的，所以此处暂不涉及。

总之，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所有这些都是总的发展阶段上的几个密切相联的环节。社会主义学校与目前学校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唯一目的是使学生得到充分而又全面的发展；它不会压抑学生的个性，而是有助于个性的形成。社会主义学校是自由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刻板的训练、机械的教育、呆读死记的风气没有容身之地。

但是，学校在帮助学生形成个性的时候，应该使他能在公益劳动中表现这种个性。因此社会主义学校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广泛地开展儿童生产劳动。现在人们常常谈起劳动教学法^⑥，但是在社会主义学校里不仅应该采用劳动教学法，而且应该组织儿童的生产劳动。社会主义者反对剥削童工，但是他们主张儿童从事力所能及的、有助于全面发展的劳动。生产劳动不仅可以把儿童培养成未来社会有益的成员，而且可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社会有益的成员。儿童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着重大教育意义的。在如何组织儿童的生产劳动上，资产阶级想出了许多花样：组织菜园劳动队，帮助生产部门做一些统计工作，帮助分送信件，为士兵缝制防寒衣。美国学生还打扫街道，制作食物，进行计算工作，鉴定产品的真伪，张贴广告，分送书籍，制造教具等等。这些组织生产劳动的经验应该加以收集补充，使之系统化而趋于完善。在这

里，各级工会组织、合作社、农村组织都应该帮助教师。这项工作很重要，完全能完成，因此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当然，组织儿童进行生产劳动的学校与目前的读书学校很少有相同之处，但它与生活 and 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里进行的儿童生产劳动与教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可以使教学有百倍的生命力，使教学更加深刻。这种学校将要培养受过全面劳动训练的人，他们能从事各种工作，操纵各种机器，适应各种生产条件。他们也能从事智力劳动，而这种劳动至今还是少数特权阶层所独占的。居民本身也应该能够从事这种劳动，这样才能从官僚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生活的主人。

社会主义学校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建立，因为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学校的原因并不在于这种学校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而在于这种学校的宗旨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学校：这种学校的宗旨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使之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非常发达的社会本能，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学校是很个别的，而且生命力不强。在这种学校里受过教育的青年，离开学校之后，就进入了这么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很快就把教育效果化为乌有。在那种把人分为贵族和平民、分为“智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社会里，青年只能选择一种劳动，因而他从事“多方面”劳动的能力就减退了。同时究竟选择哪种劳动并不取决于他本人，而是取决于他的经济地位，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贫穷的、只同工人有“关系”的人，不管他的生活情况如何，都只有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为伍。而一经进入这个队伍，他就得干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重活。在这里，他的十分鲜明的个性只不过是一种妨碍而已，使他的单调的、不自由的劳动更为沉重、更难忍受。强烈发展的社会本能只有在青年人具有一个战士的本性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其他的情况下，这种社会本能只不过是受苦受难的源泉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性

质的学校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培养出这种战士，因为战士必须在生活中受过严格的训练，而附着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只可能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只可能是一个脱离生活的机构。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机构，它至多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教育实验而已。它只能是一个私人企业，而不是一个国家企业，因为国立学校的面貌已经由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决定了，而这个阶级所提出来的学校宗旨完全不同。资产阶级在安排学校的工作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是从必须保证自己的阶级统治权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每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出发的。

只有人民政府在办学时才能兼顾个人和社会的利益。但是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理解，则要根据人民政府取得政权的时间而有所不同。如果人民政府是在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取得政权的，那么人民政府所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建立民主的学校。学校的民主化使知识也民主化起来了，并使知识不再成为统治阶级独占的财富。在美国就有这种民主化的学校，这种学校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获胜的政府所创办的。

但是，当人民政府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强大时期取得政权时，那么，它根据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就会摧毁旧时的阶级学校（这种学校的不公平令人发指）而建立符合当时要求的学校。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培养适应这一制度的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大量地浪费劳动力，是一部分人拼命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只是吃喝玩乐，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就是合理地、有计划地、最恰当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把强制的劳动变为自觉自愿的劳动。为此就需要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种人要能适应经常发生变化的生产条件，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个性特点。生产的性质不言而喻地会用这种精神去培养人，去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是，由强制的劳动转向自觉的劳动，由单调的、狭隘专业的劳动转向多方面的劳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最初非常困难(特别是在俄国这种普通教育水平非常低的不文明的国家里),而只有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青年一代才能改造整个社会。社会主义学校肩负的任务就是培养这样的未来一代。

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1917年9—10月号的《教育通报》，发表了巴·布朗斯基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教育原理刍议》^①。该文许多地方立论偏颇，有待商榷。但这篇文章却很重要，因为它提出了许多生活本身产生的问题，必须加以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新式学校的问题。作者写道：“我们到处都听到一个普遍的呼声：‘必须建立新式学校’。那么是否马上就要建立这种新式学校呢？不，不仅不必要，甚至很有害，会产生极坏的后果……如果我们眼下摧毁了旧式学校，让软弱无力、威信不高的政权拟定建立新式学校的计划，那我们能不遇到各地的消极抵制吗？能不发生对孩子们说来更为危险的罢教怠工事件吗？现在就着手建立新式学校，那无异乎策马于悬崖之缘，疾行于薄冰之上……社会各界担心，摧毁了旧式学校，得到了一份匆忙制定、考虑不周的新式学校计划，结果是什么学校也没有，这种担心是很有根据的。目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要把现行学校从官僚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诚然，许多地方未经官方许可已把旧时下达的文件废除了，但是未经官方许可的作法乃是明显的不合手续的作法。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混乱现象，必须由上面来改组旧式学校，这样可以为建立新式俄罗斯学校更好地扫清道路。而现在所必须做的事，只是对学校进行改革。否则就要使学校陷入斗争和矛盾的深渊。”

“……要建立的不是学校，而是制定一个教育计划；学校是与

人民的历史和人民的社会日常生活的现实条件有机地联系着的。学校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困难的和缓慢的过程。因而改革者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这一过程更为自然、顺利，不留下任何后遗症……我们在改革旧式学校时，要对建立新式学校的可能性充满信心。不过教师都是从前的教师，他们受旧时学校的影响很深。但是我国的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它远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现在就看我们自己是否具备了新的思想和精神？”

照作者看来，新式学校能否建立起来，对于那些真正关心我国学校命运和社会教育问题，但在伟大革命时期暂时还保留着旧思想的人来说，还是模棱两可的。任何一个具有新的思想和精神的人不可能不懂得，旧式学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它是阶级的学校，其宗旨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现在，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摆脱了奴役的地位，他们需要的学校不是培养老爷和奴仆的学校，而是培养自由的、强壮的而且能干的人的学校。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建立新式学校确非易事。最不利的是缺乏一批有经验的教师，这些教师要懂得新式学校的任务，能够与旧的教育偏见决裂并献身于培养青年一代的创造性工作。我们正在培养这样的教师，而且这一工作的进展比预期的要快，因为妨碍这项工作的官僚主义桎梏已被粉碎。这是一件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工作。现在各地已有许多新生力量投入这一工作，他们对培养自由的人这一使命充满信心。他们很快就将组织起来，工作就会热火朝天地展开。但是新酒不能盛于旧瓶之中，必须把旧式学校的一套彻底打碎。

作者担心学校会陷入斗争和矛盾的深渊。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作者为什么没有看到学校早已成了斗争的场所。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摧毁旧的学校，而在于旧的学校一直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各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进行之际，他们充分的运用了这一工具。

至于说到矛盾，那么，在根据民主原则急剧进行变革的社会

里，没有什么矛盾比旧式的阶级读书学校这一矛盾更令人不能容忍了。作者说得对，学校应该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有机地联系起来。但是，难道他没有看见我国整个生活中以及整个制度方面的根本转变，没有看到我们已取得的重大成就？难道他没有看到，要扭转历史车轮只是痴心妄想？旧式学校早已不适应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条件了。因此它注定要灭亡。

至于说到学校的改革不要造成什么“后遗症”以及这种改革的过程很缓慢云云，那么，巴·布朗斯基完全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在革命时期提倡缓慢进步，这是徒劳无益的举动。在春天来临、江河解冻之际，却来论证在春天阳光的照射下如何使解冻的过程最少“后遗症”和最为自然，这实在迂腐之谈。冰雪消融，江河早已把河面上的一切吞噬一空。

当然，作者有一点是对的：不要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一切改革都应从当前生活的实际要求出发，要立足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研究。但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普通常识，就好像说伏尔加河水流入里海一样。

尽管我们在打碎旧式学校这一问题上与作者有分歧，然而在教师必须接受居民监督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作者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对学校应由教师说了算这种提法提出了异议（这种说法在各种教师会议上时有所闻）。他认为：“学校是为了社会而由社会设置的一个社会机构。学校的立法和学校的管理应如整个国家一样，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社会政权手里。”因此，“教师可以到”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去“为自己在未来的学校立法和管理机关中谋求特别的代表权……教师并非人民代表，而是被任用的职员。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学校应该按照人民代表所体现的社会意志来建立的话，那么再来谈什么被任用的职员在人民代表机关享有特别的代表权就很荒唐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代表机关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性质，而代表权的思想就遭到了破坏。这在实际工作中就会

导致对社会意志产生许多可能的破坏。请想一想，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希望建立新式学校，但是在学校立法和管理机关却有一半的教师是由旧式学校的老爷们任命和挑选的。再设想一下另一种情况，那些掌握了教师任免大权的人物在貌似民主的代表机关里实际上是支持这一半教师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意志可言呢？”

“……但是教师的呼声是否应该听取呢？当然应该。不过不应是在这种时候听取，即：教育委员会里的五位教师代表与另外十位代表争论得最激烈的时候。瑞士某些州早已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那里社会上的教育委员会如果不事先听取当地教师的意见就无权作出决定。这是一条最正确的道路：团体的意志有权作决定，但团体必须听取教师们的意见。”

作者还对另一条基本原理即“学校应该自治”提出异议。国民教育应由国家资助。“当然，不言而喻的是，学校在经济上的依附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它在权力上的依附……让现代学校脱离社会的影响，让当代的教师与世隔绝，以此来增加现代学校的缺点，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学校利用社会的经费以实现社会的任务，并从社会得到一切人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原理，在学校正好需要与社会和生活进一步接近时，有什么必要把它囿于‘自治’的高墙之中呢？……有关中小学自治的这一陈旧的学说有一部分道理，就是教师们害怕民主像专制那样对芝麻小事都进行监督，并且随意对教师的工作加以限制……教师理所当然地对这种预防性的管制（可以说是一种检查）表示气愤。他们当然应该要求完全废除所谓的预防性的管制。但是要求‘废除任何监督’往往是做得过份了，这不过是黑暗的反动时代的事了，那时教师必须向团体的代理人打小报告，既然人民甚至要求自己选出的代表做这种事，因而不打小报告的人就是人民所不需要的人。”

“教师理所当然地对一些有关芝麻小事的文件表示气愤，因为这种文件甚至要求说出在评分之前考虑了多长时间。教师们说得

对：社会，请把任务交给我，而向我提供执行这种任务的技术时，请把我看作一个专家……。不过教师们要求完全独立，又做得过份了。这依然是黑暗的反动年代的事：教师希望自由一些。宪法规定的权利早已解决了教师关心的问题。宪法规定每个当选的代表都是独立自主的（不接受委托或命令式的委托），但是要采取某种方式报告工作；每一个被任命的职员（亦即包括教师）享受他被任命的那一等级的权利，但是为了事业的利益，该职员的活动（专长）只能受目的所决定（即所谓特别委托制度），在另一种情况下，要大致确定教学大纲的目的并在选择教学法上提供充分的自由……。我们发现，教师是被任命的职员这一点对他追求权利和自由很有妨碍……因而教师们常常谈到选举的原则就可以理解了。教师们把选举的原则理解为由教育委员会挑选新的教师。但是，这显然不是选举的原则。我们通常所谓的选举，是指居民进行的选举，亦即接受人民的委托。而教育委员会挑选新教师只不过是遴选工作人员，这有很多缺点：委员会挑选了一个人，但是并不清楚这个人在地方范围内的一点浅薄的宣传鼓动才能及其缺点将会起多大的作用。”

作者怀疑居民是否能够挑选教师（他未说明为什么他觉得这种选举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指出，在德意志和拉脱维亚地区，在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也采取了这种办法。我们是很重视由居民选举教师的，也就是说，由居民直接监督教师的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纲中一向坚持由居民直接选举官员，其中当然也包括教师在内。教师的职能至为重要，因而居民不能放弃自己直接任免青年一代教育者的权利。美国，还有瑞士的一些州都实行选举教师的办法。瑞士实行选举教师的那些州，教师的水平都高于未实行选举的州。不过需要缜密地考虑，怎样才能把这种选举组织得很好。选举教师对于居民群众关心学校工作、关心教学工作、关心各种教育学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俄国的居民目前对这些事情还很不关心，然而这却是使学校能完成自己使命的一个保证。

论废除童工问题

拙文《法律字面上的意义》(载《真理报》1918年2月5日)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有碍于禁止童工这一措施的实行,因为很多人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甚至要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这一问题。这个问题能引起注意使我感到高兴。诚然,我党党纲中已载明禁止雇用未满16岁的童工^①。但是党纲中的这一条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目前表现得特别明显。党纲中写上这一条是一种疏忽(而且表述也很不周严:把未满16岁的儿童通称之为“学龄前”儿童)。不管怎么说,这一条是与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见《禁止童工》)^②:

“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③

德国的一些教授,还有仰其鼻息的各种机会主义者,以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一正确思想为根据,力图把事情说成是社会的发展全归结为某种独立自主的机械生产过程。他们认为,人、人的意识及其斗争全是自发的,全然与别的无关。生产日益发展,小的企业逐渐组合为大的企业,而后又由大企业形成垄断,

而当这个过程发展到这一地步，即一切生产实质上成了一个组织庞大的企业时，这也就是社会主义了。当然，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就什么都一样了，就像指着一副干枯的骷髅说：“瞧，这个充满生命力的人，热情洋溢，思想开阔，爱憎分明，他为幸福和有理性的生活而奋斗不息。”

对社会发展的这种肤浅理解，与马克思的观点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技术发展的一定阶段影响着生产的形态；在生产形态的压力下，形成了一定的法和国家的准则；他们指出，经济及其一切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影响着心理和世界观。他们特别详尽地论述了大工厂的劳动条件使过去的手工业工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根本改变，培养了他们阶级团结的感情，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锻炼了他们的阶级自觉性。

马克思一贯强调，改造社会制度的动力是人。但马克思所谓的人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变化的、同样的人。他指出，在经常变化着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生活形态的影响下，人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无产者远不同于现代的无产者。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人。

我们往往忘掉了事情的这一方面而去十分机械地理解社会主义，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即经济，而完全忽略了另一面，即培养相应的人材。马克思从来没有忘记培养人材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认为对青年的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十分重视。他一向认为，并且不只一次地讲过，教育乃是改造现行制度的强大杠杆。

但是马克思究竟是怎样理解教育的呢？他认为教育的基础在于生产劳动，在于青年与工人的生活同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一致。工厂可以培养少年儿童对生活的理解力，锻炼他们的阶级自觉性，使他们充满阶级团结的感情。如果让他们脱离工厂的劳动，置身于与世隔绝的家庭的自私气氛中，或脱离生活的学

校的密不透风的高墙之中，这实际上就是为培养有用的人材这项工作设置障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坚决反对禁止童工。但是，他希望儿童的生产劳动与教学结合起来。工人需要知识，因为知识是伟大的力量，而马克思正是想用这种力量来武装青年工人。当然，马克思在谈到不想禁止童工时，他并不希望保留当时那种工厂劳动形式。当时那种形式的劳动是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纯机械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使人愚蠢。我们所指的儿童在工厂的劳动是另一种形式。例如，英国和德国一些企业是这样安排少年儿童的劳动的：每个儿童在他在工厂学徒的几年期间（这个期间他是可以得到劳动报酬的），不是从事某一种机械的工作，而是完成一系列难度越来越大的工作，同时从一个工场转到另一个工场，以熟悉整个的生产。

与此同时，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数学、物理、力学、制图、商品学、商业地理和政治经济学。对实际工作的学习与理论上的探讨紧密相联。这种工厂劳动不会使青年人愚蠢，而只会使他们不断提高。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只是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④。

也许，这句话就成了党纲中“禁止使用未满16岁的童工”的根据，而完全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不是禁止童工（这与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表述的、并在《资本论》^⑤和《日内瓦决议》^⑥中充分发展了的观点是完全矛盾的），而只是讲的现在这种形式的工厂劳动。

我们俄国正处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人们完全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把青年工人培养成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人。

在童工方面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应该采取：

- 1) 缩短少年儿童的劳动日并采取其他一些劳动保护措施；
- 2) 适当地组织少年儿童的劳动；
- 3) 尽一切努力立即在工厂为少年儿童开办学校，使教育与

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许多五金工厂未经官方许可已开始实行少年儿童六小时工作日制。

有些工厂(如艾里克松工厂)已经开始合理地安排少年儿童的劳动。

许多工厂已经开办了工厂学校，不过工作搞得很不好。应该对这些学校进行改造(在费里克斯工厂甚至已为这种新式学校制定了教学大纲)。

劳动人民委员部只消把这些试验工作加以总结，下达相应的命令即可(包括少年儿童必须上学的命令)。

教育人民委员部早在11月30日^⑦即向劳动人民委员部抄送了必要的命令。但是，这项请求未曾引起注意，因而现在匆匆忙忙把少年儿童赶出工厂，其根据则是必须禁止童工。

这是一个痛苦的误会，很可能对工人运动产生严重的影响。

职业教育的任务

革命运动翻天覆地，它把最底层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并向他们指出：专制制度使他们陷入愚昧无知的深渊。伴随着俄国革命而来的一个产物，就是广大群众对知识的渴求，不可遏止的自发的渴求。觉醒了的工人、觉醒了的农民都看到，知识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因此他们想用这种力量武装起来。他们想知道周围的动向，想弄清楚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但是他们也想知道如何建设新生活，想获得使他们成为生活主人的本事。除了渴望受到普通教育之外，他们还极其需要实用知识，职业知识。不让群众得到一般的知识是一种罪过，同样，如果不让群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也是一种罪过。在莫斯科省召开的国民教育委员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委员说，渴望获得职业知识往往是个人名利思想的表现，是想出人头地。这种论调招致了大家的反对。另一位委员对他说：“如果为了掌握生产过程以便搞好生产，成为生活的主人，这是个人名利思想表现的话，那我就举双手赞成这种个人名利思想。”

为了使工人和农民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应该怎样安排职业教育才好呢？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向那些想尽快受到职业教育的成人进行这种教育，另一个是如何向在校学生进行这种教育。

目前，校外教育问题是一个极其尖锐、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人民群众为了使生活走上正轨现在迫切需要他们还没有的那种

职业知识。

应该怎样传授这种职业知识呢？

至今为止，对工人的职业教育最为关心的是工厂主。各工业国之间的竞争迫使各国资本家不得不去关心如何使本国的工业处于高度发展的水平，如何使产品具有很高的质量。而现代经过改进的机器需要许许多多具有熟练技巧的工人去掌握，需要懂得专业的工人去掌握。所以工厂主十分关心如何培训出大量这样的工人，因为工厂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些具有专业技术的工人。英国的专业技术工人人数有限，这些工人都参加了工联。英国的经验说明，在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工人为之效力时，工厂主会作出什么样的让步。凡是资产阶级执政的各国政府，都对在国内妥善安排职业教育一事十分关心。十九世纪末叶，各发达国家的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那时起，对职业教育更加重视了。德国从1900年起，规定在工厂干活的青少年必须上补习学校，这种补习学校很快变成了职业学校。不只是国家，工厂主本人也乐于拿钱在厂内开办职业学校。甚至在我们这个工业最落后的国家，工厂主在一些先进的生产部门（主要是五金工厂）往往也出资进行职业教育。

不过，资产阶级让工人受到的职业教育都带有特殊的烙印。对于工厂主说来，工人（即使是专业技术工人）依然是“一双干活的手”。工厂主需要的是一双灵巧的手，而且只是需要这双“手”。他们所关心的正是培养这双手。他们之所以关心，是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但一点也不关心让工人懂得本工业部门发展的需要，不关心让他们获得管理生产的技能——只有工厂老板才关心管理生产，工人的责任就是好好给工厂干活。

我国现在的职业教育应该具有不同的性质，由于工人在大的生产单位既是工人，同时又是主人，所以，职业教育应该教工人既要学会干活，还要学会安排生产、监督生产以及懂得如何进行核算。工人目前需要的不是狭隘的职业教育，而是广泛的职业教育。工人不仅要会在车床上干活，而且还要知道这台车床的构造；

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种类的车床，什么车床干什么活；知道这些先进车床的产地和价格，是否值这些钱，使用起来是否合算，要纳多少税；要学会进行核算。为此，他要懂得绘图，能从事各种计算，懂得机械及其发展史，懂得商业地理。他还要懂得所加工的铁件的性能、产地和制作方法及条件，何处购入，如何购入等等。他还要知道国内外对生铁的需要情况，要知道产品销往何地，如何计算生产成本，等等。而与这一切有关的，就是要了解既是工人同时又是主人所须具备的条件，要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工人如果想成为生产的主人，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需要了解。

我国已经办起了一些工人大学^①，它既讲授狭窄的、纯技术性的专业，同时也授予工人使之能成为生产主人的广泛知识；这种知识在我们目前建设新生活的时候特别重要。校外职业教育就应该如此进行。

至于说到学龄时期的职业教育，那么这种教育不应过早开始。要在各地普遍建立质量好的普通教育学校(但不是目前这样的学校)，教给孩子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如何很好地干活的方法；教他们怎样使用各种工具，培养他们从事各种劳动的一般技巧，使他们看得准、拿得稳、动作快。在这种学校里，可以发现儿童的爱好、能力。在这种学校毕业后，他可以从事适合他的体力和能力的称心如意的劳动。这样，他就能很快、很容易地熟悉自己的职业。在一些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如德国和美国)，人们都深明此理，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合理地安排进行一般训练的劳动学校的工作。儿童们应该在普通教育学校学习八、九年(德国、瑞士和其他各国都是这么办的)，然后就学习一门专业，一种特殊的职业。这就是说，职业学校不能为年龄太小的儿童开设，把未满15、16岁的孩子送到那儿去是不妥当的。职业学校不仅应授予纯实用的技巧，而且还要让学生熟悉广义的职业，而年龄过小就做不到这一点。儿童很小就让他学习某种职业，这会摧残他的精神力量，妨碍我们去发

现和发展他的创造性才能。不言而喻，新型职业学校应该与生活紧密联系，而且一部分教学应在工厂进行，要在学生今后作为一个熟练工人所工作的环境里进行。德国、英国、美国一些著名的职业学校就是这样办的。任何学校都要与生活保持联系，职业学校更应如此。

除了培训工厂工人的技术教育之外，还必须进行手工业培训。现在往往是向某一位师傅学手艺，但是这种“教学”十有九成是把学徒当听差。进行手工教学最好在专门的手工职业学校里。不过只应该为那些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开办这种学校。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是那些具有工艺性质的手工业，它要求手工业工人有很大的创造性。目前也特别需要工艺工业学校，还有技术学校。工人们迫切需要这些学校，而且目前就需要。由于职业教育是工人的切身事业，因此在组织这项工作时应特别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

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

沙皇政府所遴选的教师，都是一些死心塌地为它效力的人。它把一些信仰社会主义的教师流放到远地，关押在监狱。社会主义者要想当上教师，只有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不暴露自己的信仰才行。当时大多数教师都不拥护社会主义。

但是，小学教师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大多数人都具有民主的思想。大部分小学教师出身于农民或工人家庭，国民学校教师与人民群众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了解得比较清楚，并且与这种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的思想也就比较接近群众。但是他们的知识不足（他们在师范学堂学到的只是一些零碎知识，而且还是虚假的），所以他们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往往缺乏主见。

社会主义的报刊没有发行到教师手里。发行到教师手里的只有政府的、黑帮分子的刊物。自由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刊物也发行到教师手里，它们给教师介绍各种新的教育思想流派，受到教师欢迎，但这些人对政府的报刊却感到愤懑。一些亲近统治阶级的中学教师，对自由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刊物更为信任。由于他们信任自由主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学校和教育工作的言论，因此他们不可能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长期戴着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来看待一切事物。正因为如此，他们推举到全俄教师联合会理事会的人，都是一些对苏维埃政权抱有某种敌意的人。这是1917年4月的事了。

随着岁月流逝，又过了很长一段时期。教师群众在生活实际中，看到了很多过去没有见过而且也不能理解的东西。因而小学教师中，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情绪已经转变；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开始在教师中播下。

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是在教师中间宣传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团体。正由于这一团体所起的这种作用，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

我们对全俄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的态度如何呢？

目前，全俄教师联合会对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同时它所依靠的人都是教师中的一些抱残守阙、顽固不化的不良分子。既然全俄教师联合会持这种立场，教育人民委员部也就不能和它有任何来往，即使是纯经济方面的来往也不行。

现在很多地方的教师联合会，对苏维埃政权所抱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全俄教师联合会。教师们开始明白过来，他们不应妨碍，而应该协助群众建设新生活，并且积极参加这种建设工作。对这些地方教师联合会，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态度也完全不同。苏维埃政权很重视教师工会，因为它深知教师的集体工作对建立新学校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苏维埃政权希望教师工会能发展壮大、日趋巩固，并且积极开展活动。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可以帮助全体教师走上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康庄大道。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就得在一般的教师工会内成立一些小组（在教师联合会内，一直存在着这种小组。例如，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在教师联合会内就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教师小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全俄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物总在唆使全体教师去反对布尔什维克教师。有些教师由于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被教师联合会开除了。这就促使苏维埃政权去保护受害者并支持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但是不应该把国际主义教师跟其他的教师对立起来，不应使他们享有与众不同的特权，因为这样反而使在教师中宣传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作增加困难，使人们不相信国际主义教师，会使他们与其他的教师疏远。如果忽视他们的教育学水平；或者把国际主义教师当作一把尺子，去衡量别的教师是否称职，去检查别的教师的政治观点如何，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会使国际主义教师组织不得人心，会把它变成一个由各种没有原则、贪图享受、为了捞取物质利益的人组成的团体。这些人就会彻底破坏国际主义教师的威信，践踏他们的主张并使之庸俗化。

应该承认，国际主义教师是懂得这一点的，并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形成一个不享有任何特权的思想团体，这个团体将在全俄教师的精神新生和精神高涨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

(1918年9月20日在无产阶级文教团体
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环境对教育人的工作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对于教育工作来说，改革社会制度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讲的只是狭义的教育，所指的是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有组织的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应该受到广泛的社会教育，为此，学校就应该成为社会的学校。工人阶级掌握统治权的思想已经深入到青年一代的心里去了。我们看到，彼得格勒的青年纷纷走到马尔索夫广场去发表演说，指出统治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说这些话的往往是一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儿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种思想是如何深入到青年一代的心里去了。

我们所谓的教育，就是指有计划地对青年一代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类型的人才。当然，随着生活的发展，教育的理想也各异，因此也可以去探索教育理想的演变过程，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内容。我只想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教育的思想已充分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家庭教育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必须指出，资产阶级是这样组织社会教育的：资产阶级认为，他们的子弟应该受一种适合于他们自己的教育，而工人阶级所受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教育。如果我们看看西欧学校的情况，那么我们会发现，那里的教育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有一些学校是为平民子弟设立的，有一些学校是为贵族子弟设立的。为广大劳动人民设立的全

部学校，都是一些培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顺从听话奴仆的教育机关。资产阶级早已知道，由于实行了普及义务教育，它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所有子弟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了。著名的教育家凯兴斯泰纳^①非常露骨地说：“重要的不是小学所传授的那些知识，而是要使这种学校培养出工人来。必须让儿童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要他能及时准确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必须让他养成善于逢迎的习惯。”这就是资产阶级学校的任务，不仅德国如此，法国、民主的瑞士也如此。在那里，学校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学校，尽管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那里的儿童学不到，可以使一个人自觉地对待周围一切真正的知识。我曾经参观过瑞士的一个学校，四年级的儿童听写时，还把字母大声地一个一个地念出来。这说明瑞士学校授予儿童的知识是多么少。

此外，授予儿童的知识并非他们真正需要的知识，而是一些毫无用处、损坏脑子的东西。例如，在自然学科方面，教给学生的是各种需要强记的鱼和蝴蝶的名称。而这些东西对儿童的发展毫无意义。结果，八年的学校教育并未使儿童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只不过使他们受到一些训练。学校不过是一种训练机关。摆在第一位的是服从原则，如果儿童不盲目服从教师，那么就要挨打。

资产阶级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儿童一定的观点。例如，我们发现，历史课上讲的是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参加这种战争的都是声威远扬的民族英雄），以培养儿童对其他民族的仇恨感情。在历史课和伦理课上都这样做，在这种课堂上，教师通过和学生谈话，竭力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观点。总之，学校的任务就是用资产阶级精神来熏染儿童。列夫·托尔斯泰有一篇小说，描写他想让一个牲口商的儿子到学校来学习的事，这个商人对他说：“我不能把我的儿子交给您，因为我得用自己的精神来陶冶他。”^②劳动人民的子弟也是这样受教育的。

资产阶级在教育自己子弟时所抱的目的完全不同。如果我们

拿最近发展的所谓农村古典中学来看，那末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学校都是根据最新科学成果建立的，设备很舒适。儿童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住在“象牙之塔”里，脱离了日常生活，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无法观察日常生活。儿童什么科学都学。那里也有劳动，不过这种劳动简直是儿戏：富豪的儿子在田里种上些白菜，长好之后就把它卖给厨子赚几个钱。美其名为教育劳动，却毫无教育意义。资产阶级创办的学校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科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完全脱节。拉萨尔^③早就指出必须把劳动与科学联系起来。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却力图使两者分离开来。劳动群众只能获得零碎的知识，而那些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人却坐在大学里和研究院里研究各种科学问题。在学校里，体力劳动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只具有某种教育学和卫生学的意义。农村寄宿中学的简章上说：“此类学校系为那些将来掌握大工商业之人而设立的。这些人或在印度某地担任行政官，或者在远方殖民地担任总督。”总之，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性格鲜明、知识扎实。但是他们全然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脱离了生活。西欧的所谓中学的宗旨就是培养官僚政治的官吏。教育家巴乌里辛说：“我国古典中学的宗旨就是培养官吏和下属。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是在特权学校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青年，而他们的执行者和管理上的助手则是一般中学的毕业生。”资产阶级各国的国民教育就是这样安排的，同时教师也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教育出来的。这些教师都经过严格的遴选，以免那些对生活具有广泛见解的教师，即社会主义的教师，进到国民学校里去。

法国政府对工团主义教师的态度非常有意思。工团主义教师^④认为，他们应与人民群众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决定，白天教工人的子弟念书，晚上应该到工人中去，与家长们一起讨论：怎样安排学校的工作才能使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知识，受到真正的教育。当工团主义的教师提出要加入劳动协会时，他们就纷纷遭到迫害。克列孟梭^⑤非常露骨地说：“你们不过是政

府官吏而已，应该传播政府想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思想。”结果，许多教师被调到偏远的地方去了，许多人被解职了。资产阶级政府害怕教师和居民打成一片。

现在，当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教育理想时，就会发现，它是与资产阶级的教育理想针锋相对的。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因为我们正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现在，这句话日益成为现实了。透过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世界社会主义的轮廓已依稀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头子们非常清楚，为了进行这场战争，必须重新组织生产。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生产已不适应战时的要求。德国把生产的组织称作“国家社会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向了有计划的安排。其他一些国家也曾想进行这种有计划的安排。德国随处可见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在大战的形势下，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俗话说：“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国家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很快就威信扫地，并且充分告诉群众，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安排，对群众的利益毫无好处，群众只不过是炮灰。这就在心理上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可能性。德国在欧洲遭到的失败有着重大的心理学上的意义。从德国来的同志们对我说，德国最近变得令人难以辨识了；那里就像我国革命前夕一样，只要军官一出现在电车上，人们就当面痛骂。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注定要失败，工人群众的愤怒情绪日益强烈。我们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培养青年能建设新制度。

目前，我国已经宣布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工作未能有计划地进行，主要是由于人民群众在心理上还没有认识到废除私有制的必要性，——私有制的本能还很强烈。为了建成新的制度，必须培养新的一代人。法国人常常说：“死人牵着活人的鼻子走”。这种垂死的制度紧缠着新生的制度，影响了新制度的发展和按照新的方式建设新生活。我

已说过，资产阶级的学校和国民学校都轻视劳动。因此，目前在教育工作上应该特别注意集体劳动。所谓进行教育，就是指要这样来安排儿童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基础是有科学根据的各种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可以把儿童培养成社会主义者。

资产阶级开办了职业学校。工厂里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所以资产阶级开办了这种职业学校。但是这种学校进行的是什么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这种学校里念了多年书而毕业了有专业技术的人，当技术进步，一些新机器出现了的时候，他们往往弄得丢了饭碗。资产阶级只让工人得到一些狭隘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受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这种教育可以使他们熟悉各个生产部门的情况）。机器完成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工作，而人不过是帮助机器干活的劳动力而已，他只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可是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机器不仅完成一些基本工作，而且也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新机器需要的工人要少些，但他们得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由于技术的进步，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人数减少了，需要更多的懂得许多专业知识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就拿排字工作为例吧，从前是人工拣字，排字工人只要识字就行了；现在使用的是排字机，排字工人不仅要识字，而且还要会使用打字机，懂得技术和电工学。排字工人需要具备所有这些新知识。

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教育问题。他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杠杆；这种综合技术教育是全面教育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学校里，我们要教的不是一个部门的劳动，而是尽力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资产阶级国家的城乡严重分离，而社会主义社会却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时，我们也应让学生熟悉农业生产情况。

我们设想这样一种学校，这种学校在夏天迁到某个农业公社去，学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开始学习农业生产；到冬天，学生就到某个工厂去从事工业生产。一级学校的低年级只学习一些生活常见的东西，多半是一些手工业的知识；而在高年级就对这一切

进行完整的研究。这里，重要的是使这种学习不变成死板的学习。

在奥地利设立了许多所谓劳动学校，这种学校实质上是在学校附设的小型工厂里授予学生各种机械的技巧。当然，在社会主义学校里是不会进行这种劳动的。应该用科学来说明这种劳动，使这种劳动能让人了解整个的生产情况，让人了解社会生活。所以说，教学与综合技术活动在这里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学校应该成为生产劳动的学校。

在资产阶级学校里，总是尽力把学生加以分化。法国著名的教育家库吉列^⑥曾说，如果不把学生分化，那么教师面临着团结一致的学生就将一事无成。因此教师应当尽力分化学生，从学生中分化一些人来，就能对付其余的学生。这种卑劣的手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当然，教师必须绝对唯命是从。在瑞士的学校里，采用了一种密告法，千方百计地激发学生的私有制的欲望。法国和德国都很盛行学校办储金局，每个学生都可以在这种储金局储蓄。这样一来，私有制的本能、竞争和学生之间的纠纷都带到学校来了。在社会主义学校里不可能有这种现象产生。社会主义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会本能，使学校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净化，使私有制本能臭不可闻。劳动要安排得能满足社会本能。发展社会本能应该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整个学校生活中。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人被指派去做一定的工作，他必须完成这一工作。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工人本身就是生活的主人，他就应该学会进行组织工作。

社会主义学校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有计划、有组织。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所以在学校里让儿童积累一定的组织经验是极其重要的。在学生的任务只是呆读死记的那种学校里，是得不到这种经验的，而在生产劳动起主要作用的学校里，却可以

获得这种组织经验。要使儿童能够亲自参加劳动的安排，因为从小养成组织工作的技巧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缺乏组织技巧，对生活进行组织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完成得很慢，而真正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去组织生产工作时，工人群众应具有这种组织技巧。

此外，劳动还具有另一种教育意义。在资产阶级学校里，一切都建立在外表纪律上，可是，参加创造性的活动，尤其是参加劳动（从事这种劳动的有很多人）可以培养内在纪律。如果违了农时，蔬菜就长不出来。在这里，事情本身就教育了儿童，使他不知疲倦，学会律己，因为这里的目很明确。由劳动活动培养起来的纪律性，就不再是外部纪律了。当然，如果一个人不守纪律，那末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可能生存下去，不过这种纪律不应该是外部纪律，而应该是一个人觉悟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发展这种内在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再者，劳动活动还可以教儿童认识自己，检验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劳动的重大教育意义还在于儿童可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在学校里往往只发展记忆力：读课文，讲述，背诵。而一个记忆力不好的儿童往往可能是个很有能力、很有才华的人。

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就是不使劳动成为单调的，使人感到疲倦的事。如果儿童能够发展自己的全部才能，他就比较容易去从事他中意的工作，也不会把它当成沉重负担。同样，劳动还可以培养许多其他优秀的品质。儿童可以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组织自己的劳动。

资本家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劳动，它要求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它把劳动力看作剥削的对象，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组织工人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也很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应该发展自己的力量，珍惜自己的力量，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来支配自己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国家，这项工作将要珍从珍惜人力的观点出发予以安排。工人阶级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具备

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当然，目前建立这种学校非常困难，因为教师（甚至工人也在内）还很不明确这种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

必须在教师中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教师要用完全不同的精神去教育儿童。他们对儿童的热爱将使他们拥护社会主义。最近一段时期，国民学校的教师越来越多地参加了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只有中学教师至今还非常敌视苏维埃政权。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

(在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在俄共党纲第12条中，曾一般地涉及到国民教育问题，着重地谈到了职业教育问题。党纲的这一节要求对未满17岁的男女孩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求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职业教育。

正如整个党纲一样，这一条也不是随便写上的，而是在全面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才写上的。因此，在它未修订之前，全体共产党员必须遵守执行。

可是，我们往往很容易忽略这一节，对它不予重视。去年冬天提出了要把经济建设问题放在首位之后，马上就暴露出一个大漏洞：我们十分缺乏具有专业技术的工人。于是职业教育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们许多同志往往离开了整个国民教育制度孤立地谈论它，却忘记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例如，在最近召开的全俄职业运动代表大会的职业教育分会上，有人就认为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统一的劳动学校和校外教育与职业教育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忽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试以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例。那里的职业教育是怎么搞的呢？在这两个国家里，要上职业学校必须至少念完了国民学

校的六年级才行。而且即使进了职业学校，学生们也还要学习普通教育课程。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因为没有普通教育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美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一些有名望的工程技术人员经常向技术学校毕业的青年介绍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强调指出，不应过高估计纯技术知识的作用，不应忘记一切技术知识的基础是数学和自然学科。要特别重视数学和自然学科的学习。

因此，德国和美国特别重视专家的普通教育水平。

但是，有些同志却说，我们不求长胖，只图活命。也许有人会说，德国和美国可以重视普通教育，培养精通本行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不能追求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应该注意培养狭隘的专家。培养这种专家所需要的时间要少得多。

目前大生产部门的工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了解一定工作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钳工、纺织工等）；照看机器、为机器干点辅助活儿的工人（例如走锭精纺机工人，他负责机器断线时接头）；最后，就是力工。

机器越不完善，就越需要多的辅助工人。

当然，美国和德国需要的辅助工人应当比我国少。为了临时教出一些这种类型的工人，让他们学到一点本事，往往有几天时间就够了；复杂一点的工作，有几个月就够了。培养这种“手艺人”（angelernten）式的工人要容易得多，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则需要两年、三年、四年时间。

如果认为只要有“手艺人”式的工人就够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类型的机器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而且，工业发展的水平越高，对专业技术工人的要求就越迫切。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就必须进行普通教育。

现在我讲讲怎样安排统一劳动学校的教学，才有利于职业教育的进行这个问题。第一，统一劳动学校要培养学生的绘图能力，即能够画图描图。这种能力对许多生产部门的工人说来都是

极重要的，在普通教育的教学工作中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数学，尤其是应用数学，应该在统一的劳动学校里占有显著的地位。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还有自然学科。但是，不言而喻，自然学科应该安排得很恰当，能把学生培养成自然科学家，让他们能充分掌握自然史的方法。物理、力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工人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统一劳动学校应该把综合技术教育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是一门新课程，既无现成的教学法，又无现成的教学大纲，然而这门课程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第三次工会代表大会职业教育分会上有人反对综合技术教育，而俄共党纲早已指出了综合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党纲提出：宁肯学少一点，但要学好；不要学很多课程，但都未学好。然而这个要求未能做到。综合技术教育指的就是从理论和实际上对国内经济进行研究。它实质上是一门课程，而且是一门极其重要的课程。

在苏维埃俄国，劳动人民要亲自建设经济生活，因此，了解和懂得本国的生产情况对他们说来是特别重要的。

如何搞好综合技术教育，在我国完全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不可能单独讨论这个问题，必须约请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认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之间的意义，找出最重要的那个部门，提出可以派遣高年级学生按一定教学大纲进行学习的企业。对几个主要的、基本的生产部门进行研究，可以使学生对经济建设的大致领域有一个理解。我重说一遍，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在我国还没有进行过讨论，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绘图能力、数学、自然学科以及国民经济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可以使学生受到严格的训练，从而把职业教育提到很高的水平。

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

资产阶级把教育变成对无产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通过学校、报刊、电影等等，资产阶级用它的精神来侵蚀无产阶级，把它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强加给无产阶级，从它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它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来对待每一个问题。

因此，十月革命前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机构是合适的，必要的。它与共产党配合一致，处处揭露资产阶级把艺术上的思想意识强加给无产阶级的内幕。

十月革命的巨变使全部政权转到了劳动人民手上。无产阶级得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建设国民教育，得以把教育领域中一切它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清除掉。

在这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可以起到巨大的、光荣的作用。它可以对整个国民教育工作的安排产生重大的影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展开全面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步入了歧途。它声称它的任务不是开展群众性的工作，而是从事无产阶级文化因素的培养工作。这是一种实验性质的活动，无产阶级通过这种活动就能够发现对待科学和艺术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在创作过程中创造新的科学和新的艺术。

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能使自己与周围的环境隔绝，它就不可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实验性质的工作。当周围的群众渴望知识，贪婪地吸取一点一滴的知识的时候，当群众创造着艺术的时

候，它就不能与群众隔绝开来，不能拒绝群众工作，而躲到树荫之下去纳凉。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变成一个进行群众工作的组织之后，就不能防止自己不受到自称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体现者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影响。

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变成了一个最普通的教育组织，无论在工作方法上，抑或在阶级组成上都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组织没有多少区别。而由于它一心想独立，想得到“无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称号，它就走上了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机构相抗衡的道路。实验室变成了一个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工厂相抗衡的工厂。这就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在省里。我不打算举这方面的例子了，因为每个人根据经验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机构十有九成不具有实验室性质。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说来能否通过实验室的途径培养某种文化因素。新文化是在与旧文化作斗争中产生的，受到一般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艺术领域为生活所创造的共产主义新文化提供了表现的机会。

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通过开办普及的训练班及其他活动，为表现这种共产主义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取得了成果。

但是，这项工作乃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一个部分，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要另搞一套，而应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一般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现在，有一些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人说：“你们搞的是资产阶级文化，我们搞的才是无产阶级文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管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抑或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都在与资产阶级文化作斗争。这里并不存在工作上的对立，而是同一工作的两个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该加入到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总的组织中来。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①的决定，目前整个有关成人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都集中到一个统一的机关——政治教育委员会去了。这项工作自然分为三个部：无产阶级工作部，农民工作部，红军工作部。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参加无产阶级工作部，并把这一工作的实验部分担当起来，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人员就显然具有更明显的阶级性了。

不管怎么说，目前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因此俄共（布）中央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最近的一次代表会议作出了如下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也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党团所接受）^②。

这个决议指出：“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相互关系的基础应该是两个机构工作上的密切配合。

教育人民委员部是文化领域中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机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创造性工作应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中央机关应积极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政治教育工作，其地位相当于该部所属的一个处，在工作中遵循俄共中央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令。

地方机关（国民教育局和政治教育委员会）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相互关系是：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国民教育局的一个科，在工作中接受省国民教育局、俄共省委的领导。中央委员会指示俄共各级党委机构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级机构进行自由的创造性工作创造条件并给予支持。”^③

我们可以预料，这一决议将成为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相互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一个基础，并促使双方的工作走上比较正常的轨道。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1. 随着我们向共产主义的迈进，国民教育问题将一年比一年更居于首要地位。

2. 共产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合理化，严格的核算，科学上的最新发明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它需要大批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干部。

3.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任务在于培养一代新人，这种新人既是生产部门的工人，又是生产部门名副其实的主人。

4.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教学大纲一般应与国内经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特别要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

5.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应该在工业和农业这两个基本的生产领域方面授予学生大量扎实的实际知识和理论知识。

6. 统一的劳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第一阶段，由于儿童的年龄关系(7至12岁)，只是自觉参加生产的准备阶段。

7.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使儿童通过书本能够对人类的思想和生活开始进行接触，教他们学会读、写、算，并且掌握绘图的本领(作为一种劳动手段)；通过观察、学习手工和进行自由的创造活动，千方百计地发展儿童的构造设计能力；让他们熟悉周围的自然环境，学会观察并用实验检查自己的观察结果；了解自然资源和附近地区的生活，了解国内和全世界的生活。

但是，第一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集体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组织学校生活, 组织集体劳动, 组织游戏)。这个阶段的活动不应该是繁重的(采集植物, 饲养牲畜, 投递信件, 送发通知, 打扫房间等等)。

8. 第二阶段(从12岁到16岁, 包括16岁在内)就应该安排参加生产了。

9. 夏季应该参加大农场的劳动。第一年在附近地区的农场, 其余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各种类型的农场(育种农场、专门的畜牧场、专门的经济作物农场等等)。

重要的是, 首先要让少年学生在这些农场参加一定的工作; 其次是要了解整个国营农场的经济情况; 第三是了解这种经济情况要与从理论上研究农业学、畜牧学等等联系起来。

无论城市的少年学生或是农村的少年学生, 都应在大农场完成这些工作和任务。

10. 工业领域可以分为化学生产部门和技术生产部门。据此, 第二阶段的头一年应该参加化学生产部门的工作, 而第二年则参加技术生产部门的工作。城乡少年学生都应参加工业方面的活动, 包括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

11. 综合技术学校最后一年用于研究整个国民经济。对以往的经验进行总结。夏天可通过专程旅行去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某一问题, 有的人还可以出国。冬天可以进行核算分配和组织方面的实际工作。

12.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教学大纲的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应邀请农学家、农业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技术人员共同制定, 并应采取若干具体措施。

13. 不言而喻, 基本的大纲应该包括对政治经济学、文化史、社会生活史、革命史等等的研究。艺术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14. 要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学习各种语言。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

1. 最近几十年将是对我国整个工农业进行改造的年代，是使整个生产合理化、机械化的年代，是加强把科学发明应用于生产的时期。

2. 在目前对整个生产进行革命改造的时期，需要大批受过综合技术教育训练的工作人员，这些人要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能迅速地判断形势，会操纵新的机器，等等。

3. 根据上述情况，目前在我们俄国发展综合技术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 综合技术教育对13—17岁的少年学生还具有发展他们一般结构设计能力的意义，这种能力对他们今后学习任何专业都大有帮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综合技术教育最能说明少年儿童的体力和智力状况，使他们在16—17岁时就可以自觉地选择专业。

5. 综合技术教育主要应在第二阶段进行，但是，它一方面与第一阶段有着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职业学校有着有机的联系。

6. 第一阶段(7—12岁)授予一般的知识，数学和绘图知识，教他们学会把书本、数学、图画当作劳动的手段；教他们学会观察，会做总结，会用实验来对观察、总结的东西进行检验；授予他们主要的自学方法和对周围环境的初步知识(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研究)。在第一阶段，通过劳动的方法传授知识；第一阶段的劳动无论如何不应局限于自我服务；第一阶段的劳动应具有集体参加初级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并形成初步的劳动熟练技巧。

7. 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基础。

8. 第二阶段(13—17岁)学习整个生产。既从理论上学,也从实践上学。学习几个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同时要特别注意对实际活动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与此同时,要学习劳动史,阶级斗争史,然后还要学政治史、宗教史、革命史、1917年的革命等等。

9. 冬季的实际活动应具有工业方面的性质,要与大工厂和电站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夏天应在大国营农场参加生产。

10.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与经济方面的人民委员部(农业局、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局等等)的工作保持紧密的联系,而由工会、农业和技术学校加以协助。

实际措施

11. 必须立即制定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的大纲。这些大纲应在专门的会议上与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与工会进行讨论,应根据各地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大纲。

12. 必须立即召开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农场处和农业实验站站长开会,弄清楚如何组织并在哪些农场组织少年儿童的劳动,什么地方能安排多少人。要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13. 农业学校应该成为基地,因为农校的学生可以当二级学校的业务指导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应与各农业学校联系。

14. 少年学生的活动应集中安排在重点示范企业;要与这些企业的工厂委员会和专家们认真研究,少年儿童可以从事哪些活动。工会应派出专门人员进行指导。

15. 要对各级工会开展有关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宣传。各级工会参加组织青年一代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工作,特别值得珍视。

16. 把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完全交给教师是行不通的,必须吸引各级专家参与此事。

17. 通过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可以加强与劳动人民事务上的联系,这有助于培养青年一代并使学生^①本人得到改造。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因教育目的而异。

斯巴达人为了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勇敢无畏、吃苦耐劳、残酷无情、百折不挠的军人，就对孩子们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教育，使他们在身体上受到锻炼，把他们培养成军事专家而别的任何事情一概不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孩子小时就开始灌输一定的观点，让孩子们鄙视和平的生活与享乐的生活，鄙视创造性的劳动，极端仇视一切外国人。

古希腊奴隶主的教育目的在于使生活能尽情享乐。体操、游戏、音乐、雕刻以及其他的艺术，都是为了生活上的享受。他们在进行体育和美育的教育时，还培养孩子们一种盲目的道德观念，使他们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以残酷的手段来迫害奴隶。

那么，对奴隶的教育呢？残酷的打骂，要奴隶逆来顺受、绝对服从，干着牛马的活儿，学点手艺……

教会在各个时期提出的教育问题，都是把人变为上帝的奴仆，对世事不敢闻问、不作判断……神甫总是竭力扼杀儿童的独立思想，扼杀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有一个专业技术工人，是星期日夜校的学生，他有一次写信对我说：“做人的奴隶这并不可怕，因为问题很清楚，这需要进行斗争，而做上帝的奴仆，却不敢想到斗争的事，因此最糟糕。”

资产阶级从教会那儿学会怎样通过学校培养奴隶。他们自己

的孩子是在一些专门设立的学校学习的，这种学校把他们培养成生活的主人，培养成将来作威作福的人。而在工人和农民子弟学习的国民学校里，却是有计划地摧残他们的精神，把孩子们培养成唯资本之命是从的奴仆。

我们不妨看看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情况，看看那儿如何扼杀孩子们的每一点独立思想，如何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道德，如何教他们崇拜权势和富豪，如何教他们盲目服从，教他们完成教师的每一道命令。资产阶级深知，光靠武力并不能长久保持其政权；它总是竭力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上的奴役。

1917年10月，俄国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后，他们才得以按自己的要求来教育青年一代。教育机关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教育任务。由于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因此就开始消灭社会分化为阶级的现象并把全体居民变成了劳动人民共和国的主人。

不言而喻，在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存在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培养统治者的；另一种是培养被统治者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项法令就是颁布统一的教育制度^①，即建立免费的“统一学校”，分为两级，扎扎实实地培养学生走向生活、参加劳动。开设先后共九年的两级学校不能是一纸空文，而是要让每个儿童实际上都能上学，这就是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第一个教育问题。

由于战祸不断、经济凋蔽，使我们至今未能解决这一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二月革命使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了^②，而苏维埃政权却尽一切可能使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变为事实上的平等（在生活中的平等）。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教育人民委员部竭力使男女青年都能进入各级学校。男女儿童都能在一个学校学习，由同样的老师，按同一个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这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一个统一的教育制度。

从前，孩子们上学只是学习，而现在，战争使数百万家庭失

去了父亲，国家经济遭到破坏，生活迫使许多母亲和姐姐去参加工作，家庭的许多职能发生了变化。苏维埃共和国的学校越来越关心儿童的衣服鞋袜问题，关心他们能有一切日用必需品。由于目前财政拮据、经济凋蔽，使学校的建设碰到很大的困难。不过学校提供一顿早饭并且向学生供应衣服和鞋子已很普遍了。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務十分明确：苏维埃政权应通过学校来完全负担全体学生的费用^③。

日益转嫁到学校上来的其他家庭职能还有：从前，家庭对儿童进行一般的劳动教育，教他干活；现在，由于劳动日益在家庭之外进行，因而这一职能（教儿童劳动）就应由学校来履行。读书学校从经济上看也开始显得很不宜了。这种学校对培养青年一代的劳动能力毫不关心，从而使国家的生产力总量逐渐有所下降。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美国和德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也非常注意把读书学校变为劳动学校。

共产主义的前提就是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生产。既不应浪费一点人力，也不应埋没任何人才。而要做到合理地利用人力，首先就要有计划地、有效地对人进行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从事共产主义生产乃是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教育人民委员部给自己提出的一项任务，正是建立这种“统一的劳动学校”^④。

劳动学校与劳动学校各不相同。有的劳动学校可能具有狭隘的家庭手工业性质，其宗旨是培养儿童爱好劳动的习惯、勤恳工作的作风、忍辱负重的精神，等等。而有的劳动学校则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这种综合技术的性质不应表现为儿童学习某几种手艺（而有的教育家却持这种主张）。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应使学生对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有所了解，向学生介绍有关农业工业、开采工业、加工工业的情况，了解几个主要的工业部门的情况，如：金属加工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向学生作这种介绍时，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教科书和图表的讲解，放映电影，参观博物

馆、展览会和各种工厂；还可以通过参加生产的途径。后面这一途径尤为重要。只不过学生在从事物质生产时，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劳动教学法是最为有效的学习方法。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学习物理、化学、力学原理。在劳动过程中，他可以学会观察并且通过实验来检验观察的结果，可以学会把书本当作劳动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可以学会把科学资料运用于日常劳动。学生只有学会了对物质材料的加工制造，他才能具体地发现劳动过程中所出现的生产问题。对国民经济中每个部门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这对每一个参予这一部门劳动的少年学生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他将会知道每个生产部门的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懂得蒸气、电力在生产中的作用；弄清科学在现代生产中的巨大威力。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任务不是培养狭隘的专家，而是培养明瞭各个生产部门相互之间的关系，知道每个生产部门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的人；培养懂得当时应该做什么及其原因的人，一句话，就是培养名副其实的生产和主人。另一方面，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还应该培养学生积极参加这种生产。它应该使学生具有正确从事每项劳动的能力，具有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的能力，以及在工作中迅速定向的能力。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不提供现成的专家，它只是使学生能更快地、扎实地熟悉所选择的职业，它可以消除狭隘专业化的弊端，使学生比较容易地从一种职业转向另一种职业，而主要的是，它可以使学生获得建设新生活所必须的眼界。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培养学生参加劳动。不过，它不是培养学生能参加单独的劳动，而是培养学生能参加集体的劳动，而这里的最重要之点，就是要具备组织这种劳动的能力。在农奴制时期，充当这种劳动组织者的是地主及其管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以及主要是工程师、工厂厂长等人，他们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来组织厂内工人的劳动。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旧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已经瓦解。粉碎了资本桎梏的工人，面临着

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这就是：不仅是在个别工厂，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为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利益而组织劳动。共产党人既已夺取了政权，他们也要担负起组织生产和分配的责任。而我们发现，几乎无处不感到缺乏组织的技巧。只有一些特别能干的人能胜任这一任务，而在实际工作中，处处都显得杂乱无章，不懂得最起码的组织科学方面的知识……

为什么我们俄国官僚主义的作风如此严重？原因究竟何在？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善于做组织工作。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会说，既然工人自己毫无组织能力，他们为什么要夺取政权？是的，他们将为科学付出代价。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人要为学会组织工作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不是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学习科学，而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经济凋蔽的岁月学习科学，在这种时刻，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否则就要永世受资本的奴役。在当前的历史性时刻，组织才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乃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合理地、妥善地组织社会劳动。正因为如此，综合技术教育学校除了培养学生参加劳动之外，还应使他们掌握组织工作的技巧。这就是说，进行劳动教学的环境应能使劳动者的组织工作的首创精神得到发扬。最好按组分配劳动任务，同时每组的人数可以逐渐增加，而劳动任务也可以渐趋复杂。有些游戏也有助于组织技巧的发展。资本主义深知游戏在儿童生活中的意义，因此他们把游戏当作一种工具，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资本的奴仆。童子军运动有助于儿童首倡精神的发扬，使青年的体力和智力得以自由表现，因而为资产阶级制度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用很隐蔽的手法向儿童灌输沙文主义，让他们崇尚黩武主义、崇尚暴力与权势，用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不过，资产阶级童子军运动的经验也可以借鉴，不过要使这种运动的性质有一个根本的改变，赋予它新的内容，使它成为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种工

具。游戏是培养集体行动习惯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组织技巧的重要手段，千万不可忽视。

学校自治在这方面也能发挥作用。

苏维埃政权想努力建成的这种学校，可以充分满足民主的要求，因为这种学校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这种学校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最好地培养生动的、创造性的生产力。这种学校还可以满足工人阶级在目前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最迫切要求：它可以把已取得的政权的工人阶级变为生产的主人和集体的组织者。

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

凡是多少了解一点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为了追逐暴利横财，资本家早已大批采用童工和女工。自古以来，养家的人主要是父亲，妻子儿女挣的钱则不过是一点额外的补贴。正因为如此，女工的劳动工资很低她们也愿意，因为她们只不过是“挣点外快”。于是工厂主就利用女工没有组织、觉悟不高的情况，付给她们很少一点钱，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在恩格斯以炽热的笔触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每个人都能读到，他对那些被资本剥削的女工所处的任人凌辱的境况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述。

现在，我们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是男女同工同酬。这当然只是建立妇女在生活中真正的切实的平等地位的第一步。但是，在很多场合下男人挣的工资要比女人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男人往往懂得某种专业，他或多或少花了较长时间学习过这种专业，是所谓的专业技术工人。要求专业技术的工作并非总是最难的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工厂里，制图员的工作算是要求专业技术的工作，而整天搬运生铁的粗活却不算专业技术的工作，所以制图员的工资就高一些。制图员往往是男人，而搬运沉重的生铁的却是妇女。要当制图员，就得经过学习；而搬运生铁却不需要任何科学知识。因此，几乎各个生产部门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妇女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专业技术工人。

这当然不是由于妇女不能够干专业技术工作（只有那些要求重体力的劳动部门才是如此，可是，许多男人往往也不适应这些

部门的工作),而是由于妇女长期为家务负担所累,没有参加工厂的劳动的准备,她们去工厂干活往往是出于无奈,迫于生计,只好去当一个没有专业技术的工人。

为了改变这种高强度、低报酬的劳动,就必须对女工进行职业教育。目前苏维埃俄国急需专业技术工人。为了振兴工业、发展农业,把工农业提到很高的水平,需要有能力的劳动力。由于对这种人的需要量很大,因此根本谈不上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存在什么竞争问题。整个工人阶级关心的是尽可能让更多的男女工人受到职业教育。在组织这种职业教育时,要注意不受传统势力的影响,使女工能够自由地选择她们至今一直不能选择(不是由于能力不济,而是由于旧的偏见作祟)的职业。

战争把妇女推向了許多新的工业部门,因而这种偏见许多已经得到纠正。必须在妇女的职业教育方面也肃清这种偏见。现在要教女青年学习的,不是编织花边,不是给手帕绣花,不是制作女人帽子或扎花朵(苏维埃俄国眼下还顾不上搞这些装饰品),而是要教她们学习农艺学、畜牧学、卫生学、技术等等。应当教她们学会那些严重缺乏技术工人而使工农共和国受到严重影响的生产部门的劳动技术。

论 学 校 建 设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提纲)①

一、原则性部分

1. 实行普及教育，男女合校，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质，建立统一的学校(分若干级)，使每个学生都能受到最高的教育，采用从教育学的观点看来最为有效的劳动教学法——这是共产主义学校的必要前提。一般说来，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都可以实现这些前提，因此我们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建设我们的生活。

注：当然，分为若干级的“统一的学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在各级得以普及。只有国家全部负担学龄儿童(至17岁)的费用时，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教育〕的普及。

2. 共产主义学校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在由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教学的基本中心应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国内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进行研究。学校的劳动性质就体现在这里。这种研究应分四方面进行：1)研究人力和自然资源；2)研究影响这些资源和人力的方法，以达到人们对其加以利用的目的；3)研究生产的主要因素：人，现代社会的成员，以及，4)研究对这一社会的组织。

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应是本地区。必须利用儿童有计划地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地区的一切机会，它具有重大的发展意义。学校不应忽视艺术的作用：艺术应通过各种形象来丰富儿童的精神世

界，使他们能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感受，——但是不应使艺术成为学校生活的中心；不是培养艺术活动家，而要培养各个生活领域里的新生活建设者。

3. 共产主义学校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单位，而应该与所在地区、与全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4. 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应该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上，这将有助于儿童社会本能的发展。此外，组织集体劳动是培养劳动技巧的最好办法。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在这方面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首倡精神和独立精神。

5. 各个学校应很自然地分成若干与一定生产地区有联系的小组。应该大力支持各个学校之间的联系。由于学生将参加该地区的经济建设，并将与居民的生产小组建立联系。因此，有必要由这些生产小组以及与儿童工作有关系的机关派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大大加强居民对教学和教育问题的关心。

二、实际部分

1. 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已尽可能地实行了男女合校并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质，但采用劳动教学法的情况仍不好。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济的普遍凋蔽，我们至今未能实现普及教育，未能建立统一的学校，未能由国家负担学生的费用。我国一级学校的数量不足，教师不足，二级学校很少。专业化开始过早，未能在儿童的志趣表现出来之后进行；同时儿童也缺乏相当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

2. 应竭尽全力开办足够数量的一级学校(四年制)，配备足够的教师，供给燃料，照明设备和一切必需品。为此：1)应吁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知各级工农代表苏维埃，立即召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学校网点设置问题，供给学校一切必需品问题，以及把未充分利用的房舍改作校舍的问题，等等；2)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有关供应教师口粮的地方实物税问题。

3. 必须拟定各工厂、发电站、大的国营农场、农业学校附设二级学校的计划，因为这些单位容易找到教师，同时还有相应的生产环境。这些学校还应设置足够的公共宿舍，以便容纳本经济地区一级学校的毕业生。

4. 为了供应学生伙食、服装及一切必需品，应立即统一制定组织学校合作社^②的原则，并使之付诸实现。

5. 立即按本文原则性部分确定的方针制定一级学校(四年制)的教学大纲。

6. 发动科学研究所、实验站和学校参加这一工作。

7. 编写教学法指导书，提出如何对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研究；如何研究影响这些资源的方法以达到人们对其利用的目的；如何研究组织人类社会。每一种方法都应开列详细的图书目录索引，并对所推荐的图书进行评价，指定其中两本为主要参考书。

8. 编写有关这些问题的《Text-book》^③，供一级学校各班使用。

9. 研究确定这些部门的教材种类。

10. 二级学校亦然，不过这一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

11. 大力宣传劳动教学法。

12. 拟定集体学习和劳动的教学方法。

13. 国民教育处应对本文原则性部分提出的学校建设原则及其实行方法下达指示。

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的演说^①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祝贺。然后，我想向你们谈一点想法，在这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其他代表大会期间，我经常都有这个想法。现在正在召开省国民教育局代表大会^②，会上讨论如何拯救学校和如何建设学校的问题。当我们面临着捍卫我们共和国不受白匪骚扰这一任务时，当问题关系到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存亡时，青年们都奋不顾身地奔赴前线作战。他们献出了一切去支持苏维埃共和国。这就使苏维埃政权和青年工人之间自然地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总是乐于向青年一代谈谈我们的问题。同志们，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所面临的另一重大任务。

我们不能不正视事实。我们都知道，俄国是一个荒蛮的国度。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有我们这么多文盲。我国的学校很糟糕。教育人民委员部挨骂已成家常便饭。不过，我们应该了解我国教师的情况，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帮助。目前最为迫切的文化任务就是需要新型的工作人员。我曾经听政治教育委员会汇报说，新闻出版部门十分缺乏工作人员，俄电^③的同志说，各个省报十分缺乏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水平很低，工作日益繁重，痛感人手不足。

你们听听省国民教育局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讲的都是缺少教员的问题。没有教员，这是全体青年都觉察到了的问题。青年农

民也渴望获得知识，但是学校办不起来，因为没有教师，学校只得空闲起来。没有教员，因为他们处境非常悲惨，因为我们不能给他们提供口粮，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向这支教师队伍提供口粮。教师们脱离生活，常常认不清周围的形势。革命爆发时，他们都去了乡下，而有些农村现在经历的事情，是首都和中心城市几年前就已经经历过的。我们惯于责骂教师怠工，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在他们头上。我于1919年乘《红星号》轮巡视，曾经在许多地方（县城，小乡镇等）稍事停留，到处都遇到同样一个情况。一些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而且往往是党的工作人员，总是以高傲的口气谈论教师。但是，如果我们更加接近一下这些教师，接近这些支持整个教育工作的人，那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忠于职守的。当学校关闭，教师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时，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日常工作。他们并未坐享其成。教师的工作是责任重大的工作，实际上，未来的青年一代都在教师手里。卢梭早就说过，儿童最早的发育年代是整个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年代。而我们却看到，这些最早的发育年代却掌握在那些旧时代留下来的并且日趋死亡的教师手里。旧时的教师水平不高，人数也很有限。

那么新的教师呢？在中等专业学校和各个地方，你们都会看到许多人想进入大学的各种系：医疗系，法律系等等，想进入技术院校去学习。你们同时也会看到，完全没有人愿意去中等师范学校学习，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更很少有愿意上师范学校的。这种情况很不正常。我们不能设想可以从工厂学校^④开始学起。要使儿童学到一点知识。目前我们的知识水平很低。现在参加师训班学习，向入学学生提的问题是： $\frac{2}{3}$ 和 $\frac{3}{4}$ 哪个数大？而这些未来的教师往往不知道 $\frac{2}{3}$ 和 $\frac{3}{4}$ 哪个数大。就这种水平，我们是不可能建成任何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必须认识：为了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我们就得掌握一切科学成就。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还弄不清 $\frac{2}{3}$ 和 $\frac{3}{4}$ 哪个数大，我们就不能胜任我们面临的建设任务。

刚才有一位同志说，应该办一些别的学校（其中包括工厂中学）来代替启蒙教育的学校。按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看，这是两个互相竞争的机构。同志们，不行，这两种学校我们都需要办。如果到我们工厂艺徒学校来上学的文盲青年没有起码的算术知识（更不用说数学了），那我们就不能培养出任何专业技术工人。因为专业技术工人并非那种只会用手做机械动作的人，而是了解自己生产部门的人。即使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他们也很注意培养专业技术工人。为了培养这种工人，我们必须改进我们通常的这种学校，这样我们才谈得上提高专业技术，才谈得上未来的建设。〔教师的〕劳动与其他各种劳动都是一样的，不过工厂工人是在同志之间工作，他们要轻松得多，因为人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会感到自己更有力量，大家更为团结。而教师却无人过问，脱离了别人，远离了文化，要想当教师，就必须有献身精神。因此，如果你们中间有谁选择了这条劳动道路，那就让他坚持自己的愿望，别人也不要妨碍他走他所选择的道路。他将像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样，其余的人应帮助他去建设未来的学校，因为光是责骂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不可能建设未来的。

在这里需要我们集体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希望青年们在教育这条战线上也能像过去在战场上一样为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功勋。当我们谈到教员不够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教员。要么这些教员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里产生，那我们就把工农的孩子交到他人的手上；要么由共青团的青年中来补充教师队伍，那我们就能真正按照生产的原则建立真正的、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这种学校将使青年一代获得建设新生活所必需的知识。

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要想正确地探讨青年共产主义教育的性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共产党员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明确共产党员应该知道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的方法。

共产党员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人，他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本能，希望大家生活美好、人人幸福。

共产党员可能出身于社会上的不同阶级，不过共产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工人。为什么呢？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培养了他们的社会本能。集体的劳动（其成就大小取决于大家努力的程度）、共同的劳动环境、共同的思想感情、为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凡此种种，都使工人彼此亲密无间，使他们被一种阶级的团结感情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由于彼此竞争，使得每一个资本家都首先把别的资本家看作一个应当打垮的敌手；工人在资本家眼里只不过是应该为他这个资本家创造利润的“一双干活的手”而已。当然，为了共同反对工人阶级，资本家也联合起来了，但是，工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分配问题，因此，他们的那种内在的团结，他们那种整个集体的融洽无间，在资本家阶级中是没有的。资本家的联合不断受到竞争的威胁。因此，工人中有强烈社会本能的人所在都是，而在资本家中间这种人却是绝无仅有的。

社会本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常常能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出路，帮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俄共在清党时特别

注意某一个党员是否工人出身。工人出身的人比较容易纠正错误。我们俄国的知识界看到，由于阶级本能的关系，工人们很容易明白的东西，知识分子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弄明白，因而在九十年代末叶以及二十世纪初(1896—1903年)出现了一种过分夸大阶级本能的意义的倾向。《工人思想》^①(社会民主党的一份秘密报纸)甚至认为不是工人出身的人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工人，《工人思想》就说：“我们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流的人！”

阶级本能(在工人阶级内部，它跟社会本能是一致的)是成为共产党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并非唯一的条件。

共产党员还应该知道很多东西。首先，他应该了解周围的动向，应该了解现行制度的结构。俄国工人运动刚刚兴起时，社会民主主义者首先关心的是在广大群众中传播狄克斯坦*所著《谁关心什么》、《劳动日》等等一类的小册子。但是只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还不够。共产党员还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应该了解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史、所有制发展史、社会分化为阶级的发展史以及国家形态的发展史。他应该懂得它们之间的互相制约性，知道一定的社会制度怎样产生一定的宗教和道德观念。共产党员既然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应该清楚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不应该把共产主义只是当作一种理想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把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上)；他还应该懂得，共产主义是人类必然要实现的制度。因此，共产党员应该为实现这种制度扫清道路，促使它最快地到来。

在俄国工人运动初期出现的一些工人小组中，往往也学习旨在阐述现代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学习文化史(文化史跟一般

* 狄克斯坦是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者，是《谁关心什么》一书的作者。该书揭露了榨取剩余价值的伎俩，是当时在各个秘密小组中最受欢迎的一本书。——作者

的历史讲述不同，后者往往是各种历史事实的堆砌)。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当时的工人小组中都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919年，在尼日戈罗德省的拉波特卡村，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件事。有几位教师告诉我，他们在二级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史，说学生们一致要求在二级学校里开设这两门课。

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村子里，所有居民从事的都是伏尔加河流域的小手工业和农业，那里的农村少年怎么会产生这种强烈的学习要求呢？显然，这是由于某一位过去参加过工人小组的工人，在拉波特卡村培养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史的兴趣，他给孩子们指出了他们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

但是俄国共产党员目前所应知道的东西还不止于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创造了最广泛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为了利用这些条件，就必须知道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向共产主义更靠近一步；必须知道目前可以做到的是什么，不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必须知道怎样建设新生活。首先要精通你所担任的那一部分工作；其次还要掌握以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方法。举例来说，为了合理地搞好我国的医务工作，首先就要对工作本身有一个了解；其次，还要知道我们俄国过去进行这一工作的情况以及现在其他各国进行这一工作的情况；最后，第三点，必须以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即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进行宣传，关心他们，发动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依靠劳动人民的努力建立强大的医疗组织。以上这些，不仅必须知道，而且还应做到，还应善于做到。由此可见，共产党员不仅应该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而且还应该很好地掌握自己的业务，要善于对待群众、影响群众、说服群众。

共产党员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随时都应以共产主义的利益为准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例如，不管你怎么留恋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一旦工作需要，一旦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你就应该抛弃一切而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共产党员就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不管任务多么艰巨，责任多么重大，既然这项任务要完成，共产党员就要把它担当起来，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做，到前线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等。这就是说，共产党员不应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袖手旁观，而要积极地跟一切损害共产主义事业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另一方面，要积极地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把劳动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

下面这些人应该清除出党：1. 自私自利之徒和混入党内的分子，即把那些个人利益置于共产主义事业利益之上的人；2. 对共产主义事业极其冷漠，不愿做任何工作来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人；以及严重脱离群众，不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3. 不受群众欢迎的人；4. 态度横蛮、妄自尊大、不忠诚老实的人，等等。

所以，要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1. 了解资本主义的弊端所在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知道怎样促使共产主义制度最快地建立起来；2. 善于把自己的知识用于事业；3. 对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无比忠诚。

现在我们来谈谈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十月革命和整个的革命形势培养了热情澎湃而又富有同情心的青年对社会生活的兴趣。不仅青年工人如此，青年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也是如此。青年们都向往共产主义。

所以，一定不能压制这种志趣，而要尽一切力量去支持和发扬在革命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人的社会本能。

怎样去支持呢？首先，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每一个团员都有可能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工作，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而不当共产主义建设的消极旁观者。人们为之献身的、包含我的一份力量在内的那一事业，使我们越来越感到特别亲切。当然，为了使每一个人能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志趣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找到一项工作，共青团组织就应该非常灵活和充满生气，应该跟国内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建设

工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参加建设还可以获得我们俄罗斯人特别需要的技能和组织技巧。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可以培养团员的集体工作能力，使他们随时随地都会进行合理的分工，养成对集体的工作责任感和遵守劳动纪律，并且教他们学会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项教育工作能否取得成绩，完全取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气魄及其组织机构是否合理，取决于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度和迫切程度。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既应重视讲演能力的培养，也应同样重视性格的培养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培养。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除了要求每个团员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之外，最好还要他们在某一工厂参加劳动至少一年。美国人和德国人要求每个即将毕业成为工程师的人，要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企业从事一年的实际工作，其劳动环境与该企业全体工人完全一样。美国人和德国人认为，一个工程师只有取得了这种工作经历之后，今后才能管理工人、影响工人。对于每一个共青团员来说，更需要有一年社会工作的经历。

在培养性格、社会本能以及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每个团员还必须努力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我们俄国，这一工作是跟自学工作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偏见、资产阶级观点比西欧青年少得多，因而在这方面处于一种比较有利的情况的话，那么，由于大多数青年工人，特别是大多数青年农民缺乏起码的普通教育知识，这就使我们在这方面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这种知识就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我国的青年必须学习，再学习，必须利用每一分钟的闲空时间和每一个机会来填补妨碍他们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的空白。

还必须通过顽强的学习来获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了解周围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不致在乍看起来不能理解的局势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这个基础是必不可少的。苏维埃党

校^②、各级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可以帮助一部分青年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幸到上述单位去学习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将是采取自学的方式，有时只是一个人学习，有时采取分小组学习的形式，共同去获得知识。为了帮助这些自发成立的小组开展学习活动，应该出版图书推荐目录、教学法指导书，告诉他们如何开展小组工作，还要出版各种示范大纲。

必须尽快出版这些材料。

一级学校的任务

要讨论一级学校的任务，首先必须指出学校的教育任务是什么，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学校的整个精神。

首先，学校应该培养儿童对周围的环境怀有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培养他们研究自然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各种现象和事实的兴趣。为了做到这一点，学校必须与居民、居民的劳动以及整个经济生活建立密切的联系；在教学中应该依靠儿童周围的现实生活，从儿童熟悉的具体事实出发。对所学的课程要采取研究的方法，这就要把自然和劳动提到首位。

一级学校的第二项教育任务，就是教儿童学会从书本中、从科学中，找出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让他认识到，他可以从书本上了解到人类在某些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什么见解。因此，即使是一级学校，也必须使儿童的独立阅读占有较大的比重，必须改变学校教科书的性质，扩大选读材料的挑选范围。

第三项同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儿童养成集体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这就决定了组织学校生活的性质，决定了实行儿童自治和儿童互助，等等。由此也产生了开展活动的方法：对所见所闻进行分析，养成通过集体的力量取得一定成果的习惯，根据能力来分工的本领；由此还产生了学校的劳动性质，除此之外，还有学校劳动的性质——集体的、创造性地组织的劳动；必须大力开展艺术活动，因为艺术可以增加了解，引起共鸣，发展社会本能。

除了这些教育任务之外，学校还面临着—项任务：授予儿童一定的正规知识和熟练技巧，使他们有可能在今后进一步自学，有助于他们参加人类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些知识是：1)读和写的能力；2)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知道各种量的相互关系(算术和初等几何)；3)知道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基本概念)；4)懂得人体构造；5)掌握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6)对当代各国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7)对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8)对人类过去生活的了解。

一级学校是与8至12岁的儿童打交道，不能指望它可以给儿童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或者进行深刻的政治教育或职业训练。

不要热衷此道。一级学校的任务就是授予儿童进入现代文化范围所需要的知识。之所以要教儿童学会读和写，是因为读书识字的能力可以促进人们的了解，克服人们交往中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障碍，把—己的狭隘经验扩大而为全人类的经验。学校应教儿童学会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知道各种量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知识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基础，—个人把这些知识掌握得越牢固、准确，那么他在进行核算和制订计划时就感到越容易。必须让学校教儿童知道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知道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因为这将有助于他们正确地判断周围自然界的情况和弄清产生各种现象的原因。如果不了解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儿童就会受到各种迷信的毒害，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无知的境地。世界大战引起了我们对邻国生活情况的关心：红军战士、我们过去被俘的人和曾经在我国当过俘虏的人，纷纷谈起了其他各国的生活情况；应该把他们的讲话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指出可以借鉴之处。了解各国的经济情况、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可促使我们进行比较，激发对本国的关心。了解本国的生活及其面临的任任务，所有这些当然只是最起码的形式，但却是生活于—定政治和经济整体中的每一成员所必需的知识。最后，还要了解我们的

现代史——战争、革命、国内战争，它使旧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摧毁，这一段往事现代人还记忆犹新。它可以首先使儿童对现代史产生兴趣，以后还可以使他们对远古的历史产生兴趣。儿童必须了解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为了了解现实，为了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必须了解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周围的生活使儿童对所有这些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们应该把这种兴趣与研究各种现象联系起来。

实现既定任务的办法何在呢？

读书学校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学校。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况在旧时的住宿学校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贵族女子专科学校、武备学校企图在教育儿童时完全不接触外部环境。人人都指摘这种住宿学校的做法。但是，平心而论，我国的许多幼儿园难道不是使儿童完全脱离生活的吗？难道我们的学校就与居民的劳动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吗？

许多当代的教育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愿意自我封闭于学校的高墙深院之中而脱离复杂的现代生活，不去正视生活的黑暗面。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当代绝大多数学校都是通常那种自我封闭的学校。学校与周围环境没有任何联系，居民对学校感到陌生不亚于以往。

应该千方百计地建立这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于教师要把周围环境当作学校研究的对象，而且要使学校和居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

学校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外表的（诸如，学校上演戏剧，儿童和教师都参加；或者由学校赠书），而应贯穿于全部学校工作，成为这项工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学校应该对生活起作用。重要的不在于学校干预生活的好处有多大，而在于学校要正视生活，积极干预生活。

举例而言。

农村里由于对儿童照顾不周而造成死亡。我们为幼儿开办了

幼儿园。重要的是让学生关心幼儿园：有时帮助缝补幼儿衣服，有时为幼儿园画一幅图画，有时制作一点玩具。或者是出现了某种害虫，孩子们在学校学过如何消灭这种害虫，那就让他们到某个农场去消灭这种害虫。或者让他们投递邮件、代写书信。年龄大的儿童可以让他们在校内为居民答疑（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等等）。

在这里，很难提出一个现存的模式。只不过是教师应利用每一个机会让儿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不过要做得很有水平，能激发首倡精神，一点也不勉强。

另一方面，居民也要把学校看作自己切身需要的东西。因此，教师必须向居民介绍自己在学校里的工作情况，使他们了解这项工作。教师应摆出自己的困难，指出解决困难的办法；让居民了解送儿童上学是一件大事；而在学习时期，不要让儿童去饲养母鸡，等等。如果教师能够做到这一点，居民就会主动帮助学校，既关心烧柴问题，又关心清洁卫生问题。

当然，由于居民以前未碰到过这些问题，因此向他们作宣传解释工作往往不容易。就拿学校早餐来说吧。现在，国家无力供给全体儿童伙食，就应该发动家长来参加这一工作，把他们组织到这一工作里来。如果加强了居民对学校的了解，居民代表参加学校的工作，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在学校里应做些什么工作，在校外应该为学校做些什么工作。居民代表参加学校工作，可以促使学校由“官办的”学府变为社会性的学校。同样重要的是，要让教师认识到居民代表积极参加学校工作的重要性，这样他就能在这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加以配合，同时自己也表现出高度的主动精神。

现在谈谈劳动学校的问题。

居民最为欢迎的可能就是劳动学校。早在革命初期，即劳动人民发动革命之时，就曾宣布我们的学校应该是劳动学校。但是，什么是劳动学校？每个人对劳动学校的理解各不相同，现在时隔

五年，旧事重提：到底什么是劳动学校。在这方面，我们有教训。现在我们认识得比较清楚了：劳动学校不只是崇尚劳动的学校，也不是从事单一机械劳动的学校，不是只搞冒牌劳动学校常搞的那种自我服务的学校。

那么，到底什么是劳动学校呢？它是不是只是拼命干活为学校？它是不是侧重教学生不要消极地接受知识，而要积极地对所学的知识产生反馈？而且，不管儿童整天在学校里是学戏剧也好，艺术体操也好，或者从事生产劳动也好，都无所谓；是不是这样的呢？

不是。我们至今坚持我国革命时宣告的劳动学校的原则，不过应该慎重地说明，我们所认为的劳动学校这一概念包含的是什么内容。

第一，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活动应该是学校学习的中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劳动学校对待教学大纲上的一切问题都应从劳动的观点出发（如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课程），从生产的观点出发，从劳动人民的观点出发。如果把劳动学校归结为研究声名狼藉的“劳动过程”，那就无异乎抽掉了它的精髓。

第二，在组织学校生活中，儿童的生产劳动应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劳动活动的选择。担水劈柴是劳动，采药、画招贴画、举办教育博物馆、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缝衣服、采集蘑菇和干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劳动。

在选择劳动的形式时，要考虑到儿童的兴趣以及他们对生产劳动的认识。只能逐渐地使儿童对生产劳动的认识接近成人对生产劳动的认识。

其次，在选择劳动的形式时，必须使这种劳动形式具有集体性质。集体劳动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再有一点，就是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劳动。要让儿童自己提出目的，讨论工作计划，分配工作，决定劳动过程中的互助形式，然后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去完

成自己分担的任务。这样安排的劳动就会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就能使儿童获得生活组织者的熟练技巧；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们形成一种自觉纪律，这种纪律不是靠命令形成的，不是出于害怕处分形成的，而是集体劳动的本质的体现。这样组织的劳动也有助于儿童正确评价自己的力量。

在选择劳动形式时，还应注意的一点就是，给儿童劳动提出的目的，起初不应太复杂，要使儿童易于接受，以后再逐渐复杂起来。

最后，我们之所以赞成劳动学校，还由于我们认为劳动教学法是最完善的方法。

初起只是让儿童掌握某一事实或思想，然后才转为讲授所布置的功课。下一步就是过渡到直观教学。进行直观教学之后，再采用实验方法，让儿童通过实验检验他所学的知识，最后，当代教育学提出的这种劳动教学法，可以使儿童最全面地研究事物、影响事物。

我国学校应该充分利用上述一切方法。教师要善于简单明了地向儿童讲述各种概念和现象。直观教具在学校里具有很大的作用：图片、模型、标本等等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学校应该广泛采用参观教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直观教学的一种扩大。应该让学生通过检验性的实验对所学的东西尽可能广泛地进行研究，但是劳动方面的研究（制作模型，创作上的模拟）在学校里应占特殊的地位。在研究物质文明和研究日常生活时，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总之，劳动乃是教学大纲中研究的中心；劳动是学校生活的组成部分；劳动是一种教学方法！

全面地研究居民的劳动活动是教学大纲的基础。这种对劳动活动的全面研究正是综合技术教育化。人们往往把综合技术教育理解为学习多种手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不应该只是通过手工的形式来学习技术，而应通过各种形式，直至最完善的形式。在

学习技术时，也应学习各个阶段的农业技术。还要学习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通过学习，要对国民经济有一个了解。

但是，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对儿童亲眼所见的劳动活动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研究，而且这种劳动活动应该是儿童能够理解并能直接参加的。对儿童能够理解的这种劳动进行具体的研究，这是研究全国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农村学校，对于城市学校，对于工厂学校等等来说，由于学校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其出发点也各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谈学校的某种侧重面。最典型的的就是学校的农业和工业的侧重面。可以通过这种侧重面说明，在某种环境下应该选择周围生活中的哪些现象来研究；并根据这些事例来说明应该怎样对待这项工作。不过，每个学校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根据劳动活动特点的不同而采取的独特研究这种活动的方法。

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侧重面只不过是提出了选择什么东西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

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性质是排斥职业教育这种侧重面的。侧重职业就是专业化，而专业化只能在研究整个劳动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只能在研究儿童的力量、爱好、专业兴趣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这个基础的专业化就会缩小学校的普通教学和普通教育的意义。

学校自治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

只不过不要像许多学校那样，把学校自治与学校管理混为一谈。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学校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既要求对人的了解，也要求对学校任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儿童们当然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让儿童肩负管理学校的重任，这是对儿童的能力毫不了解，它只能使他们的纪律混乱，使他们或者是自命不凡、目空一切，

或者是(对比较好的儿童说来)丧失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当然，可以让儿童多少学习一点这种管理方法，学生代表应该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在管理学校这件事上，不能由他们说了算。

自治却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学校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自治，儿童们学习如何群策群力来探求学校内共同生活和集体劳动的形式。自治是把这种生活和劳动引上一定轨道的一种手段。要学会共同生活，就要学会尊重别人的劳动、知识和爱好，就要学会为他人着想，给别人以方便，与别人同甘共苦。要学会共同工作，就要学会了解自己的和别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学校自治对上述方面都能给予帮助，这与其说是自治，毋宁说是集体地探求实行这种自治的形式。要使这种自治根植于儿童的经验。例如，一个小孩欺侮别的小孩，不让别的小孩干他喜欢干的活儿，那么，就要制定一个规章制度，禁止互相妨碍、干扰，等等。

从教育的角度看，重要的正是形成自治方式的过程本身。当然，自治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培养自觉纪律的一种手段，是自愿服从集体意志的一种风尚。

自治应该是经常进行的，应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儿童的整个生活加以规范。有些教师的做法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学生中有谁惹祸了的紧急情况下才召开儿童大会。他们把这种大会当作审判大会，从而完全降低了自治的教育意义。

一般说来，自治应尽可能接近儿童生活，应从儿童的利益出发。不言而喻，这种自治不同于成人的自治。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自治都不应是成人政治生活的翻版，不能套用民主共和国甚至不能套用苏维埃共和国的作法。

阶级社会的生活组织中行之有效和势在必行的东西，在学校生活里完全不适用。

国家自治是一种统治组织，是利益冲突的各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

学校里的自治却是安排集体学习和劳动的一种途径。

要实行自治，只有在劳动学校里才有可能，只有在社会生活极其活跃的学校里才有可能，因为儿童在这种学校里经常为了某种目的而组织起来。

谈教学大纲问题

至今为止，俄罗斯联邦还没有一份各校适用的统一的固定的教学大纲^①。革命前的旧大纲束缚了教师的手脚，对整个学习过程妨碍甚大，以至革命胜利的初期，新大纲尚未制定，旧大纲即被废弃。但是很快就发现，许多教师本身无力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大纲，致使一般教师无所适从，不知怎样办才好。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孩子们在学校里非常积极地参加演剧，画图画，唱歌，制塑像，可是却没有学习读和写，或者整天忙于自我服务，忙于开会，在学校里甚至连四则运算都不会。虽然这种情况总的说来现在已不多见，但仍然时有发生，而被反对新式学校的人肆意夸大。

因此，从1919年起，教育人民委员部已开始印发个别课程的示范参考大纲。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这一工作的同时，有些省市也在制定大纲。现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库尔斯克、梁赞、土拉、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叶列茨、西伯利亚等地都有了自己制定的大纲。一年前，教育科学部曾把教育人民委员部早先印发的示范大纲汇总后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改。这项工作做得很仓促，因为想把这份未定稿在1921—1922学年先行试用。这项工作虽然按时完成了，但是由于印刷条件所限，七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直到1922年才发下去^②。大纲未定稿清楚地表明，现行大纲非常抽象，很不完整，许多课程还没有大纲（如：经济地理，劳动组织，卫生等等），而更主要的是，现行各科大纲之间没有内在

的联系，互相脱节。已出版的大纲汇编可能对教师们有参考价值，但大纲还有待进一步修改。

我们把我们的学校称为劳动学校，不仅是由于这种学校在教學上采用劳动教学法，不仅是由于劳动成了学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还由于劳动、人们的劳动活动应是整个教学大纲的一个轴心。

形形色色互不联系的大纲较少下达到一级学校，因为那里的课程很有限，而且儿童正处在这样一种年龄时期，在这种年龄时期，他们从学习过程本身得到了乐趣，不大注意他们为什么学习这门或那门课程。

但是在二级学校里，儿童们开始感到课程繁多，所学的材料有很大的偶然性，突出地感到所学各部门之间缺乏内在联系。一会儿学这门课，一会儿又学另一门课，会使儿童感到困难；同样，他们也很怕分散注意力，他们会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学习这个？”大纲成了很难消化的东西了。

凡是认真地观察过儿童的教育家都不可能不发现，这样无休止地变换课程会增加很多困难，因为对这些课程必须集中注意力。近来，人们日益强调在一级学校教学时应该采用所谓的综合教学法。但是，如果教师没有掌握判断某一问题重要性的标准并使整个谈话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前景，那么这种综合法就会很容易地变成一种单纯的空谈。采用综合教学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原因还在于只有在最初几年的学习中才能运用这种方法。

随着学生学习范围的扩大，就要按不同的学习内容将他们分组。问题在于如何在按课程进行划分时使大纲成为统一而又完整。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把学习人们的劳动活动当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的基础才行。这就可以使每次谈话的题目之间、各门课程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它有助于对整个教学的理解。如果在题目的选择上，在讨论时所持

的态度上有一种内在的统一的東西，那么综合教学法就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東西，那么综合教学法也于事无补。

也许人们会问：你们为什么对问题采取这种片面的态度，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归诸于研究人们的劳动活动？这会不会大大缩小学生的视野呢？

首先，对“研究劳动活动”这个概念，我们是从极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的。为了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研究这一活动的客体——自然界和自然力；其次必须研究人作用于自然(技术)的方式；最后，还要研究这一活动的主体——人。既要把人当作动物界的一员来研究，又要把他当作人类社会的一员来研究；既要研究他的肉体需要，又要研究他的社会需要。而为了了解社会需要，就必须懂得当代社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道当代社会的发生、发展和前进方向。

我们把研究人类劳动活动当作基础，还由于这种劳动活动是整个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把这种研究作为基础，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对这种劳动活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正生活在两种经济制度交替的时期。旧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筑在竞争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建筑在忽视整体利益、缺乏计划性的基础上的。现在，旧的经济制度已经瓦解。新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已经诞生。在这种制度下，生产是以一定计划作根据的，并且是为了共同的福利而进行的；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但是这种新的制度所需要的却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不是单纯地执行别人的命令，而是自觉地参加生产，他们能照顾整体利益，懂得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学校应该为培养这种类型的人材作出贡献，这种人材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

不同生产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各国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现在，一个人独居斗室、与世隔绝已不行了，

必须懂得自己周围的生活与其余世界的的生活之间的制约关系，应该看到把自己与这一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经济和生产方面的关系。

但是，我们把研究人的劳动活动作为教学大纲的基础，并非完全由于上述这种情况，还由于儿童对人在这方面的活动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鲁宾逊漂流记》一直是儿童爱不释手的读物。

我国的教学大纲带有传统的烙印，而且还是一种很不好的传统。过去制定旧的小学教学大纲时，所考虑的是工人和农民不需要有很多知识，他们的任务不是组织生产，而是努力地按时好好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二级学校的大纲是为特权阶层子弟制定的，他们照例不大劳动，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可以学习各种古代语言和一些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课程。

必须对我国的大纲进行审查、修订。

在修订大纲时，必须把一些最本质、最必需的东西突出出来，形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大纲。这个最低限度的大纲不仅是示范大纲，而且也是国内所有学校必须执行的大纲。

国家应该授予每个学生最低限度的必要知识。

这个最低限度的大纲应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学校都搞一刀切。

对于必须遵行的大纲应采用什么材料还没有作出最后确定。但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要从儿童周围的环境中选取材料，这种材料要很具体，为儿童所理解，是他能观察得到并能产生影响的。所以，大纲中规定的农村中学要讲授的材料，应不同于工业区学校所讲授的材料。彼得格勒省农村中学又不同于沃涅什省农村中学；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工业区学校所学的材料，又不同于顿巴斯或乌拉尔。最低限度的大纲规定要讲授的材料由各个地区确定。

当然，在这方面应有一定的分工。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总的大纲，各地根据当地的情况确定师生应该学习和研究的材料。最

好能召开一些各生产地区的教师代表大会，邀请当地执行委员会、农业局、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各处和保健处的代表参加，邀请农业实验站、工业企业等单位的代表参加，讨论学校要学习的生产材料。单个的教师是无力完成这项任务的。这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个集体应使学校与学校所在地的生产单位建立联系。各生产地区的教师代表大会应指出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

学校集体要把所学的材料进一步具体化：它应该研究学校怎样与某个工厂、与某个国营农场和农业实验站以及火车站等建立联系。毫无疑问，应该发动当地劳动人民参加这一工作。

最低限度的大纲并不意味着只限于学习所指出的最低限度的东西。教育人民委员部要是不制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大纲，那就错了。那样就会单纯地追求教学大纲的进度，埋头于读书。而有了最低限度的大纲，就可以使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留下充裕的时间让孩子们从事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使学校得以了解当地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工作，得以采用需要时间的劳动教学法并且合理地安排学校生活，同时实行学校自治和多方面的劳动。

现在我们谈谈大纲本身。

一级学校的宗旨是授予儿童从事劳动活动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技巧和知识，并使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兴趣。

必须培养儿童流利地、连贯地、详细地讲话的熟练技巧，这不是靠传统的转述能做到的，而是靠在学校集体中对一切见闻进行讨论并且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思想的习惯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合理地安排学校生活，合理地组织学校集体才能做到这一点。

还要关心扩大儿童的词汇量，丰富他们的概念。不充分扩大他们的视野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级学校的经常任务就是给儿童讲授实用的、有趣的、内容广泛的阅读材料，所讲授的这种材料要写得通俗易懂，要考虑儿童的心理特点。特别重要的是描绘人的劳动活动的材料。一级学校往往完全忽视了社会知识。据说是因为儿童年龄还小，不懂得经济和政治问题。实际上，儿童们

无论在家里或街头巷尾都常常听人讲起这些问题，常常考虑这些问题；学校里回避这些问题是错误的。不过，在讲解这些问题时，要考虑到儿童的心理特点，考虑到他们的阅历和兴趣。

自然学科应在一级学校里占较大的比重。与此同时，特别重要的是用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积极地对材料进行分析。

要记住，语言课和数学课在一级学校只应起辅助作用，一级学校把这两门课当独立的课程来学为时尚早。因此，本族语和数学的学习材料应该适当，要与儿童的观察和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也不应该用一些纯文学的材料、修辞和语法练习来加重儿童的负担。这个阶段的语法课只具有辅助的、实践的性质。学习语法完全是为了学习拼写法。

绘画、雕塑、唱歌、游戏对于8—12岁的儿童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这是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获得经验的手段，是组织和表现自己感受的手段，因此应该使它们为教育的目的服务。但是在这方面应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能负担过重，一切工作都应纳入正轨。

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的教学目的，就是授予学生以认识力和熟练技巧，使他们能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and 劳动，自觉地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

这个圆周阶段是对生活和劳动活动的一个准备。在这个三年为期的圆周阶段结束后，学生们或者是直接参加工作和在工作过程中根据生活实践进行学习，或者是上某个中等技术学校或工厂艺徒学校。

现在我们来谈谈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的大纲。

旧的大纲只字不提组织劳动的事，然而无论是组织个人劳动还是组织集体劳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对人的劳动活动的基本领域以及这一活动的不同形式进行研究，还要对各种形式之间的联系及其相同关系进行研究。也许后面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初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时的生产是

建筑在竞争的基础上的，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却碰到了计划生产的必要性问题。当前的时代要求我们理解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彼此的制约关系。学生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对这方面的知识加以研究，就可以使劳动学校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学生必须对社会的劳动组织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为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也必须指出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的方式以及相应的劳动组织(经济形态)对社会的阶级组成，对社会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必须知道它的发端及以前的发展情况。历史应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实。学生们要懂得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样他们才能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历史教学中，个别的历史事件和事实不应淹没社会发展的趋势。文艺作品是激发人们对社会现象产生感情的强大武器，因而应该广泛利用。但是，文学史应该与语言学习分开，而与历史教学保持联系。这样才可能杜绝这方面教学中的许多有害倾向。

为了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感情，最好还能用艺术史上的一些事例来讲述历史，让学生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作品。

二级学校和一级学校都应讲授艺术，不过性质略有不同。8—12岁的儿童感兴趣的那种简单的技术，它却不能满足12—15岁儿童的需要了。受这种不满足的感情的影响，他们往往完全放弃了艺术学习。因此在对待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的艺术教学中，需要注意方法的正确。一方面要注意技术，使儿童们掌握一定的技术熟练技巧；另一方面应该更加深刻地理解艺术作品及其任务和宗旨。

至于说到语言学习，那么这种学习应该紧密地结合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历史。条理清晰的语言和文字史，可以激发儿童对语言形式、讲话结构产生新的兴趣，使他们对能使语言形象、生动并且具有说服力的那些条件产生新的兴趣。这可以把儿童从前感到头疼的语法规则和图表变得生动具体起来。在深入学习本族语

的同时，还应学习外语。二级学校一定要讲授新的语种(学生不一定必修)，最好从一级学校三年级开始讲起。第一圆周的语文学习应从一开始起就与学习语言的精神、语言的特点联系起来，还要与学习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或国家的生活和历史联系起来。

自然学科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要面向人们的劳动活动，要与这一活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要特别注意卫生课的教学。同时，自然学科的教学要为学生的世界观打下基础，讲述地球的起源，阐明地球的历史和物种以及人类的起源。

学校里的自然学科教学也不应回避有关性生理方面的问题。讲授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使学生懂得性生活的规律，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在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讲授各门课程的时候，必须注意使学生充分掌握各该知识领域的研究方法。

在这里，我们还未讲到教学大纲的份量，而只是讲了大纲的性质。教学大纲的份量应使学生不感到负担过重，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学，合理地安排学校的集体生活，进行劳动教学，从事体力劳动和由学生积极管理自己的生活。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是为这样一些儿童安排的，这些儿童在第一圆周阶段对某种知识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这门知识。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已实行分科制^③，也就是说，把主要的兴趣或者放到自然学科及其派生的技术学科上，或者放到社会经济学科上。

在第二圆周阶段两年的时间里，学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熟悉他们所选择的知识领域，更好地掌握该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圆周阶段应使学生尽可能独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并养成对所选择的知识领域的专门兴趣。

这样，我们就将建立一个符合生活和时代要求的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 产阶级文化协会^①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无产阶级就应该与世隔绝，把自己与国家对立起来，成立自己的宗派主义的文化机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

9月27日的《真理报》刊载了普列特涅夫^②同志所写《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副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宗旨和任务”。这篇文章兴味盎然，才华横溢，但是正误并存，鱼龙混杂。

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毫无疑问的。普列特涅夫同志指出了这一点，他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把意识形态理解得过于简单。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既包括道德，也包括艺术，还包括科学。谁也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的道德与无产阶级的道德有霄壤之别。同样不难证明，艺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表作与无产阶级艺术的代表作无论在形象上、内容上和情节的组合上都截然不同。这两个阶级的思想感情不同，对艺术的态度也各异。至于说到科学，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不消说，在社会科学方面有资产阶级科学，也有无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社会现象的评价完全不同。精密科学方面的情况却不同了。精密科学是建筑在世世代代以来人类在掌握自然力方面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礎上的。这些科学的资料受过实验的检验，每天都得到实践的证实，

它给予人们比过去多少世纪都要巨大的控制自然界的权力。谁要是把这些成就弃而不顾，那就十分荒唐可笑了。当然，目前精密科学也在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成了少数专家的财富。无产阶级掌握了科学之后，就把科学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财富，使科学变得更容易理解掌握，把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形成了一系列精密科学的新领域。尽管资产阶级不关心精密科学的发展，但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却很关心。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和应该说：精密科学可能带有一定阶级的烙印。

其次，普列特涅夫同志说得对，征服世界不能只靠武器和暴力，而应该从思想上征服世界，应当消灭资产阶级的旧文化，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

这并非分歧的根源。可以完全赞同这些思想，却同时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组织。

在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还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的国家里，问题比较简单。无产阶级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思想上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艺术、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是完全必要的，是主要的斗争工具之一。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提出“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口号，这是战斗的口号，斗争的口号。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口号是极其革命的东西。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的“无产阶级文化”组织都应受到欢迎。

但我国的情况如何呢？我国所处的情况是：无产阶级人数较少，阶级锻炼不足，只是由于形势使然，它才掌握了政权。它取得政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使自己居于特权地位，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吗？是为了压迫别的阶级吗？当然不是。它之所以夺取政权，是为了消灭一切剥削现象，一切压迫现象，按照自己的思想改造社会，消灭社会分化为阶级的现象，然后它就不再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无产阶级在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和旧的压迫机构之后，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在思想上对别的阶级施加影响，进行教育，

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得到普遍的承认。

进行这种教育的一种形式就是艺术，因为艺术对人的感情的影响特别强烈。艺术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起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工人通常是用形象进行思维的，因此最能教育工人群众的就是艺术形象。革命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斗争中（游行示威，前线杀敌——在一切有群众出场的地方），都有很多戏剧性的场面，不是矫揉造作的、夸张的，而是顺乎自然的、革命的戏剧性场面。但是，革命同时也使人感到，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尚未产生。目前只有少量反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志趣理想的作品。现在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艺术作品。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不适应革命的要求，它只是穿上了一件红色的外衣。

在革命的动荡时期，新的艺术几乎一点没有而目前又迫切需要。那么如何创造这种新的艺术呢？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他们要为工人开辟通往艺术的道路，让他们有机会学习音乐、戏剧和录制唱片的技术，而不掌握这些技术就不能创造艺术作品。但只是掌握旧的技术还不够，还应通过革命的熔炉给它注入无产阶级的思想，开办无产阶级需要的艺术训练班，要开办许多这种办得好的训练班，因为它使无产者有机会掌握创作活动的前提——技术和对艺术的自觉态度（这里的“自觉”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说的）。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做了一件对无产阶级说来意义重大、十分需要的事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另一个方面。

艺术训练班应该对资产阶级艺术持批判态度：要使学员懂得，资产阶级艺术中哪些是可以吸取的，哪些是应该扬弃的；要明白资产阶级艺术的最新形式，即没落时期的艺术。艺术训练班要培养学员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没落时期的这些形式的厌恶感情，因为这些形式毫无思想内容，矫揉造作，虚伪透顶，喧嚣异常。可

是我们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举办的艺术训练班没有用这种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而把那些没落腐朽、堕落沉沦的东西说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艺术的萌芽成了资产阶级艺术的俘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艺术作品之所以能称作无产阶级的艺术作品，并非由于它的作者出身于无产阶级，而是由于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并非每一个无产者都是很有觉悟的人，并非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心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有些无产者满脑子小市民的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对无产阶级的理想、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格格不入。只是无产阶级出身这还不够，无产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要有阶级觉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此却置之不理，而把工人的每一部作品都宣布为无产阶级的作品。这种做法也许出于不得已，但毕竟起了使思想混乱的作用。

第三点：不能“冥思苦想地创造”无产阶级艺术，不能勉强地去创造这种艺术，只能为这种创作活动扫清道路。无产阶级的艺术只能产生于生活之中。对这种生活的理解越深刻，艺术家的生活感受越强烈，那他就越能完美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反映。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斗争，不能不正视周围的环境，对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充耳不闻。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恰好是奉行了充耳不闻、闭关自守的信条。

第四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把整个社会由阶级社会改造成为无阶级的社会。资产阶级由于居于统治阶级的地位，它对所有的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在内）都打上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烙印。现在，无产阶级也应努力做到这一点。它手上已经掌握了像国家这样的进行思想意识影响的强大工具。无产阶级依靠国家可以有充分的机会广泛扩大自己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对这些阶层进行改造，摧毁他们的阶级心理。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说：“国家不能说

只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的任务是要关怀所有的阶级。尽管国家普及文化(这是有益之举)，但是这种文化并非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我们无产者也不应为这件事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应该与一切非无产阶级因素保持距离，创造无产阶级自己的洁白无瑕的文化。这种阶级的文化是其他阶级、其他社会阶层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同，与无产阶级的心理相距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症结之所在。这就是我们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分歧的根源之所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

无产阶级的观点与此不同。无产阶级并不认为：他是单独地生活在阶级社会中，他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使命并不在于此，而在于消灭阶级社会，让人人过上幸福欢乐的生活，建立一个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就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使命产生了如上的理解。现在我们也沒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阶级社会的基础正在土崩瓦解，新旧制度之间正进行殊死的斗争。在这种时刻，如果还想在什么地方开辟一块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园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正是干的这种工作)，那就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组织总是把自己与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相对立，把自己与一切它害怕与之交往的其他阶级(尽管他们是劳动人民)和这些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也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立，他们所宣扬的思想，所采取的作法，我们认为都是宗派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因此我们要与之斗争！

组 织 自 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来根据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生活。工人开始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农民的宿愿也实现了:他们分得了土地。这使他们渴望参加各种活动,他们也感到自己的精力空前充沛。

但是,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很快就察觉到,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知识,因而手脚受到束缚。战争打破了农村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局面,为农民掀开了生活的帷幕。他们知道了科学成果的伟大作用,知道有了知识就可使山河大地改变面貌,就可获得巨大的力量 and 资源。工人认识到这一点要早些。

革命使劳动人民成了生活的主人,激发了他们利用科学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愿望。工人和农民的这一愿望更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因而迫切要求掌握知识。

苏维埃政权满足了这种要求学习的愿望。

在沙皇时代,所谓的校外教育十分可怜,并处于一种半合法的状态。苏维埃政权极其重视成人教育工作,不惜为此而拨出巨款。

扫盲工作的步子迈得很快,建立了大约八万个农村阅览室、三万个图书馆以及许许多多苏维埃党校、俱乐部等等。报刊充分发挥了作用,进行了文艺宣传,开展了宣传运动,举办了各种短训班。

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年来,政治教育委员会在居民中广泛地、

积极地开展了普及知识的工作。

红军也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基地。全体男青年都参加红军，他们在红军中这两年并未虚度。各地都开办了红军学校（为不同文化水平的红军战士设置的），图书馆，俱乐部（例如，目前*已有1200多个红军俱乐部，下设6200个政治、普通教育、农业等等小组，拥有13万多会员）。

各级工会、妇女部、青年团也同样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

为了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上高等学校的机会，专门制定了优待录取的规章，普遍发放了助学金。工人和农民的子弟上中学也从宽录取。为了培养工人和农民上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还为他们专门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

但是，上述种种还远不能满足劳动人民对知识的迫切要求。自学在长时期内还将在我们俄国起着十分独特的作用。

为了使自学取得很好的效果，必须知道读什么，怎么读，如何最恰当地安排自己的学习。

我们常常看到，工人和农民干完活之后想学习时，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不知道从何学起，不知道读什么和怎样读；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知识。有的人识字不多，却立即捧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读，结果发现自己啃不动。

有些干劲不足、坚持不了的人感到灰心丧气，就只好放下了他们力所不及的学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读的是马克思的作品，而又不能掌握作者所讲的材料，结果就成了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

干劲比较足、能坚持学习的人虽然可以达到既定的目的，但是却占去了很多生产劳动时间，往往影响了工作。

现在，我们经常讲起和写文章谈到组织劳动和生产宣传的问题。这主要是指组织生产的问题。

* 指1922年。——原注

泰罗^①和其他许多工程师、专家都曾详尽地探讨过如何组织体力劳动的问题。论述企业劳动组织的著作汗牛充栋。还有很多著作谈到车间的机器应如何放置，工具如何发放，劳动怎样分工，命令怎样下达，考核工作怎样进行。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从合理地组织劳动的角度来看，最优秀的专业技术工人都能做到：一切必要的动作都是合理的、迅速的，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又是最少的。

但是，如果说在体力劳动方面我们还能经常强调合理地组织劳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观点的话，那么在脑力劳动方面却常常忽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这个道理对于学生和那些需要通过自学来充实自己知识的人说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学习材料的选择

人类的知识领域广阔无垠。世世代代以来，千百万人积累了大量有关社会生活和周围世界的知识，谁也不能全部掌握这些知识，即使把一个人的寿命延长几十倍也不行。不过，一个人也没有必要掌握所有这些知识。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他只需要挑选最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能使他变得勇武有力，能驾驭自然界和各种事件，能使他学会如何利用自然力和自然资源，如何改造人类社会的整个生活。应该从大量的知识中挑选那些对现代人最有意义的东西来学习。

我们生活 在社会革命时代。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土崩瓦解；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正在茁壮成长。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建立在祸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及其残酷的事实，撕破了资本主义的假面具，使广大群众看透了这种制度的极不公道之处，看透了这种制度的种种黑暗面。劳动人民渴望寻求并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俄国已经

开始建设新生活了，这种建设工作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言而喻，所有这些情况都将唤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浓厚兴趣，而人们也将力图弄清当前的形势并理解其意义。

当然，想弄清当前的形势（这在目前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得读报，而象《真理报》这样的报纸，能使他们懂得很多东西。但是，报纸自然只能阐述某一方面的观点，让人们注意一定的事实，指出对待问题的态度，也就是说，实际上只能做到一个有天才的、消息灵通的演说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一定的方向，给人们指出远景，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指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但是，为了弄清问题，除了读报之外，得同时读一些比较有用的书籍。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复杂的结构，就不可能明白它整个体系中的个别现象。由此可见，凡是想了解当前形势的人，都应该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的整个结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弄清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是什么（这种力量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了解当前形势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关键、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了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必须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原始文化的历史以浅显易懂的形式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必须学习原始文化史。但是不能停留在学习原始文化史上，还要研究后来社会是如何发展的，研究后来的历史怎样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那些规律，这时就能明白社会发展的方向。

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之外，还有关于自然现象的问题。人是人类社会的一员，同时也是动物界的一员，对他产生影响的不仅有人，不仅有社会生活，还有自然界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

因此，我们还应对自然界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对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规律进行研究。自然科学有助于我们掌握

认识自然现象的一定方法：观察，作结论，用实验来检验这一结论。逐步地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研究科学（人类日积月累的系统经验），这样就获得了有关这一领域的大量重要知识，从而得以为人类的福利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及自然力。我们必须熟悉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积累的知识，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掌握人类在征服自然界方面的日益增强的措施。

自然科学还有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方面。我们在对待社会生活的问题上，是从其发展过程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同样，我们也必须以这种态度对待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地球是怎样形成的，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产生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是怎样形成的，人是如何形成的——凡是想知道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承认自己是大地之子的人，都应该具备这些知识。当然，重要的不只是了解科学的最终成就；重要的还在于了解如何认识到这一点，怎样去观察、借助什么样的工具、根据什么样的事实来认识这一点。重要的是不仅使人口头上相信，而要懂得实际上的确如此。在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地球的起源有过种种传说，对于物种和人的起源也有过种种传说。尽管这种传说已为许多研究成果和事实所驳倒，但至今依旧流行不衰。我们必须掌握这一情况。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说法：书籍是劳动的工具，而非形成世界观的手段。“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不是为了形成‘完满无缺的世界观’，过去的这种说法应该成为我们今日的座右铭。人们主张，要使书本成为锤子和镰刀的奴仆。”

这些话听起来娓娓动听，却没有什麼道理。什麼叫做“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人们怎麼理解这句话？书本的存在正是为了让人获得知识，使人们把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再是，说什麼“书的存在是为了从事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是过去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世界观是什麼？它是我们对周围生活和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态

度和解决某些基本问题的一种方法。这些基本问题能不能不解决呢？不能，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一窍不通，就会在生活中四处碰壁，有如无头苍蝇一样。

“完满的”世界观是什么？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具备了这种世界观，处理一切基本问题都能做到胸有成竹，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协调一致，完满无缺。

如果一个人对一切基本问题都能做到深思熟虑，妥善处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尤其是他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时更是如此。这种人懂得他需要什么知识以及为什么需要这种知识，他将成为我们称之为的“自觉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自觉的人的工作成效，要比那种一问三不知的人的工作成效大得多。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关心形成自己正确的世界观是一种过时的、不合法的事情。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会感到，具备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可以使他的工作和活动搞得更好，也就是说，搞得更有成效。

如何学习必要的材料

对于从事自学的人说来，从什么地方入手去学，按什么程序去学，这是一个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问题。当然，所选择的书在文字上和内容上都要适合自己的水平。不言而喻，一个不懂得初等数学的人是啃不动高等数学的，一个不懂得哲学的人，是读不了黑格尔的著作的。但问题的实质还不在此。如果一个人读的书中所谈的问题是他从未考虑过的，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他不知道怎样把这个问题与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不知道怎样把它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阅读这本书就会使他得益甚少。如果书的内容与这个人的思想有关，满足了他的某种需要，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我谈一段自己的往事。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有三十年了。当时我虽然已在中学毕业，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时在这方面也一点不懂）世界上还有一门科学叫政治经济学。有一天，我的一位女友给我带来了一本伊万纽科夫^②写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她竭力劝我把这本书读一读。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我都能看懂。我开始读了起来。我“啃了”很久，勉强弄明白了它的意思，不过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却觉得毫无所得。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参加了工人小组的活动，这时我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我阅读马克思的作品，兴致勃勃地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花的时间不长，而收获却很大。对我说来，一本薄薄的通俗读物却比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还要难。

一个有才华的报告员，一个出色的教师，只有自己对某一事物非常喜爱，他才能使听众和学员对这一事物产生兴趣，才能把他们的思想引向这个方向，激发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往往有的报告并没有什么丰富的内容，也并不十分深奥，但是，如果它能启发听众的思想，使他们产生某种要求，这个报告就是有价值的。过去，一些进步的语文教师经常利用文学来启发学生的思想。有的讲演人员在群众大会上往往也能做到这一点。

与同学们交谈，共同讨论问题，这对提出新的问题、激发新的兴趣很有帮助。正因为如此，所以集体的、班级的或小组的活动很有益处：它可以给人启发和推动。

现在再来比较详尽地谈谈兴趣的问题。

每个人的兴趣各不相同：有的人对社会生活的问题感兴趣，另外一些人对技术问题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对艺术问题感兴趣，等等。一个人是被迫学习还是乐于学习（俗话说，带着脑袋去学），其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例如，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情况，如果儿童的注意力被别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他们是很难好好学

习的。

“哈哈，普希金也得过零分。”

为什么普希金在皇村高等法政学校学习成绩不好？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公子哥儿，成天游手好闲？当然不是。他的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学非所需，还由于他的兴趣完全放在诗歌上了。

正是普希金，他曾经描写过一个诗人的感受（这位诗人未能表示对诗歌的兴趣，而诗人的内心却已对某一现象产生了兴趣）：

诗人尽在怯懦而虚荣地
浸沉于世俗无谓的烦扰；
他的神圣的竖琴喑哑了，
他的灵魂咀嚼着寒冷的梦；
在空虚的儿童世界中间
也许他是最空虚的儿童。

然而，诗人敏锐的耳朵
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
他的灵魂立刻颤动起来，
像是一只惊醒的鸢鹰。⑤

普希金喻之为“神的声音”的东西，也就是兴趣。

普希金所描写的诗人的心情，对于每一个对某种现象产生了浓厚强烈的兴趣的人来说，也是完全适合的。例如，一个医生沉醉于自己的工作中，可能达到忘我的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他的灵魂往往“咀嚼着寒冷的梦”：他精神不振，对四周的一切表示冷漠，——但是，只要一接触他的专业，他“立刻颤动起来，像是一只惊醒的鸢鹰”。你们不妨对人作一番观察：他们大多有一块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天地。不过有的人这个天地特别广阔，他的志趣在于改造人类的生活；另一些人则关心火警，还有一些人则只是想到自己的孩子，等等。兴趣往往产生于某种强烈的印象，这种印象有时甚至是很久远以前的。我认识一位消防专家。他十岁的时

候，遇上了一次大火灾，这次火灾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为消防工作所吸引。他气喘吁吁地在屋里谈起这件事，绘声绘影，竭力渲染。此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枯燥无味、度日如年的中学年代，小官吏的宦海浮沉生涯……而他唯一的休息就是在一个小城市的消防队当义务队员。

奶娘讲的故事和长篇的诗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深刻感受，决定了普希金的活动方向。

每当我们对职业兴趣产生的原由进行探究时，我们往往都会上溯到久远的感情经历上，也就是说，这种经历一直控制着一个人的感情。

兴趣可以使人集中注意力。注意力分为随意的和不随意的两种。随意的注意力只能保持短暂的时间，以后还需要再费力气才能复呈。不随意的注意力不需要任何意志力，此外，它要更全面、更深刻得多。如果一个学生对历史毫无兴趣，就很难让他注意听教员讲课，他的思想经常溜号，注意力涣散，因而他必须不断督促自己，为此要费去不少精力。如果一个学生对历史感兴趣，他就会注意听教员讲的每一句话，毫不分心。

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注意的时间越长，他全面掌握这一事物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知识贫乏、呆头呆脑的人不可能长时间对某一事物集中注意力，他对这个事物的兴趣很快就会减弱。反之，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学习，依靠对问题的敏感和判断，可以不断巩固自己对某一事物的注意力，“强化”自己的注意力。

我们所注意的事实和事物，往往能记得更牢。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德对一切有关微生物科学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但他一辈子也没记住每天晚上随他妻子一起念的祈祷词。

请看著名心理学家詹姆士^④对兴趣的作用所作的论述：

“大多数人都能牢记与他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一个有竞技能力的学生，他在学习上可能一窍不通，十分笨拙，但他对有关竞技活动的知识却非常丰富，令你吃惊，他可以成为体育统计数字的

活字典。原因在于，他经常想到他所爱好的这门活动，注意收集有关材料并逐一加以分类。这些材料对他说来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自成体系的许多概念（他已牢牢地掌握了这些概念）。正如商人不会忘了商品的价格一样，政治活动家总能记住自己同僚的演说内容和选举结果，其数量之大，不能不令旁观者惊服，但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并不足奇，只要我们留心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各行各业的专家对自己关注的事物总是千思百虑、朝夕不忘。

达尔文和斯宾塞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群脱凡的记忆力，很可能只相当于这两位科学家大脑功能的中等水平的作用。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向他切实灌输进化论（发展理论。——娜·康·）的思想，那么他就会很快地积累并牢固地掌握有关材料。

各种事实将把它们与理论的关系密切联系起来。科学家的智慧越能把各种事实区别开来，那么他的知识就越广博。然而，有些理论家的记忆力可能很差，所记的东西很不连贯，甚至完全不具备记忆力。一些对于理论家无用的材料，他可能不加注意，或者刚一接触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大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很可能与那种近乎大百科全书式的无知并存……”^⑤

兴趣激发了无意的注意力，而注意力又是记忆力的前提。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兴趣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选择学习材料时，应该以最感兴趣的、最令人“心神向往”的材料为选择的条件。对有的人说来，感兴趣的是社会现象，对另一些人说来，感兴趣的是技术，而对第三种人说来，感兴趣的是艺术，等等。

但是，主要选择某一领域的知识来学习，这完全不是说，一个人只应把自己的知识囿于某一领域，不必也不应涉猎别的领域。恰恰相反，我们只是说他对其他别的领域应采取什么态度。

比如说，我们面前有一个学生对技术感兴趣，另一个学生对

社会科学感兴趣。假如两人都要学习电气化知识，那他们的态度就会不一样。学技术的学生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他的着眼点在于：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电气化需要什么技术设备。这是他学习的重点。但是，他在考虑各种必要的设备时，也会关心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有助于电网的顺利建成。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人首先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待电气化问题的：电气化是建立苏维埃制度的物质基础所必需的，但要判断俄罗斯联邦的电气化是否可能，他必须弄清楚什么叫电气，电动机如何使用等等。我国出版了一本有关电气化的通俗读物，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教科书。写这本书的人不是一位工程师，而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活动家伊·伊·斯杰潘诺夫^⑥。

通过这个例子使我们看到，兴趣所决定的与其说是所获得的知识的内容，毋宁说是对这种知识所持的态度；兴趣是籍以掌握别的知识的一种基础。

心理学认为，任何新的思想、任何新的知识都应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思想联系起来，产生“同化”，或者说，新的东西应该与旧的东西“挂上钩”。

詹姆士认为，最令人感到快慰的，就是善于把新的与旧的联系起来，正视一切完全不同于我们早已形成的概念的新现象，揭露其神秘性，把它归入旧的、早已确定的门类，归入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现象的领域。尽力把新的与旧的同化，这是一种科学的求知欲，在这种同化未发生之前，新东西对旧东西的态度是很令人惊奇的。对于那些大大超越了我们的知识能力、我们对它毫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反而没有什么好奇心，也不感到惊奇，因为我们不知道把它归于何类，也没有具体衡量的尺度。达尔文有一次说，菲吉群岛的土著居民看见小船时感到很惊奇，看到大军舰时反而无动于衷。只有那些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的东西，才能使我们产生进一步深究的愿望。“任何新的片断知识都应该与儿童头脑中早已形成的兴趣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某种途径把这个片

断知识与从前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这就有了一种好处，就是可以把久远的、陌生的直接经验与最近的、熟悉的东西加以比较，把未知的与已知的加以比较，可以把所传授的知识与学生个人的经验联系起来。”^⑦

比如说，教员想给学生讲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这个概念。教员问学生：“如果有人想从太阳上朝您开枪，并且在他开枪时您已发现了，您怎么办？”学生会回答说：“我就躲到一边去。”这时教员可以这样讲：“您不必躲躲藏藏，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房里睡觉，第二天照常起床，无忧无虑地长大成人，学习经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子弹才快临近您了，这时您再躲一躲。您看，地球隔太阳是多么远啊！”^⑧

把新获得的知识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联系起来，并且依靠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这乃是选择学习材料时所应遵循的一条原则。问题不在于从各个领域猎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从而成为一本活的百科全书。问题在于要逐渐使知识深化，使新获得的知识与旧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从兴趣出发，使知识越来越巩固。

重要的不只是取得知识，而是要很好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教育”一词的涵意正是要围绕一个人已有的概念这个基本核心，培育一些与这一基本核心有密切关系的新概念。

不言而喻，农民获得知识的方式将不同于工人。两者的阅历和知识范围各不相同。我们在制定各种训练班和成人学校的教学大纲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这些大纲很少考虑教育对象的情况。问题不只是在于知识的分量，而在于通过什么方法和形式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教育对象。

读书是学习各种材料的基础。对于人类现代的生活，对于现代的文化，书本具有重大的意义：“人类文化是世代相传的，并且是建立在经验、知识、发明的积累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种世代相传，如果每一代都不继承这一遗产，一切从头开始，那么人类就会至今过着与原始野人差不多的生活。而经验和知识的

传播靠的是书本。世代相传的大量知识正是在书本中固定化起来的，而又由每一代人予以丰富，使之不断迅速发展，从而加快了人类文化前进的步伐。”^⑩

因此必须学会读书。要养成大量、迅速默读的习惯。要使阅读达到完全自动化的境地，不为任何事情分心。

但这还不够。要能弄通所读的东西。这就困难得多了，需要一定的水平，广阔的视野，相当的词汇量和概念。

随着读书的人的水平提高，对所读的东西理解也就更深。但是，要弄清楚哪些地方已经看懂了，尽量把不懂的地方弄明白。最好把不懂的地方再读一遍，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不明白：单词，成语，意思。要查阅政治辞典、百科辞典、有关的教科书和有关这一问题的通俗读物，以便把不懂的地方弄明白。弄清楚一个不懂的字的意义之后，最好把这个句子整个抄下来，记住它，同时考虑几个可以用这个字的类似的句子。要像孩子们碰到这种情况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去做。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她第一次听到“刹那间”这个词。在以后的半小时里，她把这个词与不同的词搭配使用了十来次。这个六岁的小女孩是无意间这么做的。青少年或成年人也应该采取这种办法，以便完全掌握以前不认识的单词，而在必要时就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个词。只不过要注意准确掌握词的含义和它的细微差别，以免用错了。

当然，这样来弄明白一些不熟悉的成语和单词的意思，可能会使读书的人离开了主要的东西，即掌握书中的基本思想。因此要注意尽快掌握文学语言并能熟练地理解其含义。

还必须学会弄明白所读的东西。最好按一定的程序来做这件事。

首先，读完一本书之后(开始最好是读完每一章之后)，要弄清楚作者想讲的是什么东西，他在这本书里要坚持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他引用了什么论据来论证这些基本思想。特别重要的是弄清作者的思路。明白无误地掌握所读的东西，这是自觉读书的第

一步。

很可能头一遍还不能把握作者所讲的意思，那就把这本书重读一遍，两遍。当你弄明白了所读东西的意思时，不要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地方，不必记住每一个单词——这样做甚至还有害。要找出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再看看其余的材料是怎样充实这些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的。有时，作者为了说明基本思想引用了许多事例，有时又运用了许多推理来论证自己的思想。读书时最好写一个书面的提要。所有这些方法都应认真在实践中采用。

然后应该考虑全书的内容。如果基本思想是用事例阐明的，首先就应看看事例是否正确，其次要看事例是否典型。自己要尽量提出一些类似的事例或者与作者提出的事例相反的事例。当作者运用许多推理来论证自己的思想时，那就应该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可否采取别的办法来论述，并且具体地说是什么办法；然后，把自己考虑的推理与作者的推理加以比较，看看哪种推理比较正确。还应考虑可否从别的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读书的人就应该得出结论，他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不同意的是什么地方。

全书读完之后，要做笔记，把应该记和想记住的材料，如事件的年代，人名，数字写下来。通常，最好不只是记下数字，而是根据这些数字绘制相应的图表，以便一目了然地掌握实际情况。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意思和成语记下来。但是，笔记不要过长，否则日后就难于弄清楚书中到底说了什么。只应该用提纲的形式记下最必要的东西，并分为许多部分。要写得清楚了。把书上的东西一连好几遍地抄在笔记本上要花不少时间，而且抄写的人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些东西的意思，这种冗长的笔记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笔记本记得简明扼要，使人一看就能想起所读过的东西，能弄清数字材料和其他材料，这种笔记本就很有用处。应该学习按这种方式记笔记，一开始不要怕花时间去练习，起初可以

从短小的文章做起，逐步掌握用这种经济的办法给自己作笔记的熟巧。

当然，有些情况下最好记得详尽一些。例如，如果这本书特别有趣和重要，那就可以不惜时间多摘录一些，把长的引文完全抄下来。如果打算用这本书做报告或写文章，那就应该这样做。有的人还未完全掌握书写的技巧，未完全掌握拼写法或文学语言，在这种情况下，笔记最好也记得详细一些。在上述的各种情况下，摘抄都是很有益处的。最好把有趣的和与所读材料有关的东西反复抄几遍，这比抄别的任何东西都有益。但是，一般说来，笔记应该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总之，阅读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弄懂意思，掌握所读的材料。第二项任务就是对所读的东西进行思考。第三项任务就是把要记住的东西做读书笔记。最后，第四项任务，就是看从所读的书中学到了什么新东西：这本书是否讲了一些新知识，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处和益处；它是否教你学会了某种新的观察方法、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是否激发了你的某种新思想；是否唤起了你的某种特别的情绪和愿望。

这就是我们拟定的读书的程序。

当然，这个程序可以稍加改动，问题提出的办法也可以稍有不同。阅读数学、自然学科等等往往只需要一部分程序。但是，一定得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因为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读书效果。

工作的程序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往往使一个人能够发现别人未能察觉的东西。例如，拿破仑在检阅时总能看出士兵制服上的一些很小的毛病，而检阅前军官们仔细看过之后也未能发现这些缺点。原来拿破仑在检阅时有一定的程序，而这一程序使他得以发现一切缺点。

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的专家是怎样对待同一事物的。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观察体系。例如，艺术家在观察植物时，他的程序是看色调的配合、鲜明程度，明暗色彩的配置，形式的雅致。艺术

家在观察这株植物时，可能完全不注意花里有多少雄蕊以及这些雄蕊的排列法——这个问题全然不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恰恰相反，植物学家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些雄蕊，叶子的排列等等，而可能全然不去注意当时这朵花的明暗色彩以及它的形状如何。

同样的道理，在阅读时对书本所采取的一定的程序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使您发现书中可能被忽略了的东西，如果您不有意去注意这个方面的话。这种读书态度逐渐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从书上学习知识，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能用自己切身的经验对这种书本知识和别人的经验加以检验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这些知识。我们在书上读到“雷鸣电闪时的大海，景色至为壮观”，这是一回事；我们目睹这一景色，这又是一回事。再比如，我们从书本上知道，机器可以节省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只有那种从前用手工方式干活，后来改用机器操作的人，才能懂得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从书本上知道如何做某种手术(眼睛、耳朵)是一回事，亲自动手去做这种手术是另一回事。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阅历广博”的人，由于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懂得各种风俗习惯，往往更能理解生活，而另一种饱学之士可能却不如他，因为这种饱学之士闭门读书，缺少亲身的体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特别重视“有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教师等等。中世纪时，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很有教益的风俗。学徒出师之后，还没有当师傅之前，要到各地去闯一闯，到别的城市去跟不同的师傅干活，看看别的地方的手工业同行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正因为如此，对自学的人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尽力把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通过个人的观察或劳动活动来加以检验。

从这种观点出发，参观农业、工业博物馆和展览会、示范农场和企业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活动。要广泛开展各种参观活动。不过这种活动要搞得有实效，而不要变成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

参观时要做笔记，会画画的人还可以画画，然后再写参观的心得。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到外地旅行，去接触并观察陌生的人和他们的工作、生活。而且，日常生活也提供了丰富的观察材料、学习材料。不过应该弄清楚，你想看什么，目的何在，然后把自己的观察进行到底，并做出相应的结论。

如果使整个集体都来参加这一活动，那么它会搞得更生动些，产生较好的效果。参加活动的人应该交流自己观察的结果。每个人有自己特有的态度：有的人注意到这一面，有的人却注意到另一面。这样一来，就能对这一事物进行全面的观察。集体可以弥补个别观察者可能疏忽的方面。

节约时间和精力

讲求实效的美国人随时随地都说：“要节约时间和精力。”他们出版了许多书（很遗憾，我们俄国人很少听说过），指出应该如何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安排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学习，应该如何节省学生的精力以求最快地达到目的。美国青年很懂得这方面的道理。我们也要学会它。

现在，我们不允许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生活在两种社会制度交替之际：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日趋灭亡，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正在成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像父辈和祖先那样生活。每天都给我们带来某种新东西，而对待这种新东西需要我们亲自观察、亲自判断、亲自决定。但是，若要亲自观察，作出正确判断和决定，并选准道路，就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整个工人阶级要有知识，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要有知识。如果慢吞吞、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我们就没有时间工作。要学会尽可能节约时间。

历史事实是，俄国（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举起了社会主

义革命的大旗，并且已把这面旗帜打了五年之久。如果它今后还想继续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地，它就必须加强自己的物质基础。为此它就必须拼命地“毫不停息”地学习，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和精力。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生活方式要求这种节约。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占了他们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有把业余时间用来自学，而他们的这种时间却很零散。

总之，目前的历史性时刻，俄国的特殊地位，学生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在学习时要竭力节省时间和精力。

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必须：

- 1) 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 2) 为自己创造最顺利的工作条件；
- 3) 掌握读书的必要技巧；
- 4) 正确选择学习材料；
- 5) 合理分工；
- 6) 从节省时间和精力观点出发，拟定集体工作的形式；
- 7) 具备必要的参考书和指导书。

先从安排时间谈起。

不言而喻，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时间，我们就要合理地安排时间。我们的时间通常是怎样度过的呢？只有上班或上工厂，我们才是按钟点，其余的时间都是随便度过的：有时是去找好朋友聊天，有时是捧一本无聊的小说躺在床上看；深夜还吵吵闹闹，让时间白白浪费掉，等到拿起一本正经有用的书去看时，却已困倦不堪，只好点燃一根烟，驱赶睡意，这时，书又扔在一边，开始与同事谈话、争论，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早上怎么也起不了床，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像散了架似的。

外国人比较懂得时间的价值。一些科学家、文学家和教授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按时睡觉，黎明即起，趁早上头脑清醒时工作，尽量少串门，严格安排时间。他们起床、工作、进餐、休息、

就寝都有固定时间，从不更改。这样一来，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持久不衰。

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是如何支配自己时间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例吧。他写了很多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似乎他的写作完全取决于情绪，实际上，他的时间是经过严格安排的。他每天上午写作，工作很紧张，反复修改同一篇作品。作家不可能与世隔绝：他要经常与人接触，观察他们，研究他们。列·托尔斯泰抽出一定的时间与人交往。然后，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读书，等等。谢尔盖彦科写的《列夫·托尔斯泰生活和工作侧记》一书，很好地反映了列·托尔斯泰这方面的生活情况。

法国作家左拉的工作情况也是如此。左拉写了大量小说，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左拉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他也像托尔斯泰那样，每天上午写作，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研究他所写的那些社会阶层。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伟大的音乐家(例如，贝多芬)的创作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他花了大量时间来弹钢琴，很严格安排自己的时间。

一些在实验室里与微生物打交道或在解剖室工作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医生、科学家，他们安排自己的时间更为严格。您不妨读一读有关爱迪生、路易·巴斯德和其他著名思想家工作情况的书。著名的外科专家柯尔即使到了晚年，也严格支配自己每天的时间，按时就寝，每天抽一定的时间打网球，好让手在做手术时刚劲有力。

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凡是想取得辉煌成就的人，都应该非常珍惜、严格安排自己的时间。

合理地安排工作以免浪费时间和精力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尽可能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头脑清醒,不能过度疲劳。疲劳不堪的人工作起来速度既慢,效果也差。最佳工作时间当然是早上。正常的人在早上工作的效果最好。当然,如果要很早去上班,那就很难在早上安排学习。但是,如果工作是上午十点、十一点才开始,那就一定要把早上的时间利用起来。不过有人往往由于睡得太晚而不能早起,那就应该尽量改变这种生活习惯。晚上学习令人感到疲倦,为了驱赶睡意,人们往往喝浓茶、抽烟、展开争辩,结果很快就疲劳过度了,工作效率随之下降。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在空气新鲜的环境里工作。要使头脑正常和有效工作,就需要使心脏的工作正常、均衡,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房间里不能太闷或太热。学习前要开气窗或窗户,使室内空气清新。烟雾弥漫的房间对学习的影响极坏。

还有一个良好的条件就是工作时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周围有人大声喧哗、高谈阔论,随时都有人向你问这问那(尽管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是很难学习的。要学会照顾别人,让人安宁。当别人学习时,不要吵吵嚷嚷,吹口哨,高声谈话。要使自己养成在图书馆或俱乐部学习的习惯。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使你学习时分心。此外,在图书馆学习随手可以取用百科全书、参考书、地图册、教科书,这些东西都是认真读书时经常要用到的。

诚然,一个人有时可能是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和忙乱中学习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是他所读的书或干的工作使他入了迷,以致他无暇顾及周围的情况。阿基米德是著名的古希腊科学家、几何学家,有一个关于他的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他沉醉在他的几何图形里,甚至当敌人进了他的房子,朝他跟前走去时,他还说:“别碰坏了我画的圆。”不是任何人和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样全神贯注,不为周围的情况分心的,因此,如果外界没有什么干扰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同时,为使学习能顺利进行,还必须不受别的思想的影响,别像普希金笔下的欧根·奥涅金那样:

他的两眼盯在书上,

但是思想飞到了天边……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最好还是早上学习。昨天的印象经过一夜之后已渐淡漠，而新的印象还未产生，暂时还没有什么东西来破坏内心的平静。如果没有必要的平静和学习所必需的情绪，就要尽力为自己创造这种平静，培养这种情绪：或者在房间里快步走几圈，开始哼什么曲子，进行某种回忆，读几页最喜爱的作者的书或者采取其他某种类似的方法。

为使学习顺利进行，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没有这种技巧就无法读书。

这种技巧包括：能读、写、算，会看地图等等。要养成快速大量默读的习惯，养成做简明扼要的笔记的习惯，对书本提出一定要求的习惯。

为什么需要养成上述这些习惯呢？为了不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种习惯可以使人的智慧得到解放而用于思考。动物的大部分动作都是无意识的。人刚生下来时，神经中枢并没有专司无意识动作的现成器官。“但是，成人的无意识器官却很多，而且大部分是通过艰苦劳动形成的。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通过训练而完善，而习惯又没有减少神经和肌肉能量的支出，那这种人的处境就是很悲惨的。所以，孟德斯里^⑩说：

‘如果动作经过重复还未变得容易一些，如果每次对这一动作的重复需要意识一再的指引，那么，显然就不可能有任何发育上的进步，而我们整个的日常生活活动就会局限于一两个动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整天就只会穿衣脱衣，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到穿着上；每次洗手或扣钮扣他都会感到困难，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做这种事一样。最后，一些无效的努力使他深为苦恼……’

然而，正如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同时会带来一点疲劳一样，意志的自觉努力在这方面近似机械的或基本是无意识的行动，很快也会使我们疲倦^⑪。

我们知道，一字不识的成年人学习把字母连写是多么难；还有，识字不多的人签名是多么难，他要花很长时间、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名字写上。不说，当这些事情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时，他是不可能去钻研读物的含意的。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克服技术困难上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应当培养一定的技巧，达到熟练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进行认真的阅读。

上面我们已经谈了：从节省时间和精力角度看，选择学习材料具有何等的作用。下面我们已讲过的话略加重复。

学习要量力而行：所选的书起码文字上要能看得懂，不要选择那种需要相当高的水平才能看得懂的专业书，如果实在需要读这种书，那首先就得掌握必要的知识。读一本啃不动的书就等于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浩如烟海的人类知识中，只需要学习那些特别重要的、对理解周围环境和改造这种环境有用的知识。工人和农民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各种没有重大意义的知识。

当然，应该按需要研究的问题选择最好的书，因为这种书能全面地、深刻地、正确地讲清这个问题。最后，应该从最感兴趣的问题读起，逐步扩大学习范围，把有关的重要领域纳入，围绕一个基本核心来组织全部新获得的知识。

还要培养自己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工作的能力。

学习经验不足的人往往漫无目的，一会儿读这本书，一会儿读那本书；一个题目未掌握好，又换了另一个题目。这种学习方法收效甚微，也很不经济。不要乱学一气，要有一定的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要很明确具体，不能是遥远的、不着边际的。比如说，有一个人想研究资本主义。这个题目太大。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把这个总题目分为许多比较小的题目，然后从中选出一个题目，比如说，现代资本主义。然后还要把这个题目划小。例如，开始研究某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的现代资本主义。进一步再缩小范围，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只有把这个具体

的题目弄懂之后，才能转到另一个与之有关的具体题目上去，同样，把这个问题掌握之后，再搞别的问题。这是掌握相当大的题目的一种最经济的办法。当然，要制订出这样的计划，就必须对整个题目的总的概念有一些了解。

美国著名工程师泰罗在谈到劳动组织时指出，应该给每个职员、每个工人一定的具体任务。泰罗说：“水平越低的人，知识越差的人，就越是要给他提出比较简单和比较近期的目标。任何一个教师都不会想到让一个十岁的儿童研究某个问题，学习某本书。他只给儿童布置一些很容易的任务：读哪一页的哪首诗，哪篇故事。一本教科书是分成许多部分去掌握的。”

泰罗的这个意见完全正确。初次读书的人，只能给自己提出力所能及的、不复杂的、最近期的目标。只有通过这种办法他才能完成总的任务。

要初学者制定学习计划，这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因为他不清楚他所学习的这一材料的份量和这一总题目下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比较了解总题目的同志应该给初学者以帮助，或者是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参考书。各个训练班的学员在这方面有一些很有利的条件，就象农民所说的“可以吃现成饭。”他们的学习计划已由训练班的领导拟好了。这当然要省事得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初学者也是很有好处：他可以不走冤枉路。但是，如果一个读者养成了自己定计划的习惯和提出近期任务的习惯，他就比训练班的学员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为他可以定一个比较适合自己个人情况、符合自己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计划。

现在再谈谈下面这个问题：怎样学习更有效——是个人学还是小组学？

这就要看小组的学习是如何安排的。如果小组的成员学习很自觉，按时来上课，大家都能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特别是如果小组里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时，——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就更有效。集体学习可以节省时间。应该从每个人的力量出发而有

所分工，经常交换意见有助于大多数人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明白。讨论可以提高大家对学习的兴趣，启发大家的思想。此外，集体学习可以加强督促，使学习能稳步前进。正因为这样，我们极其重视小组学习。当然这是指具备了上述条件之后。如果小组的成员经常迟到缺席，在家里也不去看学习材料，只是在小组里夸夸其谈一通，而不认真地进行任何独立作业，那就最好退出这种小组一个人去学。

但是，不管是小组学还是个人学，为了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学习的人都必须准备各种必要的教材和指导书，使学习走上正轨。需要有一本通俗的政治辞典；还需要有一本通俗的百科辞典，参考书目（指出每本书的内容，具有什么水平才能读懂）；还要一本学习计划汇编，把学习各门知识、适应不同程度的人需要的学习计划编入其中。要出版一些学习最重要的知识的指南，这种指南要给独立学习提供较大的余地，指出对某一问题如何进行自学。如果有了这些材料，就会使自学更有成效。

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

我们往往不大了解我国流浪儿现象多么严重，不大了解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①。我们对这件事考虑不够；而为了消灭这一现象，我们做得更少。当然，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专门有一个处^②，它与缺陷儿童和犯罪儿童机关一起，大力开展着反对流浪儿现象的斗争。但是，难道这就够了吗？

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旧制度的被摧毁以及1921年—1922年间的饥荒，造成大批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单靠一个处的努力，或者靠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的努力，甚至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各条战线都要作出努力来消灭这种现象。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把消灭这一灾难变为全体组织起来的居民的工作；要发动各级苏维埃机构、妇女部、俄国共青团以及一切能对此作出贡献的人参加这一工作。

有些人认为，反对流浪儿现象只需要把流浪儿抓起来，然后送到各个儿童之家去就行了。只要多拨一点钱，用作抓人，用作开办儿童之家，就万事大吉了。

实际情况却是：流浪儿往往逃避登记，而且即使进了儿童之家，他们也经常逃跑，因为儿童之家不掌握他们的心理特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参加生活的训练。儿童之家往往无济于事，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何况我们又有多少个儿童之家呢？我国登记在册的流浪儿达七百万（而未登记的又该有多少！），可是儿童之家最多只能收容八十万。其余的人怎么办？

流浪儿之中，有的是儿童，有的是少年，对他们采取的办法又各不相同。

当然，不管对儿童还是对少年，首要的任务是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有病能治，有人照管。各种委员会（一般的，特别的，中央的，各省的以及其他的委员会往往忘了，每个流浪的少年儿童首先需要的是关怀，是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都于事无补，甚至反而有害。

各个机关都要认真关心流浪儿的吃住问题。自愿帮助流浪儿童要成为自愿支援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形式。

妇女部、共青团、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大家都应全力以赴地帮助流浪儿童。重要的不在于成立什么特别委员会，而是要想方设法能找到帮助流浪儿童的途径。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太严重。凡是打算要做一件什么事情，马上就是这么一套搞法：谁负担经费，工资额是多少，设置几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哪儿去找；而正事却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所以说，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发动全体居民帮助流浪儿。当然，这并不是说苏维埃机构可以“把无力的双手在冷漠的胸前”一交叉，什么也不管，而光让居民去关心流浪儿的问题。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级机构都应大力开展帮助流浪儿的工作。

至于说到流浪儿童，只要我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地方住，真诚地关怀他们，并且为他们敞开学的大门，那我们就做了或者说几乎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对少年流浪儿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这些儿童有强烈的反社会的情绪，不信任任何人，心怀不满，十分孤僻……对他们要采取特别的态度。首先，要让“不信任的冰河”解冻；其次，帮助他们自立；最后，给他们安排一个力所能及、又感兴趣的工作，把他们的旺盛精力和首倡精神引上正轨，同时，要把他们安置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让他们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与自己的反社会情绪是格格不入的。

要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就得让他们感到大家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快进监狱的人，看作人类的渣滓；不要把他们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让大人牵着他们的小手，然后往角落里一放，而要以友好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尊重他们的意志和人格。甚至资产阶级都懂得这一点，他们为流浪儿成立了童子军组织(如英国)。难道我们还不懂得这一点吗？难道我们就那么笨，只会对流浪儿说一些挖苦的话：齐步走向儿童之家，那儿去找爹和妈。要知道，他们既无爹妈可找，又无儿童之家可去。

俄国共青团要吸收少年流浪儿加入自己的组织。共青团员比“哥儿姐妹们”更信任少年流浪儿，不管“哥儿姐妹们”的手段多巧妙。

还有，就是要为流浪儿设置集体宿舍、食堂，为他们敞开俱乐部和学校的大门。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是否吸引流浪儿参加了这项工作呢？思想工作人员在这件事上做了什么工作呢？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英国的童子军运动安排了流浪儿的生活。它使这种生活带上了罗曼蒂克的美妙色彩，它不强制流浪儿的意志，让他们的首倡精神和独立精神充分发挥，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丰富的内容，大力发展他们的社会本能。

我国有无类似的组织呢？共青团面向18—23岁的青年，他们声称：“我们不是小娃娃。”少先队组织刚刚建立，那儿的活动稚气十足。所以这个迫切的社会问题一直未解决。国外的少年往往通过童子军组织找到了参加劳动生活、参加社会工作的途径。

是的，资产阶级关心的是（他们不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要把所有的儿童培养成资产阶级制度的忠实奴仆，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道德，培养他们具有资产阶级的观点。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们也要对少年流浪儿进行社会帮助，让他们参加组织，因为这种组织将向他们展现一个新世界，引导

他们走上新路，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由这种童子军组织向正常的劳动生活过渡，这件事应该尽量使之简化易行。要在保健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劳动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协助下，找出少年参加劳动的适当形式，这种形式不能有任何剥削现象，但是确实是社会所需要的，而且要把这种形式安排得能满足学习和进行组织工作的需要，等等。

组织少年流浪儿参加劳动，这当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对他们进行根本的帮助，所以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在组织少年流浪儿参加劳动的同时，还应积极地为他们设置集体宿舍，开办食堂、俱乐部、学校，——所有这些都是迫在眉睫之事。

浅论教师

在教育工作中也应充分利用专家。不要害怕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习气”。真正优秀的积极的教师不会不跟共产党员走。

《真理报》第61号刊登了莫斯科国民教育局长拉法伊尔同志^①的文章《是官僚主义还是教育工作的进步》。

这篇文章把情况说成这样：莫斯科国民教育局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好，而妨碍莫斯科国民教育局有益工作的只有“小资产阶级习气极为严重的”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一类的人物。

凡是注意到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工作情况的人或是看过该局教学大纲和在社会主义教育部代表大会上听过该局发言的人都知道，莫斯科国民教育局的工作到底搞得是好还是不好。讲这种话要严肃负责，慎之又慎。我在本文里只想谈谈所谓“小资产阶级习气极为严重的”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一类的人物。

约尔丹斯基^②不久前还是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的局长，而沙茨基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最积极的一个成员。

我过去反对延请约尔丹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不对之处，而是由于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全体委员应该一律是共产党员，而且我现在也还是这样主张。但是，只要我们看看约尔丹斯基在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担任局长时的工作情况，对他那种无比忠于国民教育事业的态度的态度，对他一贯重视建设普通学校这一问题的态度，我是

衷心敬佩的。

我与沙茨基^③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共事已快两年了。我对他的首倡精神、积极工作和忠于事业的表现，一向是很佩服的。我还应该指出，我们合作很好，没有任何重大分歧。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的工作很重要，它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它坚持什么路线——对此，党员同志都了解，中央宣传部也了解。

是否应该吸收沙茨基和约尔丹斯基参加工作呢？

我认为必须这样做。我们面临着愚昧无知的汪洋大海，而为了消灭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力量。

首先应该利用那些对国民教育事业无比忠诚、感情深厚的人。我是十分器重和敬佩这样的工作人员的。我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这种人才目前还不多，不应浪费。

那对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又怎么办呢？

首先，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并且经常得到证实：凡是忠于教育事业、热爱这一事业的人，就不可能不在这个问题上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执行的是一条最重要、最正确的路线，为开展工作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不仅如此，正是共产党员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所持的立场把许多教育工作者引向了共产主义。这是第一点。第二，凡是十分清楚自己奋斗的目标的人，就再不去胡诌什么“小资产阶级习气”。共产党员大权在握，并且又有道德威望，完全可以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即使这种小资产阶级观点的确存在，而不是那种不会实行自己路线的共产党员所想象的，那这种观点也并不可怕：有可以与之对比的观点。重要的是善于克服小资产阶级习气，重要的是揭示其实质，让人们加深认识。

共产党员面临着一个繁重的任务，就是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教师。由于大多数教师接近了工农群众，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工农情绪的影响，这项任务现在是能比较好一些完成的。但是要认真对待这一任务，就要恰当选择进行教育的论据并能做到

以理服人。

乱扣帽子，说别人有“小资产阶级习气”，这种做法要不得。我认为这是蛊惑人心的手法，是软弱无力的表现。

改革教师培养工作

去年，我们大力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在建设新式学校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所采取的措施、对各地的工作、对个别教师和部分教师创造性的创举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确实有可以总结的东西。诚然，由于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要走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崭新道路，开垦处女地，同时还要进行一种极可贵的尝试，即为苏维埃工农学校打下基础，我们也做了许多幼稚可笑的事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的学校已初具规模，这种学校一方面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学的成就上的，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它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培养着新生活的建设者。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还进行了检查，看看工农苏维埃学校应该授予学生什么知识，并且从共产主义和现代教育学成就的观点对教学大纲进行了审订。省社会教育科代表大会^①最近通过的教学大纲纲要，抛弃了旧的传统，提出了必须面对现实的方针。

总结经验，确定工农苏维埃学校教学工作的内容，这就为培养这种学校所需要的教师打下了基础。

全俄各地都传来了消息：教师转变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渴望了解现行制度的原理，了解教育学上的新的教学法。“轮训教师”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令人感到还缺乏一个教育宣传的经常中心，这个中心能把教师团结在自己周围，并把那些在教育和政治方面逐渐提高的教师组织起来。这

个中心不能是国民教育处^②，因为国民教育处的编制极小，而且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国民教育工作。只有教育工会才勉强可以作为这种中心，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把同行业的教师团结起来，而生产宣传则处于次要地位。

还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关：国民教育工作可以依靠它，教育工会的生产宣传工作也可以依靠它，——需要建立一个教育实验室。经过改革的高等师范院校应该成为这种实验室，新式学校的思想通过它传播，这种思想在新式学校里得到提炼和探究，并从这里传播到居民和教师中去。高等师范院校应该成为教育宣传的中心，就像高等农业院校应该成为农业宣传的中心一样。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与国民教育处和教育工会地方分会一起商定，应召开专门的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听取教师的修改意见。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包括依靠学生力量按一定提纲对地区教育工作进行的考核，这种考核应成为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建设的一个基础；应包括组织本地教师的教学法咨询委员会，举办教育问题的讲座和报告会，组织“教育活动周”，举办教育展览会、短训班和召开各种教育代表会议。高等师范院校不仅应关心本校几百名学生的培养工作，而且还应关心本地区广大教师的轮训问题，关心本地区的教育工作水平的提高。

培养大学生参加教育工作，不应该流于抽象空洞和过于烦琐，而应在组织大学生参加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进行，并且要从理论上论证这一工作，在坚实的共产主义基础上进行这一工作。

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应包括利用学员的力量为政治教育机关服务。现在，政治教育工作甚至都未纳入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然而这项工作却要求我们投入不少的力量。当然，高等师范院校的学员不应该花时间去举办音乐会和戏剧演出会，邀请演员，筹集资金等等，但是他们能够而且也应该参加扫盲工作，流动图书馆和咨询处的工作，进行谈话等等。这种工作要求具有

专业技术的人去做，而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正好能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这项工作可以使未来的教师接触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并且可以使未来的教师学会做居民的工作。这项工作可以启发他们的思想，激起他对社会生活中许多问题的兴趣。只是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还不能造就社会活动家，还必须具备感情方面的先决条件，而深入地进行政治教育就能创造这种条件。当然，为了使学生们高质量地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进行实际工作的同时，对各种社会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准备。这种准备工作要做得生动活泼，不能搞烦琐哲学。使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作居民工作，就能培养出把学校变成文化中心的社会活动家式的教师。

除了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大学生还应学会对少年儿童进行校外工作，如：对少先队员，对流浪儿，在儿童游戏场，儿童俱乐部，儿童阅览室和食堂。这有助于大学生普遍地了解现代的少年儿童，从而能正确对待他们。在这里，仍然应该把实际工作与对儿童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与对儿童身体素质、年龄特点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与对环境的影响、游戏的作用以及组织在他们整个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才能去研究学校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组织问题。大学生的社会素养和对儿童的知识可以使他自觉地对学校据以建立的原则。这样，他就能理解新的教学大纲，明确知道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什么，掌握新的教学方法、新的儿童工作方法的实质，懂得应该怎样组织儿童在学校的生活，如何使学校充满共产主义精神。同样还应利用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力量进行对成年人的工作和儿童的校外工作，高等师范院校的工作计划还应包括中小学的工作。

对于未来在二级学校任教的教师来说，还必须做到：研究农业，或者是研究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领域。每个二级学校的教师都应研究上述两种专业之一。劳动学校要求教师具有哪怕是

国民经济一个领域的扎实知识，掌握这个领域的方针，并能把专业知识与一般知识联系起来。否则他就是国民经济领域里的外行，而这将会影响他的专业课（本族语、数学、自然）的教学，因为他不能把握劳动学校的基本课程：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和组织劳动的方法。

一些思想僵化的教师和教授会说：“这纯粹是空想，走极端。”他们没有看到，用当代的革命精神对学校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新式学校都要求对整个教师的培养工作进行彻底的改革。

论道德缺陷儿童问题

“道德缺陷”……这个丑恶的资产阶级术语怎么进入了我们苏维埃教育学并且得到了普遍承认呢？

“道德缺陷”这一术语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存在着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在人的意识之外，是由某个人从外部确定的。

这种道德规范在人的心灵之中，凡不懂得这种规范的，就是道德缺陷者。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特别喜欢使用这种道德观念，把它的资产阶级道德描绘成永恒的、不可动摇的道德。

哲学唯心主义遭到马克思主义体无完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与哲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斗争，他们深知哲学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手中多么有力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及道德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依靠对历史的研究，断言：道德观念并非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它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变化着，社会的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比如说，不仅野人和现代人对是非善恶的见解完全相反，而且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也截然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道德的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不同阶级的道德的阶级实质，它还指出了道德观念是如何在一定的经济、政

治、日常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极其精辟地阐明了道德观念产生的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一直在与哲学唯心主义作斗争，这当然不是由于这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满足，就像下象棋消遣一样。他们之所以要与哲学唯心主义作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把无产阶级从精神上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是多么重要，是因为他们知道宗教只是哲学唯心主义的“群众通俗读物”。

宗教是控制群众的有效手段，是扼杀群众阶级本能的手段，是削弱群众阶级意识的手段。

但是，如果不摧毁宗教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唯心主义，就不可能与宗教进行斗争。

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道德缺陷”这个术语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有受迫害的儿童、凶狠的儿童、受苦的儿童、患病的儿童，但是不存在道德缺陷的儿童。

为什么要用这个术语给苏维埃教育学抹黑呢？

教育那些凶狠的、患病的儿童确非易事，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为了生存而进行凶狠斗争的艰苦条件下，长期生活在极其腐朽的环境中。在作风上需要极其细致，很讲分寸，要对他们进行观察，给予帮助和支持，使他们社会本能的心弦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适合这项工作的教师呢？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经济凋蔽、饥馑丛生，使得无家可归的儿童急剧增加。要想办法安置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往往是那些不了解儿童、不热爱儿童的人，而是那些需要解决吃住问题的人。“道德缺陷”这个术语可以使他们不负任何责任（无论是内部的抑或外部的）；可以使他们不去考虑儿童，不去尊重儿童的人格和个性，不去正确对待儿童；它也可以使他们不去唤起帮助弱者这一最普通的人类良知。“道德缺陷”这一术语使他们以犯罪的态度对待流浪儿童也成了合法的事了。对“道德缺陷”儿童设置单身禁闭室，“隔离室”，使用

一些侮辱人格的称呼，——总之，一切能想的办法都想出来了，对这些孩子还是没有法子，因为他们是“有缺陷的”。

“道德缺陷”这个侮辱性的术语使一部分缺乏良心和觉悟的教师为所欲为，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这个术语。

派去对这些被生活遗弃了的、生活上堕落了的儿童做工作的人，应该是一些朝气蓬勃、非常细心的人，他们要能取得儿童的信任并善于对待儿童。

应该帮助那些备尝生活辛酸的儿童，要帮助他们提高，应该派优秀分子去做这一工作。

反对一切类似“道德缺陷”这种推脱责任的资产阶级术语！

无人照顾的流浪儿童和患病儿童应该成为苏维埃可爱的孩子。

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

(在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1. 由于历史形成的条件，俄国第一个摆脱了资产阶级制度的桎梏，得以根据新的原则来改造整个生活，并且结成了兄弟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

世界革命的胜利帮助了俄国，为俄国发展壮大创造了必要的国际环境。但是俄国国内还有迫切的工作必须去做（不完成这一工作，她就不能担负起面临的任务；现有的种种条件也不能得到利用），这个工作就是提高全国的文化水平。为了根据新的原则来改造整个生活，必须群策群力做好这一工作，合理地安排和分配力量，与现代科学的成就步调一致。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工作中，教育人民委员部担负着特别重大的任务。

2. 教育人民委员部要弄清楚，它怎样制定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才能明确规划本部工作的远景，并确定它在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中承担哪些局部任务。

3. 六年来，通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顽强工作，使我们变得实事求是起来，学会了考虑实际情况和严格的估计现有条件。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理由放弃它1918年宣布的原则。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现在还信守这些原则，不过它现在在认识上更明确了，知道工作从何着手以及如何逐步达到既定目的。

4. 1918年提出了对共和国3—17岁的全体儿童进行社会教

育的口号。教育人民委员部认为，国家应该供应他们伙食和衣服，让他们在儿童之家接受教育，等等。

实际生活表明，目前国家完全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它至多只能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是，建立必要的儿童之家以收容流浪儿童。

只有完成了这一首要任务之后，才有可能扩大儿童之家网点，并收容那些在家里无法受到教育的孩子。

对于其余的儿童，暂时还只能通过学校进行社会教育。由于在校时间延长了(例如，长日制学校)^①，首先使校外工作得到了发展，成立了暑期学校^②，学校的影响也扩大了。正是应该沿着这条道路去扩大社会教育的范围。不过我们不应忽略，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儿童，因此延长在校时间和开办暑期学校后也不能减少学校网点。

5. 在社会教育方面，我们应该实行两项原则：男女合校原则和彻底的非宗教教育原则，余下的问题就是在下列方面加深社会教育的内容：加强集体主义本能、习惯和意识的培养，普遍实行适当的自治形式和组织儿童在校内的劳动，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特别要巩固学校与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的联系。

考虑到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在校内外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教育人民委员部应千方百计地支持这两个组织并加强它们与学校和儿童之家的联系。

6. 在各种群众性的社会教育形式中，最切实可行的是学前教育，因为学前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人和农民从照顾儿童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所以劳动居民乐于为修建学前教育机构而作出物质上的破费。只不过需要指出，目前不可能开办大量讲究的幼儿园，而只能设立一些比较简陋的幼儿园。3—8岁时的印象对儿童的心灵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这一年龄阶段的社会教育特别重要。

7. 按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设想，国民教育制度应是分为几级

而又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统一学校。

一般说来，一级学校招收8—12岁的儿童，其宗旨是培养儿童读、写和算的能力，授予有助于他们了解周围的人的劳动活动、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的知识并培养其能力。

二级学校第一阶段招收12—15岁的儿童，其宗旨是更加全面地介绍人的劳动活动及劳动活动的组织，介绍自然力、自然和社会生活规律，把学生培养成苏维埃共和国的自觉公民。

二级学校第二阶段招收15—17岁的儿童，其宗旨是培养新生活的自觉建设者，而不论他今后将在何部门从事何种专业的工作。

第二阶段应该向学生明确地讲述苏维埃政权在建设领域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和手段。

第二阶段的学生，凡具有某种专长和必要素养的人，可升入高等院校学习。

8. 教育人民委员部力图把这种统一的学校变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劳动学校。

统一的学校应该特别重视人的劳动活动及劳动活动的组织。这一主题应该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各级统一的劳动学校的教学大纲之中^⑤，它决定着自然科学方面教材的选择，是研究阶级社会、社会结构及发展的基础。

以研究人的劳动活动为方向，并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界、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实与历史的相互关系，这样就可使教学内容具有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的性质。在统一的劳动学校里，我们不是从专家的观点来对待劳动，而是从新生活建设者的观点来对待劳动，不管他今后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他都必须对上述各种关系有一个明确的理解。

我们对普通教育的观念有了本质的变化。从前，我们所谓的普通教育是指学习一般的知识，其范围有限，主要是人文科学性质的东西。现在对普通教育则应作另一种理解：明确懂得上述各种相互关系。

统一的劳动学校不仅在教学内容上，而且在教学方法上都应该是一种劳动学校。它应该广泛采用劳动教学法这种得到公认的现代教育方法，因为这种教学法能使学生透彻深刻地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统一的劳动学校应该成为一种劳动学校，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它应该与周围人的劳动活动有直接的联系。从二级学校第一阶段开始，学校就应该成为扎实的劳动基地。

六年的经验改变了我们对二级学校性质的看法，一方面把它看成工厂学校；另一方面把它看成青年农民学校；再就是把它看成设有手工劳动或市政劳动基地的学校。

在这种学校里，从事一定领域的劳动：工业（通过工厂和手工业的形式），农业，市政建设。这种劳动的基础不是自我服务，而是社会公益劳动。但是，无论是在工厂学校，也无论是在青年农民学校，或者是在市政建设为主的城市学校，都要保持综合技术的、普通教育的特色，而由于对一定领域的劳动从实际上和理论上进行研究成了出发点，这一特色只会越来越突出。

不言而喻，如果这样来处理问题，就应把统一的劳动学校的学习看作一种实际的劳动试用期，并且对于一切愿意和具备了必要条件的由二级学校升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开方便之门。

9. 教育人民委员部认为，不仅是二级学校，而且还有高等院校，都应成为生产基地。

高等院校网点的分布应认真考虑到生产地区的需要。

每一所高等院校都有自己一定的生产计划，即高等院校要利用师生的力量完成与他们教学课程有关的领域里的一部分社会必要工作。此计划应与该领域的经济机构共同认真商定。

在完成既定计划的过程中，大学生可以把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这样一来，高等院校的工作就会搞得生气勃勃并使学校与该地区的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

摆在日程上的问题还有：高等院校应进行一些该地区所需要的调查研究工作。

此外，高等院校还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本地区进行一些与学生专业知识有关的生产宣传。这种生产宣传的性质和形式，以及在专业高等院校高年级建立教育系以培养教育专家的问题，都要认真加以讨论。

高等院校的这种教育系应该与中等师范学校和侧重教育专业的二级学校建立密切联系。

10. 在我国条件下，上述国民教育制度表现为下列形式：

1) 国家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使我们在当前只能以兴办一级学校为主，以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广大阶层的群众能够入学；

2) 在俄国主要地区，一级学校定为四年制，招收8—12岁的男儿童。四年制应为一级学校的标准学制；

3) 除了这种类型的学校之外，在比较落后的地区最好实行三年制；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削减学校网点。不应忘记，即使是我国的一级学校，也只有50%的学龄儿童能够入学，在四年制还不能普及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办三年制的学校，还可以办二年制和一年制的，把它们当作四年制的萌芽，并在短期内将它们发展成为四年制；

4) 在条件许可的地区，四年制可以改为五年制、六年制和七年制，同样不能因此而削减四年制学校网点；

5) 如有可能，有的一级学校不仅招收8—12岁的儿童，而且还可以招收没有受过初等教育的少年。这类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办成夜校。鉴于学生年龄比较大，为少年举办的一级学校的课程可开二年。这种学校招收未满18岁的少年；

6) 凡是专门设立少年学校的地方，只要儿童学校有缺额，这些少年也可以入儿童学校学习。但吸收少年入学，人数不能过多，因为他们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7) 如上所述，二级学校应与某一生产部门保持密切联系，这个部门是学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学习的场所，而且是二

级学校教学大纲普通教育部分的出发点；

8)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定型的劳动学校形式，即工厂学校^④。工厂学校是把教学与工厂的劳动结合起来的学校。就学生的年龄结构(15—18岁)来看，工厂学校超过了二级学校的第一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的文化水平过低，工厂学校只能相当于一级学校，即令如此，往往也还要为一些少年办补习班，以便赶上一级学校的课程。总之，工厂学校在年龄上可以放宽，它相当于一级学校的水平，只进行第一阶段的普通教育部分；

9) 青年农民学校^⑤尽管还未开办，但雏型已经具备了。它相当于一级学校，尽管预定招收的是12—15岁的儿童，实际上将要招收年龄大得多的青年。这种学校主要学习农业，方针是面向农业。青年农民学校广泛采用设计教学法^⑥，这种方法可以使学校与农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参加工作，到示范农场实习；

10) 对城市学校完全未作研究，这种学校一般说来应以市政劳动^⑦为基础。这种学校第一阶段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的课程应从理论和实践上与某种市政劳动紧密联系起来；

11) 职业学校应进行改革，与生产保持密切联系，保留第一阶段教学大纲的普通教育部分；

12) 工厂学校、青年农民学校、职业学校和以市政建设为重点的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入中等技术学校，也可升入第二阶段继续学习；

13) 中等技术学校授予二级学校第二阶段的综合性的普通教育知识。

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有权升入任何高等院校一年级或相同专业的高等院校二年级。

总之，青年一代所受的专业教育是：初等专业教育在工厂学校、青年农民学校、职业学校和市政劳动学校；中等专业教育在中等技术学校；高等专业教育在高等院校。上述每种职业教育一

方面与生产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与相应等级的普通教育大纲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使学生不是成为一个盲目执行他人命令的人，而是要成为既是生产部门的工人，同时又是主人。

11. 应当着重讲讲教师的培训制度^⑥，因为教师是新式学校开展工作必不可少的人。如果不认真抓好这一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一切决议无异于纸上谈兵，只是一些美好的愿望。教师的培训工作应由国民教育局负责，教育工会则应积极支持。高等师范院校应该是教师培训的中心。每个生产地区的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在教师中开展教育宣传并通过教育工会为教师服务。例如，按照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计划，新的教学大纲应以地方材料为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收集当地材料并加以分类，这个要求就是一纸空文。个别教师无力从事这项工作，国民教育局也无力从事这项工作，因为它忙于行政工作。教育工会也无力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作都可以委托高等师范院校去做，通过苏维埃机关收集材料，从教育学的观点对这些材料进行评价，以编写必要的指导书。

再拿地区教育工作的生产计划这个问题来说。这一计划应由国民教育局会同科学教学法研究会^⑦一起制定，但是，无论是国民教育局，抑或是科学教学法研究会都不能预先做一些有关的调查工作，而高等师范院校却可以承担这项任务。

这样一来，高等师范院校就成了思想上的教育中心，依靠这个中心任何培训班都将取得截然不同的教育意义，它既有利于教师培训，又有利学校的教学工作。高等师范院校应与教育工会、中等师范学校和地区学校建立联系并通过它们进行教育宣传，关心它们的工作。中等师范学校和地区学校都应当成为在教师和居民中进行教育宣传的中心(虽然规模小一些)。中等师范学校以及高等师范院校应与本地区的教师就教育问题互相通信，成为一种教育咨询处；应与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

应在教育工会的协助下在本地区举办教育报告会；应根据国民教育处的指示举办训练班，召开代表大会等等。另一方面，中等师范学校应该系统地研究本地区教育工作的情况并设法提高教育工作的水平。中等师范学校以及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也应在居民中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对少年儿童进行校外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流浪儿的工作，同时还要搞校内工作。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教育宣传机关网，才能培养出符合建立新式学校所需要的有高度业务水平的教师。

与工人和党的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这也有助于教师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12. 为了帮助工人和农民顺利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专门为成人和青年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⑩，招收具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人，其课程包括一级和二级学校(两个阶段)的教学大纲。

这种特殊类型的学校为劳动人民进入高等院校敞开了大门，而他们以前是不可能受到高等教育的，同时，由于他们的热情、毅力和对待一切问题都能从工农利益出发，因而国家对他们特别重视。

13. 国民教育制度里还包括各种类型的成人学校。开展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这在我们俄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一般说来，扫盲学校应发展为成人一级学校。

这些学校应该授予学员一级学校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知识，当然，所使用的教材不同。然后开办提高类型的学校，授予二级学校的知识。

在一般地提高文化水平和觉悟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展专门提高政治觉悟的工作。为此建立了政治常识学校，一级和二级苏维埃党校^⑪。党的教育制度的最高层次为共产主义大学^⑫。在我国的形势下，党的教育与一般教育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一级苏维埃党校应保持一级学校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知识水平，二级苏维埃党校应保持二级学校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知识

水平。

14. 在开办成人学校的同时，还应设置其他各种教育机关以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要出版群众需要的专门丛书，设立图书馆、俱乐部、人民文化馆，开展各种体育运动等等。

艺术在政治教育工作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能作用人的感情，激发新的兴趣，扩大人们的视野。应该广泛利用电影、节日活动这种能影响群众的方式。

15. 建立一个条理分明、既考虑到国家的要求和时代的任务，又有充分科学根据的国民教育制度，——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形势的发展将会指出：什么地方还须修订补充，使之臻于完善。这个提纲只是一般地谈了谈我们对国民教育制度^⑧的理解。

为了完善这一制度，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目前只不过是刚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16. 实验学校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省国民教育局所属的单位，它是现代教育思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所以及各种科学研究机关能给上述工作以巨大帮助。

高等院校的研究所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的工作既应与生产保持联系，还应与高等院校的整个工作保持联系。它们能使高等院校不停滞在某一水平上，也不会让高等院校沉醉于某些成就上，而是促使高等院校赶上现代科学的水平，使高等院校洋溢着一种科学探求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工作。

培养列宁主义者

(在俄国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三十年前，列宁在他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本小册子里，曾经以赞许的态度引用了莱辛的几句诗：“谁不赞美克洛普什托克呢？但是，每个人都会去阅读他的著作吗？不会的。我们希望人们少恭维我们，而多用心阅读我们的著作吧！”^①这就是说，与其去赞扬我们，不如去读我们的作品；我认为，这段话也适用于对待列宁。每当谈话涉及到某一个老革命者，而这个革命者已经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他的话不能左右群众的行为，但是人们还尊敬他，并且千方百计地去称颂他，在这种时候，列宁往往在他的言谈中以惋惜的心情使用这样一个颇为不恭的词——偶像。列宁常常说：“这算什么，这不过是偶像”；在他的文集里，有一些地方曾谈到，偶像是一种应该对之顶礼膜拜的东西，但是它却不能左右人们的行为^②。

不能把列宁变成偶像，而要使他的思想成为行动的指南。我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是一切想成为列宁主义者的共青团员的指导思想。

同志们，你们都想成为列宁主义者，而要做到这一点，你们就必须学会为解放劳动人民的事业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在战前的和平发展时期，在那些容许社会主义存在的国家里，往往有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一张党证，订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参加一些会议，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党员了。我们当然不

能这样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生活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跟社会生活脱离的现象会使一个人迟早背叛共产主义事业，过去对这一点可能不清楚。今后，我们必须竭力使我们个人的生活跟斗争、跟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联系起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个人生活。共产党不是清教徒，因此它不会鼓吹这种禁欲主义。我曾经在一个工厂里听到一个女工对别的一些女工说：“女工同志们，你们应该明白，既然你们要入党，那你们就不应该照管丈夫和孩子。”当然不能这样做。问题不在于不照管丈夫和孩子，而在于把孩子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并且还要使丈夫也成为这种战士。要善于把自己的生活跟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这并非禁欲主义。恰恰相反，由于有了这种融合，由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事业成了自己的事业，个人生活也就因此变得丰富起来。它不会变得更加贫乏，它所产生的那种生动而又深刻的体验，是小市民的家庭生活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了共产主义而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融合起来，把它跟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而进行的斗争融合起来，这是目前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任务。你们是青年人，你们刚刚开始建设自己的生活，你们能够把生活建设好，使个人生活跟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

同志们，列宁在他的著作里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他为奠定这一理论而孜孜不倦地工作。明确的既定目标，对这一目标的深刻理解，确定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这些都是每个革命者所不可缺少的素养，因为如果不明白前进的方向以及前进的道路，那么不管他对自己的工作怎样热情，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

为了能够在自己的活动中把主要的东西跟次要的东西区分开来，也必须对既定的目标有深刻的理解并能看清前进的道路。列宁就具有这种把主要的东西跟次要的东西区分开来的能力。进行

斗争的时候，在次要的东西上往往要作些让步，以便得到主要的东西。机会主义者跟革命者的不同点，就是机会主义者往往在重要的、主要的方面作出让步，忘记了目标，放弃了目标。我们看到，列宁在自己活动的过程中一直是跟这种机会主义、跟这种不能捍卫主要的、原则性的东西的表现进行斗争的。另外还可能产生一种错误：如果一个人不能把主要的东西跟次要的东西区分开来，他往往会被一些革命的空话所迷惑。反对讲革命的空话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列宁的全部活动里。列宁说过：革命理论不是教条。它是行动的指南，工作的指南。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理论。目前，我们特别需要研究革命的理论。苏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因此国内的无产阶级有很多阶层，有无产阶级的进步的阶层(均在大工业部门工作)，有比较落后的阶层，有手工业者，不同阶层的人的阶级觉悟程度很不相同。因而无产阶级的真理光靠嘴说是不能教育每个无产者的。青年们要善于掌握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就特别需要仔细地研究革命理论。

不应该盲目地相信一切：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对一切都要切实加以思考，对一切都应认真加以检验。这是青年人的任务，也是想成为列宁主义者的共青团员的任务。列宁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事实也的确如此，正是由于他以革命的理论作指南，所以他能找出各个时期所要达到的最近的目标。

对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方法的深刻理解，可以使一个革命者受到应有的锻炼。它可以使革命者在进攻时勇往直前，也可以使革命者在退却时镇定自若。列宁写道：“我们应当时刻进行平凡的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意外，因为爆发时期转变为平静时期往往是很难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转变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非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绝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纳杰日丁之类的

人大概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几次比较激烈的爆发时期和比较沉寂的平静时期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的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和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并且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各方面的生活、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起来的政治鼓动工作。在现代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是绝对无法进行这种工作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是按这个字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真正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萧条’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③。

要善于妥协,如果这种妥协是不可避免的话。1917年9月,列宁在《工人之路》④报上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⑤

当然,并非经常要采用妥协的方法。列宁喜欢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政治斗争并非在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漫步,⑥有时也必须在泥泞中行进。

列宁不喜欢空谈和吹嘘的作风,他要求每一个革命者和党员都能非常紧张地进行工作。

这种工作有时是不愉快的,平凡的,但是一个革命者不能拒绝这种工作;为了事业,不仅需要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作,而且还需要进行平凡的日常工作。

列宁写信给米雅斯尼柯夫说:“有些人对笨重的工作、对缓慢而艰苦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张惶失措,去找‘捷’径……”⑦。

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而不倦地工作,不要懈怠——这就是列宁的遗训。

要为共产主义而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联系起来,以革命的理

论为指南，清醒地看待生活，不要惧怕棘手的工作，这样，你们就一定能够成为列宁主义者。

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志们，我国的整个生活都在向前发展，你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社会进步的时代，你们要高举列宁的旗帜，跟群众步调一致，走在群众前面，朝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论儿童之家问题

儿童之家应该办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起初，即1917年—1918年间，我们讲过必须进行社会教育，我们以为能够给全体儿童提供住宿、伙食、衣服，授予他们知识和社会生活熟巧。实际生活表明，这是目前条件下国家做不到的；这只是一个要经过漫长的途程才能达到的遥远的目标。

现在，我国有相当多的儿童需要国家抚养和教育；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一个极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却完全不能胜任这一任务。问题全然不在于没有经费，这是明显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认真考虑儿童之家的工作方法，我们对儿童之家的的问题没有深入地、扎实地进行过研究，而这个问题却是关于一大批儿童的前途的问题。

儿童之家应该办成什么样？

儿童之家应该是这样一个机构，它能使儿童得到全面的体力发展；获得丰富的知识并能将这些知识用于生活；养成劳动的习惯并能过集体生活、能集体进行工作；能理解生活并在生活中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一员。

可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就拿体育来说吧。儿童之家的体育活动往往开展得很不好，借口是穷，经费不足。是的，我国的儿童之家的确很穷，但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儿童之家的领导人对如何搞好儿童的身体往往认识不清。大多数教养员知道清洁卫生的重要，尽

量把儿童之家搞得干净些，但是他们对新鲜空气、运动、劳动条件和睡眠等等的作用，却理解得很差。

举例说吧。夏天的时候，天气很好，可是孩子们却坐在地板上织袜子，房间里门窗紧闭。儿童之家有阳台、花园，可是却没有儿童可以在户外干活、学习的工场。于是只好在令人窒息的教室里和车间里干活。这并非由于车间里有什么机器和设备，举例说，编织车间所用的唯一工具就是编针，但孩子们却不能到室外去，而是坐在闷热难耐的房间里。当然，冬天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没有厚衣服，但是可以轮流穿嘛。宿舍、教室等处要开窗，这件事在我们儿童之家做得不如预期的普遍。夏天，儿童在户外、在阳台上睡觉是很少有的事情。

再谈谈运动的问题。年龄大的学生经常运动，但往往只限于年龄大的，其余的学生则无人过问。令人深感惊奇的是，比如说，连散步的活动也没有。我不谈远足旅行，这种活动只能偶而为之。不过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到附近的小山上去爬山，这总是可以的吧！因为现在有许多儿童之家的孩子，从来没有走出校门一步。我不禁想起了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件事。她在学院^①学习了九年，九年间，她们只出去散步过一次。每个人都很惊奇：“当时是有时间的呀！”然而，这种旧时留下来的习气，这种旧时闭门读书学校的作风，至今依然存在。不让孩子们走出校门一步，这就是旧时闭门读书的学校的遗风。

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可以到处瞎跑，而是要按班级经常组织他们去散步。

还有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就是儿童之家很少关心儿童在户外的自由游戏。我说的不是打棒游戏和踢足球，这种游戏往往使人如醉如痴；我指的是自由游戏，这种游戏可以发展儿童的首创精神、集体生活能力，激发他们的想像力。我国的儿童之家很少做自由游戏，甚至于学龄前的儿童之家也很少做这种游戏。要是孩子们在儿童之家能多做一些游戏，那么孩子们的就会丰富多

彩。当然，应该教孩子们学会如何进行游戏。

儿童之家对擦身、洗澡、游泳也不大重视。很少有哪个儿童之家认真地组织过游泳活动。

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中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做到的事情。

对睡眠问题更是不关心。往往一张床上睡两三个儿童。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能安然入睡，为手淫创造了条件。对睡眠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现在在儿童之家又常常演剧，儿童们也常到少先队俱乐部去玩，因此他们睡觉很晚，睡眠不足。有一次，一个来访的美国人提请我注意我国孩子睡眠时间很少的问题。她很惊奇地发现我国孩子的睡眠时间太少了。她对我说：“我们美国很重视睡眠。”

我们往往也不注意合理的休息，不注意让体弱的孩子白天得到休息，并且尽可能打开窗户。

有时(例如夏天在菜园里干活)完全不注意不要让孩子太疲劳，超过他们体力。

至于说到智力发展，这方面的情况更糟。孩子们在儿童之家往往什么也不学，或者学得很不好。谁都不管他们的学习。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儿童之家的主任应该负责儿童的知识训练。儿童要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去上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它可以大大减轻儿童之家的负担，而且还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儿童之家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之家的任务就只是安排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学习落后的儿童搞好学习，并组织他们独立读书。我国儿童之家目前书籍奇缺，对读书也不感兴趣。谁也不关心培养并巩固这种兴趣，却说什么：“没钱买书！”没有钱，但是可以从图书馆借书，可以与别的学校和儿童之家交换图书呀！要组织年龄大的孩子系统地读报。在儿童之家往往见不到报纸，没有安排读报活动。儿童之家不抓学习，没有书报，这是令人发指的灾难。对此必须认真注意。

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儿童之家的儿童劳动问题。

许多儿童之家的唯一劳动就是自我服务，夏天就是到菜园干活。每个儿童之家应该还另外设置一些手工业车间，如缝纫车间，制鞋车间，编织车间，木工车间，装订车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车间即使从手工业的观点看来也是一些很粗糙原始的设施。

当然，自我服务，种菜园，能使用一般的劳动工具，这都是必要的。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安排这种劳动。可以安排得使儿童对整个劳动学习感到是一种负担，也可以通过这些劳动使儿童学会集体地工作，按照科学的劳动组织安排自己的活动，等等。

但是，即使自我服务、种菜园和果园、饲养牲畜、做手工活都安排得很妥贴，即使这些活动使儿童学到很多东西（顺便说说，这种情况很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儿童之家如何培养儿童走向生活？培养他们将来干什么？离开儿童之家后的生活出路是什么？儿童之家办得越好，向何处去，干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就越尖锐。

不久前我参观了一所儿童之家。孩子们都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这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儿童之家。孩子们很有教养，非常活泼，学习抓得很紧，儿童们自己管理事务，把儿童之家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搞得很好，他们做木工活，搞装订，缝衣服和做鞋子，种果园和菜园，开展雕刻、绘画、歌咏活动，而主要的是，教师在这所学校的作用不是很突出的，因为儿童们组织得很好，他们有一种内在的纪律，他们表现很好。但是……这些儿童的生活出路何在呢？他们在严峻的生活中将占有什么地位呢？当然，他们并非公子少爷、千金小姐，他们在哪里都可以成为有益的人，他们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是……儿童越是天真活泼，就越是使人摆脱不了这个问题：今后怎么办？今后每个姑娘、每个小伙子都将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如何为生存而斗争，如何适应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工作——“只有天知道”。

我认为，应该换一种方式来组织年龄大的儿童的劳动。现代生活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也许，现在与其说是需要大学生，毋宁

说是需要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能深刻认识生活、掌握一门专长并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的人。

我们试举几个方面的例子。目前国民饮食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否有足够的懂行的工作人员呢？因此，儿童之家就可以开设一个国民食堂，好让孩子们实际学习这门业务，而在学校里则让他们学习卫生学、营养学、会计等等，——总之，学习作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国民饮食业工作人员所必须知道的一切。工会要帮助这些孩子，等他们离开儿童之家后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工作。

另一项工作——饲养家禽。儿童之家可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可以让孩子们学习饲养家禽，学习包装和保存蛋品，等等。我们很需要会饲养家禽的人。做这种工作需要大学毕业生吗？不需要。儿童之家就可以培养出一批会饲养家禽的人，他们能像家禽饲养指导员那样做出不少贡献。

还有养蜂。

还有养兔。

还有种菜和管理果园。

目前儿童游戏场和幼儿园似乎发展很快。大量的农村幼儿园没有领导人。儿童之家可以开办幼儿园来培养这种领导人。

要培养年龄大的儿童走向生活。这个问题要细致研究。通过这种办法也许能使儿童之家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

而主要之点在于，生活出路有了着落，就能使流浪儿安心在这些儿童之家呆下去；从而使流浪现象今后少出现一些。

各级工会、经济工作人员、各级执行委员会，一切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个人和单位，都要尽力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学什么和怎么学

(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我只想讲几个问题。我觉得，在谈到进行列宁主义教育时，这几个问题特别重要，因而需要着重讲一讲。列宁的全部演说，他的每篇文章，都贯穿着一根红线，就是仇恨一切压迫和剥削现象。如果我们看一看无政府主义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那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待剥削和压迫问题的态度是很暧昧的，他们不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反对这种或那种剥削形式，而只是笼统地说要消灭产生这种剥削和压迫现象的制度，却又不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考虑如何去根除这种原因。

如果我们看一看列宁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那就会发现，他认真地研究了每一种剥削形式。就拿工厂的剥削来说吧，他的研究不限于工厂里的一般剥削形式，而是认真地研究了这种剥削的一切形式。我们知道他写的这样一些小册子(如关于罚款的小册子^①，关于6月2日法令的小册子^②)，对剥削究竟采取的是什么形式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列宁怎样对待农民问题，他怎样提出这个问题，怎样阐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呢？他是怎样从这个问题发展的根源，从农奴的解放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农奴的这种解放是怎样进行的，地主是如何挖空心思去霸占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以及他们又如何利用这些土地去奴役农民。

你们在学习列宁的演说和文章时就会发现，他对剥削和压迫

的一切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入木三分。资本家的剥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民族的压迫——所有这些问题列宁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探索其发展情况，找出最本质的东西，好让人们明确斗争的目标和斗争的方法。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和很简单的事。当然，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会说，他不仅仇恨压迫和剥削现象，而且还知道产生压迫和剥削现象的那些形式。

但是，同志们，不应忘了下面这个事实：我们现在已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是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下，这种过渡的基础是不大发达的工业和小农经济。当然，不能认为在这种过渡的制度下就不存在任何剥削现象了。诚然，由于革命的胜利，由于社会的巨大进步，许多旧的剥削形式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不能认为，现在就不存在任何剥削，不存在任何压迫了。这种剥削和压迫现在采取了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与旧的形式虽然有着有机的联系，但毕竟在性质上有了某些不同之处。因此，同志们，这里就有一种很大的危险性，就是对旧的剥削形式的仇恨，将会由于旧制度的消亡而失去对象。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正视生活，不善于深入了解生活，不善于观察周围的形势，我们就可能发现不了新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当然，从前那种形式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了。从前对工人的那种残酷剥削现在已经没有了。地主的财产被剥夺了，尽管有的地方还有点反复，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旧的剥削形式已被摧毁了。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意观察身边的情况，这样才能发现各种新生的剥削形式。这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

我们现在对旧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比较熟悉，今后，时间越久远，所有这些问题就越复杂，我们要注意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要流于空泛，要对这些剥削形式进行详细的探讨，详细的研究。现在已经暴露出我们对新的生活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很不够。我们现在谈起剥削和压迫时，往往流于一般化。所以我说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应该认真研究一切新的剥削形式，否则时间越长就

越复杂。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现在的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环境的变化也是迅猛异常，因此我们应该经常注视这种变化，研究各种变化中的剥削形式。

这个问题很复杂，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不久前，我曾经与一些团员同志谈过一次话，我问他们现在都成立了一些什么小组。他们说，有政治常识学习小组，还有列宁主义学习小组，什么都有，却似乎没有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而如果我们要懂得列宁主义，那我们首先就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马克思的学生。他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经常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求教，尽管这些著作他过去都读过，但他还是经常重读，从中找出对待生活的新办法，认真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阐明了这些规律。当我们谈到各种自然现象时，每个人都清楚，在这里必须具备对自然界的知识——化学和物理现象的规律，并且随着人们对这些规律的研究日趋深入，他们就越能控制自然界。研究自然规律的目的是为了驾驭自然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不用我们去讲。对待人类社会生活的态度也是如此。社会的发展是以一定的规律为根据的。各种现象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规律。要想驾驭运动，要想使革命运动走上正轨，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规律。

列宁曾经说过，必须学会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法”。马克思阐明了现象发展的情况，指出每一种发展中的现象都含有新的生活形式的萌芽，描述了新的形式如何摧毁旧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就提醒共青团不要迷恋各种口号。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了解个别的口号，而要研究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把他的革命辩证法运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他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和发展的情况，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如何形成了资本主

义制度掘墓者的力量。他描述了工人阶级成长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了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革命目的以及工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以，理解工人阶级的目的，理解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才能洞察周围的情况，了解瞬息万变的形势。过去，有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人，他们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革命的辩证法。他们认为，只要随便读几本马克思的书，同意马克思的结论，这样他们就有资格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了。但是，列宁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是这样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所以，他把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用于俄国的实际，用于他工作和活动的那一时代。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已清楚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那时正是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时期。列宁根据他所精通地掌握了的马克思理论，评价了这个时期所具有的深刻的革命意义。

列宁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研究了俄国具体条件的一切特点，反复思考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用于实际生活。由于列宁掌握了革命理论，所以他就能够找到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所必须经历的途程。列宁能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且能够正确地运用这种理论，这不是出于他的个性特点。同志们，你们今后将会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要你们去解决，因此你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

列宁任何时候都很重视改变现存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一革命目的。他十分重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正是他和那些他毕生与之坚决斗争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不同之处。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③在发言中说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时，列宁站到了当时还是革命者的考茨基^④方面。他指出，否认工人运动目的的重要性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经济派分子也举起了机会主义的大旗，不过形式稍有不同，带有特殊的俄国形式。

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也完全估计不足。他们说，必须进行经济斗争，因此他们也只重视这种经济斗争，而马克思一向十分强调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他们却毫不重视。因此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一起与经济派分子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同样，列宁与之进行了顽强斗争的孟什维克的主要错误何在呢？列宁指出，孟什维克与自由党人沆瀣一气，投靠激进的资产阶级，放弃了基本的立场——正确评价无产阶级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明确地理解目的，认清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凡此种种，使列宁能够对所有这些机会主义倾向作出正确判断。

青年要想走革命的道路，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这种理论能使他们了解周围的现实。一般说来，没有任何一个口号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每个口号只有在它所产生的那一具体历史环境中才有意义。米尔托夫^⑤在他所著《历史信札》一书中曾说过，任何一个口号，即使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革命的，但是时过境迁，它可能就是反革命的了。判断某一口号是否恰当，就看你能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待现实并对此作出评价。一个政治上没有素养的人拿起列宁著作一看，他可能觉得列宁有很多前后自相矛盾之处。在许多问题上，列宁在不同的时刻捍卫的是不同的观点，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各种现象的内在联系，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他就会感到有矛盾，而实际上却是同一观点在不同形势下的发展。就拿立宪会议这个问题作例子来说吧。在无产阶级还未取得政权之前，这个政权最初是以苏维埃的形式出现的，这时布尔什维克是支持立宪会议的；而当革命的苏维埃建立起来之后，当苏维埃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政权之后，这时立宪会议这一口号所具有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它已从一个革命的口号变成了反动的口号，因为它可能削弱无产阶级已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再以合作制作例子来说。列宁对合作制的论述，在取得政权以前的提法与他逝世前所写的几篇文章中的提法完全不同。他在

逝世前所写的文章中說，目前合作制對於在集體主義的原則上改造整個社會具有重大的意義。只要我們把列寧的著作拿來讀讀，我們就會發現：列寧在不同的具體情況下對某種運動形式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

要了解具體的情況，首先就要掌握理論，因為理論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體系、一定的辦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縝密地研究周圍的現實。如果你們看一看列寧是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的，你們就會發現，他根據書本知識、根據個人經驗、根據同志們的談話與講述，對現實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如果你們看一看列寧的大量筆記本，你們就會發現他怎樣把自己在俄國生活中所觀察到的每一事實與歐洲生活中類似的事實加以比較，並且在進行這種比較時，盡量找出兩者之間的某種差別。他在筆記本上的批註表明，他總是盡量抓住由於情況不同而產生的那種差別。如果你們讀一讀回憶列寧的文章，你們就會發現列寧如何細緻地向同志們詢問各種情況，他如何根據個別的敘述，根據個別的事實盡量把握事物的全貌，他如何每次都對每個問題進行檢查。在黨內的一次討論會時，列寧寫道：黨內發生某種分歧，產生某種危機時，那就應該以極其忠誠老實的態度對待問題，要尊重真理。

列寧在研究現實時總是採取老老實實的态度，能够尊重真理，而且他还善于向敌人学习。如果敌人能够正确地评价某种现象，列寧并不考虑这一评价来自敌人，他还是利用这一评价，以便找出正确处理事态的办法。另一方面，列寧不仅善于直接向敌人学习，也善于间接向敌人学习。他把敌人的赞扬当作警钟，以促使他重新审时度势，看看自己是否犯了什么错误。

列寧还善于从错误中学习。例如，1903年，列寧提出并坚决捍卫了党纲中关于把1861年土地改革时地主从农民份地划出来的、不给农民耕种的地段归还农民的条文。后来，在190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⑥来总结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他在文章中直率地指出党纲中的这一条文是有关份地问题的一个不正确的口号。

尽管列宁曾经热情地捍卫过这个口号，激烈地反对过普列汉诺夫的主张，尽管他长期以来就一直在争取所有的人都站到他这一边来，力图让他们了解这种划出份地的做法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后来，在革命之后，他依然对这件事作出了客观的评价。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口号是有缺点的，当时应该立即提出更为革命的口号。

这种革命的诚实态度，在处理每个问题时，不计较可能一切都要重新作出评价；不计较可能要做大量的工作；不计较任何个人的尊严威信；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明确地提出问题，直截了当，力求找出正确的答案）；——这种认真学习的本领，这种深入观察的本领，这种善于学习别人经验的本领，这种敢于正视事实的本领，正是想成为列宁主义者的青年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最后，我想稍为谈谈列宁要求每个革命者忠于革命事业的问题。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写了一个革命者准备怎么献身的问题。他说，在运动刚刚兴起的年代，应该是极度克制的年代，应该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年代，在日后回顾这些工作时，会感到这一工作当初实际上很不惹人注目。一个革命者就应该准备做这种默默无闻的日常的粗活。但是，与此同时，一个革命者又应该准备建立丰功伟绩，准备表现最伟大的英雄主义。这也是列宁在《怎么办？》^⑦一书中阐述过的观点。这本书当时曾使党员们爱不释手，它在革命运动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一个革命工作者应该准备为一切献身：既要去干默默无闻的日常粗活，又要去建立英雄般的丰功伟绩。列宁的这种主张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列宁主义者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列宁主义者应该去干日常粗活，不管这种工作如何困难，他都应全力以赴。在革命运动处于高涨的时刻，他也应该对一切都有准备。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列宁如何认识群众的作用。九十年代的时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刚刚建立，当时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当时特别强

调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米海洛夫斯基写过一篇题为《英雄和群氓》^⑧的文章。他认为，群众乃是唯英雄之马首是瞻的没有主见的群氓。拉甫罗夫也提出了英雄主义问题和有识之士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后来，社会革命党人也接受了这种英雄和群氓的观点，把英雄人物放到了首位。马克思主义者却持不同观点。他们讲的是阶级斗争。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阶级斗争”这个术语的意义，我们就应该像列宁那样对待个人的作用这一问题。他放到首位的是群众问题，是群众在某种动机的影响下而行动起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总是把个人的行动与这个人所代表的那一阶级联系在一起来看的。个人离开了群众，离开了阶级就会一事无成。但如果个人把自己的革命活动与革命阶级的活动、与无产阶级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由于个人把自己这一叶扁舟系在一艘大船的船舷上，系在无产阶级的事业这艘大船的船舷上，由于这个缘故，个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只有在他不脱离群众，只有在他代表了人民意志的情况下，他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们看一看列宁的著作，看一看他发表的演说，你们就会发现他是多么重视群众。他说过，“社会主义是群众生动的创造。”^⑨在他逝世前的几篇文章中，他说现在应比从前前进得慢一些，但这是大批群众的前进活动，是千百万人的前进活动。如此评价群众的意义，如此评价群众的创造力，堪称为列宁的特点。列宁认为把群众组织起来，提高群众运动自觉性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一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列宁主义者应该学习他的这种对待群众的态度。

而要了解群众、依靠群众，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因为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群众运动的始因，教我们认识革命的力量，以引导群众达到伟大的目的。

一个青年要想成为列宁主义者，他就应该认真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

(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①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您们表示祝贺！

我们大会召开的时刻，正值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热情明显高涨之际。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广大的群众都卷入了根据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生活的热潮，现在又出现了这种热气腾腾的局面。

今年，即1924年，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看到，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中，非党工人如何积极争取入党并在党的领导下改造了整个生活。我们看到，农民的主动精神也表现得非常强烈。每天都有从农村来的青年到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来，向我们讲起他们在地方所做的大量工作。

刚才，就在我讲话之前，我还和一个在雅罗斯拉夫省偏远乡村工作的小伙子谈过话。他的一席谈话告诉我们，即使经费微乎其微，我们也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这个小伙子是个有残疾的人，他向我讲了他是如何在他那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的房里展开工作的。他在自己那间房子里办了一个农村阅览室，并且与附近各村的许多红角建立了联系，他在农村阅览室做了大量工作。他钱不够时，就拿起背包去为农村阅览室筹款。据《真理报》不久前报导，他在《真理报》主办的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这个小伙子并未因为经费不够而裹足不前，也不畏惧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他热情充沛，干劲十足。

当你看到工人正在按新的要求建设自己的生活，看到青年农民正在百倍努力地改变压得广大群众透不过气来的整个日常生活和千百年来形成的旧基础时，这时你就会明白，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我们的可能发展红角、农村阅览室、儿童游戏场，把我们的全部经验向群众介绍，并帮助青年、工人和农民真正按新的原则来改造生活。我觉得，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应该是一个转折性的大会。

应该一起来好好考虑一下，如何使幼儿园深入到城乡的日常生活中去，如何在目前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唤起社会对幼儿园的重视，如何做到使幼儿园不仅得到国家的帮助，而且也得到一切文化团体、一切认识到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人士的帮助。青年大学生夏天经常到农村去，他们在农村开办了一些幼儿园，已取得了经验。我们的示范学校在有些地方也办了幼儿园，也取得了经验。这些经验说明，只要有首创精神，只要能引起大家对这件事的重视，就可以花少量的钱而取得很大的结果。只要依靠青年农民，甚至于只要依靠少先队员，就能取得在另一种形势下看来完全不可能取得的成果。

我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使居民关心幼儿园，如何使各地忘我工作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学会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这是生活本身提出的任务，这次大会应该加以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决。我认为这一任务至关重要，因此衷心祝愿你们在这一工作中取得成就。

学校和少先队运动

教师们正在迅速提高并且日臻成熟，他们用建设新式学校所必需的知识武装自己，深受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与此同时，少先队运动从工人阶级内部脱颖而出，这一运动使教师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有了少先队运动，教师的工作好做多了；另一方面，却要求教师进一步提高自己。

少年先锋队是一种儿童组织，它有自己的章程、宗旨和工作方法。

在这个组织里，儿童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的感情，学会集体行动并且服从集体的意志。

成立儿童组织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孩子们能够养成随时随地关心整个集体的利益的习惯，并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集体的言行联系起来。这样，儿童就能形成一定的集体主义心理，这种心理能够对各种本能进行适当的调节，消除软弱无能、孤独无依的感情。儿童越早开始过集体生活，他就越有希望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共同事业而献身的名副其实共产主义者。

在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健康儿童，都渴望参加组织。凡是观察过儿童游戏活动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儿童对少年先锋队组织很感兴趣，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少先队的宗旨是协助工人阶级的事业并且为这一事业服务。

有人也许会说：协助工人阶级的事业，帮助无产阶级开展斗

争，这个宗旨是儿童们难于理解的。事实果然如此吗？现代的儿童感到这个宗旨是很亲切，很好理解。他们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讲起不久前的事，讲起当时的斗争目的；他们看到周围生活中百废待举，因此他们就不难理解党和共青团的奋斗目标。他们越早为自己确定目标，越早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这一目标，就越能使他们成为更加坚强有力、志向明确的人。

尽早确定目标，开展集体活动，这本身就对儿童的发育成长具有重大的意义。

少先队采用的积极工作方法也能对儿童产生最佳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儿童看见“红领巾”的整齐队伍时，看见儿童严守纪律的表现以及欢乐明朗的面容时，孩子们一个个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

但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少先队员参加庆祝活动的这一方面的生活情况——看他们表演，听他们演说；然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日常平凡的工作。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儿童不断成长，不断进步，使他们的知识日益丰富，对既定目标的理解更加深刻。否则少先队运动就会不景气，过一两年之后就对少先队员失去了吸引力。少先队运动要与学校的学习联系起来，要依靠学校的学习。

再有一点，就是要让儿童在自己的工作中提出正确的具体目标，使它与总的目标密切联系起来，使它非常具体并逐步复杂起来；这也是很重要的。目标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这恐怕也是件最为棘手的事。要使具体的目标合乎社会的需要，既是儿童们力所能及的，又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要使他们努力所得的结果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小队和中队提出的具体目标要随着儿童觉悟和能力的提高而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有的青年为儿童运动的初步成绩而沾沾自喜，竟然说什么“学校无所谓，儿童运动才是关键。”

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十分尖锐地提出深入、系统地搞好学习的问题，而离开了学习，少先队员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列宁主义者。不把系统的学习与实际的经验结合起来，青年人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一元论世界观。具备集体生活和工作的本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而具有远见卓识，能合乎逻辑地思考问题，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这是事情的另一面。如果少先队运动竟然提出要“打倒学校！”那么，尽管它旗帜如何鲜明，表现如何进步，它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客观上将起着一种反动的作用，而表面的华丽多采不过是用来掩盖旧时的那种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

苏维埃学校与儿童运动一样，它力图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力图培养他们能够解决历史向他们提出的任务。苏维埃力图很好地用知识来武装全体儿童，因为只有掌握了知识，他们才能明确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知道应该怎样去改造生活和安排生活；只有掌握了知识，他们才能取得胜利。苏维埃学校将教儿童学会把人类积累的知识用于实际工作，教他们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没有知识的人有如瞎子。苏维埃学校要使瞎子重见光明。由此可见，绝不能把少先队运动与学校对立起来，两者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内在联系。

儿童运动对学校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它为学校提供了新的儿童人才。少先队运动大大提高了儿童的人类尊严的意识，激发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兴趣，使他们养成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教师对这种儿童进行工作要容易得多。

教师和少先队运动的领导人即共青团员们，要向儿童们讲清旧的、资产阶级学校和新的、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渗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校与洋溢着无产阶级思想的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教师和共青团员们要向儿童讲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掌握大纲的这一部分，他们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教师能做到这

一点，他就会对儿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奇。对于儿童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件事？”教师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回答他们说：“这与你没有关系，你不必东问西问，好好学习就行了，大人会知道你该学些什么东西才有用。”而会这样来回答儿童提出的问题：“你要建设新生活，就得有知识。比如说，如果讲的是历史，你就得知道从前人们是怎样建设自己的生活的，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斗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斗争；这样研究历史，你就会懂得什么事情不该做，并且因此也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如果讲的是地理，教师会说：“你既然希望全世界不再有压迫和奴役，那你怎么能不知道哪个民族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生活怎样，工作如何，他们在怎样进行斗争？”如果讲的是物理，教师就会说：“你既然要让人们摆脱沉重的劳动，那你就应该懂得自然规律；只有学习了这些规律，人们才能驾驭自然力，让它为人类服务；只有学习了技术方面的成就，把它应用到生活中去，人们才能摆脱自然界的控制；你应该知道这些成就是什么，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建设者。”

教学大纲上的各种课程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儿童理解其意义。教师在激发儿童学习热情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教学热情高涨起来，这种热情鼓舞着他的全部教学活动，使这种教学工作搞得生动活泼，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儿童。

每个人都很清楚，由于这种教和学的活动受到远大目标的鼓舞，教师和学生都将得到很大的益处。

如果这样来安排工作，就会使学校与生活很快接近起来。而当教师和学生明白了这种接近的全部意义时，他们就会共同把学校办成新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儿童运动早已成为这么一个部分一样。

教师渴望建设新式学校。但是他必须明白，只有与儿童一起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少先队运动对完成这一任务具有极大的帮助。

因此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帮助少先队运动，帮助少先队的基层组织对全体学生施加自己的影响，帮助它们把全体儿童都吸引到这个具有伟大目标的组织里来。

因此每一位儿童运动的领导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学校与苏维埃学校之间的区别，明白现代学校所面临的任务；都应该告诉少先队员们，他们通过帮助建设苏维埃学校将会对国家作出多大贡献。

现在，苏维埃学校教学内容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例如，有关学校自治的问题就完全没有解决。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很多帮助。

我国劳动学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未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教学大纲与儿童的实际活动、与他们的劳动结合起来。虽然新学校从1917年起就已研究这一问题，但至今未能彻底解决。在这方面，儿童运动的经验也同样可以给予很多帮助。

少先队员要向自己提出(尽管范围有限)社会需要的具体劳动目标。这方面的实践还很薄弱，也未对这一工作进行充分的总结。毫无疑问，儿童工作者在发扬儿童这方面首倡精神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创造出新的途径。

而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提出社会需要的具体劳动目标的本领，就会使我们把学校的工作搞得更好。

考虑到这一目标，现在就应该把少先队活动与学校的教学大纲联系起来。

苏维埃的新式学校和少先队运动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照耀着它们前进的道路。深入开展儿童运动离不开学校；儿童运动又为学校创造了新的条件，它在许多问题上不失为学校的一个基地，因此在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应该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有助于苏联青年一代去解决无产阶级世界斗争向他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工厂艺徒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

(在全俄工人教育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要讲的问题是，我们所办的工厂艺徒学校^①为什么必须把学生培养成为既有觉悟又有本事的工人。

每个学生所应当认识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如果不给社会主义制度打下基础，如果我国不普遍发展工业，不大力提高农业，那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工业发达了，掌握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只有农业真正高度地发展了，我们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因此必须使工厂艺徒学校的每个学生都能认识到他必须成为有本事的工人，他要参加劳动，要在提高工业、发展工业中表现出首倡精神。要使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有这样一种志向：为了提高生产，一切都有赖他们的努力，这点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工厂艺徒学校就要让学生一时一刻也别忘了这个任务。当然，如果他一时一刻也未忘记提高生产的任务，他对学习的态度就会不同于从前的雇佣工人（雇佣工人根本不考虑工业发展不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是生产的主人，工业是否会普遍发展起来，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工资的多少、工人地位的高低。我国正在改变这种心理状况。因此，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工厂艺徒学校的活动、工厂艺徒学校的学习，都能做到让学生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能

促进生产发展的有专业技能的能干工人。

当然，这与科学的劳动组织问题和生产劳动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使工厂艺徒学校和学校的一切组织都能教育在校学习的男女青年尽量有效地安排自己的全部工作，不要浪费精力和时间，要把工作安排得以最少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成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开设一门新课程(科学的劳动组织)是不行的。

我们要把工厂艺徒学校的全部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使工厂艺徒学校这个组织本身就能让学生们懂得，所谓合理的科学的劳动组织是指什么而言的。

这门课程应该单独开设，但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整个过程中(不管是教学部分，抑或是实际操作)，通过每天学习合理地安排工作，学生应该弄清楚的是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工厂艺徒学校必须培养生产所需要的工人。工厂艺徒学校在培养有专业技术的能干的工人时，不应该只着眼于今天，还要顾及到明天。

我们知道，我国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技术也在突飞猛进，因此我国工厂艺徒学校不能只是培养那种能满足目前工业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人，我们还要考虑到明天工业的需要。否则我们就会面临着一种危险：目前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只适应今天的工业，但不能适应明天的工业向他们提出的工作条件。

我们知道，一般说来，从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是很低的，以至目前还需要半手工业工人。然而，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之后，对专业技术工人的要求，更多的不是技术熟巧，而是很高的发展水平，很高的理论素养。如果没有这种理论素养，一个完全适应今天工业要求的专业技术工人，可能完全不适合改革后的工业，不适合更高发展水平的工业。因此，工厂艺徒学校的学习活动和教学大纲，不仅要看到今天，还应看到明天。

工厂艺徒学校教学大纲的任务，一方面要授予学生一些专业技术，有时甚至是今天工业所需要的半手工业性质的技巧，但同

时还要使学生具备一种理论素养，使他们能够适应日新月异的生产形势。这当然是不容忽视的，不仅学校的领导人要懂得这个道理，而且要让每个学生明白，工业不是停滞不前的，它在不断提高，不断发展，因此要把握这种发展的趋势，知道技术发展的方向，不要把工业看作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而要在发展中研究工业。在编写工厂艺徒学校的教学大纲时，必须对这方面给予应有的注意。工厂艺徒学校在授予学生必要的技巧时，还要使他们具备理论上的素养。

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很可能同时又是一个觉悟不高的工人。有的工人可能很会使用机器和工具，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要求今天的专业技术工人还应具备另一条：要有觉悟。他不仅应当成为忠实的执行者，同时还应是生产的主人。十月革命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工人已由雇佣工人成了当家作主的工人。但是，要当家作主，成为生产的主人，光有专业技术，光会开动机器、使用原料等等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别方面的知识：懂得组织生产，懂得工厂执行的生产计划。

我们知道，德国的许多职业学校（例如铁路学校）里，生产本身就要求学生逐步由一个工场向另一个工厂过渡，好让学生不仅知道本工厂、本企业一隅之地的情况，而且还了解整个企业的全面情况，知道他所做的工作与整个企业全面生产的关系。

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得不走这条路的。大生产本身的性质就驱使它们这样去做。但是，我们让我国的职业学校走这条路，却不仅是由于技术的要求，而且也是由于工人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工人的觉悟，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企业的主人。工厂艺徒学校的每个学生应当不仅熟悉自己机床的工作，还要了解整个企业的全部生产情况。因此他特别要关心工厂委员会这类机关的工作，关心工厂里各种组织的工作，关心各种生产会议，因为这种会议能使学生了解生产情况、组织情况及整个企业的全部计划。

大企业本身的劳动条件可以使儿童懂得计划性，懂得有计划

地安排劳动的必要性，所以我们说整个工人阶级比别的任何人都能更深刻、更快地懂得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由资本主义走向另一种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杂乱无章，一切都是自由竞争，一切为了个人利益，而在另一种制度下，计划性代替了杂乱无章，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代替了浪费生产力。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点恰好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统一的经济计划，而是每个资本家各自安排生产，根本不考虑整体的利益；而工人们在工厂里、在生产部门却看到了这种计划性的必要，看到了统一安排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很容易理解，整个经济应按统一计划进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谈到有关电气化的问题时，特别强调了这种统一的经济计划的意义^②。所以，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在了解了工厂的计划性之后，还要了解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要很好地领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篇演说的意思。要弄通这篇演说的含意和意义，因为计划经济的问题乃是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础的问题。弄明白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懂得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许多一再提出的口号就失去了意义。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生产的计划性，工厂艺徒学校的教学大纲对此必须特别注意。

工厂艺徒学校的教学大纲中，要开设一些有助于了解每个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课程。要使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不仅了解本厂的情况，还要了解各个工业部门的情况，了解这种工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中起什么作用，占什么地位。教学大纲对此也必须特别注意。要了解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列宁同志在全俄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多次提到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提到这个计划是以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基础的，是以电气化为基础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③ 电气化就是在技术发展基础上的

统一的经济计划，这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基础。

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应该懂得高度发达的技术所具有的意义，但是他还必须懂得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我们经常使用苏维埃政权这个词，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不仅要会用这个词，而且还要懂得它的含意。苏维埃政权的含意是什么呢？苏联宪法规定，选举权并非人人都有，而只有劳动人民才有，只有工人和农民才有^④。这个意思每个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都应懂得。他要非常熟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政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因此全部生活的原则就是，劳动人民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处于雇佣工人的地位，处于被压迫阶级的地位，而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应该懂得苏维埃政权乃是由一个制度走向另一个制度（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巨大进步。苏维埃政权是从剥削者手中夺取来的政权，这一政权完全交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手上，交到了劳动人民手上。

各种教学大纲都规定了要学习苏联宪法。但是学习我国的宪法要有一定的立场。

我们苏维埃宪法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我们常常谈到联系，但是要充分理解我们所说的这种联系，就必须懂得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懂得生产的这两方面、这两种类型的生产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

要懂得工人阶级是什么，为什么工人阶级觉悟比较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眼光比其他阶级都远大，还要明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然后，还要弄清楚目前的农民是什么状况，一般说来小私有者是什么状况，它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是什么情况；还要知道，经济本身的发展推动了小生产走上联合的道路，即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农业走向大生产的必然之路，这是走向以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那种生产的必然之路。当前农民的情况如何，它在朝什么方向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怎样改变自己的阶级

实质——这些也都是每个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所需要知道的。这样就能明白把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使农民对工人阶级的任务和目标理解更深，感情更亲。农民现在可能还不理解这些任务，但是，只要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他们就会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更深地理解工人阶级的这些任务，并成为工人阶级忠实的同盟军。

要使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懂得所有这些道理，这样他们就能成为自觉的列宁主义者。

但是，要保证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洋溢着工人们在工厂里充分体现出来的那种集体主义的自觉精神，就必须使工厂艺徒学校与工厂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工厂里的全体工人团结成一个整体，生产本身的条件使他们的集体主义感情得到了发扬。只要工厂艺徒学校与生产单位保持密切的联系，让学生们有机会研究整个企业的组织，只要工厂艺徒学校是这样来制定教学大纲，那么，这一大纲就能使学生了解全国的经济情况，就能把学生培养成能干的工人和生产的主人。这样，他就一定能完成时代赋予他的重任。

苏维埃学校

(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十月革命已将旧学校摧毁。旧学校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效劳的资产阶级学校，因此人民对它深恶痛绝。

我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1917年末，布尔什维克刚刚取得政权不久，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同志对我讲，士兵们有一次在一个学校宿营时，把学校的图书撕得粉碎，物理仪器砸得稀烂，学校遭到了严重破坏。士兵们之所以做出这种事，是因为他们觉得拥有这些图书和仪器的这所学校是敌人的学校，老爷们的学校，是人民群众痛恨已极的统治者的学校。他们认为这种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不是为了搞好大家的生活，而是为了培养奴役人民的资本的奴仆。必须建立新式学校。

191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上发表他第一篇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说时就曾讲到，俄国学校从此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学校与挣脱了奴隶枷锁的人民一道，开始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平等友爱原则上的新生活。接着，在这篇演说快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学校所具有的意义：“必须利用全部力量、精力和知识，以便尽可能快地建成我们未来的劳动学校，因为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今后免除任何类似今天这种持续四年多的世界冲突和屠杀。”^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番话对学校评价很高，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原因是国内战争不久就爆发了，而且后来越演越烈。

国内战争使我们暂时把学校问题放到一边了。甚至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列宁给学校所作的这么高的评价都感到很新颖，不过，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一下他所讲的意思，我们就会发现，列宁是说学校应该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学校应该帮助青年一代按崭新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上改造整个生活。关于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我们还面临着严重考验的年代，“我们还未完全渡过所有这些考验阶段。”事实上，学校后来的确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教师的确经历了艰苦的考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去建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8年8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那种未来的学校。

从实际上看，为什么过去这些年未能建成劳动学校呢？首先是因为战祸频繁、经济凋蔽，学校没有物质保证。席卷全俄的国内战争对学校的破坏特别严重。现在情况日趋好转，全国进入了经济高涨时期。当然，我们不能作任何特殊的幻想，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困难将有所克服，而以前它一直妨碍着学校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农民对新式学校十分不满。农民对这种学校不理解，他们觉得这种学校有许多旧时贵族老爷的习气。

应该说，各地教师在开始时也不知道如何建立这种新式劳动学校，因而学校的劳动往往局限于自我服务。

农民和劳动学校

农民常常说：“这是怎么搞的，学校里老是干活，就是不学习。我们干了一辈子活，我们不该再干活了，得学点别的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当孩子们去远足旅行时，当农民看见孩子们唱歌、塑像、雕刻时，他们就觉得这都是贵族老爷们那一套，而农民们按新的方式建设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以及真正的知识，这种劳动学校

却未教给学生。多少年来形成的传统的不信任感情既转向了新式学校，也转向了新的教师。从前，教师只与神甫和富人往来，而凡是与贫农接触的教师，都认为是不可靠的人。这种把教师看作统治阶级走卒的旧观点，也被农民用来看待新式学校的教师了。

我们看到，今年各校入学的儿童特别多。各地来的同志和全体代表都说，今年有大批儿童涌进学校，以前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没有机会入学的孩子，以及由于农民对学校不信任而未送去入学的孩子，今年都纷纷上学了。

教师同志们都说，现在各班人数很多，一个教师有时要教150—180人。儿童入学人数剧增，根本原因还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但也说明农民对学校的不信任已开始消失。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曾经说过，过去农民对教师是不信任的，而刚开始时，教师心里也没有数，他的认识也不像现在这样明确，不懂得他应该与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起来，应该与劳动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

居民对教师的态度

最初那几年，教师们有些惊惶失措（当然，这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他们的不幸），对苏维埃政权没有认识，不知道是应该支持它还是反对它，后来逐渐地通过痛苦的思考、通过长时间的斗争，他们才得出了结论：应该把自己的事业与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起来。

我们看到，最近两年来，教师们已开始参加社会工作。教师参加社会工作，这件事对加强教师与居民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仅要做到部分教师参加社会工作，而且要做到全体教师都能参加社会工作，因为这是教师与劳动人民建立最密切关系的唯一途径。

我们已经看到了教师参加社会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居民（特别是贫苦阶层的居民）已开始信任教师。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份材料

说，许多地方在这次选举苏维埃时，教师们成了深受信任的社会活动家，而在沃洛格达省卡金柯夫县，乡农民代表会议甚至于给那些以前没有表决权的教师以表决权。这说明居民对教师的信任增长了，而现在教师的影响也比他过去置身事外、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时要大出百倍。

教师在参加这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他的视野开阔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也提高了——知道这是劳动人民的政权，也是他自己的政权。教师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领导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领导着全国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教师们的这种认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体现，所以说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表现了教师和苏维埃政权的密切关系。这次代表大会表明，教师们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工作。

昨天有人告诉我一件小事：有几位巴什基里亚教师问一个过路的人：“同志，请问到教师代表大会怎么走，坐几路电车？”这个过路人看了他们一眼说：“我哪是你们的同志，我是资本家，那才是你们的同志，”他指着一群过路的工人说。这件小事很说明问题，资本家是外人，而他认为教师和工人是同志。

苏维埃学校是劳动学校

影响建立新式学校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不大清楚这种新式学校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共产党人认为，这种学校应该是劳动学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社会的富裕阶层可能不重视劳动，不懂得劳动的作用，那么整天与劳动打交道的工农群众不可能不关心这件事，他们希望全面地阐明这个问题。苏维埃学校是劳动学校。

早在189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讲到要使学校成为劳动

学校，而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都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早在189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指出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只有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造就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②。

工农取得政权之后，就提出了建立劳动学校这一目标。但是具体去建立这种劳动学校时，却发现经验不足，办法不多，还有好多地方不明确。许多人对劳动学校的理解是，学校应该培养学生爱好劳动，劳动学校要大搞自我服务活动，儿童在劳动学校里应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经验表明，这样的学校对儿童很少有什么帮助。问题不在于养成儿童爱好劳动的习惯，而且恰巧是对于工农子弟，对于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学校不大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而应该是换个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只有逐渐地在总结实际经验的同时得出结论：特别要紧的是把对劳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说明劳动的意义和劳动的组织，说明发展中的劳动问题。这时就会明白怎样把这个问题与实际的劳动活动联系起来。要注意探求具有前途的劳动形式；不要让学生去学那种旧时手工业的落后的劳动形式，而要让他们去学新的劳动形式，让他们懂得以知识作基础的劳动有助于提高经济，有助于驾驭自然力。

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

对劳动学校的这种新认识，在我们多次讨论过的国家学术委员会印发的教学大纲中已有反映^③。大纲中那一部分就是讲的如何认识劳动的意义，如何讲述发展中的劳动这一问题。这一部分也指出了劳动与社会的联系，一方面指出了劳动如何成为这一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劳动如何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掌握自然力和自然资源。因此，如果像有的地方所采取的那种办法，在使用大

纲时把这一部分去掉的话，那就丢掉了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教学大纲。他多次讲到要编制新的教学大纲，规定出学校的教学内容。他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指出，要以批判的态度去学习知识，应当学习那些最有价值、最有用途的东西，以使用改造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来武装青年。不能把现有的知识都告诉学生，因为这些知识数量太大。但是要从现有的知识中选出最有用的、最重要的来。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就是试图选出那些从劳动人民观点看来有用的东西，从现实生活看来有用的东西，以及青年一代为了根据新的原则改造生活有用的东西来讲授。当然，这些教学大纲还不够完善。它只是试图选出必要的教材并以一定的形式向学生传授这些教材。

授予学生的知识不应是互不联系的，不应是类似用许多块零头布缝制成的百衲衣。所讲授的知识互相要有联系，也要留有余地。否则这些知识连一半的价值也不会有。

知识的联系不能生拉硬扯，而要合乎生活实际。由此就产生了综合编制的教学大纲问题。最近以来，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也写了不少文章。有些人把这种综合性大纲对教材的安排搞得神秘莫测，而我们只是希望所传授的知识不要与生活脱节，要有一定的生活联系。只有通过一定的联系传授的知识才能使学生用以自觉地对待环境，才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种环境、理解这种环境。

在教学大纲中，我们是从每种现象发展的角度来讲授这种现象的。我们观察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然后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现象。我们教儿童深刻地理解这些现象，认真地对待这些现象。当然，只有通过教师积累的经验，通过学校对这一大纲的检验，才能看出大纲中哪些地方要改。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大纲的实质是正确的。

各地来的同志，大会的代表同志都一致指出，新的教学大纲有助于儿童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对待环境。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们也指出，这一大纲很难与培养熟练技巧联系起来。

如果认真探究下一级学校的熟练技巧到底是什么，那就会了解到，这是指的能流畅顺利地阅读，详细地写下自己的思想而没有语法文字上的错误，再就是会算。

当然，农民们要求掌握这种熟练技巧是完全正确的，学校应该传授这些知识。但是这种熟练技巧与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是否水火不相容呢？这是各地同志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要说，困难不在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本身，困难在于我们往往没有可供阅读用的教科书。只要能发给学校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有联系的书，从而给儿童提供了生动有趣的学习材料，这就可以使阅读熟练技巧的问题迎刃而解。用儿童感到生动有趣的教材去教他们阅读，这当然比用枯燥无味的教材去教他们容易得多。

书写熟练技巧也是如此。现在这些熟练技巧都大大简化了。凡是革命前上过学的同志都知道，旧的拼写法是多么烦琐。他们一定会说，现在培养学生的书写熟练技巧要比以前容易多了。从前要花很长时间学习字母“и”及其他一些拼写法上的难点。现在学会书写要容易得多，不过要发给教师一本与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有联系的基本语法练习手册作参考，以便他们掌握儿童非常需要的正确书写方法。

最后，谈到数学，在这方面的意见比较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找出了一些办法来把教学大纲安排的教材与数学、与算术联系起来。今后再供应学校一些教科书，也许就有助于教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要重说一遍，农民所产生的这种要求（会读、写、算）当然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如果教学大纲不利于培养这些熟练技巧，那这种大纲显然是不合适的。

但是教学大纲是合适的。目前的问题不在于修订教学大纲，不在于精简大纲的内容，而在于供给学校相应的教学材料，相应的教科书。学校物质条件的改善，也许有助于这一教学大纲的贯彻执行。这一大纲要有助于熟练技巧的形成。大纲与熟练技巧之间要有联系。

关于劳动的问题还谈得不够。这个问题在一级学校里很容易解决，在二级学校里则比较复杂，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需要指出(列宁早已指出过)的是，必须发动技术界、职业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学校的工作。例如，我们现在还经常看到，一部分懂得各种手工活的农民帮助学校，帮助儿童学习钳工、木工和其他手艺活。

学校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农民对学校的态度有所好转，教师的立场有所转变，劳动学校的面貌逐渐明确，所有这些都是新的原则上建设学校的前提条件。

少先队运动

近来，我们还发现我国学校有一种新气象：我们看到共青团和少先队运动在自发地成长。这一运动在农村也有了发展。起初我们以为，少先队运动会受到居民的强烈的抵制，但是我们估计错了。居民们总的说来是积极支持这一运动的，只有个别地方例外(如顿河省哥萨克的居住地区)。

农民们常常说：“现在是新时代了，没法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加强少先队运动与学校的联系。某些教师感到不满意的是，这一运动是在校外发展起来而独立存在的。许多教师说，教师应该是当然的辅导员。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一运动产生于工厂并且不依附于学校，这正是一个优点，因为必须使全体在校儿童关心自己的学习，提出某种问题和任务，以使用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并通过自己的错误来学习。

在旧时的读书学校，教师与学生是对立的。即使是学识比较渊博的教师，尽管他什么都明白，也是靠自己的权威来压制学生。

儿童们应该在自己的组织里学会集体工作和集体生活。

必须直率指出，自治工作总的说来是搞得不好的。个别地方的自治工作搞得不错，但是就整体而言，有些学校的自治工作没有走上正轨。有的学校大搞什么审判同学的儿童法庭，有的学校的自治工作不过是协助教师搞好纪律。自治工作名不符实，也就是说，不是着眼于通过组织培养新人。

我们说，我国的新式学校是苏维埃学校，是劳动人民即工农的学校。由于我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以我国的学校不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学校，而且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学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学校不仅应向学生介绍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而且还应让他们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向他们指出新的劳动形式。因此，学校要教育儿童们团结一致，提出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任务，并通过共同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学校。少先队运动给学校带来了新的精神，即集体主义精神。友好团结的气氛和集体行动的习惯培养着一代新人，即具有集体主义思想感情的儿童，他们经常想到的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件事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学校也离不开少先队运动。

如果学校和少先队运动各行其是，那就不对了，因为少先队运动如果不经常学习各种知识，如果儿童不顽强地学习，那他们就不能合乎要求地去工作，就不能正确地给自己提出任务并且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得有知识。只是依靠演讲、谈话是不行的，要善于组织生活和组织工作，但若没有知识，离开了学校，就达不到这一目的。学校也应像少先队运动一样，要深入生活，而少先队运动恰好能给学校带来新的气象。

学校的社会工作

我国目前的学校已深入到生活里去了。例如，学校通过学生

广泛地开展了卫生教育，一级学校高年级学生经常为不识字的家庭读报并开展扫盲工作。有时还通过学校，通过学生广泛地进行了农业宣传，等等。

正是从学校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点来看，学校的这种社会工作是特别重要的。这是学校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任务是与研究周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当然，中央制定的教学大纲应尽可能适应各地的具体实际，但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在这里，学校和教师有一个共同的任务，这就是教儿童们学会观察生活，同时还要知道怎样改造这种生活。如果他们能懂得这一点，学校就能做到深入生活和改造生活，这项任务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学校网点

目前已经具备了建立新式学校的前提条件。起初，在1917年至1918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经认为一下子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果，比如说，可以立即实行普及教育，可以立即给全体儿童供应伙食、衣服和鞋子。但是，长期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达到这一目标往往需要经过许多阶段，走完一个阶段再进入另一阶段。因此，我们现在应给我国学校提出一系列实际任务，实现了这些任务，它就向我们理想中的新式学校迈进了一步，这种新式学校能吸引全体儿童并使他们获得应有的知识。

目前我国的学校网点只能容纳一半的儿童入学。我们现在要提出的一个近期目标，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削减学校网点而要竭尽全力扩大学校网点。扩大学校网点要依靠农民的主动精神。

超龄生学校

除了扩大正常的学校网点之外，还有一个超龄生的问题，这

是指的那些未能入学的儿童而言的。现在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些14—15岁的孩子与8岁的孩子在一个班上课，他们的发展水平完全不一样。这给教学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有些地方对这些蜂涌而来入学的儿童简直有些招架不住。因此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④已经谈到过这件事)，就是为这些孩子开办补习学校，让他们哪怕学习认字，学习读、写、算也好，也让他们掌握读书看报的本事。

改革二级学校

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必须继续发展青年农民学校和工厂学校，这种学校与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能授予学生一些能直接提高这种生产的知识。但是与此同时却不能取消任何一所二级学校，因为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具有中等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只需要把二级学校第二阶段加以改革就行了。迄今为止，二级学校一直是升入高等院校的转运站，上高等院校往往是旧观念作祟：不受高等教育就没有出路。因此，一个学生要是没有升入高等院校，那实在是他的一大悲剧。要改革二级学校，使它立即开辟通向生活的道路，立即帮助学生掌握某种劳动本领。

互助委员会和学校

还有一项任务要谈谈，就是必须支持贫穷阶层的子弟，使他们有学习的机会。在这方面，要吸引农民互助委员会参加这项工作^⑤。儿童们不能上学往往是由于他们没钱买鞋子，而这不过只要十五个戈比。农民互助委员会应该认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校促会在这方面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我国有些地方的校促

会已经广泛开展了工作。例如，医生们指出，在儿童就寝的房间里，一定得有通风小窗。于是校促会就到每家的房间去巡视，如果发现孩子睡觉的房间没有通风小窗，而家长又没有钱安装这种小窗，校促会就负责给安装。这样，他们就帮助了家境比较贫穷的居民。开展活动的方式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

谈谈教师的社会工作

现在来谈谈怎样使学校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问題。我已经说过，首先必须让全体教师参加社会工作，但是要特别注意减轻教师的负担，并且明确到底什么活动才算社会活动。例如，教师是否必须参加戏剧小组的活动呢？这项工作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但它并非都能叫作社会工作。当然，这项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鞑靼教师说，在伊斯兰居民中，戏剧有着特殊的作用。原来，按宗教规定，伊斯兰教徒不得出入戏院。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进了戏院，而且还随身带了妻子一同前往，他就会被革除教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参加戏剧小组当然就是在进行一种反宗教宣传。这种情况下参加戏剧小组的工作，无疑就是一种社会工作。但这种情况是极个别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戏剧小组的工作不过是组织文娱活动，而且还要占去教师很多时间（教师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其他各种技术工作也是同样情况，这种工作往往全压在教师身上，使他没有时间从事本职工作，因此必须减轻教师的负担。此外，还要注意发动当地的医生、农学家、全体农村知识分子去帮助教师。

教师的轮训和培养

下面谈谈用知识武装教师的问题。在发给大会代表的调查表

中，第一天由教师们填写的300份这种表格里就有282份希望免费供应或优待供应教师政治书籍和教育书籍。为了建设新式学校，为了建设居民现在所需要的那种学校，教师本人应当努力学习，精通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自觉地对待苏维埃政权开展的活动。这就要求对教师进行轮训和认真的培训。这一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同时要保证教师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学习。

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提出了各地区的重点学校的计划，要围绕重点学校把教师组织起来，共同学习和检查自己的工作，互相交流教学经验。要让各地区的学校与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建立联系，教学法研究会也要与它们建立联系。这样一来，就会使这方面的指导比目前更为恰当合理。大会代表中有很多人要求经常给教师以指导，只要我们积极开展教师的集体工作就能做到这一点。

教师和报刊

除此之外，还要让全体教师明确认识到，教师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报刊即《教师报》的工作。大家经常谈到这张报纸的巨大作用。它起着组织作用，它使教师能通过报纸与别的教师交流思想。我们知道，教师的职业很分散，全国各个角落都有。所以，他们积极参加报纸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不打算详细地讲农村学前教育的意义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了，因为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这个问题已讲了一些意见。无论是学前教育抑或是政治教育工作都有助于完成学校所开创的事业。

我的报告完了，我相信这次代表大会一定能为教师们团结共事打下一个基础，能为建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那种学校打下一个基础。同志们，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

两年前，列宁同志写道：“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应当有步骤地加强组织人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摆脱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①

在沙皇制度下，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受到严格监视，他必须去教堂礼拜，“效忠沙皇和祖国”，要与神甫、小商店的老板以及有钱的富农交往应酬。有的教师不愿这样做时，就立即被革职，驱逐出境，甚至还以“嫌疑分子”的罪名被流放。当局千方百计不许教师组织起来。分散在穷乡僻壤的教师对形势毫不了解。诚然，他们过去有过反对情绪。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布尔什维克，几乎从来不在教师中开展工作，让他们关心劳动人民先进的、战斗的队伍即工人阶级。在教师中有影响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战争时期，社会革命党人狂热的爱国主义行为曾使教师为之称颂。1917年春天，即二月革命之后两个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教师代表大会^②，与会者之中，城市教师多于乡村教师。这次会议弥漫着爱国主义的热情。社会民主党人（既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

克)大约有二十人参加这次大会。

大多数教师对苏维埃政权缺乏了解，或者心怀敌意。莫斯科曾经发生过教师罢工事件。农村的情景更是五花八门。国内战争带来的全部灾难落到了教师身上。学校遭到了破坏，只好在宿舍上课。有的地方，白匪把女教师活活鞭打致死，另外又裹胁了一部分人随他们逃走。苏维埃政权往往对教师不信任，贫农对教师的态度也是如此。旧学校及其“神学”和专横制度再也行不通了，而如何建立新式学校，教师们心里又没有数。他们的工资越来越少，学校瓦解了，教师的威望下降了，战争使他们受到冲击。

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③就是呼吁党和苏维埃政权要关心教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曾作出改善教师物质生活条件的决议——现在各地教师的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有的地方搞得更好。

此外，上面提到的列宁同志那篇文章，提高了教师的威望，使教师深受鼓舞(每位教师都知道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使教师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发生了一种新变化。

教师花了两年时间提高自己。一连两个暑假，全俄举办了各种训练班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扩大他们的政治视野，丰富他们的教育经验。这种暑期训练班的名称有点奇特，叫做“轮训班”。教师们不仅在训练班学习，他们还在教育工作者工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协助下，经常开展集体活动。在方圆10—20公里的地区内，都有一所办得比较好的学校，教师们定期在这里聚会，听报告，讨论并交流教育经验。教师们都感到自己在精神上有很大提高。报纸开始往学校投送。随着教师觉悟的提高，他们逐渐成了社会活动家，而社会工作又促进了教师精神上的提高。教师进行什么社会工作呢？除了学校的工作之外，他经常参加农村阅览室的工作，参加扫盲站^④的工作(扫盲站是成人学习认字和掌握初步知识的学校)，参加农业训练班的工作，领导农业小组，向农民宣传先进的耕种方法，从事合作化宣传和工作，帮助农民开展苏维埃工作，也参加农民互助委员会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女教师都在农民

中间开展工作，参加各种活动……。教师们的这种社会工作，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报酬的，但却有助于他接触群众，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从最近的农村苏维埃选举中^⑤，我们看到农民对教师更加信任了，看到教师在这次选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成了社会工作者，许多人至今还未觉悟，但是即使是这些人也都是倾向先进教师的。

我们早就料到教师会成为社会活动家的，但是，只有这次大会才充分显示出教师的进步情况。他们已不是旧时那种愁眉苦脸、脱离生活的农村教师了，他们是置身于生活之中的名符其实的社会活动家，是具有独立思想见解和善于审时度势的组织者。在与教师谈话时，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字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流氓无产阶级”。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600人，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来自天南海北，有的教师还来自极其偏远的地方，那儿全村没有一个人见过镜子是什么东西。选举进行得很隆重。教师们都积极参加选举活动，纷纷参加自己的教师代表会议，而特别对这件事关心的还是农民。他们嘱咐教师们：去看看中央是些什么样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否遵循列宁的遗训，是否信得过；打听一下集体经济怎么搞法。在莫斯科搞一台机器纺车（老太婆的叫法），我们纺纱都纺得厌烦了，让机器日夜去纺吧，我们得学着喝点茶，认点字，不再当文盲……

孩子们要求教师：帮我们与莫斯科的少先队员建立联系吧；给我们带一些《少先队守则》回来；到动物园去看看，回来好给我们讲讲狮子和老虎。

教师们如饥似渴地猎取各种新知识。在莫斯科为他们安排了参观活动，教师们去了革命博物馆、克里姆林宫、生产单位、学校、俱乐部。教师与工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工人们到大会上向教师们表示祝贺，送给他们印有列宁肖像的头巾。索科尔尼茨区的女工们送了一盏信号灯到舞台上（大会是在吉敏剧院^⑤召开的），

点起了红色的灯笼，一位致词的女工在讲话结束时说：“教师与工人阶级团结的大道已畅通无阻。”大会向她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晚上，教师们分别来到了各个工人俱乐部，受到了工人热情友好的欢迎。教师们说，永远也不会忘记此情此景。

向大会表示祝贺的还有科学家、红军、俄国列宁共青团和少先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教师们感到自己成了劳动人民兄弟友爱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地讲他们在会上和莫斯科的所见所闻。全国二十五万教师急切地期待着他们归来，全体居民也急切地期待着他们归来。

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列宁关于提高教师的地位、使教师成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可靠支柱的这一遗训已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现。教师们的全部发言证实了这件事；教师们也正是怀着实现了列宁遗训的这一心情去瞻仰列宁墓的。

但是，教师们不仅是对政治感兴趣，他们还在积极地探讨纯教育方面的问题：新的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学法。

前年和去年先后出版了新的教学大纲^①。这套教学大纲要求儿童自觉地对待周围环境，把学校与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教他们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建设新生活。新的教学大纲（即国家学术委员会编制的大纲）与死读书的旧传统实行绝裂。开始时它还不为人们理解，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教师表示赞成这套教学大纲，指出这套大纲对儿童的发展很有好处。农民对新教学大纲也开始有了认识，他们说：“现在学校里能学点东西了。”不过大家认为目前执行这套大纲还有困难，因为一个教师往往要教100—250名学生，分三个班上课，还没有必要的教材和教科书。

今年各校学生人数都超过定额，全体儿童都想入学，这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入学的人也入学了。地方不够，农民很不满意。今年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知识的热潮。

从各分组会讨论建设新学校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教师的教育专业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套大纲要补充地方教材，广泛开

展参观活动，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教师们正在大力开展创造性的集体活动，并且对这一活动很感兴趣。居民对学校更加关心，因为学校日益深入到周围的生活里去了。进行社会工作的不只是教师，还有整个学校。

农村的学生还负责通知召开会议的事情；高年级的学生为不识字的家庭读报，儿童们教自己的伙伴、兄弟姐妹读书识字；有些地方的学校还广泛开展了卫生宣传——在学校的影响下，孩子们开始经常洗澡、理发、换衣服，房子里比以前干净多了，乡村的道旁不再堆集垃圾了，道旁挖了水沟，栽上了树；学校开展了农业宣传，在学校的影响下，农民采用了多区轮作制，菜园做到精耕细作，牲畜饲养方法也有改进，开始采用机器了，等等。这样的学校当然引起了农民的重视，他们心甘情愿地把孩子送去上学。

现在经常举办教育展览会来介绍学校的工作情况，还举办小型报告会，广泛邀请当地居民参加，让儿童们报告本校的工作情况。展览会和“小型报告会”是宣传、推广新式学校的一种工具。

与会代表极其热烈地讨论了儿童运动问题。现在少先队员已经超过百万。少先队员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学习非常努力。他们使教师不再担任警察的职务，在教师和儿童之间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少先队员使学校的儿童自治搞得更加生动，更加深入。这种自治是名副其实的学校自治，儿童们可以充分独立自主地讨论并解决与他们有关的问题。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儿童运动是一种积极因素。讨论只涉及到如何加强少先队运动与学校工作的联系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告红军和红海军书，告列宁共青团书，告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书，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告全国教师书。

除了召开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之外，教师们还参加了为他们召开的各种专业会议：农民工作会议，乡经费会议等等。《教师报》和《真理报》与代表们一起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发动教师经常为两

报撰稿。会议发给教师们一些社会政治书籍和教育专业书籍。

教师们对这次大会一致感到非常满意。教师们说：“我们的所见所闻使眼界为之一新，现在各地都殷切期待我们回去。”他们讨论了怎样搞好汇报工作，到哪些乡镇进行传达。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写下了新学校建设中新的一页。

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奋斗

(在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一篇演说中讲道：

“我们开始了伟大的战争……使俄国成为一个文明的、光明的、健壮的国家。我们不能很快结束这场战争……”^②

如果把上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至今的政府工作加以概括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政府的工作就是为全国的温饱而斗争，而战斗，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保证居民的生活，使它不是一个忍饥挨饿的国家，而是一个能吃饱饭的国家。现在，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它已经站稳了脚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一个文化发展的高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生前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中^③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把国家的发展(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对这个问题还必须重新加以强调，因为如果我们谈到电气化、机械化、农业的工业化等问题时，我们心里必须明白，为此就要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广大农民群众能获得他们所渴求的知识。

目前已不必要讲什么在这方面促进一下农民的话了。

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人都知道，每天也都看到农民

是如何渴求知识。农民的孩子在来信中写得感人至深：

“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婶婶，请你求叔叔们给我们办一个学校吧！”

共青团在来信中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学习，请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吧！”

农民在办学上表现了强烈的主动精神，我们必须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

现在，在经历了革命之后，在经历了国内战争之后，农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知识的巨大意义。

早在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他当时还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而是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携手前进）就曾说过：“……国民教育乃是无产者权利的保证……”^④目前农民也认识到，国民教育是农民权利的保证，因为加强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巩固苏维埃的建设，都只有在提高群众知识水平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因此我觉得必须向大会讲清楚，目前要特别重视国民教育才行。不要再讲国民教育是什么第三条战线（常常被理解为三等战线），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已要求我们在国民教育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来为农民群众服务。

这就要求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互相支持。不要只是让教育人民委员部单枪匹马地考虑怎样开办某种学校，怎样做这做那，而要让政府极其关心提供物质手段，关心选派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和他们所奉行的政策。要让政府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真正做到面向农村，因为单靠教育人民委员部是办不到的。

在国民教育问题上面向农村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在最短时期实行普及国民教育。

现在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在中等技术学校和青年农民学校毕业后不要离开农村，而能留在那里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实行电气化、机械化和工业化。否则我们就是纸上谈兵，

而实际上却无显著效果。

合作制乃是农业新形式的萌芽，它在今后的发展中会获得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而只有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合作制才能顺利发展。

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支持农民在学校建设工作上的主动精神，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最短时期实行普及教育，并使失学少年有机会学习。要在农村开办七年制学校、青年农民学校，这些学校要能培养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目前迫切需要的有文化的工作人员。

必须对有关国民教育的条款作具体的说明，还必须使政府今后更加关心国民教育工作，因为只有国民教育战线巩固了，经济战线才能取得胜利。

少先队运动

(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 少先队运动产生于工厂，那里的孩子每天都看到各种组织开展的活动，其中包括年纪大的儿童组织即共青团开展的活动。孩子们强烈要求建立组织，于是就出现了儿童运动这种形式。

2. 共青团负责帮助少先队安排对孩子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共青团把少年先锋队队员看作自己的接班人，而少先队员也乐于接受年长同志的领导。

3. 但是，如果少先队运动只吸收工人子弟参加，把它变成了一个纯阶级的组织，那就不对了。我们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此时不应把社会分化为若干阶级)，正在建立新的、集体主义的劳动组织，人们应该学会按照新的方式，即共产主义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儿童运动的宗旨正是要进行这种教育，它要把全体儿童组织起来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4. 儿童运动目前在农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农村里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小私有者、个人主义的心理。儿童运动应该把这种心理与集体主义心理加以对照。*

5. 但是，儿童运动只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才能起到它应起的巨大作用。

6. 如果儿童运动追求一些华而不实的表面东西(如操练步法，穿上军服，召开大会，发表演说，讲一些少先队的“空话”，

* 此提纲写于1925年，当时还未开展集体农庄运动，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体经济。——作者注

搞什么阅兵式)，那对儿童运动将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7. 少先队中队的主要工作应当是为公共利益而开展集体劳动。每个小队经常都要提出某种集体劳动任务并切实完成这一任务，即使这种任务微不足道、非常简单也无所谓。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就讲过这个问题。

8. 不应认为只有具备了设备完善的工场、指导员等等之后，小队才能给自己提出劳动任务。小队应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劳动熟练技巧。

9. 集体劳动的熟练技巧、合理安排共同劳动的技能、承担力所能及的任务以及根据小队每个队员的能力和知识水平进行合理分工的技能，还有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人力完成既定任务的技能，凡此种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0. 由少先队员对自己集体的工作进行合理的考核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11. 一切苏维埃机关、工会组织和党的组织都应考虑如何帮助少先队员安排社会公益劳动。学校在这方面也应做些工作。

12. 学校和儿童运动之间应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共产党努力以求的，是把苏维埃学校变成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儿童运动是儿童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其宗旨是组织儿童的共产主义活动。

总之，苏维埃学校和儿童运动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走向同一个目标。

13. 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工作授予儿童一定的知识，并培养他们对周围生活进行观察、研究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和有效地对生活产生影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采用最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要能引起儿童强烈的兴趣和高度的积极性，并且最大限度地节约人力。

14. 儿童运动应协助学校把工作做得更好，为此，少先队运

动的领导人(即共青团员们)和少先队员要尽可能深入地了解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前哨”^①应尽力帮助学校搞好工作。

15. 另一方面,苏维埃学校只有依靠自觉的、有组织的儿童,它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

16. 如果把学校与儿童运动等同起来,那就错了。学校无论何时都不能代替独立的儿童运动,正如学校工作应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负责,学校的任务不能交由儿童运动去完成一样。但是两者之间要有密切的联系。

17. 学校的教学大纲、课程表都是根据一般的经济任务和一般的政治目的确定的,不能打乱,但是学校和少先队中队的计划和课程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互相协调一致。

18. 教师和担任少先队领导工作的共青团员应密切合作。少先队领导人应参加学校的工作,经常与中队的少先队员谈话,以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领导少先队基层组织的工作,并参加校务委员会的工作。教师应该帮助少先队开展活动,参加少先队队部的工作和教学法委员会的工作,经常访问少先队中队和基层组织,帮助他们开展教育、教学法和实际工作,在中队队委会和少先队基层组织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9. 学校自治一直搞得很不好。少先队运动应该帮助搞好这一工作。

学校自治工作应发动全体学生来搞,而不要只限于一部分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相反,应该定期召开全体会议,而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选举才开会。一切重要的、学生关心的问题都要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以便在会上确定学生应承担的社会工作,当场在各班之间分配这项工作,好让每个学生在共同工作中担负一部分任务,并在全体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

“前哨”无论如何不应破坏学校自治这项工作,用少先队组织来代替这项工作,恰恰相反,它应该对实行这种形式的学校自治加以协助。少先队组织应当成为儿童各种社会工作的组织者和领

导者，积极参加儿童的各种活动并使儿童在这种活动中养成自觉性和纪律性，使这种活动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

20. 不过少先队运动的宗旨不仅是要合理地安排学校的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也要合理地安排家庭和周围环境的生活和工作。

少先队运动通过学校学得了知识，并且懂得了如何把这一武器运用到生活中去之后，就应该实际地运用这一武器。

21. 少先队运动与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它时刻都不应忘记必须培养身强体壮、具有战斗力的青年，他们时刻准备着手执武器去捍卫革命成果。

22. 除此之外，现代战争要求每一个战士善于迅速判明各种情况，善于选择最适当的防卫手段和斗争手段，善于克服各种困难，能够和大家一起有组织、按计划地行动。少先队运动能使青年一代学会这一切，同时它也在培养青年一代学会建设新生活并结束一切战争。

23. 不允许有损害青年一代身体健康的任何负担过重的现象出现。少先队中队应该：

1) 严格规定少先队中队和小队每周集会和开展其他活动的时数；

2) 注意少先队员在中队里的负担，必要时(身体不好等情况)可免去他们的活动；

3) 每个城市各个大区应规定一个统一的少先队中队集会日。

24. 学校应特别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有关儿童卫生、体质方面的问题，关心校内热早餐的供应情况，关心全校生活的卫生安排和体育活动的开展。

25. 要关心少先队员时间的分配(睡眠、休息和工作时间)，关心积极开展体育活动(此项活动应与学校的学习协调起来)，还要关心和搞好夏令营生活。

在时间安排上，必须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少先队员自由支配。

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

(在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和闭幕词)

我从旧学校讲起，从资产阶级学校讲起。资产阶级国民学校产生于资本主义普遍发展时期。在旧时自然经济的情况下，工人和农民不识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时生产很原始，很简单，范围有限，不需要你认识字，也不需要你有任何教育水平。但是，十九世纪初叶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发展后，资产阶级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何把工厂里的这许多工人稍加培养，好让他们更有效地被利用。于是我们就看到，资产阶级开始在考虑各种进行国民教育的方式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成立了大批学校来教育儿童，让他们初步学会识字。当时有一种所谓的兰喀斯特学校^①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教员人数不足，于是就制定了在这种小学进行互助教学的计划。后来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对国民教育十分重视。目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能上小学，在学校里不仅学识字，而且还授予一定的知识(当然，是一些起码的知识)。总之，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和工业的发展，甚至使资产阶级也面临着必须建立国民学校的问题，必须让全体儿童人人都识字，授予他们起码的知识，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而资产阶级在这里就遇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它不能不教儿童识字；另一方面，让儿童识字和获得知识又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启发了他们的思想，而资本家又特别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工人，因为这种工人

了解形势，懂得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深知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于是我们发现，资产阶级一边授予儿童一些有用的和必需的知识，一边又在搞乱他们的思想。资产阶级散布一种宗教观点，说资产阶级社会是上帝一手创造的并且是古已有之的。他们篡改历史事实，宣扬沙文主义；然后又培植一种残暴粗野的纪律，这种纪律不是内在的，完全是外部的，是靠棍棒实施的，——资产阶级竭力通过上述种种手法来抵消他们授予群众的知识。

当然，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在群众性的国民学校里，是谈不上自治的。资产阶级极其露骨地说，要善于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办法，他们编写的教育书籍甚至公开向教师出主意，告诉他怎样把最能干的学生分化出来，经常找这些儿童谈话，让他们脱离其他的儿童。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是资产阶级旧学校的固有特点。

现在谈谈我国的情况。当然，我国实行普及教育的问题和使学校授予儿童的知识更加深化的问题尤为尖锐。最近一年这个问题特别突出了。最近一年来，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看到农民对学校的压力，而应该坦率地说，我国农村学校的情况还很可怜：总共只有45%的儿童入学，这个百分比在目前看来是太低了。在我国是自然经济的时代，只有45%的儿童入学还可以过得下去，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着要把全国的工业提到比战前更高的水平上去，在组织工业、组织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课题（因为苏维埃俄国不在这方面超过资产阶级各国，它迟早就会被打败），因此就需要为发展工业而顽强斗争。如果学校不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就不能进行这种斗争。群众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见到农民来谈学校的问题，他们说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希望给予支持帮助，等等。来访的人日益增多，可见基层的积极性多高。这也说明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当然，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都希望，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要使人有一定的发展水平，懂得社会发展的方向，明瞭周围的

形势，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当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一个很响亮的词。有时孩子们也常常讲起这种豪言壮语。不久前有一个比桌子稍为高一点的小女孩来找我。当我问她平常(是平常，不是节日)他们在儿童之家干什么时，她非常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们学习列宁主义。”要是孩子们也这样来讲世界观，那就很有害，很不自然，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对形势有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但不必说这些豪言壮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谈起学校时说，教育人民委员部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编制一份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可能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但它实际上要能表明各种现象的本质联系，要能表明自然界的各种关系(经济的、社会的)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对各种现象的关系，对这些现象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了解，这就是向学生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教育人民委员部努力设法完成这一任务。这一任务极为困难，因为要用最简单的事实，通过孩子们能接受的形式去做才行。如果我们向孩子们讲马克思主义等等，那是不会有好效果的。但是我们要用简单的事例让孩子们懂得——比如说——自然界和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懂得这些关系。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很起码的知识，但全部任务也就在于此——用儿童懂得的简单事例告诉他们各种现象的本质。我们主要是编制一级学校的教学大纲，因此首先提出了这一任务，因为一级学校目前暂时还是唯一的一种普通学校，所以从一开始就让儿童以正确的态度来研究各种现象是很重要的。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编制了这么一份教学大纲，其中的事例不是随便选入的，而是有一定联系的。这些事例的排列和讲述有助于儿童们对环境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大纲刚开始实行，首先学习的是教师。召开教师代表大会^②时，我们在会前曾与教师座谈。有一位教师(是个指导员)说：“你们编的教学大纲是怎么回事？简直把人都搞糊涂了。”参加座谈会的教师(占60%)对

这套大纲的反映如何呢？他们气愤地反驳说：“您这是指你们本省说的，我们谁也不觉得让大纲搞胡涂了。”

这说明教师们把这一大纲看作是自己的大纲。他们认为这个大纲也许应作部分修改，但他们不允许别人说这个大纲一点用处也没有。这说明教师们是以自觉的态度在对待大纲。这方面的困难是很大的。教师们谈了他们在这一大纲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他们开始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恰巧体现了这种观点的正确：要学习的不仅是学生，要学习这一大纲、加深对环境理解的还有教师。这个大纲的一个方面强调，根据大纲所讲授的知识不能是脱离生活的，而是要与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就不仅是授予一定的知识，而且还要指出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怎样用这种知识去改变生活。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来谈少先队运动与学校的关系，那么我们会说，少先队运动关心的是学校怎样办得更好以及少先队运动能充分利用这个学校。有人说，辅导员应该熟悉教学大纲，这个意见是对的。我认为，学校和少先队运动之间、教师和辅导员之间、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少先队工作计划之间，都应当有极密切的联系，因为没有这种联系，少先队员就不能像生活和时代要求他们的那样，去扎扎实实地学习。

如果认为营火会上的谈话可以代替学校的教育，那就错了，因为营火会上的谈话主要只能使人产生一种情绪，只能激发人的某种思想，而不能使人了解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它可以用一种体验、用一种感情把儿童团结起来，而学校却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少先队运动能做到。另一方面，新式学校离开了少先队运动就会寸步难行。如果我们要建设的不是旧学校，不是夸夸其谈的学校，而是真正的新式学校，那么，这种学校正是那些有独立精神、置身于一个把儿童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养成内在纪律的那一集体之中的学生们所需要的。资产阶级学校过去和现在一贯容不得少先队运动。它必然对少先队运动持敌视态度。

然而，苏维埃学校却竭力使儿童对环境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能把所学得的知识用于实际生活，这正需要少先队运动，而离开了少先队运动就达不到这一目的。从前我们只是想到要建立苏维埃学校，后来我们也的确建立了这种学校，不过我们并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少先队运动，然而现在生活却已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总的说来，这八年来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现在也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需要的那种学校，没有独立的、不依赖教师的少先队运动是不行的。

我在与一些教师谈话时，接触到这样一件事，就是有的教师觉得儿童离他们远了，因此心里很生气。他们说：“要知道，我们也是关心孩子们的呀！”我尽量向他们解释说，问题的实质在于，少先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没有这个组织，儿童就只是服从教师的意志，可是他们应当学会服从集体的意志。学校应该稍微走在生活的前面一些，应该教学生能过集体生活，能开展集体活动，而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教师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不过仍有很多人一直对儿童似乎离他们远了耿耿于怀。后来经过长时间谈话，主要是通过实际生活，他们才认识到，这是在校内建立集体形式的工作和生活、培养集体思想感情的最好途径。

共产党员常常说：共产党员有三项任务，就是学习、宣传和组织。少先队运动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但是，当我看到孩子们写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句子时，应该说，我很不高兴。这多半是教师们向他们灌输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我们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这话首先是对共产党人讲的^③；在评价一个人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人有用，他能学习”，——这些话都是对成人说的。而孩子们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句子，就有点旧时读书学校的味道：“只要我把功课学好了，

成绩考好了，我就是实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训。”这就把问题简单化到极点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那就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少先队运动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学校传授的知识加以深化，教儿童们学会以自觉的态度对待老师的讲授，因此辅导员必须熟悉学校所采用的教学大纲。要把教师所讲的某些东西在少先队组织里加以强调，为让孩子们理解得更深刻，少先队中队应对下列问题着重加以说明。例如：阶级斗争问题，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民族问题，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团结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特别加以强调，而要做到这一点恰好需要依靠少先队运动，因为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教师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讲得十分深刻。从调查的情况看，全体教师都愿意执行教学大纲，但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明白大纲的精神实质，许多人还没有掌握大纲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因而辅导员必须掌握这种特点。辅导员随时可以通过共青团支部，通过与党组织的联系对这些问题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可以得到有关的参考书等等。因而少先队运动的领导人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必须强调那些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特别重要的东西。

另外我还想讲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常说：第一应该学习，第二应该宣传。因此，要使儿童们从小就养成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的儿童的习惯。

现在，往往有些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基层组织闭关自守，使儿童和青年脱离广大群众，把自己置于这些群众之上。它们忘掉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共青团和少先队运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社会改造成无阶级的社会。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工人代表大会去做报告，他看到一条标语上写着：“工农统治永远存在。”他在演说中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够说工农统治永远存在这种话^④。难道我们希望阶级社会世代代保持下去吗？社会主义就是没有任何阶级、人人都劳动的社会；社会主义就是

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里不再存在目前这种阶级划分。年龄越轻，就越容易受到别的阶层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如果一个儿童出生于——比如说——一个商人家庭里，出生于一个资产者家庭里，他是没有罪过的，重要的是使他的世界观符合工人的世界观，使他具备工人的思想意识。成人很难改变。一个四十岁的人，他一直在干着榨取剩余价值的行当，很难让他变成一个关心工人阶级的胜利，希望工人们组织起来，更好地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而二十岁的人可能性当然就大些了。十二岁的人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在充满同志情谊的环境中，他容易形成明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而也就可能成为为工人阶级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而这一点我们往往不理解。我收到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写来的一封信（我本想把这封信带来的，但临时忘了），他抱怨少先队不吸收他，而不吸收的原因是他爸爸是手工业者。我认为这太过分了，实在是太过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所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至今毫未失去其意义，并且至今还能说明很多问题）一书中说，工人阶级是由不同的阶层构成的：一种是工厂的工人——这是先进的队伍，他们在工厂的工作条件本身使他们成了有自觉性、组织性的人；再就是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这两个比较落后的阶层。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工人阶级”不只是工厂工人，而且还有为雇主干活的手工业者以及农业工人^⑤。而我们竟然不吸收手工业者的儿子加入少先队。这样搞下去，我们就不仅巩固了旧的阶级社会，而且是在建立一个落后的等级社会，在制造等级隔阂。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反之，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少先队员尽量把自己过去和现在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的儿童。因此，我认为，少先队员在学校学的知识，以及后来他们在少先队中队里深化了的知识，都应该在校内外告诉别的儿童。我认为，可以利用“联欢会”来做这件事情。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还未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联欢会

在很大程度上应用作开门日，不仅有小组的活动，不仅进行一定的独立活动，而且还应让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入学的儿童，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学校的教学工作情况，能够参加学生的某种活动。当然应该考虑一下吸引这些校外儿童的方法。不能简单地把校门一开，谁想来就来。事先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在这方面，少先队员可以做很多工作。有组织地吸引校外儿童参加学校的联欢会活动是一项重要任务，在校儿童应向这些校外儿童讲讲他们在校内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这也是一种宣传工作。要让少先队员一开始就好好学习，然后再学会做宣传工作，也就是学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校内儿童组织起来，这个问题与自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治应该怎么搞？有各种类型的自治。有一种自治只不过是儿童协助教师搞好纪律，教师一个人对付不了全体儿童，因而就实行“自治”。我们所说的自治不是指起一种警察作用，或者督促某种学习活动的进行。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自治。1905年和1917年盛行的那种自治是，成立一个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选举儿童担负一定的职务，很少召开全体大会，全部工作都落在被选出来的那几个人身上，落在担负了某种职务的人身上，其余群众则无所事事。这种类型的自治其精神实质跟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居民实行的自治差不多。

当代资产阶级国家就是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选出某些领导人物，他们去执政，只是偶而形式主义地报告一下工作情况，其它事全体老百姓却不与闻问。

我们主张的当然是另一种类型的自治，是苏维埃式的自治。我们要在学校实行的自治，实质上是学校内的社会工作。实行这种自治时，全体儿童都从不同的方面组织起来，发动全体儿童参加工作，每人都担任一定的职务。这种自治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儿童的主动精神，儿童们会一起来寻求进行某项社会工作的方法，

会共同来讨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工作，因为这里可能有几种不同的社会工作，而关键在于选出那种特别有用的社会工作。在这里要从形式上划一条界线，哪些工作可以由学校进行，哪些工作只能由少先队员去做，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只能有一个大体的分工，而在具体情况下只能根据人力的安排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学校的社会工作中，少先队员要走在前头，要当带头人，要发挥主动精神。

拿农村的扫盲工作来说吧。目前识字的人还很少，学校想在扫盲工作上为居民做点事。有一位教师（可能是阿尔罕格尔斯克来的）谈了他们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他们那儿主要是少先队员打头阵，少先队员们帮助学校进行这项工作。学校先把家里没有一个大人或小孩识字的这种人家加以登记，然后每家派一个少先队员去。派到这个不识字的人家去的少先队员要为这家的主人写信，找报纸读给他们听。他还要熟悉农村阅览室的情况，教这家不识字的孩子认字，发动他们上学。少先队员在其他同学帮助下，把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好，居民们开始重视少先队了。少先队随后还要报告开展这一工作的情况，它还发动其余的同学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是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帮助文化机关开展工作。第三种形式是开展幼儿工作。例如，在一所学校里每周召开一次或两次在校儿童会议，邀请幼儿们前来参加。在这项工作中，打头阵的仍然是校内学生和少先队员们，学生们邀请这些小朋友来校作客，与他们一起做游戏，等等。小朋友们开始向往学校了，也能听学生的话——经常洗脸洗手，友好地做游戏，等等。

学校自治要洋溢着苏维埃精神，要符合共产党人的要求，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一个教师是完不成这项任务的（他通常只能出点主意），这项任务应由少先队组织来完成。它还要发动其余的儿童，让他们学会做这件事。

在这项工作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学会按科学的劳动组织方法进行工作的技巧，也就是说，制定一定的工作计划，按计

划进行分工，然后对工作进行总结。我们俄国人没有按计划进行工作的习惯，我们是随心所欲地干。

要在这方面进行学习：工作不要过于劳累，工作要尽量有成效。学校可以培养这种工作态度，但是少先队运动也应努力协助，使工作能按计划进行，不仅学习上有计划性，而且在安排整个学校生活上也要有计划性。

我还要谈谈学校的社会工作问题。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说，学校应该开展社会工作，——不仅是教师，而且还有整个学校，都要开展这项工作。当然，要认真开展这一工作，少先队员应该充分发挥主动精神。到底是学校还是少先队组织来领导这项工作，争论这个问题毫无必要。有时作出一项决定，说这是少先队运动的工作，学校不必介入。这就划了一条界限：社会工作是我们少先队的工作，而不是学校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划分是不应当的。但是，由于少先队运动接触群众工作更多，与工人组织或农村的农民互助委员会、村苏维埃等组织联系更密切，它当然有必要更关心这项工作。

我想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看待党组织的。当然，不能把儿童组织和党的组织等量齐观，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组织的看法却可以说明应该如何安排学校生活。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是党的这部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他应该履行一定的职能。如果他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能，整个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⑥。的确，一些过去在秘密的地下工作过并且受过锻炼的老党员，都把自己担负的党的工作看作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并努力完成这一部分工作。学校组织中也应该建立这样一条原则，就是每个学生都应担负一定的集体工作：先在全体大会上讨论工作计划，然后进行分工，每人担负一部分工作，他要对这一部分工作负责。要学会安排生活，处理好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谈到集体工作，谈到集体主义，谈到共产主义，而其基础则是普

于进行共同的、集体的工作。学校生活是学会安排自己工作的一个场所。如果少先队员自己担负大量工作，如果少先队员排挤别的儿童而只是让自己去工作，别人则无事可干，那么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少先队员的任务不是这样，他要很好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那一部分工作，并且帮助别人工作，在进行集体工作上做出榜样，而不是自己把全部工作都包揽下来。

在学校的社会工作中，打头阵的应该是少先队员，他们还应发动其他的儿童参加这一工作。少先队员发动其他的儿童参加工作，这件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党对待成人就是采取的这种办法——首先让他们参加集体工作。在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征收党员的运动中^⑦入党的男女工人，从前都在各种社会团体或工厂委员会工作过，有的当过妇女代表，有的担任过其他社会职务。所以这批男女工人首先入了党。可见，社会工作对他们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如果少先队员想扩大自己的队伍，想把全体儿童都吸引到这一运动中来，那他们就应该逐步吸引全体儿童参加这种社会工作。对儿童进行这种工作要比对成人容易。我认为，少先队员在校内外都应在这三方面（即学习，宣传和组织）下功夫，使学校成为儿童向往的一个中心。

有关儿童运动的组织问题我不打算讲了，因为我没有实际参加儿童运动的工作。我只想谈点看法。

不能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共产党员就适合当儿童运动的领导人。我就认识不少共产党员，他们对教育问题，对如何对待儿童的问题，往往毫无所知。在这方面，共青团员却要强得多，因为儿童自然愿意与自己年龄相差不多的人接近。共青团员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是因为他具有天然的威望。这一点应该注意。

党应该讨论儿童运动的总方向，这一运动的主要问题和总的路线，但党不应干预具体工作。我们如果去干预具体工作，就会使少先队运动失去独立性，就会妨碍少先队运动的发展。

闭 幕 调

这次会上有人说，学校目前还不能胜任它肩负的任务，教师们在教学方法上往往也弄不清楚，等等。这当然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但是，教师们的进步无疑是很大的。教师们学习都极其努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工作很快就会有的进展。现在谈谈教学大纲的分量过重的问题。分量过重往往是由于不善于使用大纲——纯粹是由于教师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一大纲。教师们采用的是过去用习惯了的旧大纲，然后又加上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这当然就使分量加重了。这种情况将随着我们改进对教师的工作而得到消除。会上还有人提出，不许布置各种形式的家庭作业。这对一级学校来说当然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要想在二级学校（七年制）做到这一点，就得安排儿童在校内自习……如果学生在校内的活动安排得合理，那就不必布置家庭作业来加重其负担。负担过重常常是由于我们没有妥善地处理这项工作。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教师学习，并给他们以帮助。有一位同志说得好，教学大纲中的一部分工作可以由“前哨”负责；“前哨”这种少先队基层组织可以做一些辅助工作。例如，要想做到不是教师讲什么自己就相信什么，而是要自觉地对教师所讲的东西，那就需要扩大知识面。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儿童加入少先队之后，读的书比以前少多了，——读书的兴趣不浓了。这当然是有许多原因的。一个原因是儿童比较能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所读的书了，许多书开始使他感到不能满足了；另一个原因是少先队和学校的工作都过重。这种情况必须扭转，因为少先队员要是书读少了，视野扩展慢了，将会影响他们的发展。这将给少先队运动带来极大的损失，尽管它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点。开展读书活动可以在校外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前哨”负责此

事。再就是开展图书馆工作、图书小组的工作，等等。

其次，戈麦尔市的一位同志讲得很好，他指出基层少先队有种种机会加强与各种社会团体的联系，这样，“前哨”就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使教师能够更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教师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少先队运动及其各种形式，知道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种种任务，等等。各个中等师范学校、训练班、高等师范院校在教学工作中都应充分介绍儿童运动的情况。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际上进行这种介绍。

未来的教师一定要实际接触这一工作，深入研究当前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项工作对提高他们的教育业务水平也有重大关系。

会上还有一位同志提出了如何搞好自治的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一项最重大的任务，就是自己要学会并且教其他的儿童也要学会集体工作和生活。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超过其他一切任务。没有集体工作的技巧我们就不会有有多大成就，我们的合作化工作就行不通，我们生活中就会产生许多矛盾。我们目前之所以存在这种矛盾，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集体工作的技巧。我们在社会工作、工会工作、党的工作、合作化工作以及其他各种工作中往往遇到种种困难，如果我们掌握了集体工作技巧，这些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学校里的自治工作首先就应培养这种技巧。我心目中的学校自治工作应该是这样：孩子们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应在校内进行的各种工作，卫生方面做什么工作，学习方面做什么工作，与各个组织加强联系方面做什么工作，等等。全部工作分为几个方面，每方面又分为几个部分，然后讨论各部分应该如何去做：是向专家请教，还是查找有关的参考书，根据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分工。善于安排集体工作，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儿童运动在这方面可以给学校巨大的帮助，并且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儿童都有组织能力，这是生活培养起来的，要让孩子们把这种能力

用去组织日常生活。我常常打听儿童的日常生活安排得怎样。据说安排得不好，往往毫无安排。我认为，要使儿童自己学会安排生活，特别要紧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共同生活、互相帮助的风尚。

典型的旧时学校总是不让学生互相帮助。如果一个孩子帮助别的孩子做练习或者讲功课，学校就大为不满。而现代的苏维埃学校则应该教儿童学会在工作中互相帮助，进行合理的分工，每个人担任力所能及的一部分工作。这是一项重大的自我教育工作，我们青年一代必须努力完成。现在在学校工作的人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他们只学过独自工作，而未学过集体工作。目前青年人之所以特别需要集体工作的技巧，是因为没有这种技巧他们就无法完成生活向他们提出的迫切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群众向合作制过渡^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教育，学会团结一切力量，而学校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对于学校里的集体工作，我们一直未予注意，或者注意得很不够，而这却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谈到儿童之家的问题时，那么集体工作在那里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不想去争论这个儿童之家叫什么名字才好（也不妨叫“少先队员之家”），但毫无疑问的是，儿童之家要想成为真正的儿童之家，就得把生活建立在集体、友爱的原则上，就不能像现在的儿童之家那样虚度时光。这种儿童之家不应是一个孤岛，它的生活应与社会生活、各个组织的生活、工人的生活、住在儿童之家外面的孩子们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我认为，儿童之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集体工作放在首位。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少先队书籍上说，儿童运动与学校往往不能融洽无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者是应该融洽无间的。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没有任何组织。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就是要按不同的工作目的把居民组织起来。社会主义就是各个方面的组织。这一定义说明：除了少先队组织之外，还允许有别的儿童组织如少年自然科学家组织（少先队员和非少

先队员均可参加)存在。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许多年轻的同志倾向于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少先队组织之外，不应该有别的任何组织(即使这个组织是狭隘的专业性组织)。

就拿少年自然科学家这个组织来说吧。它不是一个以政治为宗旨的组织，它的宗旨是对大自然进行研究和探索。少先队员中有许多儿童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他们应当参加这种组织，同时把少先队的精神带到这种组织里去，因为大家都认为少先队员是优秀的组织者，能够捍卫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一定能把少先队的精神发扬光大。

根据不同的工作目的和领域把居民组织起来，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压制这种方兴未艾的组织，那我们就完全歪曲了我们这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所肩负的任务。当然，少先队组织尽管是一个儿童组织，但是它带有一些政治组织的因素。其他政治性的儿童组织(如德国的“候鸟”组织^⑥)则不应发展，但是研究自然界的组织却是不带任何政治性质的。

要大力支持这类非政治性的儿童组织的发展，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前进。下令禁止是轻而易举的，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列宁格勒省一个村的一些组织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反宗教宣传问题：“……难道不能采取某些措施禁止洗礼教派信徒在芬兰人中间传教吗？因为洗礼教在他们那儿很有市场……”。他们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下令禁止。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芬兰人在这个村子里的地位如何，我们就会发现，芬兰人在苏维埃里没有自己的代表，苏维埃里也没有一个人会说芬兰话，他们完全无缘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工作。村里有一个农村阅览室，但一切工作都讲俄语。阅览室甚至连一份芬兰报都没有，也没有芬兰少先队员。这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洗礼教派信徒对芬兰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他们什么社会生活也不去参加了。我举这件事作例子，是想说明下令禁止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就这件事下一些禁止令，是否就能使洗礼教派信徒的活动销声匿迹了呢？当然不会。不仅

不会销声匿迹，反而会更加猖狂，更加隐蔽。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给芬兰党写了封信，请他们派人去，带一些图书去。我们给支部写了信。当然，要下令取缔各种儿童组织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这样做就会悄悄地出现一些秘密组织，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出现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要禁止，要往那里派少先队员。难道没有关心合作制的少先队员吗？难道没有关心科学的少先队员吗？要是没有，那就说明儿童运动压制了他们的兴趣。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报告中还未涉及到，这就是对待少数民族儿童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提请你们重视这个问题，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最近，我们国民教育部门的视导员对少数民族中间的国民教育作了一些调查。

调查的结果说明，我们对少数民族的国民教育工作还很不重视。我担心在儿童运动中对其他民族的儿童也未充分重视，没有发动这些儿童参加少先队的共同活动。我当然不能随意表态，因为我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我们往往不仅忽视少数民族的国民教育工作，而且也忽视少数民族的妇女运动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我担心儿童运动方面也是这种情况。我认为，要特别注意培养少先队员友好团结的感情，吸引大家参加共同的工作，而不要分民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少数民族中间的少先队运动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那里的学校比别的任何地方都需要大大加强，因此少先队运动在那里就特别重要。

注 释

我的生活道路(第3页)

第一次载于《少先队员》杂志1925年第2期和第3期。

克鲁斯卡雅之父康士坦丁·伊戈纳季耶维奇·克鲁普斯基曾就读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曾把她的父亲称作“典型的六十年代人物”。有关康·伊·克鲁普斯基最新的传记材料，见于《历史档案》杂志1955年第5期。

克鲁斯卡雅之母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在一所住宿学校(学院)毕业后，曾经在一些富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她亲自教克鲁普斯卡雅读书识字，甚至还给女儿编写带插图的诗歌课本(现存国立列宁格勒图书馆)。

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摘要)(第18页)

第一次载于《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22年，第5(56)期，3月号)。

① 烈克柳，让·雅克·艾里吉(1830—1905)，法国科学家，著有世界地理书籍多本，曾参加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政治信仰上是无政府主义者。

② 沃多瓦卓夫(1864—1933)，自由民粹主义派政论家，常为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主办的报刊撰稿。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1926年逃亡国外。

③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自由民粹主义派的思想家，实证论哲学家，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他曾批判过马克思主义。

④ 《论劳动和奢侈》，列夫·托尔斯泰于1886和1891年期间论文集的书名，即他的论文《我们该做什么?》的第39章。在九十卷的《列夫·托尔斯泰全集》中，这一章编入时没有标题，因为这一标题不是托尔斯泰加的(参

见《列夫·托尔斯泰全集》(九十卷集),第25卷,第392—405页)。

5) 《中介》出版社(1884—1925),列夫·托尔斯泰创办,其宗旨为出版最廉价的人民读物。继列夫·托尔斯泰之后,担任该社领导人的有捷尔特柯夫、比留柯夫,还有伊·伊·戈尔布诺夫—波沙朵夫。

⑥ 米尔托夫(拉甫罗夫)(1823—1900),民粹派思想家,主观学派社会学家,政论家,“土地和意志协会”会员,其后为民意党党员,第一国际成员,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书信往还。

在《历史信札》一书中(1869年出版),拉甫罗夫站在民粹派的立场上,从社会学主观学派的方法出发来探讨表述“批判地思考的人”的条件和任务这一问题,他认为这种人乃是社会进步的代表。

⑦ Н·В·谢尔古诺夫(1824—1891),革命民主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唯物论哲学家,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者,支持农民革命,反对“从小事入手”的自由民粹主义理论,著有《教育通信》和其他有关用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进行公民教育的书籍。

⑧ 谢·尼·尤沙柯夫(1849—1910),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自由民粹主义的思想家,曾批判过马克思主义。

⑨ 确切的书名为:Н·И·吉别尔:《原始经济文化概论》(1883年)和瓦·巴·沃龙佐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1882年)。

⑩ М·И·布鲁什涅夫(1864—1937),1888年至1892年间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小组的组织者之一。1892年,小组解散后,曾被流放十年,以后脱离革命工作。

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第25页)

第一次用《在斯摩棱斯克的教学工作(回忆录片断)》为题发表在1929年第2期《教育通报》上(该刊系1922年至1929年由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出版的社会教育月刊)。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在本文中描述了她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斯摩棱斯克村成年男工第一星期日夜校的工作情况(该校每周授课二至三次,时间在晚上,星期日则在午后)。

① 安·米·卡尔梅柯娃(1849—1926),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和马克思著作以及科普著作的出版家;与“劳动解放”组织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曾大力资助《火星报》;九十年代在彼得堡斯摩棱斯

克星期日夜校任教；十月革命后在列宁格勒师范学院工作。

弗·雅·阿布拉莫夫(阿夫拉莫夫)(1845—?)，沃尔柯沃村一所学校的国民教师；九十年代任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后来成了成人教育方面杰出的活动家。

② 陶瓷慈善会 斯摩棱斯克村陶瓷厂附设的福利慈善机构。

③ 阿·亚·雅库波娃(1870—1913)，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的教师；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为此曾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达四年之久)；后来，她同情“经济派分子”，与孟什维克打得火热。

④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64页。

⑤ 克鲁普斯卡雅在此处提及的斯摩棱斯克夜校的几位教师，其中很多人后来都从事了大量的党的工作、社会工作和教学工作。

普·弗·库捷里(1859—1944)，民意党人，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妇女运动积极的活动家；九十年代任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十月革命后从事过新闻工作和党史工作。

尼·列·米雪梁柯夫(1865—1942)，职业革命家，民粹派分子，1901年成为布尔什维克；九十年代任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十月革命后任《真理报》编委，国家出版社社务会议主席，国家学术委员会委员，苏联大百科辞典副主编，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

恩·伊·鲁巴京娜(1865—1930)，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俄国杰出的教育家尼·亚·鲁巴京之妻；十月革命后在列宁格勒革命历史档案馆工作。

奥·阿·费拉托娃(1873—1942)，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中学时代的女友，在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俄语和文学教员；十月革命后曾在列宁格勒市工农速成中学和中小学任教。

安·伊·捷秋林娜(1866—1948)，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的教员，斯摩棱斯克国民阅览室图书管理员；1917年入党；十月革命后从事图书馆工作。

⑥ 《上帝见到真理，但不很快道破》，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1872年)。

⑦ A·Г·巴兰诺夫(1844—1911)，诺沃托尔日师范学校校长；著有国民学校教科书多本；其中有一部分从八十年代直至十月革命曾印行数十版(如识字读本，阅读课本，地理教科书)。

⑧ 《斯姆林村纪事。俄国农民生活片断》，俄国民粹派作家П·В·查索基姆斯基(1843—1912)写的小说。

⑨ Д·Л·莫尔朵夫采夫(1830—1905)，俄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多本历史小说。

⑩ 《斯巴达克。17世纪罗马纪元历史故事》，意大利作家、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拉法艾洛·若瓦里阿尔(1838—1915)所著，他曾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⑪ 艾尔克曼—沙特里安，法国作家艾弥尔·艾尔克曼(1822—1899)和亚历山大·沙特里安(1826—1890)所用的笔名。

⑫ 贝尔纳·艾德华(1850—1898)，美国作家，新闻记者，风靡一时的幻想小说《回首往事》(俄译本为：《在二〇〇〇年》)一书的作者。

⑬ 国民图书阅览室是九十年代为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开设的，由社会和私人资助，但其业务活动受到沙皇政府的严格控制。

⑭ 彼·库·扎波罗茨(1873—1905)，社会民主党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村国民图书馆马克思主义小组负责人。

⑮ 这些教师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了党的积极活动家、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

尼·米·克利波维奇(1856—1920)，九十年代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员，民意党人，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任《火星报》经理；在1905年—1907年的革命年代里，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尼·尼·雅柯夫列夫(1870—1966)，苏联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九十年代在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教员，矿业学院教授(1899)，俄国古生物学协会创始人之一(1916)和协会深孚众望的会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1)。

亚·里·卡坦斯卡雅(1872—1963)，原为民粹派，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九十年代在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教员；十月革命后供职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

⑯ Д·М·罗加切夫(1851—1884)，俄国革命家，民粹派，曾在彼得堡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后来又农民中进行这种宣传；1878年被判服苦役。

⑰ 伊·瓦·巴布石金(1873—1906)，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最亲密助手。

⑱ А·Н·斯特兰诺留布斯基(1839—1903)，俄国数学教学家，海洋学院教授；彼得堡别斯吐日内夫高等女子学堂的负责人之一。

①⑨ 圣经基督教派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流行于欧洲许多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一种宗教派别;九十年代与洗礼教派合并。

②⑩ 俄国技术协会成立于1866年,其宗旨是促进技术和生产的发展,设有技术教育常务委员会,开办了一些学校来培养技术干部,并为成人和儿童举办了許多短训班和普通教育学校。

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的技术班于1889年开办。1894年获准开设一些非技术课程,如:地理,历史,文学。

②⑪ 兹·巴·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涅夫佐罗娃)(1869—1948),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彼得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地理教员;十月革命后供职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

②⑫ 雅·普·科罗布卡,彼得堡亚历山大罗夫工厂工程师,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人;九十年代曾在彼得堡一些中等学校担任数学课。

②⑬ 《工人事业》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创刊号由列宁编审出版。1895年12月9日凌晨,创刊号被警察查获,未能问世。

②⑭ 格·马·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基(1872—1959),共产党最老的活动家,列宁的朋友和战友,苏联杰出的电气科学家,科学院院士;曾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苏联国家计委领导人。

В·В·斯达尔科夫(1869—1925),曾参加彼得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1905—1907年革命后脱党。

②⑮ 克鲁普斯卡雅于1896年8月被捕,曾在狱中被关押七月之久,随后一年受到特殊的监视,直至被判处三年流放为止。

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摘录)(第45页)

《妇女与教育儿童》,娜·康·克鲁普斯卡雅1899年所著《女工》一书的第三章。该书最初由《火星报》于1901年在慕尼黑出版,未署作者姓名。

写一本有关俄国女工的书是列宁的主张。克鲁普斯卡雅回忆说:“还在流放时期,1899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与党组织的通信中,曾经谈到他想为秘密刊物撰写文章的一些题目,其中有一本书名就叫《妇女与工人事业》”(见列宁著《论妇女解放》一书克鲁普斯卡雅所写的序言,1934年版,第4页)。

① 妇女在家庭中只不过是奴隶而已。这种从属地位使她深受影响。妇女毫无权利,备受欺压。——作者注

② 参见列夫·托尔斯泰著《黑暗的势力》,芳信译,作家出版社1955

年，第123—124页。——译注

论自由学校问题(第51页)

此文最初发表于《自由教育》杂志1909年—1910年第7期(1910年3月)。

① 俄国和国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自由学校问题的文章(时在二十世纪初叶)，内容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些文章主要只触及到一些纯教育方面的问题(批判呆板的教学方法和教育上的专横作风等等)，而未涉及社会教育问题、整个教育制度的民主化问题、教育制度的统一问题以及各级教育的普及性等问题。大多数文章都赞成所谓自由教育。

自由教育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在许多国家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教育流派。支持这个流派的人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当时教育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机械训练、呆读死记的表现，以及摧残儿童个性的作法。他们反对对儿童进行任何的强制，主张儿童有权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提倡儿童人人都要自由发展，不必加以约束。

拥护自由教育的人在捍卫时必须使儿童和谐地发展这一思想的同时，都一致指出各种形式的儿童生产劳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指出必须使教育与学校周围的环境保持联系。他们同时还主张教学内容应随儿童兴趣和愿望的变化而变化，极不重视教学的系统性，认为没有必要去搞什么教学大纲、教科书、固定的课程表和一定的作息制度。因此，要求在选择教学方法和进行教育研究上让教师享有充分的自由。

② 波尔·拉科姆(1848—1921)，法国教育学家，著有《根据儿童心理进行的教育》一书。

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第57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自由教育》杂志，1909—1910年，第10期(1910年6月)。

① 指1909年。

② 《教育通报》，供家长和教师阅读的科普刊物。1890年至1917年每月在莫斯科出版。

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第61页)

此文第一次载于《自由教育》杂志1911年—1912年第3期。

1911年8月12日，克鲁普斯卡雅致书《自由教育》杂志编辑部，提出“最

好把关于两种方法的那篇文章和《向母亲们进一言》发表在连续的两期上，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两文涉及的是同一主题。”（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第1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① 肯尼希·舒尔茨(1872—1932)，德国教育家，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1906年起任社会民主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著有《教育改革与社会民主》一书。

无产阶级的儿童(第67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1912年9月19日《真理报》，署名娜·康·。

家庭与学校(第69页)

此文写成日期不晚于1913年1月4日。

克鲁普斯卡雅1913年1月4日致书《自由教育》杂志主编伊·伊·戈尔布诺夫一波沙朵夫说，“现奉上《家庭与学校》一文。目前彼得堡正在召开有关家庭教育的代表大会，此文也许是适时的。”（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第2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全俄家庭教育代表大会于1912年12月31日至1913年1月6日在彼得堡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共1253人。在讨论学龄前儿童教育问题时，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趋向，就是把儿童的家庭教育理想化，并且把这种教育与社会教育对立起来，似乎社会教育对学龄前儿童是完全不适合的。

布尔什维克主办的《真理报》于1913年1月4日在《自由主义的软弱无力》一文中指出，“软弱无力和畏缩不前表现在这次大会的全部工作、全部讨论和决议上”。

此文第一次载于《自由教育》杂志1913年—1914年第1期(1913年9月)。

① 弗里德力赫·威廉·奥古斯特·福禄培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信徒，曾创建独特的学前教育体系。

② 德雷福斯案件系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法国德雷福斯(犹太人)的间谍案件，由法国反动军事当局于1894年一手炮制而成。此案引起了法国进步力量对反动当局进行的尖锐斗争(如，左拉、法朗士等人的反抗表现)。(可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87—588页。——译注)

③ 德兰士瓦战争指英国对南非各共和国发动的侵略战争(1899—1902)，是帝国主义初期的一次战争。(可参阅程西筠、王璋辉著，《英国简史》，

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注)

④ 施泰恩肯尼希·弗里德力赫·卡尔(1757—1831)，德国国务活动家，1807年至1808年期间任普鲁士总理，曾进行过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革，是费希特制定的民族教育计划的支持者。

⑤ 洛齐·皮耶尔(1850—1923)，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著有《一个儿童的恋情》。

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迎接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第78页)

此文第一次载于1911年至1914年期间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教育》(1913年第11期，11月)。

① 指自由经济协会所属彼得堡识字委员会(成立于1861年)，该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倾向，其宗旨是在居民中开展识字运动。1865年，改隶于国民教育部，经彻底改组后，易名为圣彼得堡识字协会。

② 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于1913年12月22日至1914年1月3日在彼得堡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六千多人，主要是小学教师。这次会议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有关这次会议的材料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主办的报刊上(《教育》，1913年第11期，《无产阶级真理》报1913年12月—1914年1月)。

③ 马尔丁·布兰泰(1727—1772)，瑞士教育家和自然科学家，撰有多本物理和数学著作。他于1761年在加耳金斯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企图实现“学校共和国”。

④ 霍勒斯·曼恩(1796—1859)，美国民主主义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他为了改进美国的教育工作而领导了进步的社会教育运动。

⑤ 克鲁普斯卡雅在她的一些论著(如《论学校自治》、《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等)中，肯定了美国学校的一些进步之处，但对欧洲和俄国许多学校的阶级—等级教育制度却持猛烈抨击态度。克鲁普斯卡雅曾把这种教育制度与美国资产阶级统一学校加以对比，认为这种学校比等级学校要进步得多。

后来，在1923年，克鲁普斯卡雅写道：“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倾向于把美国学校和美国教育理想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国学校控制在沙皇政府手中，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克鲁

普斯卡雅教育文集》第3卷，第45页，1959年，莫斯科）。

她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例如，我们往往大肆赞扬美国学校，说美国学校极其民主，因为在美国学校苦力的儿子可以与总统的儿子同窗共寝。可是我们却忘了，美国的整个教育方针是适应总统的儿子的需要的，而不是适应苦力的儿子的需要的。人们往往未能透过民主的外衣而洞察其阶级实质”（见马列学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室档案）。

⑥ 弗尔·谢巴斯基扬（1858—1942）法国教育家，曾为贫民子弟和孤儿创办“蜂房”寄宿学校。

⑦ 有关该校的情况可参见《‘社会的未来’五年教育经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第1卷，第154—156页，1957年，莫斯科）。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第85页）

此文第一次载于1913年第15号（12月24日）《无产阶级真理》报。

克鲁普斯卡雅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筹备全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的工作。她先后在《无产阶级真理》报上发表了下列文章：《教育工作的组织》、《马克思论教育》（此文部分材料又用于《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无党性的学校》。她在这些文章中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反动政策，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克鲁普斯卡雅的这些文章，署名均用简称：娜·康·，直至六十年代才为人们辨识出来（参见《教师报》1968年2月20日）。

① 参见И·А·柯诺瓦洛夫著：《当代农民状况概述》，1913，年圣彼得堡。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第88页）

此文写于1913年。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63年第7期。

在《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的手稿上，标题系列宁亲笔所写。这个文件是克鲁普斯卡雅准备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上用作布尔什维克代表发言的草稿。但是，1913年6月，在讨论国民教育部1913年经费预算的报告时，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了列宁草拟的讲演稿（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2—13页）。

① 指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

② 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反动分子，专制主义的狂热信徒。1880年至1905年任元老院长。

③ 指杜马关于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法令草案,根据这一草案,宗教教区所属小学一律改隶国民教育部,但保留宗务院对小学的监督权。

④ 《新时代》是受沙皇政府资助的保皇派报纸。1868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

⑤ M·O·孟什柯夫(1859—1918),反动政论家,黑帮分子报纸《新时代》的撰稿人。按照列宁形象的说法,此人乃是“……沙皇黑帮分子忠实的看门狗”。(《列宁全集》第20卷,第142页,俄文版)孟什柯夫在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

⑥ 指立宪民主党。

⑦ 巴·尼·米留柯夫(1859—1943),立宪民主党头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在临时政府第一任成员中担任外交部长,是策划外国武装侵犯苏维埃俄国的组织者之一。

⑧ 右派政党是大工商资产阶级、地主和上层官僚集团的反革命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1907年该党解体,一部分党员成了十月党人,另一部分沦为黑帮分子。

⑨ 瓦·安·卡拉乌洛夫(1854—1910),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

⑩ 国家委员会系一立法机构。该委员会由官僚集团的高级官吏、军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组成。国家委员会经常阻挠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令的执行,1917年10月6日被撤消。

⑪ 弗·费·巴甫连科夫(1839—1900),进步的教育家,出版家。根据他的遗嘱所捐献的款项,修建了两千所免费国民图书馆。

⑫ 1912年12月9日,彼得堡私立维特曼实科中学逮捕了32名学生,借口是未经行政当局许可擅自召开大会。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第96页)

此文写于1915年,由《生活与知识》出版社1917年在彼得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此书是克鲁普斯卡雅教育著作中第一部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和教学的学说的论著。本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和发展的历史。

克鲁普斯卡雅在撰写此书时,研究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各种文献,阅读

了历史上许多最有名的教育家的著作和各国与她同时代的教育家的著作。

本集编入了她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写的第一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序言。

① 约翰·贝勒斯(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曾起草一个由富人资助的组织劳动公社(友谊性)的方案,著有《关于建立劳动学院的建议》一书,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② 指沙俄教育部(译者注)。克鲁普斯卡雅系借用列宁的说法(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7页)。

③ Д·И·伊洛瓦依斯基(1832—1920),历史学家,贵族君主派的政论作家,官方历史教科书(在沙俄中小学普遍采用)的编著者。

④ 参见附录(第198页)。

⑤ 谢·尼·尤沙柯夫(1849—1910),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自由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

⑦ 阿·叶·巴达也夫(1883—1951),苏维埃和党的活动家,1912年至1914年期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

⑧ 指列宁所写《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4—134页)。

⑨ 《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4页。“不是卡索的”系指国民教育部长卡索在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推行的反动政策(1910—1914)。

⑩ 《致拟出版〈教育辞典〉的出版商书》一文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1卷,第240页)。

⑪ 艾曼路易·费林别尔格(1771—1844),瑞士教育家,大土地所有者,经济自立的学校制度的创始人。

⑫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工厂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初一批机构的组织者。

⑬ 让·安东·孔多塞(1743—1794),法国教育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巴黎科学院成员,吉伦特党员,立法会议国民教育委员会成员。

⑭ 热伯特·洛姆(1750—1795),立法会议和1792—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代表,起草了许多有关国民教育的法令草案。

⑮ 让·加任费拉特茨(1755—1827),化学家,国民公会成员。

⑯ 泛爱派是一种教育流派,他们想在十八世纪德国的条件下实现卢

梭的教育思想。泛爱派成立了一种教育机构——泛爱学校，这是一种独特的寄宿学校，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这个流派的领导人物有：巴兹朵夫(1724—1790)——德萨泛爱学校的创办人，卡门别(1746—1818)——巴兹朵夫泛爱学校的同事，扎里茨曼(1744—1811)——施涅普费达尔泛爱学校的奠基人，古特斯姆特(古特斯·姆特斯)、约翰·克里斯朵夫·弗里德里希(1759—1839)——扎里茨曼泛爱学校的教师。

①7 让·波尔·里赫杰尔(1763—1825)，德国作家，反封建的讽刺文学和教育著作《列瓦那，教育学说》(1807年)的作者。

①8 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①9 约翰·雅科布·波得米尔(1698—1783)，瑞士社会活动家，裴斯泰洛齐的教师。他的收信人祖里茨尔(1720—1790)，德国神甫，撰有许多教育著作。

②0 约翰·卡斯巴尔·布龙奇里(1743—1767)，裴斯泰洛齐“古代瑞士人协会”(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瑞士爱国组织)的志同道合者。

②1 指裴斯泰洛齐所写《怀念人类的挚友》一文(载1782年8月8日第32号《瑞士之叶》)，是为悼念裴斯泰洛齐的朋友与保护者伊沙克·伊捷林而写(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

②2 《论农民》一文未译成俄文。

②3 指《致贵族卡尔·庆陈道尔夫伯爵关于职业教育与国民学校的联系的备忘录》(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2卷)。

②4 裴斯泰洛齐在《怀念人类的挚友》一文中谈到了自己的错误。

②5 兰喀斯特学校又称贝尔—兰喀斯特学校，是指实行在教师指导下儿童互教互学这种制度的学校。

拟定这个制度的是苏格兰人安德纽·贝尔(1753—1832)，伦敦的一位教师约瑟夫·兰喀斯特(1778—1838)把这一制度用于英国。

②6 主教协会系一宗教团体。

②7 奥托·龚茨凯尔(1841—1909)，瑞士教育史家，著有《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一书。

②8 约翰·雅科布·威尔里(1790—1855)，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办的学校的教师。

②9 参见《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一文注⑧。

③0 参见阿布拉莫夫著《裴斯泰洛齐传》，1893年圣彼得堡版。

③① 1816年, 罗伯特·欧文在纽兰纳克创办了一个“性格形成学园”, 其中包含托儿所(一至三岁的儿童)、幼儿园(四至六岁儿童), 还有小学(六至十六岁儿童)。

③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535页。

③③ 佛兰西斯·普兰斯(1771—1854), 英国政治活动家, 为扩大手工业者选举权而斗争的激进主义者。

③④ 指罗伯特·欧文所著《论人的性格的培养》(1813—1814)。1865年首次译成俄文。

③⑤ 1789年6月17日, 法国“第三”等级(农民和市民)的代表与贵族和僧侣(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国王召开的三级会议, 他们自称为制宪会议; 而在1789年7月9日(在巴士底监狱陷落之后几天)改称创宪会议。

③⑥ 萨尔·莫里斯·塔列兰(1754—1838), 法国外交家, 在五执政内阁、拿破仑一世以及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起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③⑦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立法会议, 1791年具有创宪会议的地位。

③⑧ 国民公会是法国的代表大会,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高立法机关, 存在于1792年9月20日至1795年10月26日。1792年9月22日, 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

③⑨ 罗伯斯庇尔(1758—1794), 法国雅各宾专制时期革命政府的首领。

④⑩ 雷佩尔提(1760—1793), 法国国民公会议员。

④⑪ 让·若列士(1859—1914), 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法国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1920年起为法共机关报)的创始人和主编。

④⑫ 路易·安东·圣-优斯特(1767—1794),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党的领导人之一。

④⑬ 布基埃(1739—1810), 法国国民教育委员会委员, 1793年提交国民公会讨论的改革国民教育方案的起草人。

④⑭ 有关比松辞典的问题可参见本书《〈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④⑮ 约瑟夫·拉卡纳尔(1762—1845), 法国国民公会成员, 在国民教育委员会中起了领导作用。

④⑯ 拉瓦锡(1743—1794), 法国化学家, 巴黎科学院成员。

④⑰ 塔列兰关于国民教育的报告是在1791年9月制宪会议最后几次会

上讲的，未经讨论即转交给了立法会议。组织国民教育的方案包含了当时的某些进步思想，但从整体上看依然是温和稳健的。

④⑧ 纳·威·西尼耳(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④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40页。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西尼耳《社会科学会议》第55—58页。

⑤⑩ 同上书第539页。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9号。

⑤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9页。

⑤⑫ 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

⑤⑬ 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周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第66页。

⑤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页。

⑤⑮ 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XXXVIII页第XXV、XXVI页第191号。

⑤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页。

⑤⑰ 《哥达纲领》第3条是这样表述的：“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页）。

⑤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35页。

⑤⑲ 同上，第4卷，第490页。

⑤⑳ 同上，第486页。

⑤㉑ 同上，第485页。

⑤㉒ 同上，第23卷，第533页。

⑤㉓ 同上，第534—535页。

⑤㉔ 同上，第535页。

⑤㉕ 马克思为出席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的代表拟定了一个指示。他提出的九点指示中，有六点成了大会的决议，其中包括“男女孩童和少年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6—218页）。

⑤㉖ 克鲁普斯卡雅译出了这一决议（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文集》四卷集，第1卷，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中，这段原文译为：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工作的趋势是进步的、健康的、合乎规律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趋势是不正常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该成为生产工作者，正如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应该服从一般的自然规律一样，这就是：为了要吃饭，就应当劳动，不仅用脑来劳动，而且用手来劳动。

<……>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不把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父母和企业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解决儿童和少年参加劳动的问题的。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种东西：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在体育学校和军事操练所传授的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它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使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

智育和体育以及技术教育的逐渐复杂的程度，应该同儿童和少年工人按年龄的划分相适应。技术学校的一部分开支，应当以出售他们的产品所得的钱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能够使工人阶级大大超过中、上层阶级的水平。”

⑥7 参见《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一文。

⑥8 科恩基法国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家。

⑥9 波耳·拉法格(1842—1911)第一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⑦0 奥托·卡敏尔(1865—1951)德国工程师，著作多系关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书。

⑦1 巴·尼·米留柯夫，《武装的世界和军备限制》，1911年圣彼得堡版。

⑦2 高级手工艺学校是一种进行劳动教育的中等学校。

⑦3 原文为英文Cooperative school system.

⑦4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他的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表现为工具主义的形式)。杜威主张“通过动手”进行教育，也就是说，让一切知识来自儿童的实际独立活动和个人经验。杜威鼓吹依靠教育和学校达到“阶级利益和谐一致”的思想。

⑴ 巴乌里辛·弗里德里希(1846—1908),德国教育家、新康德派哲学家,有许多美学、教育学、国民教育史的著作。

⑵ 参见《向母亲们进一言》一文注①(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1卷)。

⑶ 狄摩林·艾德孟(1852—1907),法国教育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法国“新式学校”的创办人。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第182页)

克鲁普斯卡雅的创作素材,共有26本笔记,现均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文的素材饶有兴味。她在这些素材中可以不必顾虑沙皇的检查制度。关于如何回避检查的情况,她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三版序言中已谈及。

① 皮耶尔·克洛德·弗兰芬·杜鲁(1761—1840),国民公会成员,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拥护孔多塞。

② 山岳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十八世纪末叶)对国民公会革命民主团体的称呼。

③ Germinal(芽月)系法兰西共和历第七月,这一共和历系国民公会通过,从1793年10月5日使用至1806年1月1日。

④ Бромер(雾月)系法兰西共和历第二月。

⑤ 参见本书《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一文注④。

⑥ 罗宾·波耳(1837—1912)法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参加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致力于全面教育问题的研究。他曾于1880年在布烈沃(巴黎近郊)开办一所孤儿院,以实现自己的主张。

⑦ 《蜂房》是报纸名称。

⑧ 胡斯·扬(1371—1415),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思想家,捷克改革运动的理想家。

⑨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第一次全欧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起初具有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性质,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一性质日益消失。这次战争以签订维斯特伐利和约告终,但这一和约并未使战前欧洲的政治组织发生多少变化。

列宁致阿·马·高尔基(第197页)

写于1916年2月8日之前，寄往彼得格勒，第一次刊印在1925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三卷。现载《列宁全集》第49卷第182—183页。

克鲁普斯卡雅致阿·马·高尔基(第198页)

写于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2月8日之间，由伯尔尼寄往彼得格勒。第一次载于1961年6月17日第72号《教师报》上(见门得列维奇所写《高尔基和克鲁普斯卡雅》一文)。

① 指克鲁普斯卡雅所著《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

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第203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月刊(1918年，第1—2期，彼得格勒)。

① 显然，克鲁普斯卡雅是指自由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的一些社会教育团体，如识字委员会和识字协会(成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活动。俄国技术协会等团体坚持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的问题。在两次革命之间的这段时期，沙皇政府已不能回避这一问题，于是就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法令。但是这一法令也未获执行。

② 玛丽亚·孟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医生和教育家，她拟定了一个发展学龄前儿童和低年级学龄儿童感觉器官和协调动作的体系。她在很多方面赞同“自由教育”的思想。

③ 劳动教学法就是利用学生的劳动活动来向他们传授知识，发展技能和熟练技巧，使学生的认识活动积极起来，为此就要发动儿童运用其感觉器官。

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第213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刊《国民教育》(1918年，第1—2期，彼得格勒)。

① 巴·布朗斯基所撰《教育原理维议》一文编入《巴·彼·布朗斯基教育文选》，第145—159页，1961年，莫斯科。

论废除童工问题(第218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18年2月20日，第30号)。

①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要求“禁止工厂主雇用(未满16岁的)学龄儿童参加劳动并把少年儿童(16—18岁)的劳动时间限制为6小时”。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曾根据1917年11月11日(10月29日)《关于8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废除了童工制。该法令第9款写道：“……1) 不准雇用未满14岁的幼童参加劳动，2) 未满18岁的童工一昼夜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见《临时工农政府报》，1917年10月30日，第2号)。

1919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指出：“……由战争所引起的严重破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进攻，迫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下述退一步的办法……允许14岁至16岁的少年参加劳动，限定工作日为4小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卷，第58页，第8版，1970年，莫斯科)。

② 在《哥达纲领》第3条是这样表述的：“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卷，第273页。

⑤ 显然，克鲁普斯卡雅是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6节)和第13章(第3节和第9节)。马克思在揭露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部残酷性时，提出不必禁止童工，而是要使这种劳动在适合少年儿童年龄特点的条件下进行。马克思写道：“……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0页)。

⑥ 给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代表的指示是马克思写的。他提出的九点指示中，有六点成了大会的决议，其中包括“(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6—218页)。

⑦ 法令草案于1917年11月30日抄送劳动人民委员部，草案规定在安排少年儿童劳动时应使他们有学习的机会，并让他们逐步熟悉各种生产。

职业教育的任务(第222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每周附刊《国民教育》(1918年第2期，6月2日)。

① 工人大学系一种人民大学，是在工人组织的倡议下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兴办的。

俄国的人民大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叶，正值第一次俄国革命风起云涌之际。1917年10月之后，人民大学的网点有所扩大，成了整个教育机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随着工人大学的发展，人民大学相继停办。

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第226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每周附刊《国民教育》(1918年第2期，6月2日)。

全俄教师联合会(全教联)是教师工会，成立于1905年4月，起初(1908年以前)叫做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在反动年代，该会停止了活动(1908年)。1917年2月革命后重新恢复，改称全俄教师联合会。在该会起领导作用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全教联的领导人对于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共产党员教师和一些同情苏维埃政权的教师退出了全教联，建立了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2月23日下令解散了全教联这个反苏组织。1919年成立了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工会，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遂与其合并。

本文写于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时。这次会议是1918年6月2日至6日举行的。6月5日，列宁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1918年9月20日在无产阶级的文教团体代表会议上的演说)(第229页)

第一次载于《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教团体代表会议记录汇编》(第56—61页，1918年，莫斯科)。

① 格奥尔格·凯兴斯泰纳(1854—1932)德国教育家，资产阶级公民教育和劳动教育的理论家，主张进行宗教教育，强调学生必须绝对服从听话，认为普通教育的内容只限于对青年工人进行职业训练。

② 参见《列夫·托尔斯泰教育文集》第243页，1953年，莫斯科。

③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之一的创始人。他在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时，站在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主张工人

与资产阶级国家和平共处，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批判了拉萨尔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25页）。

④ 法国教师的工团主义运动发端于二十世纪初叶，主张各个教师组织与工人的工会运动团结合作并建立密切的联系，因而受到政府的镇压。

⑤ 若尔日·本扎曼·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活动家，反动分子。1906—1909年和1917—1920年期间任总理，是武装干涉苏联的策划人之一。

⑥ 罗惹·库吉列(1881—1973)，法国教育家，“新教育”的代表人之一。他创造了学生分组教学法(每组二至五人，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各种课程)。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第237页)

1920年8月16—2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第一次学校教育科、省国民教育处代表大会，克鲁普斯卡雅在大会上的发言载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周刊《国民教育》(1920年，第71—73期，11月1日)。

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第240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教育》杂志(1920年，第1期，11—12月号)。

① 指1920年9月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必须成立统一的国家机构来领导全国政治教育工作。

② 所引决议系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

③ 参见《无产阶级文化》杂志，1920年，第17—19，83—84页。

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第243页)

这里发表的材料是克鲁普斯卡雅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提纲之一，她准备在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做这个报告。这次党的会议于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宗旨是为迎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准备有关组织全国教育工作的材料，并根据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新任务，讨论有关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构问题。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第245页)

第一次编入里亚波所著《苏维埃教育制度中的职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问题》一书(1929年, 哈尔科夫)。

这里发表的材料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党的第一次国民教育会议(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上的报告提纲之一。由于克鲁普斯卡雅患病, 她所撰写的这一报告提纲由卢那察尔斯基代读。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是“社会教育的基础”, 而有人却主张实行“单一技术”教育。克鲁普斯卡雅在提纲中主张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而格·费·格林柯和奥·尤·施米特则主张早期实施狭隘的专业教育。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会议结束以后。

列宁对克鲁普斯卡雅的提纲写了评述。

① 显系“教师”之误。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第247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女共产党员》杂志(1921年, 第8—9期, 1—2月号)。

①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项法令是1917年10月29日发布的教育人民委员告俄国公民书。其中谈到有关“成立对全体公民统一的、绝对非宗教性的多级学校”的问题(见《苏联国民教育》。1917年—1973年期间文件汇编, 第8页, 1974年, 莫斯科)

由于实行统一的教育制度, 全体儿童不论其家长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如何, 都能获得同样的普通教育知识、劳动技能和熟练技巧。实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教育和教学的目的—致, 基本的教育原则—致, 各级学校相衔接。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行这一原则。

② 显然, 克鲁普斯卡雅指的是二月革命后在立宪会议选举时的选举权; 当时公民权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并未消除。

③ 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党纲写道: “……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以衣、食、鞋袜及教材”(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2卷, 第48页, 第8版, 1970年, 莫斯科)。

1918年至1921年期间, 通过了一系列关于供给儿童伙食, 特别是免费供给儿童伙食的法令。但是, 1921年夏天克鲁普斯卡雅写道, “然而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济的普遍凋蔽, 我们至今未能实现普及教育, 未能建立统一

的学校，未能由国家负担学生的费用”。实际做到的只是大大扩充了收容孤儿的儿童之家，以及对部分家庭经济最困难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学生进行物质上的帮助。

④ 统一劳动学校这一名称见于苏维埃政府关于普通教育学校的第一个法令——俄罗斯联邦统一劳动学校章程。该章程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于1918年10月16日公布。章程把学校分为各种初等和中等学校（古典中学，实科中学，商业学校，等等），除高等学校外，凡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均授予新的校名。统一劳动学校学习期限为九年，分为两级，均为免费并实行男女合校，坚持非宗教性质。明文规定“生产劳动乃学校生活之基础……”（第12条）和“劳动学校的教学在一级和二级阶段均具有普通教育的综合技术教育性质”（第13条）。

章程还规定了学校工作的制度和学校自治的基本原则。在公布这一章程的同时，还下达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告《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这两个文件均见《苏联国民教育》（第133—145页，莫斯科）。

论妇女职业教育问题（第253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1年2月27日）。

论学校建设（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提纲）（第255页）

第一次刊印（据俄罗斯联邦国立中央档案馆档案）。

①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系根据1921年2月11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批准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章程于1921年6月成立的。克鲁普斯卡雅于6月28日召开的科教部会议上根据这一提纲作了报告，而提纲则于1921年7月4日通过。这一提纲成了国家学术委员会对各科学研究所下达指示的根据。

② 学校合作社建立于二十年代，其任务是负责供应学生在校的早餐和教学用品。克鲁普斯卡雅在《论学校合作社》一文和她所作的报告《二级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3卷，第149—153，166—168，178—179页，1959年，莫斯科）中均曾指出：学校合作社应发展为生产性质的合作社，而非商业性质的合作社。她认为，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的这一生产合作社能够成为用集体主义精神进行劳动教育的一种手段。由于学校的物质基础薄弱，学校合作社后来未能得到推广。

③ Text-book——教科书，指南。

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258页)

第一次载于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汇编(1925年，莫斯科)。

① 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1921年9月21—28日在莫斯科召开。

② 克鲁普斯卡雅指的是1921年9月22—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局代表大会。

③ 俄罗斯电讯社。

④ 工厂学校，即工厂艺徒学校。根据共青团的倡议，1919年—1920年期间创办了此种学校。从1921年起，工厂学校发展成为群众性地培养专业技术工人的一种形式。最初，工厂学校招收具有小学程度的少年工人，学习期限三至四年，教学计划包含七年制中学的普通教育、社会政治教育、一般技术和职业训练以及生产教育。后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迫切需要干部，学习期限缩短为一年半至两年，压缩了普通教育课程，扩大招收七年制中学的毕业生入学。工厂学校是各个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首先要满足各该企业对干部的需要。为了满足那些不能自办工厂学校的企业对干部的迫切需要，1940年建立了劳动后备学校体系，同时对大多数工厂学校进行了改组。到了六十年代，劳动后备学校改为城乡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期限不一。进入七十年代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有了很大发展，学习期限三至四年。

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第261页)

此文第一次载于《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22年，第8—9期)。

① 《工人思想》是“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年10月出版，1902年12月停办。列宁在许多文章及《怎么办?》一书中，都对《工人思想》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② 苏维埃党校分为一级和二级两种，是1920年—1934年期间为培养基层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作人员而开办的。学习期限一至二年。

一级学校的任务(第267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年,第1期,7月号)。

《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1933)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机关刊。该刊的宗旨是团结一切赞成统一劳动学校这种主张的教育家,让他们去探索建立新的、苏维埃学校的途径。1930年—1933年期间,该刊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的机关刊。该刊从第2期起由克鲁普斯卡雅任主编。

该刊第1期在发表克鲁普斯卡雅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布朗斯基写的《小学的教育任务》,戈尔东写的《新式学校,原则、结构和方法》以及沙茨基写的《是学校为了儿童还是儿童为了学校》(第2期续完)。这几篇文章加有如下编者按语:“这几篇文章虽然实质上谈的是同一问题,但每个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却各不相同。编辑部认为,同时刊登这几篇文章可以充分阐述所涉及的问题。”

克鲁普斯卡雅在文中论述了苏维埃初等学校的教学和教育工作,以及这一工作与生活、与研究居民的劳动活动、与组织儿童参加集体的公益劳动的密切关系。她还提出,自治是学校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布朗斯基的文章着重讲了小学劳动教育的内容和组织,小学与居民的联系以及培养儿童积极参与周围生活的志趣。

沙茨基的文章特别强调环境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问题。

戈尔东反对小学实行课程教学制,主张改为按综合法讲授具体的生活材料。在采用这种方法时,各个课程的材料都集中为一个共同的主体,即综合体。

谈教学大纲问题(第276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年,第2期,9月号)。

① 1918年9月通过的《统一劳动学校章程》和《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只规定了苏维埃学校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是,在1918—1920年期间,全国性的大纲尚未制定。1921年成立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成了制定普通教育学校新教学大纲的中心。该部制定的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一直用到1931年。

新教学大纲的总的构思,克鲁普斯卡雅已在科教部1921年7月4日通过的有关学校建设的提纲(见本书第255页)中谈到了。

制定一级学校教学大纲的主要工作是由布朗斯基和沙茨基负责的。

制定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即5—7年级)和第二圆周阶段(即8—9

年级)教学大纲的工作是由M·M·皮斯特拉克主持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的。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教学法工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莫斯科市列别辛斯基实验示范公社学校的教师。

到1922年末,已制定的有:一级统一劳动学校大纲、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的教学大纲的草案。1923年3月5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常务会议通过了上述三种大纲的草案,决定在此基础上使大纲进一步完善详尽。

1923年7月15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常务会议同意了一级学校一年级和二年级教学大纲,以及二级学校一年级教学大纲,并将这些大纲印发下达供各实验示范学校讨论和试行。

大纲把全部教材分为三个部分:(1)自然界、自然资源和自然力;(2)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利用;(3)社会生活。这三部分的材料统一在总的综合性题目之中。大纲分为两种:城市一级学校用和农村一级学校用;两种大纲均应保证统一的知识量。

1924年,出版了一级学校全部四个年级的教学大纲,其中着重指出了社会学科、劳动知识、自然学科、数学和本族语的总的知识量。

预计在三年内(从1924—1925学年到1926—1927学年)使所有一级学校全部逐渐过渡到按新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即5、6、7年级)的教学大纲汇编于1925年出版,包括下列课程的教学大纲:社会、自然、物理、化学、数学、本族语、文学、地理和外语。同时,每门课程的教材安排体系要服从总的综合性题目。过渡到使用5、6、7年级的新的教学大纲,规定在三年期限内,即从1926—1927学年到1928—1929学年。

上述大纲见于下列两书:《一级统一劳动学校新教学大纲》,莫斯科,1924年;《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5、6、7年级)教学大纲》,莫斯科,1925年。

1927年,根据各校执行新大纲的经验,修订出版了一级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参见:《统一劳动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法说明书》,第1—4册,莫斯科,1927年)。这次出版的大纲第一次纳入了1—7年级劳动教学的材料。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8、9年级)普通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于1927年出版(第5、6册)。

这两次新编的教学大纲(1924、1925年和1927年)在教育界统称为国家

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

这些大纲促使教师注意加强学校与生活、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以及共党政策的联系。这些大纲也引导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这是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优点的一方面，也是它与旧时学校的教学大纲和1919—1921年期间大纲参考材料原则上不相同的地方。

但是根据统一的综合题目来制定大纲的做法证明是不妥当的。综合性地安排教材往往导致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十分牵强，破坏了知识的系统性。因此，1931年就改变了综合性的结构。从此以后，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大纲均按课程体系制定。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不止一次地指出综合性有变为偶像的危险，极力反对教学大纲之间的主观臆想的、牵强附会的联系。她在《谈教学大纲问题》一文中说，综合性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内容，只有在低年级适用，以后还是得按课程分（参见本书第256页）。

执行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时期，是从原则上改革和更新学校教育内容的重要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到三十年代初期，苏维埃学校已能保证学生具有相当广阔的社会政治视野和总的发展水平，而这是革命前的和资产阶级的学校所不可与之比拟的。

但是，中小学校有一个根本的缺点未能克服，就是它为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输送的人才水平还不够高，科学基础知识还掌握得不够牢。废除综合性的大纲并不是否认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1932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教学大纲和学校制度的决定中已指出了这种联系所存在的缺点及加强这种联系的必要性。

② 指《七年制统一劳动学校教学大纲》一书（莫斯科，1921年）。

③ 分科制——为了实行专业化在中小学高年级分为许多科，但保持共同的基础教学内容。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284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2年10月8日）。

①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系文学艺术领域里无产阶级独立的文化教育组织，成立于1917年9月，不受资产阶级国家的管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是在捍卫其独立性的幌子下，使这一组织走上了脱离无产阶级国家领导的道路。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意义估计不足，企

图摆脱群众文教工作的任务，坚持通过实验的途径建立纯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理论。

列宁、联共(布)中央和克鲁普斯卡雅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立场。

二十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地方组织改由工会管辖，1932年由于文艺团体改组而解散。

② B·Φ·普列特涅夫(1886—1942)，曾于1921—1932年期间任“无产阶级文化”派中央委员会主席。

组织自学(第289页)

第一次以《读什么和学什么》丛书的一个分册的形式出版(1922年，莫斯科)。

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联共(布)党纲指出，学校及教育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国家全面协助工农自学及其自求深造(建立校外教育机关：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文化宫，大学，短期训练班，讲演会，电影院，艺术工作室及其他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卷，第49页，第8版，1970年，莫斯科)。

克鲁普斯卡雅主张，必须为自学者拟定教学大纲，编写教学法指导书，出版参考书、科普读物和自学杂志，推广各种形式的函授教育。克鲁普斯卡雅对自学问题写了很多文章，发表了很多演说。1922年成立了国家自学委员会，以后多次召开了全俄各种会议来讨论有关组织自学的问题。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科技革命的形势下，不断更新社会全体成员的知识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因此，1973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法律基础》中，有一条专门谈到自学问题：“12.为了促进公民的自学并提高其文化水平，特开办人民大学、讲习班、短训班、共产主义劳动学校及其他社会形式以普及政治和科学知识。国民教育各机关和机构均应协助组织公民的自学。”该文件的第19条指出，中等普通教育学校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他们(指学生——编者)不断完善自己知识的志向以及独立补充知识、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苏联国民教育》，第96页和97页，1974年，莫斯科)。

① 泰罗·弗雷德里克·温斯洛(1856—1915)，美国工程师，创立了工厂管理法，旨在尽量缩短劳动时间并合理地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在

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泰罗制度是用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的。

② И·И·伊万纽科夫(1844—1912)，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教授。他承认经济现象的历史正确性和进化情况，支持温和的民主改革。

③ 摘自普希金：《诗人》(《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查良铮译，第19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④ 威廉·詹姆士(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撰有情感理论和“意识流”理论的著作多本。他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也是实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⑤ 见威廉·詹姆士：《心理学》，第223页，第8版，1922年，彼得格勒。

⑥ 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杰潘诺夫)(1870—1928)党和国家活动家，撰有经济学、历史学和无神论方面的著作多本，曾翻译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及其他著作。他是俄罗斯联邦首任财政人民委员，《消息报》主编(1925—1928)，列宁研究所所长，1921年—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

⑦ 威廉·詹姆士：《心理学》第250—251页注。

⑧ 同上书，第251页注。

⑨ А·А·波克罗夫斯基：《图书馆工作》(论人民图书馆的文化和社会工作)，第6页，1919年，莫斯科)。

⑩ 孟德斯里·詹姆斯(1848—?)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兰开夏纺织工会的领导人。

⑪ 威廉·詹姆士：《心理学》，第101—102页。

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第313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3年3月7日)。根据克鲁普斯卡雅所著《少先队运动的道路》一书第2版，莫斯科1928年刊印。

① 1910年，沙皇俄国共有250万流浪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918年)，流浪儿人数又急剧增加。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为消灭儿童流浪现象展开了斗争，拨出了经费，开办了许多儿童之家。但是，由于国内战争的影响，经济凋蔽，特别是由于1921年的旱灾，据克鲁普斯卡雅证实，流浪儿至1922年已达700万人。为了联合各个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来消灭流浪儿现象，根据捷尔尔

斯基的提议，1921年2月成立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儿童委员会，负责建立儿童之家以收容流浪的少年儿童，安排他们从事劳动，并对他们进行职业训练。1924年7月24日成立的“列宁基金会”在拨款开办儿童之家这一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1917年，孤儿院收容的儿童只有3万人，而1923年，儿童之家收容的少年儿童已达80万人左右。

当时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儿童之家、收容所和公社的教育工作都搞得很好。

1924年，为了发动社会力量来反对流浪儿现象，成立了“儿童之友”协会。随着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流浪儿人数逐渐减少。到三十年代中期，流浪儿现象已基本消灭。

② 指保障未成年人的社会权利处。

浅论教师(第317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3年3月27日)。

弗·伊·列宁在他所写的《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和《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均发表于1921年2月)两文中，都提出要特别注意吸收具有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知识的教育家参加工作，并把他们安排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担任负责工作。同时指出，非党专家必须在党员监督下进行工作。教学内容，特别是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列宁讲到要善于发现和使用专家，实现教育家与党员领导人的合作(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10—111页，第112—116页)。

教育人民委员部吸收了巴·彼·布朗斯基、H·H·约尔丹斯基、С·Т·沙茨基、H·B·契诃夫等非党专家参加了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法的领导工作。

克鲁普斯卡雅此文捍卫了党在对待专家问题上的路线，反对在所谓与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的幌子下对专家一律持怀疑态度。约尔丹斯基、沙茨基和其他许多专家在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后，他们的全部活动充分表明他们无限忠于苏维埃新学校并且真诚拥护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思想。

① P·B·拉法伊尔(法尔布曼)于1921年至1923年任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局长。1927年，由于他积极参加“反对派联盟”的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党。

② H·H·约尔丹斯基(1863—1941)，革命前系进步的国民教育活动家。1921年—1922年为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和儿童社会政

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局长。晚后，在莫斯科高等师范学院任教授，撰有学校管理学方面的著作多本。

③ C·T·沙茨基(1878—1934)，俄国和苏维埃教育家。1905年在校外儿童工作方面开始其教育活动。从1919年起任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站长，1921年—1933年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1929年—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1932年—1934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教育实验室主任。1928年加入共产党。撰有大量教育著作：关于学生社会公益工作法，关于儿童集体的组织问题，关于环境对儿童个性的影响等等方面的著作。

改革教师培养工作(第320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3年7月11日)。

① 指1923年3月召开的全俄第二次省社会教育科长代表大会。

② 指国民教育处。

论道德缺陷儿童问题(第324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3年，第9期，11月号)。

本文批判了1918年—1923年间在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中间流行的“道德缺陷”概念和理论。与“道德缺陷儿童”这一概念同时并用的术语还有“妨害社会利益的”儿童，“变态心理的人”，“不讲道德的人”。属于这一范畴的儿童主要是一些在道德感情的发展上有缺陷的人。道德缺陷这一概念是英国精神病学家布里查尔德在十九世纪初叶提出的。在俄国，道德缺陷这一概念见于特罗辛的儿童心理学著作以及别里斯基等人的著作中。

克鲁普斯卡雅首先指出道德缺陷论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指出这种理论非人道的、露骨的资产阶级性质。与此同时，《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还于同期发表了巴·彼·布朗斯基写的《论所谓道德缺陷》一文，该文阐述了这一概念的起源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心理学的分析。

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在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第327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3年，第9期，11月号)。

1923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克鲁普斯卡雅作了报告。她的报告提纲对有关各级教学和教育机关的整个制度作了说明，并且就这一制度如何在对国民教育进行了六年社会改造之后形成的过程作了描述。提纲阐明了这种改造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了进一步发展苏维埃教育的前景。

1918年5月3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各级教学和教育机关一律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法令，是俄罗斯联邦国民教育制度的基础。晚后，又相继通过了有关国民教育制度的下列政府决议：

1919年2月20日：关于将孤儿院和其他儿童机构由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所辖改为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议；

1919年6月20日：关于扩大职业技术知识面的措施的决议；

1919年12月26日：关于扫除俄罗斯联邦居民中文盲的决议；

1920年1月29日：关于职业技术教育总局职权范围的决议；

1920年6月4日：关于高等技术学校的决议；

1920年7月29日：关于职业技术教学的决议；

1920年9月17日：关于工农速成中学的决议；

1921年9月2日：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的状况；

1922年12月27日：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报告的决定；

1923年8月20日：关于制定普及教育计划的决定；

1923年12月18日：统一劳动学校的章程；

1918年1月2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的法令和1918年2月18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非宗教学校的决定宣告了学校与教会脱离；

1918年5月31日：教育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决定；

1917年12月20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学前教育处的通告，宣布要建立学前教育的国家制度，把学前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8年9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统一劳动学校条例。

① 在二十年代，长日制学校为数极少。

② 暑期学校是指二十年代暑期进行各种形式的教学和教育工作(保健活动，体育活动，参观旅行和乡土研究小组的活动，采集植物标本，学生参

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种组织。

③ 参见《谈教学大纲问题》一文注①(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2卷,第112页)。

④ 参见本书《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④。

⑤ 青年农民学校是农村不完全的中等普通教育学校。1923年10月,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关于建立青年农民学校的方案。1923年11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一方案。1924年5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同年7月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同年10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决定都肯定了这种学校类型。青年农民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校一直存在到1934年建立统一的初等和中等学校结构时为止(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4年5月15日决定)。

⑥ 设计教学法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农业青年俱乐部在工作中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把各种课程的材料统一起来,使之服从于完成一定的劳动任务或实际工作的培养任务。它是使理论与实际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知识的选择上完全从功利主义出发而对理论材料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克鲁普斯卡雅反对把设计教学法变为一种万能的方法。

⑦ 市政劳动是指与城市经济各个领域有关的劳动。以这种劳动为基础的城市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法材料没有编出。

1925年起,与工业企业有联系的七年制学校在工人区有了广泛的发展,这种学校称为七年制工厂学校。从1934年起,七年制工厂学校改为不完全中学或完全中学。

⑧ 有关教师培训制度的问题详见本书《改革教师培养工作》一文(第320页)。

⑨ 科学教学法研究会和省国民教育局的工作机关。它由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各种专业教师组成,其任务是编写教学大纲和教学法材料,这些材料要能反映本省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特点。它们还要编写教学法指导书,这些指导书要根据当地条件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导文件加以补充和发展。

⑩ 工农速成中学1919年—1920年期间附设于高等院校,目的在于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工农青年尽快升入高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期限为三至四年。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有优先升入高等院校的权利。工农速成

中学在培养新型苏维埃知识分子上起了重大作用。工农速成中学于1940年停办。

⑪ 参见本书《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一文注②。

⑫ 共产主义大学系高级党校，学习期限三至四年，培养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共产主义大学中包含培养国民教育机关领导干部的共产主义学院。

⑬ 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外，苏联其他各共和国均采用了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不同，普通教育学校为七年制，下一阶段为三年制的职业学校，然后为二至三年的中等专业学校和三至四年的专科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专科学校被视为不同形式的高等学校。俄罗斯联邦的工厂艺徒学校是在四年制小学的基础上开设的。

培养列宁主义者（在俄国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336页）

第一次全文载于《俄国列宁共青团速记报告》一书（1924年，莫斯科）。

1924年1月24日，俄国共青团临时全会通过决议，俄国共青团以列宁命名。同时决定把苏联当时的斯巴达克小组和少年先锋队儿童共产主义小组更名为列宁少年先锋队儿童共产主义小组。全会决定由俄国共青团全俄代表大会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审议。俄国列宁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7月12日至18日在莫斯科召开。在7月12日的开幕大会上，会议决定把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向全体团员、全体青年工人和农民发出了宣言。

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少年先锋队这个儿童共产主义团体和斯巴达克儿童团体易名为列宁少年先锋队这一儿童共产主义团体，并通过了告苏联全体少先队员、全体工农子弟书。大会讨论了共青团下一步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包括工农青年的劳动和教育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问题，红军和红海军中的工作问题等。克鲁普斯卡雅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培养列宁主义者》的演说。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14页。

② 列宁在《政论家的短评》（1920年）一文中批评了法国和德国中派分子的两个决议，他们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变成了偶像，

正如第二国际的许多决议成了他们领袖的偶像一样。列宁说：“……对偶像应该祈祷，可以画十字，对偶像应该磕头，但是偶像丝毫不会改变实际生活和实际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23页）

③ 参见《列宁文集》中文版第5卷，第486页。

④ 《工人之路》是1917年7月至10月间《真理报》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查封时所用的名字之一。

⑤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99页。

⑥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美国经济学家凯利所著《致美利坚合众共和国总统的政治经济书信》一书时写道：“历史的道路并非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这条道路完全通过荒野之地，有时尘土飞扬，有时泥泞不堪，有时经过沼泽，有时穿越密林。谁要害怕尘土满身，谁要害怕鞋子弄脏，谁就不可能投身社会活动”（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集，第7卷，第923页，1950年，莫斯科）。

⑦ 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5页。

论儿童之家问题（第341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4年，第7—8期，7月—8月号）。

① 克鲁普斯卡雅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曾在彼得堡巴甫洛夫学院学习。

学什么和怎么学（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第346页）

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教育》杂志（1924年，第5期，9月—10月号）。

克鲁普斯卡雅1924年9月20日在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在全会日程上所定的题目为《论青年团的列宁主义教育》。这篇报告与她1924年7月12日在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有着有机的联系。这篇报告曾以不同的标题发表过：《培养列宁主义者》（1924年），《论列宁主义教育》（1925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1925年）。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3—52页。

② 指1897年6月2日颁布的缩短工厂工作时间和安排节假日休息的新

工厂法。工作时间缩短为一昼夜11.5小时，节假日规定为66天。列宁1897年夏天在流放地所写的《新工厂法》这本小册子对这一法令作了透辟的分析和批判(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228—271页)。

③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极右翼领袖，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家，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国家。

④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初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最危险的机会主义——中派的思想家；敌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德国1918年11月革命，恶毒诽谤苏联。

⑤ 参见本书《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文注⑥。

⑥ 指列宁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34，261页)。

⑦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86页。

⑧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在《英雄和群众》一文(1891年)中把群众运动看作一种无意识的、模仿的运动，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超阶级的”力量，能够根除人民的不幸。“英雄”与“群众”的理论(其创始人 为П·Л·拉甫罗夫)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是社会 学中主观派代表人物所特有的理论，具有反动的性质。

⑨ 指1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列宁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时所说的如下一段话：“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354页)

讲话发表于1924年10月15日。第一次全文载于克鲁普斯卡雅著《学前工作》，1936年，莫斯科。

① 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于1924年10月15日至21日在莫斯科召开。主要议题是农村的学前教育工作；会上还讨论了幼儿园新的工作内容的报告、研究儿童的方法的报告和培养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的报告。

学校和少先队运动(第356页)

第一次载于《辅导员》杂志(1924年,第6期,10月号)。

工厂艺徒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在全俄工人教育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61页)

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5年,第1期,1月号)。

全俄工人教育代表大会1924年12月15日至21日在莫斯科召开。

① 参见本书《在俄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④。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3—470页。

③ 同上书,第468页。

④ 根据1936年的苏联宪法,剥削阶级分子、过去的沙皇警察以及神职人士均无选举权。

苏维埃学校(在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67页)

第一次全文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5年,第2期,2月号)。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县教师代表大会选举的1,600名代表。

大会讨论了下列报告:教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苏维埃建设的任务和教育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民族问题;与共青团的合作等等。克鲁普斯卡雅于1月11日向大会致贺词,1月14日发表了与流浪儿现象作斗争的演说,1月15日作了《苏维埃学校》的报告。

这次大会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

① 参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第417—418页,1924年,莫斯科。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

③ 1921年成立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成了制定普通教育学校新教学大纲的中心。该部制定的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一直用到1931年。

④ 指安纳托里·华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⑤ 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简称农互会)于1921年由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主持组成,遇有各种灾情和困难时给有困难的农民以救济。

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第380页)

本文写于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同时发表于《人民教师》杂志(1925年,第2期,2月号)和《共产国际》杂志(共产国际执行局机关刊)(1925年,第2期,2月号)。《共产国际》杂志该期还发表了《大会告世界各国教师书》。本文据《人民教师》杂志(1925年,第2期)刊印。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678页。

② 全俄教师代表大会1917年4月7日至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大会的代表多数是城市中学教师,其中许多人同情立宪民主党,主张只是对学校进行一点温和的改革。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6—680页。

④ 扫盲站:扫除文盲站。该站对成人文盲进行识字教学。由国民教育局、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举办。初期,扫盲站学习期限为三个月,后来改为识字学校,学习期限九个月。

⑤ 指1924年的农村苏维埃选举。

⑥ 吉敏剧院是一家私营剧院,1904年由吉敏创办于莫斯科。革命后收归莫斯科市苏维埃。

⑦ 参见本书《苏维埃学校》一文注③。

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奋斗(在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386页)

本文的摘要最初载于《真理报》(1925年5月20日)。这里发表的是1925年5月18日在大会的演说速记稿全文,曾编入《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书,速记报告,1925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莫斯科—克里姆林。

① 全苏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25年5月13—20日召开。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75页。

③ 指列宁的下列文章:《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1—688页,689—692页,698—712页)。

④ 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96页,1959年,莫斯科。

少先队运动(在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第389页)

本文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5年,第3期,3月号)。

克鲁普斯卡雅这一提纲是为迎接党的第二次国民教育会议而写的。这一会议原定1925年举行,后改定1929年举行,实际是在1930年4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

① “前哨”是各校少先队员和学生的组织,分为若干中队。“前哨”建于1922年至1934年,当时少先队组织系按生产原则建成,少先队各中队均附设在各机关和企业。1935年以后,少先队组织才开始按学校的班级建制。

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在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第393页)

这次大会于1925年5月末在莫斯科召开。克鲁普斯卡雅的发言第一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25年5月30日)。

① 兰喀斯特学校是指贝尔—兰喀斯特的相互教学制度,是小学组织教学活动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高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导生)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为低年级学生上课。因其创始人是英国教师贝尔(1753—1832)和约·兰喀斯特(1776或1778—1838)而得名。这种识字方法由于花钱少、收效快而于十九世纪初叶在许多国家(美国、法国、比利时)得到了推广。俄国学校从1819年开始采用这种方法,但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

② 指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参见本书《苏维埃学校》一文注。

③ 指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

④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86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

⑥ 同上书,第5卷。

⑦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是为了纪念列宁逝世而于1924年吸收最有觉悟的工人大量参加到共产党队伍来的一次活动。在三个月内,吸收了24万先进工人和两万农民为候补党员。

⑧ 见列宁《论合作制》一文(《列宁选集》第4卷,第681—688页)。

⑨ “候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组织。德国“新学校”的组织者之一——古斯特夫·维列金促进了这一组织的发展。他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自由的教育集体,师生应协同工作。